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苏联解体亲历记
（下）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名称与音译

对苏联及其继承国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叙述，总会有两件事令作者感到头疼：（1）选择和运用一种合理而又前后协调一致的音译方法，去翻译那些不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2）明确表达经常正式改变的地名和民族群体名称的概念。

关于俄语音译，我遵循一种注重实效而不是学究式的方法，我认为只要两种语言的发音许可，单词的实际译音要尽量接近。让我们来举例说明其含义。当西里尔字母“e”在字首或在元音字母之后出现时，我就把“e”音译为“ye”，因为这就是它的发音。反过来说，我通常忽略西里尔语中的“软音符号”（b），经常在音译时把它译成撇号（’），然而该符号在英语里是有不同含义的；同时也不可能指望不是专家的读者去知道该符号只不过是表明在其前面的辅音字母要用舌头顶住上腭发音。懂俄语的人知道“软音符号”应该在哪里；那些不会使用撇号的人就会搞错。现举一例说明两种不同的情况，即第一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姓名的拼写：我称他为“Yeltsin”，而字面上的音译却是“El’tsin”（叶利钦）。

其他在文字翻译上的例外情况包括用“y”来翻译形容词结尾的“ИЙ”和“ЫЙ”；用“ovo”和“（y）evo”来表示“oro”和“ero”的发音；在一些人的名字里，用“x”发“kc”的音——尽管在更多的文字拼写中那些名字并不是众所周知的。我处处努力设法把独特性尽可能减低到最低的限度，有时甚至不顾文字的稳定性。例如，在拼写常见的名字“Alexander”（亚历山大）时，不拼写为“Aleksandr”。在特殊单词和名称的音译中，我在全书尽力设法做到统一。

在注释和条目索引中，我较多地使用了音译表，正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

从俄语进行音译看上去似乎很复杂，实际上，这也许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因为此书有许多名字是由其他语言而不是由俄语构成的。一些作者为了使事情简单化，把所有译名全部译成好像是用俄语写成的，这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而且会使许多不愿其文化和语言被俄罗斯化的人生厌。不同的字母表不仅能成为一个有选择性的过滤器（在归宿语言中并不省略发音），而且也能成为一个歪曲形象的哈哈镜。例如：俄语里根本没有完全与英语里的“h”相同的送气音。按照传统，这个字母就被译成“g”。但是这就意味着英国人的姓“Garrison”（加里森）和“Harrison”（哈里森）在西里尔语中是一样的，而“Harry Hopkins”（哈里·霍普金斯）则变成了“Gary Gopkins”（加里·戈普金斯）。

当提到波罗的海三国和摩尔多瓦的人名和地名里（经常使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我决定尽力使用原来的拼写，而不用西里尔文音译。有的名字用西里尔语音译也能看得懂，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指出其替代的名称。有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的公民的名字是原先的斯拉夫人的名字，因此具有正确的西里尔语的词形，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说明。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他（她）自己是一个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或摩尔多瓦人，我就遵照他们的优先选择，采用非西里尔语的形式音译。于是，“Igor Gräzin”（爱沙尼亚语）就不是“Gryazin”（被音译的西里尔语）；“AnatolijsGorbunovs”（拉脱维亚语）就不是“Anatoly Gorbunov”；“petruLucinschi”（摩尔

多瓦语）也不再是“pyotr　Luchinsky”了。

对于乌克兰人的名字，我采用了马克兰的地名形式（用“Lviv 和 Kharkiv”来代替“Lvov 和 Kharkov”），因为自从乌克兰独立以来，这些名字已开始普遍使用了。可是，基辅（Kiev）这个地名外国读者非常熟悉，我认为把它译成“Kyyiv”将是一种愚蠢的强求一致。至于人名，我努力设法用个人所喜爱的形式；但是如果拿不准的话，我就采用比较熟悉的俄语形式。

白俄罗斯语（Belarusion，以前的拼法为 Belorussion）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白俄罗斯语还没有普遍纳入拉丁字母标准的音译中：一些作者使用波兰文表音法，其他作者用德文表音法，还有一些作者使用纯属个人的表音法。而且，白俄罗斯语和俄语的语音变化，在未受过东斯拉夫语训练的读者看来差异很大。例如：一个于 1991 年 8 月政变以后被迫辞职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在俄语里是“Dementei（或 Dementey）”，但在白俄罗斯语里就变成“Dziernyantsiei　（或 Dziemianciej），或者可能还有半打其他的译法。有鉴于此，我勉为其难地用俄语形式保留了大部分白俄罗斯人的名字，如果这种做法得罪了我在那里的朋友，本人在此表示歉意。

在近代，既不用西里尔语，也不用拉丁字母（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书写的名字，或者用一种以上的字母（如突厥语）拼写的名字，引起了另外的纠纷。我一般采取以下的做法：

·对于格鲁吉亚语，我采用西里尔语音译，因为除了格鲁吉亚语需要增加区别符号这一点不容易被英语读者理解外，一般说来，这种音译和用格鲁吉亚语音译没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亚美尼亚语，我也基本上用西里尔语音译。但涉及一些在亚美尼亚的活跃人物时，就要同一些与亚美尼亚表音法结合的变化来音译。由于亚美尼亚语有“h”这个音而俄语没有，我就在人名中应该有的地方加上这个字母。而且，在亚美尼亚语中，一般的亚美尼亚名字的结尾都拼写为“一 ian”，而在西里尔语中则被译成“yan”。因此，1989 年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就被叫做“Harutiuntian”而不是“Arutyun-yan”。如果此人不是活跃于亚美尼亚而是活跃于俄罗斯，我就用西里尔语来翻译，即使这个名字是亚美尼亚人原来的名字。

“Abel　Aganbegyan”这个名字的译法将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突厥语的问题更为复杂。本世纪以来，突厥语用三种字母来书写（即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突厥语中的很多语言正处在从西里尔字母回归拉丁字母的过程之中。我以为最好不要试图去预测未来，而需用俄语音译，除了那些情况以外，即当我知道特定的人宁愿选择不同的形式时，或者要把俄语里的“g”矫正为原来的“h”，就像在“HeidarAliev”这个名字中，是“Heidar”而不是“Geidar”那样。

阐述我对不断变化的地名的处理方法要容易得多。我尝试用我所描写的事件发生时通用的地名。例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而现在则是圣彼得堡市长，工作没有变动。安德烈·萨哈罗夫曾被流放到高尔基市。但是如果他的寡妇要去看看他们在那里的公寓时，她必须去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市旧称）。斯摩棱斯克的西面是白俄罗斯，过去作为苏联的一部分称为 Belorussion，现在则是 Belarus。摩尔达维亚甚至在独立前就已变成摩尔多瓦，但是在 1991 年许多人仍继续使用摩尔达维亚这一旧称。如果这些情况使读者感到混淆不清的话，我只能申明这也曾给我带来不少迷惑。

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已具有政治的重要性，它们没有歪曲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受到忽视。

我使用“Baltic”（波罗的海的）和“Balts”（波罗的海国家）这两个词来表达地理概念而不是表达人种学或语言学的概念。因此，“Baltic states”（波罗的海各国）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速写名称。在语言学和人种学的观念上，只有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才是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属于芬兰乌戈尔族。可是，这种差别不是我所讨论的有关政治话题，因此我让自己把“Balts”作为集合名词使用，代表所有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而不把它们写作“Balts and Estonians”（波罗的海国家和爱沙尼亚），这样将会更准确一些。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在提到官方的头衔时，我交替使用了“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部长会议主席)和“prime minister”（总理）这两个头衔。它们都与苏维埃共和国或苏联解体后相继独立的国家的政府首脑有关。从另一方面来说，直到1990年初为止，国家元首通常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统办公室首先是在苏联开始设立的，尔后许多共和国也设立了总统办公室，尽管不是在所有的共和国。甚至1990年在苏联创建总统办公室以前,许多新闻记者就把戈尔巴乔夫叫做“总统”，但这并不是他的官方头衔。由于总统办公室的设立通常具有改变政府机构的含义，所以在涉及国家元首的头衔时，我尽量小心谨慎，保留“主席”和“总统”之间的区别。为了避免与政府首脑混淆，我一般把后者称为“总理”，而不是“主席”，要不然我就使用全称——部长会议主席。

致　谢

1989 年在一次吃午饭时，纽约卡内基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维·江伯格先生第一个向我建议，在我卸任驻苏联大使后，写一本有关苏联改革的书。他的想法很合我的心意，我首先考虑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作一番评论。　1991 年 10 月，我离开了莫斯科，退出了外交部门，开始筹划此书的细节。但就在此时，事态的发展加快了速度，显然，要想将它们概括进一本实用的书籍已不可能，甚至连一些日报也难以跟上这些千变万化的变革。几个星期之后，苏联终于垮台了，起初曾被认为是对当代事件进行分析的东西现在已变成明日黄花，成为对最近的过去的判决报告了。

本书对我本人经历的描述已超过了实际的需要，我本人希望如此。唯有我才能将这些经历准确而详尽地记载下来，但是我并不想以这些经历“证明”我是这些事件的中心（当然，我不是），我只想以我个人对这些重要事件的所见所闻，尽力提供一些内幕信息。

许多人帮助我加深了解了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由于人数太多，我无法在此一一向他们致谢。尤其是我的那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 1983—1986 年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同事，他们不断地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实际的支持。作为美国驻苏联大使，我曾经和最优秀、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外交官员组成的集体为了唯一的使命在一起工作过，这是我的殊荣。他们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工作，然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最自信的幻想家的想象。我将此书奉献给他们，有些人对我的帮助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我未能列出他们的名字，那将是我的疏忽。我的助手理查德·库姆斯、约翰、“迈克”乔伊斯、约瑟夫·赫协格和詹姆斯·科林不仅管理着驻莫斯科使馆，使我能以大部分时间与苏联的公民和官员们交往，而且不断地向我提出明智的建议。欧内斯廷·芒西、凯·托马斯和玛丽·弗朗西斯·威尔逊先后担任我的行政秘书，他们安排日程，使我能有效地利用时间，对各项活动做充分的准备。作为助手，迈克尔·克列切斯基、伯纳丁·乔斯林和西奥多·林特别擅长组织旅行、检查社会职能方面的计划是否妥当、帮助我进行新的联系。我希望能用更多的笔墨描述这一时期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这样，我将更充分地向使馆的许多其他杰出人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还要对苏联最高层官员们给予我的信任表示感谢，由于这种信任，他们在我在莫斯科任职期间与我交往，其后，我对撰写此书还特地去访问了他们。戈尔巴乔夫总统、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前总理雷日科夫、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别斯梅尔特内赫以及许多其他官员，诸如白俄罗斯议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波波夫和索布恰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博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先生，他们不仅在我从外交部门退休后答应接见我，而且还慷慨地允许我描写与他们早期的谈话。

来自卡内基公司的补助金使我有可能集中精力研究此书，并且能到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于 1992—1993 年相继独立的独联体国家作几次旅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曼研究所不仅是我早期学习苏联知识的地方，而且在我调研此书期间，像款待高级研究学者那样，为我提供了一套住房。达特茅斯大学的迪基基金会（当时由伦纳德·里塞尔博士主持）在 1992 年夏季拨给我一笔迪基补助金，这笔钱使我在撰写前几章时处在田园诗般的幽雅环境中。

我遇到南希·卡尼特别幸运。她很早就在我们驻莫斯科的使馆里工作，任研究助理。我还要感谢阿曼达·莱内斯，他于 1992 年替代南希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时期。

当本书写成时，许多同事给予了鼓励并提出建议：赫伯特·S·奥肯大使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赫伯特·埃利森、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歇尔·舒尔曼、罗伯特·莱格沃尔德、理查德·埃里克森、亚历山大·莫泰尔和我一起讨论了本书的发行问题，有几个人还通读了原稿或阅读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他们以及我的长子詹姆斯·G·马特洛克的意见使本书的定稿生色不少。

撰写此书所花的时间比我当初设想的要长。但是，我的文字助手菲菲·奥斯卡德的信心和坚定不移的支持时时给我以帮助，使我完成了这项看上去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任务。

我得特别感谢我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他向我指出，我的文字中存在着比我想象得还要多的缺点。他的敏锐意见改善了此书的结构，他的蓝铅笔则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如果他准许我不时地使用那种久已渗透到我的职业环境之中的绕弯子的官僚语言的话，这无疑能证明我从前的确曾为政府工作过。

丽贝卡·马特洛克是这个故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原稿编写和需要提供大量照片时，她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没有她，大部分章节不可能产生，而本书也肯定永远不能写成。

苏联解体亲历记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

第十七章

预演

此时此刻怎样才能取悦总统呢？……教别人撒谎，你就能当上中央电视台的头儿。搞垮整个经济，他就会让你当上总理。

尤里·切尔尼琴科 1991 年 1 月 20 日①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尼古拉·被得拉科夫辞去戈尔巴乔夫顾问一职时所作的解释 1991 年 1 月②

罗纳德·里根是对的。这的确是个罪恶的帝国。

瓦连金·奥斯科茨基在莫斯科举行的声摞立陶宛的示威游行中的讲话 1991 年 1 月 20 日③

在 1991 年 1 月 7 日开始的那一周里,戈尔巴乔夫再次加紧了对立陶宛的控制，这次的行动比去年春天的行动更具有威胁性。国防部宣布正在向立陶宛派遣一支伞兵先遣部队，表面上说是去对付那些拒绝服兵役的立陶宛人。由莫斯科支持的联合阵线在维尔纽斯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立陶宛政府提高零售价格。当议会主席兰茨贝吉斯宣布推迟物价上涨的时候，总理普隆斯基涅提交了她的辞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随即接受了她的辞职。这时，戈尔巴乔夫利用维尔纽斯出现的政治混乱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戈尔巴乔夫于 1 月 10 日颁布总统令，把局势日趋紧张完全归罪于立陶宛人，指控他们违犯了宪法、侵犯了人权并企图恢复“资产阶级”制度。总统令责令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立即完全恢复苏联和立陶宛〔450〕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废除此前通过的所有违宪法令”。④虽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日益强硬，但是这个总统令还是令我感到震惊。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总统令除了加剧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外，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他正在为一场悲剧作准备——这场悲剧将会同时吞噬掉他本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受制于谢瓦尔德纳泽所描述的那些力量了呢？

立陶宛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苛刻的、毫无余地的要求；这个总统令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使用武力提供借口。事实上，不等立陶宛作出回答，在颁布总统令的次日即 1 月 11 日，苏联军队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占领维尔纽斯的一些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过去属于共产党和共产党控制下的一个准军事“公共”组织，现在由立陶宛安全官员使用，另外还有一个新闻中心。

早在这些建筑物被占领之前，兰茨贝吉斯就向西方政府发出了痛苦的呼吁，要求它们采取“断然行动”，防止苏军入侵立陶宛。兰茨贝吉斯特别要求对立陶宛作出正式的外交上的承认，并且发表了苏联宪法不适用于立陶宛的声明。他尤其担心的是，国际社会由于过分关注伊拉克问题而忽视了苏联对立陶宛的镇压。

然而，华盛顿的目光并不仅仅是注视着海湾危机。甚至在美国官员看到

兰茨贝吉斯的呼吁之前，白宫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已经谴责以伞兵相威胁是一种“挑衅，只能起相反的作用”，他敦促苏联政府“停止恫吓的企图，回到谈判中来”。代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戈伯格召见了苏联大使，我也获得了指示，向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官员传递更加坦率和明确的信息。布什总统星期五与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亲自提醒他我们的关注。

维尔纽斯流血事件

当紧张不断升级的时候，我接到了叶利钦办公室的消息，叶利钦本人希望1月12日星期六的上午同我见面。我非常想知道俄罗斯政府准备怎样阻止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日益增长的威胁，如果他不叫我去，我自己也可能会去约他。我当时不知道华盛顿的白宫官员曾经考虑过责令我拜见叶利钦，但是由于顾及此举可能会激怒戈尔巴乔夫，所以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忘了通知我他们后来的决定。

叶利钦出席约会通常都很准时，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却让我等了 10分钟。当他在会客室接见我的时候，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同主席团一道制定出了俄罗斯关于立陶宛问题的公开声明。他称之为“强硬的声明”，因为它谴责在立陶宛使用军队，要求不要在该地区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动用从俄罗斯招募的军人。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自信知道答案。他望着我，仿佛我在问他为什么莫斯科冬天会变冷一样，然而还是耐心地解释道：“如果他们可以对立陶宛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动用武力，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对俄罗斯的议会动武。事实上，如果他们在对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我们就将成为名单上的下一个。”

叶利钦计划当天下午出席联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说他相信其他几个共和国的首脑也会和他采取相同的立场。他明确表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已经破坏了戈尔巴乔夫希望达成新联盟条约的努力。他认为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完成这件事情。

当我从叶利钦的办公室返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接到了贝克国务卿写给谢瓦尔德纳泽的一封信。当时还没有任命继任人，所以谢瓦尔德纳泽还在担任外交部长。但是，我们被告知那天见不到谢瓦尔德纳泽，所以我只好把信交给了负责对美关系的外交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奥布霍夫。国务卿的信件强烈呼吁缓解立陶宛的局势，明确地表示一旦使用武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452〕严重的损害。我让奥布霍夫尽快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谢瓦尔德纳泽（因为它是用英语写成的，所以还需要一个译本），而且我还让他告诉谢瓦尔德纳泽，如果有什么消息要传达给贝克国务卿，我整个周末都等着为他服务。奥布霍夫向我保证说，谢瓦尔德纳泽会很快收到这封信，但是我怀疑他是否还在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尽管尚未任命继任的新外长。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局势是如此严峻，如果他继续待在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干到周末，就很可能成为“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府中的一名成员。

事实上，尽管直到下一周的星期二才任命接替他的人选，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早在那个周末就已经停止行使外交部长的职责了。

在我拜见期间，奥布霍夫询问为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打前站的小组何时到达,这次访问原计划 2 月份进行。通常在举行首脑会谈之前的 5—6 个星期，一个小组就会先期到来，为会议日程和其他事情做准备。但是，这一次白宫对此出奇地平静。我告诉奥布霍夫我可以催问一下，但是同时也坦率地告诉

他，我怀疑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如此严峻的气氛中还会不会进行这次访问。

奥布霍夫扬起头，显得十分不悦，然后便故作惊讶，说我们竟然让“一桩内部事务”影响到首脑会议这样的重大事情。我告诉他说，他很清楚我们并不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情况视为“内部事务”，而且如果莫斯科的行动导致那里发生流血，很难想象首脑会谈会在那样的气氛下举行。我提醒他注意美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并且要他力求使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最高领导人充分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感情的力量。

当晚，我非常注意收看电视新闻，因为我希望听听在叶利钦对我评论过的那个声明中，俄罗斯立法机构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新闻对俄罗斯的声明只字未提。国家电视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显然已下了命令，对这个声明不予理睬。苏联电视忽视重大新闻事件的例行做法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看来，这种倒退行为证明戈尔巴乔夫以克拉夫琴科取代涅那谢夫的做法正在产生效果。

新闻广播对最近这些事件的态度是一个不祥之兆。以稳重的语调播送的新闻暗示，立陶宛秩序大乱是由于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不能进行有效的领导。〔453〕　虽然这一天白天很长，但是这一天夜晚显得更长。我被邀请去参加为纪念《莫斯科新闻》周刊发行 60 周年而在“旧历新年”——十月革命前使用的历法中的新年——举行的庆祝活动。邀请参加的时间是晚上 11 点，整个庆祝活动将持续到午夜以后。

我不喜欢深夜，而且考虑到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知道这种周年庆祝活动将更像是一次守灵而不像是一次晚会，但是我必须参加。民主俄罗斯的许多领导人将会出席，而且此次庆祝活动将为我提供一个听取最新的政治小道消息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我的出席将象征着美国对改革的支持，表示我们同那些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人士站在一起。

叶利钦在一个保镖的陪同下姗姗迟——他喜欢夹道欢迎的入场方式——身后跟着许多摄影师，并被引到了礼堂中我坐的那一排。他一个劲地朝我打招呼，坚持要我挪过去坐在他旁边以便交谈。他的保镖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为我调整了椅子。当我们进行简短谈话的时候，好几个电视摄像机都对准了我们。

他正利用我来传达一种政治信息，而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我也像他一样在利用对方传达信息，否则我可能早就生气了。他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正在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商讨；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赞成他当天下午所作出的呼吁，即不要干涉立陶宛。

当天晚上，我听说反复无常的财政部长瓦连金·帕夫洛夫将被任命接替雷日科夫的总理职务。这个任命非常奇怪；帕夫洛夫既无政绩又无能力，不可能成为一名有效率的政府首脑，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我问叶利钦此事是否咨询过他。他回答说他早就听说帕夫洛夫是候选人之一，但是两天前他还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认为帕夫洛夫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听说戈尔巴乔夫已决意任命帕夫洛夫，如果戈尔巴乔夫确实这样做了，他也不会反对这个任命。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此外，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下达明确的指示，任何一位苏联总理都不能实施需要进行的改革。

我又问他是否注意到了电视新闻对他关于立陶宛的声明不予〔454〕理睬。他咧嘴一笑，大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对此应该怎样报道。”⑤正如

我预料得那样，当晚的节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以后。幽默短剧一个接着一个，对白常常非常可笑，但是表演者们却没有喜剧情趣。虽然也经常传出笑声，但那是冷漠的勉强发出来的笑声。人人都表现得忧心忡忡。

当纪念活动的主持人宣布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才得以解脱。我回到斯帕索别墅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当我把头靠在枕头上的时候，克格勃精锐部队阿尔法突击队正在发起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战斗。就是这支部队在 1979 年 12 月 24 日突袭了喀布尔的总统府,并且暗杀了拒绝请求苏联提供“ 友善的援助 ” 的哈菲祖拉 · 阿明总统。

谁下的命令？

当我被电话铃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天空还是一片桃红。半梦半醒的我把话筒从话机上取了下来。打电话来的是我的副手詹姆斯 · 柯林斯，他告诉我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建筑群在夜里已经被攻占了，人员伤亡惨重。虽然报告只是片断不完整的，但是显然有许多平民被打死了，数百人受了伤。而且有迹象显示，对议会大楼的进攻可能已迫在眉睫。绝大部分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坚持留在大楼里面，数千平民聚集在外面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如果大楼遭到攻击，其结果必然是血流成河。

整个上午不断传来各种报告。除了外国记者的报道之外，通过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从 1990 年 3 月起在该地区实行的外交人员禁令几个星期前已经取消了），我们获得了自己的目击报告。

中午时分，我为自己匆匆写下了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做？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在联邦委员会获得对这种做法的牢靠的支持。不等调查委员会到达⑥就开始这类军事行动，粉碎了两个一本正经的谎言，即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下达命令（这能让人相信吗）以及事态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难道说这一切大部分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谢瓦尔德纳〔455〕　　泽辞职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些计划了呢？但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在事情发生时他仍然担任外长一职呢？事实上，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维尔纽斯的最高委员会大楼有没有受到攻击。当我了解了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俄罗斯备派力量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反应，便能更好地把握这一事件了。我不能想象所有力量都会袖手旁观，但是我也怀疑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行动。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苏联外交部的请柬，邀请我去同第一副外长阿纳托利 · 科瓦廖夫会谈。我的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和其他几国的大使同行们也被邀请参加。集体召见我们，又是在星期天的下午，这暗示着问题既重要又紧急。

我们集中在一个中等大小的会议室里，过去谢瓦尔德纳泽常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议员代表团。科瓦廖夫是葛罗米柯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他又高又瘦、态度和善，被公认为是一个西欧专家和严肃的诗人。他现在似乎已经是代理外交部长了，因为他没有提到是奉谢瓦尔德纳泽之命。我怀疑是否谢瓦尔德纳泽本人拒绝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如果这样他就不得不为戈尔巴乔夫做些辩解。

科瓦廖夫告诉我们他刚从总统办公室来，希望把总统的信息带给我们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当他翻阅笔记的时候，他的手有些颤抖，而且他嗓音也在异常地发颤。他接着说道，总统希望让他的外国同行们知道，他对攻击电视台的行为不负责任。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

全国的形势非常严峻，他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国内纷争进一步扩大。他希望他的外国朋友们放心，他仍然决心继续进行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决心要避免流血冲突。

我有些吃惊，不是因为否认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是“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下的命令”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完全控制苏联的安全部队了。

此前，除了接到过一个电话提醒我布什总统将会强烈谴责维尔纽斯的暴行之外（此时在华盛顿还是星期天早上），我还没有收〔456〕到其他指示。但是，我认为对科瓦廖夫的声明不作评论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告诉他，美国总统和公众都对维尔纽斯发生的暴行感到震惊，总统不久可能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从我个人讲，当听到戈尔巴乔夫没有授权采取暴力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既然事情是这样，我猜测戈尔巴乔夫总统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这次袭击，指出那些有罪的人将会受到相应法律的惩处。

科瓦廖夫向我们保证说，一定把我的意见带给戈尔巴乔夫总统。另一个大使问道，不知道他理解得是否正确，即总统不知道使用暴力的罪犯是谁。科瓦廖夫看着他的笔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念过的声明。

当我们离开大楼的时候，我的一个同行问我是否相信戈尔巴乔夫未曾参与此事。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最难使人相信的就是他不知道事态的发展，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个信息是假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呢？对此我也难以理解。他不太可能希望加深人们的怀疑，即认为他已不再能控制他自己的政府了。

“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糟呢？”我的这位同行问道，“是戈尔巴乔夫策划了这次行动还是他失去了对武装部队的控制？”

“我不清楚，”我告诉他，“两种可能性我都不喜欢。”

当天，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其他苏联高级官员都没有对这场悲剧发表声明。然而当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国防部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格内基·卡舒宾少将进行采访时，后者把所有罪责都推给了立陶宛人。据他说，民族拯救委员会反复要求立陶宛当局停止在他们控制的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煽动性的讲话。他声称当这些请求无人理睬的时候，该组织就作出了志愿军事人员应该去控制电台、电视台的决定。然而，当这些人员接近这些建筑的时候，立陶宛非正规军朝他们开了火，于是他们就向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求援。〔457〕接着，他发表了针对立陶宛民选政府的长篇攻击性演说，指出该政府的做法违犯了宪法，特别是践踏了军人的权利。

这是自 1983 年否认苏联空军击落了一架韩国民航飞机以来,又一个愚蠢的妄图掩人耳目的故事。每一个目击者都同意是攻击部队——他们不是来自维尔纽斯的卫戍部队，而是来自克格勃——首先向人群和广播大楼控制室及制作室中的人开枪的。但是，谁首先开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谁企图通过装备精良的军队夺取属于立陶宛政府的设施。

当戈尔巴乔夫保持沉默的时候，叶利钦开始行动起来。他立即飞往爱沙尼亚的塔林，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缔约一方将“承认其他几个国家的国家主权”，禁止各自的公民参与“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武装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宣布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是作为独立国家，而不是苏联的组成部分——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强调后一点，他们宣布这份声明将呈送给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全世界的议会和政府。

叶利钦走得甚至还要远些。他向俄罗斯的军事人员发出直接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听从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平民开火的命令。他还向军队中的俄罗斯族人发出呼吁，要他们“记住你们自己的家园，你们自己的共和国的现在和未来，以及你们自己的人民。对合法机构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犯下的暴行会给俄罗斯自身带来危机，并且伤害居住在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⑦这比一天前他对我讲的话更加雄辩有力，他的话在整个国家上空回荡。

叶利钦已经在经济政策方面向戈尔巴乔夫发起了挑战；现在他又对戈尔巴乔夫在违背加盟共和国政府意愿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控制军队发出了挑战。军事指挥官们都痛恨叶利钦，因为叶利钦曾对他们提出过尖锐批评并提出过削减军事预算的计划，他们当然不会理睬他的呼吁。但是，在 1 月 12 日和 13 日发表的声明中,叶利钦开始提出来自俄罗斯的军人应该把最高忠诚献给〔458〕他——俄罗斯的领袖，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双重权力的成分正在增长。

与此同时，更多的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由于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加入到保卫其民选领导人的人盾行列，维尔纽斯议会大厦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公然违抗保卫该地区的坦克车手的命令，后者使用麦克风命令人们下午 5 点以前离开，否则就会面临攻击。在立陶宛其他大部分城市里，甚至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举行了群众集会。里加的局势几乎和维尔纽斯一样严峻，示威者们开始在那里的议会周围修筑栅栏。声援立陶宛的示威游行席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什尼奥夫、利沃夫和帝国的其他许多城市。

戈尔巴乔夫于次日即 1 月 14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对维尔纽斯悲剧公开发表评论。令我沮丧的是，他的评论似乎是在为攻击者们开脱。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也就立陶宛最近的事件向最高苏维埃做了报告。他们发现的唯一问题是，顽固的立陶宛领导层对无法无天的行为听之任之。他们声称军队由于激怒而采取的行动不应该受到指责。

我看着他们在电视上的讲话，心里一阵阵恶心。于是，我写下了下面的笔记：

普戈、亚佐夫、甚至戈尔巴乔夫对昨天事件的解释根本不能令人信服。攻打维尔纽斯电视塔的命令似乎是一个下级指挥官根据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救援请求而下达的。戈尔巴乔夫说他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在凌晨 3 点被叫醒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可以相信的。但究竟是谁创造了条件使

这一切成为可能呢？谁向当地军事指挥官签发了空头支票呢？

而且为什么没有人试图去惩罚他呢？

况且，民族拯救委员会没有任何合法地位。它的成员状况还没有被公布，而且戈尔巴乔夫昨天也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组织由哪些人组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一个军事指挥官根据一个不为人知的非法机构的“请求”而对民用目标发动攻击的行为又怎么能被容忍呢？然而，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被容忍了；根据今天几个发言人的话来判断，这次〔459〕行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当的。

让我们把这次事件同阿塞拜疆发生的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控制权的事件相比较。军队镇压了那次事件，其根据是那是一种非法的夺权行为。然而

这一次，一个诡秘的集团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权力的企图似乎获得了联盟政府最高权威人士辩护！唯一的问题是谁向谁下了命令……

戈尔巴乔夫根本不能逃避对当前形势的责任。他或者策划了这起事件，或者不负责任地创造了事情得以发生的条件，或者被迫参与了整个行动。不管哪种可能性更准确，对于我们的政策的影响都是一样的：继续阐明进一步的冲突将会给苏联利益带来的严重后果。

许多人担心电视中心被占领后将会对立陶宛议会发动进攻，但是这种情形在星期天晚上和星期一晚上都没有发生。似乎有人下令维持现状，不要激发进一步的暴力——至少暂时要这样。然而，电视中心并没有归还给立陶宛政府，拉脱维亚的政治紧张也不断加剧。刚刚成立的拉脱维亚民族拯救委员会（其领导者是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的一名发言人要求解散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把权力转移给该组织。⑧其他人则要求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都实行总统直接管辖。我想起了 10 天前克留奇科夫对我发表的评论。整个事件似乎都是以民选政府丧失了对局势的控制为由，为“ 中止 ”民选政府做好准备。我所不清楚的是，究竟戈尔巴乔夫是计划的后台老板呢，抑或这是一个迫使他采取行动的阴谋。

星期二，戈尔巴乔夫就立陶宛的形势又一次发表了演说，但是对在维尔纽斯施暴的军队未做任何批评。与此相反，他继续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立陶宛人身上。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和军事机构继续呼吁他在该地区采取直接管辖。

对于戈尔巴乔夫没有谴责星期天早上发生在维尔纽斯的暴行一事，我并不是唯一感到沮丧的人。六个星期前刚被解除内务部部长职务的瓦季姆·巴卡金是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手中第一个对〔460〕这一事件公开表态的人。在《共青团真理报》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首先，我不能理解的是，国家总统为什么不把他与维尔纽斯事件的关系做一明确的、毫无掩饰的澄清。他作为总统的所作所为，他要求立陶宛的独立进程回到正常的途径上来以及尊重人权，所有这一切与夜晚采取夺取权力的企图毫无关系……

其次，我不能理解的是，议会里那么多人吵吵闹闹地抱怨缺乏信息……他们知道谁掌握着信息，应该去问谁。事实上，在作最后分析的时候，竟然缺少资料来证明是谁首先开的火……重要的是这一使许多人丧生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和

违宪的。很明显，任何将领听从街头人群或者自封的委员会的命令都是违宪的，不管这些群体的呼声有多大。⑨这是我在公开刊物上看到的唯一一份由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员发表的准确的法律判断。巴卡金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要在法制的基础上立国，但是又不情愿或者无法去承认明显的事实。

新闻工作者开始作出更为广泛的结论。1 月 15 日星期二，维塔利·波特尼科夫在刚刚创建的《独立报》上撰文写道，究竟是谁下令在维尔纽斯使用武力的问题总是纠缠不清，它表明“ 苏联权力的瘫痪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瘫痪的权力 ”。他还把苏维埃制度比作垂死的章鱼，虽然还在蹦跳折腾，但是却意识不到自己的触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被煮熟。⑩波特尼科夫描绘的情景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是我不能肯定有多少个触手已经被煮熟了。有一些也许只是麻木了，还可能会再次向外出击。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正在迅速地下降。他往往摆出一副恫吓和威胁的架势，然而还没有实施威胁就停止了行动。通常，他不去实施他的威胁是明智的，但是既然如此，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出威胁。

他对南奥塞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区）日趋严重的暴力活动的反应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一些奥塞梯政治领导人开始谈论正〔461〕式脱离格鲁吉亚、同他们的北奥塞梯（属于俄罗斯联邦）兄弟结成联盟的时候，新当选的格鲁吉亚领袖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逮捕了他们，未经审判就把他们关押起来。一开始双方的非正规武装人员在南奥塞梯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当奥塞梯人开始把格鲁吉亚人驱逐出本地区的时候，加姆萨胡尔季阿便派出了格鲁吉亚正规军。他们在隆冬封锁了奥塞梯的首府茨欣瓦利，造成了该市市民的极度困苦，在格鲁吉亚的眼中，奥塞梯的政治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后者正试图以肢解相威胁迫使格鲁吉亚继续留在苏联。

戈尔巴乔夫没有尝试向双方施加压力，使其达成妥协以解除危机的办法，他的选择是发布自己不可能去实行的总统令。 1 月 7 日，他命令格鲁吉亚政府从南奥塞梯撤出军队，但是格鲁吉亚议会以压倒多数票拒绝了这个要求，加姆萨胡尔季阿宣布任何实施这一总统令的企图都将使格鲁吉亚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

我并不同情格鲁吉亚对待奥塞梯的粗暴的做法。格鲁吉亚一方面反对苏联将其当作一个殖民地，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中间的少数民族要么接受附属地位，要么就走开。然而，戈尔巴乔夫武力干涉的威胁只会把事态搞得更糟：如果他不能实施命令，他的信用就会受损；但是如果他试图实施命令，他就可能给格鲁吉亚带来流血冲突甚至内战。

从 11 月中旬开始，戈尔巴乔夫不断发布徒劳的、自拆台脚的命令。在进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前两天，我记录下了对戈尔巴乔夫威胁向南奥塞梯派兵的评论：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落入抵挡苏联军队的陷阱，而格鲁吉亚人则不同，他们很可能会与威胁针锋相对。虽然我理解莫斯科对离心趋势的失望，而且也不认为格鲁吉亚人在对待奥塞梯人方面做得恰当，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这样行事……目前的方案是一个

愚蠢的方案——戈尔巴乔夫仿佛愚蠢至极，竟然看不到那些怂恿他以这种方式“ 施展权威 ”的人实际上希望取代他！既然他肯定不傻，那他本人一定欣赏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可能会奏效的幻想。可悲，可悲，可悲，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

当我把这些输入到我在斯帕索别墅里的个人电脑的时候，我〔462〕真希望克格勃的侦查装置能够窃取到我正在输入的东西，那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得到我的评论的副本了。然而，我根本不敢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得到这个情报，因为我所记录的信息正是克格勃主席不希望戈尔巴乔夫看到的东西。

在 1 月 15 日的那个星期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紧张局势就像发高烧一样，爱沙尼亚的局势稍轻一点。苏联最高苏维埃派出的代表团来往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首都之间“ 调查事实 ”，但是证据表明只进行了有限的几次真正的谈判。在维尔纽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仍然预计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军事进攻。当我们驻列宁格勒的总领事理查德·迈尔斯星期三访问议会大楼的时候，他发现代表们都倔强地执意要留在大楼里，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愿意牺牲在那里。

兰茨贝吉斯就是下定决心的代表中的一员，但是他也出席了为星期天的死难者而举行的葬礼。想要参加葬礼的人很多，以至于必须在足球场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发表了令人瞩目的演讲，他说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他感到羞耻，因为俄罗斯人进行了杀戮；他还说中央媒体对事件进行了歪曲的报道；最后，他用“ 立陶宛一定会独立！ ”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并不是所有在立陶宛的俄罗斯人都同民族拯救委员会唱一个调子。

1 月 20 日，星期天晚上，在里加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起初，它似乎反映出已决定要在那里使用武力。特种防暴部队的小分队（从他们佩带的缩写标志可以看出）袭击了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在整个过程中杀害了五个或者六个人。占领大楼之后，他们在午夜后两小时又撤走了。当战斗打响的时候，拉脱维亚总理伊瓦尔斯 · 戈德曼尼斯立即打电话给苏联内务部部长鲍里斯 · 普戈（他掌管着“ 黑色贝雷帽 ”部队），普戈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提出要派他的副手去里加进行调查。

后来证明这次攻击实际上是“ 黑色贝雷帽 ”部队军官的一次越轨行为，并没有得到高层当局的批准。然而尽管这样，这次行动还是加深了大家的紧张感。

〔463〕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命令不再进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大楼，但是他直到九天之后才间接地把袭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贴上非法的标签。然而，在 1 月 22 日的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继续批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坚持要它们废除“ 违宪的法律 ”，只不过又补充说，任何集团都只能通过宪法允许的途径而不是靠武力来获得权力，任何在政治斗争中运用武力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11）

鉴于违宪事件的严重性，这只不过是个非常温和的谴责罢了，但总算是有所表示了。

又一个愚蠢的任命

当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辩论达到高潮的时候，雷日科夫总理心脏病突发，于 12 月 25 日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年里，他一直遭到人们的攻击，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听到他住院的消息我非常难过。虽然我喜欢尼古拉 · 伊万诺维奇，敬仰他的勇气和正直，但是我也知道他不理解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因而成了亟待进行的结构性变革的障碍。如果苏联除总统外还将保留总理职位的话，那么这一人选必须懂得主要工作应该是把中央的经济权力重新分配给企业、地方和加盟共和国。

雷日科夫的疾病解放了戈尔巴乔夫的双手。尽管两人之间的紧张不断加剧，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迫使雷日科夫辞职，不愿意同他最初阵营里的又一个成员完全破裂。现在，他可以自己选择任命一个总理了。许多人预测他将利用这次机会改组部长会议，把它转变成类似美国总统内阁的机构，只有 20 来个成员，而不是现在的 60 多个。把经济部门的职能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将会满足加盟共和国领导们的基本要求，从而有助于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

戈尔巴乔夫花了三个星期来挑选雷日科夫的接班人，然后他在维尔纽斯流血事件的第二天即 1 月 14 日宣布自己选择了瓦连金 · 帕夫洛夫。由于刚刚发生的暴力事件所带来的混乱，几乎没有人注意这一任命。事实上，帕夫洛夫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总理〔464〕人选。戈尔巴乔夫任命他的想法早在几天前就传了出来，但是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助手都很难解释帕夫洛夫有什么资格担任总理。

帕夫洛夫身材微胖，长着一张圆圆的猪脸。自从 1989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部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货币供应增长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商品的增长。虽然价格仍然得到了控制，但是“ 卢布倒挂 ” 加剧了商店里的货物短缺，并且一旦放开价格就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政府以外的观察家们认为，财政部长至少应该对这个局面负部分责任，因而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挑选他晋升，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混乱日益严重的时刻。

我在一年前曾经见过他，当时我是为了安排他对美国的访问而去拜访他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古怪、不太严肃。不仅如此，他的行为中还有一些傲慢自大的成分。我们正在试图为他选定访美的时间，与他同行的还有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维克多 · 格拉什琴科。我曾经同格拉什琴科讨论过时间问题，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建议的所有时间对他都不合适。当我把这事告诉帕夫洛夫的时候，他拿起电话，找到了格拉什琴科，当着我的面命令他改变他的日程，必须在他曾经尽量避免的日子里出访。帕夫洛夫这样做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向我显示他对国家银行行长拥有权威。

有时候，他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古怪，以至于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然而随后的发展往往证明他是认真的。例如，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前 3 天，即 1 月 11 日，他应邀来到斯帕索别墅与我们共进午餐。在餐桌上，他嘲笑“ 卢布倒挂 ” 的提法，估计市面上只有 250 亿卢布而已。我认识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发行的卢布数量有 1000 亿甚至更多。鉴于印钞机过度使用的问题出现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采取辩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企图引用明显虚假的数字来否认问题的做法，是不能说服消息比较灵通的人士的。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他看上去很傻。

当有人提到卢布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时，他转过头来对我说：“ 这可能会让你吃惊，是我定下那个价格的。 ” 他的话果然让我吃〔465〕了一惊，以至于我都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听对了，于是我让他重复了一遍。使我感到吃惊的并不是听说财政部长涉足于黑市——事实上，我对此早有耳闻——而是我没有料到部长本人竟然拿自已牵扯进这类活动来吹嘘。他高兴地向我重复了他的话，然后解释说，在黑市上抛售美元是一种从投机商手中吸收卢布的好办法，因为他能够出到 40 卢布兑换 1 美元的比价。而当时官方汇率是 5.6。

尽管人们对帕夫洛夫能否有效地对付日益增长的危机普遍存在怀疑，但是他的任命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确认了对他的提名。

几个星期后，新的“ 总统内阁 ” 宣告成立了，这时大多数观察家——也包括我自己——又吃了一惊。我们曾经预计戈尔巴乔夫为了削减中央官僚机构会减少目前行使权力的经济部委的数量；他也没必要顾及雷日科夫的感情。看上去，这应该是一个把大部分经济决策权交给加盟共和国的有利时机。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当公布内阁各部和各“ 国家委员会 ” （事实上也是部，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的名单时，看上去部委的数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这只会激怒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因为他们一直为要求更大的经济自主而大声疾呼，而戈尔巴乔夫也多次做过许诺。

直到 3 月份，戈尔巴乔夫才最终任命一个安全委员会来取代消亡的总统委员会。实际上，由于职务的原因，有些人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当然成员：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除了这些当然的人选以外，戈尔巴乔夫往整个名单里额外增加了三个人：叶夫根尼 · 普里

马科夫、瓦季姆·巴卡金、以及他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

当对名单进行投票时，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其他人选，但是不同意普里马科夫和波尔金。戈尔巴乔夫坚持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于是这一次普里马科夫勉强获得了通过。而波尔金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到多数通过的。我问最高苏维埃的几名代表，为什么立法机关两次拒绝同意普遍认为非常接近戈尔巴乔夫的波尔金。他们都说不信任他的原因是他因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歪曲的信息而臭名昭著。其中一个代表指出：“ 他是个惹麻烦的人，经常给戈尔巴乔夫灌输些垃圾，增加他的疑心。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让他接近自己。 ”

反对派的批评尖锐化

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的信心越来越小，而改革者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则日益增强。到了八九月，当戈尔巴乔夫同压制改革的力量结盟的时候，那种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利用新的权力实施经济改革的想法便消失了。许多人似乎感到谢瓦尔德纳泽所说的“ 独裁统治 ”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施行的这种统治。

1 月份，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发生流血事件的那个周末，民主俄罗斯代表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主席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这是 11 月会议的第二阶段，它表明人们正逐渐丢掉对戈尔巴乔夫的幻想、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迅速发展。

该组织声称拥有 30—40 万积极成员。据说，它的基层组织在 40 个城市里出版了大约 500 种报纸,总发行量达 50 万份(如果这些数子都是正确的话，那么许多这类报纸的发行量将非常小，因为平均数只有 1000 左右）。而且它的非官方全国性报纸《民主俄罗斯》据称发行量达 150 万份。

在这次会议上,波波夫宣称同戈尔巴乔夫组成“ 中间派—左派联盟 ”(12)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此民主人士需要反对现政府，发展规模巨大的政党组织。早在 10 月份时，波波夫还很乐观地认为存可能形成他所说的“ 中间派—左派 ”联合——这意味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形成联盟。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呼吁把权力从戈尔巴乔夫控制的中央政府移交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实行迅速激进的改革，包括把土地转交给私人所有者，把国家资产分配给公民，制定新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其中应该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大会还通过了正在加盟共和国之间进行谈判的条约，呼吁建立起同其他加盟共和国民主团体进行政治合作的框架。

此外，会议还谴责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动用武力，警告说〔467〕由最反动、最保守的力量实行独裁统治的危险正在逼近，它认为这部分力量包括共产党特工、军队、克格勃的精英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他们都听命于一位“ 像独裁者那样行事的改革的倡导者 ”。

会议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全面的谴责，而仅仅六个月前这个组织还把戈尔巴乔夫当成盟友。

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戈尔巴乔夫前总统委员会中的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开宣布同他决裂。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宣布他不再认为自己属于戈尔巴乔夫的阵营。而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则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其中的一些段落是这样的：

一个正经历着垂死前痛苦的政权会做最后的挣扎：经济

改革停止了；对传媒的监控恢复了；厚颜无耻的宣传复活了；

对加盟共和国的公开战争也宣布了……

在立陶宛发生的事件可以清楚地归类为犯罪行为……

（而戈尔巴乔夫）却为它辩护，也许正是他同意了整个行动……

在反抗独裁统治和专制主义进攻的同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身上。（13）

通过这份宣言，绝大多数签署人表明了他们脱离戈尔巴乔夫、投奔叶利钦的决心。

1月19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公开声明刊登在星期三《共青团真理报》采访巴卡金的消息上面，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以前最亲密的助手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的高潮。他能够开始用心接受这些批评吗？或者只是简单地把它们视为个人对他不忠诚的证据（当然这更有可能），然后顽固地坚持他现在似乎已经选定的道路呢？如果事实证明出现了后面一种情况，那么我就必须赶快修正先前对他继续执政的估计了。

第二天，1月20日，莫斯科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民主俄罗斯组织这次游行以抗议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发生的暴行以及戈尔巴乔夫同反动保守分子的联合，共有30多万人参加了游行。虽然在先前的游行中也曾出现过反戈尔巴乔夫的〔468〕标语，但是在莫斯科出现大规模的纯粹反戈尔巴乔夫的游行，这还是第一次。在向人群宣读一项决议时引起阵阵欢呼，决议呼吁：

·戈尔巴乔夫、亚佐夫辞职

·苏联军队撤出立陶宛

·解散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

·审判对在立陶宛动武负有责任的人

·只对加盟共和国，而不是联盟中央政府提供外来援助

虽然叶利钦并没有参加，但是许多人都把他当成那一天的英雄，有人称他是“俄罗斯最后的伟大希望”。每当提到他的时候，人群都要一再高喊他的名字。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宣读了叶利钦的一封信，信中称谢瓦尔德纳泽和其他人所警告的独裁已经到来了。戈尔巴乔夫正在阻碍民主改革，有人以自封的国家拯救委员会的名义对合法的民选代表机构使用武力，而他竟为此辩护，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叶利钦认为反对必须是以和平的和议会的方式进行。他指出：“我们不能给中央政府任何借口来对我们使用武力。”

戈尔巴乔夫“曲折前进”

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格鲁吉亚共和国继续处于骚乱状态、而戈尔巴乔夫与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辩论不断加剧的时候，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海湾的军事行动也开始了，首先进行的是对伊拉克目标的空中打击。戈尔巴乔夫一直试图在该地区避免战争，但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固执使得苏联作出的和平努力化为泡影。尽管由于中东政策的180度转变而在国内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反对，战争打响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仍然同美国在安理会进行勉强的合作。同美国保持和睦关系已经成为了他国内权力的关键。

许多观察家仍然怀疑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有一个协议——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即只要戈尔巴乔夫支持布什在海湾的政策，布什就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自由行事，特别是在立陶宛。这些〔469〕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即使

是在海湾危机的高潮时刻，布什依旧密切关注着立陶宛事态。例如，他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对夺取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在 1 月 13 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或是他们的新闻代表几乎每天都就此发布消息、警告或者公开声明。

由于戈尔巴乔夫对引起暴力的军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布什总统给他送去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如果继续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他将被迫采取某些措施。信的全文是在 1 月 23 日午夜通过电传传到使馆来的。我次日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以递交这封信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 10 点左右电话通知我说戈尔巴乔夫可以在 1 点钟见我。

当我 12 点 45 分上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我发现一大群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使馆前面抗议美国解放科威特。通向使馆的大门被关闭了，但是我命令海军陆战队哨兵把大门稍微打开一点，以便我的车子能够通过。开车通过一大群敌对的示威者可能是有些鲁莽，但是大使是不可以耽误总统的指示的，我感到自己没有其他选择。我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唯有这一次才发现国务院提供的卡迪拉克防弹车是那么的舒适。

戈尔巴乔夫看上去有些疲倦，但是很平静，面带微笑。他在过去的部长会议办公楼、现在的总统办公楼接见了我。我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信的内容很敏感，我觉得没有同事作记录谈起话来可能会更加坦率。我们在一个会议桌的两头面对面地坐下来，切尔尼亚耶夫坐在他的左边。

在我们互致问候以后，我解释说上面命令我转交一封布什总统的信件。我递给他一封英文信，然后一行一行地把内容翻译成俄语。布什指出，在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发生混乱之后，他的行动一直十分克制，但是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有所行动。他曾经接受了戈尔巴乔夫 1990 年作出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所以在此基础上授权开展了支持苏联经济改革的项目。然而，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面临恫吓、压力和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继续这些项目的。除非那里的局势发生变化，否则他别无选择，只能暂停他开〔470〕创的援助步骤。他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惩罚，而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改革的基础将不复存在。他敦促戈尔巴乔夫制止日益增长的暴力浪潮，回到先前的和解政策上去。

当我念完那封信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问我：“ 他是说已经采取了那些步骤还是即将采取那些步骤呢？ ”

我回答说：“ 他说如果……那么他将那样做。 ”

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没有对那封情发表意见，而是对我说道：“ 告诉我，杰克，你怎样看待目前这里的形势？ ”

他的提问使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原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途径来表达我对他最近一些决定的疑问，但是没想到他会主动问我。我现在还没有就如何表达做好准备，而且除了信本身以外我没有接到其他指示，但是我经常考虑一些他似乎做错了的事情。能够直接听他的解释实在太诱人了，决不能错过机会。

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作记录，但是会谈结束之后我马上匆匆忙忙地写下了谈话要点。当我写会谈记录时这些要点足以唤起我的记忆。首先，我说很难解释他近几个月政策的根据。长期以来，我始终坚信他真心寻求在苏联推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我也一直是这样向政府报告的。然而后来，我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虽然我知道他仍然坚持说改革在向前发展，我也知道这对

他和他的国家都是有益的，但是我看见发生的一切并不符合我的假设。事实似乎表明他的政策已经变了，然而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所以也就不愿得出他确实发生了变化的结论。但是，我又觉得他对民主人士及叶利钦一再进行口头攻击与他自称的改革的目标是不相符的。

至于立陶宛和它的邻国，我指出，军事压力使局势尖锐对立，破坏了谈判，产生了暴力的潜在危险。那里的事态使布什总统蒙受了巨大的压力——来自国会、报界和整个公众舆论的压力。虽然我不相信他曾下令军队向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开火，但是我不能理解他做的许多事情或者他同意其他人去做的许多事情：派驻军〔471〕队、夺取建筑、发出毫不妥协的最后通牒，等等。如果他的目的是和平，那么这一切就无法解释了。我还补充说道，我非常了解他所受到的要求使用武力的压力，但是我似乎看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既不是他的朋友也不是改革派，所以我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屈服于这些压力，尤其解释不了的是他所采取的步骤会被那些坚持使用暴力的人所利用。

我还指出，他常常强调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当然，没有人会反对这一抽象的概念，但是他应该试着去理解其他人的观点，即如果他们是被迫加入联盟的，那么联盟宪法对他们就没有约束力。即便如此，双方也还是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但是前提是立法机关必须做出关于退出联盟的条件的修正案。现行的法律否认有退出的权利，更谈不上实施退出行动了。

我最后指出，在像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是威胁使用暴力的人。他们似乎懂得只有通过非暴力手段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显示出了极大的克制。我们看到的暴力是由莫斯科控制下的苏联军队犯下的——这些军队最终是由他本人控制的。虽然我并不怀疑他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无法向我的政府解释他最近的行为怎么能与他的这个目标相一致。

我谈了大约 15 分钟，然后便停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独白，感谢我不带嘲讽的坦诚。

关于我难以理解苏联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请我从问题的“整体严重性”考虑。“请帮助你们的总统理解，”他接着说，“我们正处于内战的边缘。作为总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战争。”所以有时候他将不得不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段“曲折前进”的时期。

他评论说，我们正处在高度紧张和情绪极度波动的状态下。许多问题都是爆炸性的，武装力量很难控制。我们为政治文化落后所困扰；过去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的传统。但是，他必须坚持在宪法的道路上推进政治进程。他本人不会受制于任何人。

他声称他愿意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对话，过去：〔472〕同拉脱维亚的对话就取得了一些成果。他曾经同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主席戈尔布诺夫共同制定了一个协议，并且得到了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卢比克斯的同意。然而，立陶宛的事情有些不同。如果兰茨贝吉斯继续当权，他怀疑是否还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普隆斯基涅比较理智，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取得一些进展，然而立陶宛政府提高价格的计划给兰茨贝吉斯提供了一个搞垮普隆斯基涅的机会。至于叶利钦，他很难与之打交道。因为叶利钦往往先与别人达成协议，然后违约，而且他经常作出些不能履行的许诺。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还是要试一试。

在他结束谈话以前，他要我转告“我的朋友乔治”，不管在海湾战争、

德国问题、批准常规武器协议等方面面临多大的压力，他都将继续按照他的承诺行事。他在国内的主要愿望是确保根本性变革不要伴随着暴力事件，而且他决不会放弃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14）

我后来回想这次谈话的时候，深深感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态度和私下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许多私下里容易动怒的领导人往往展现出不同的公共形象：平静、周到、富有同情心。而戈尔巴乔夫似乎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在公共场合里，他变得极其容易发怒，他的讲话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但是私下里，我却发现他泰然自若甚至于明断是非。我怀疑他是否对每个人都是那样，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对布什总统的信件所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策略的。

他没有抗议说我们是在以停止经济合作的威胁来干涉和破坏改革，而是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给我们表达的机会，使得双方都有机会提出观点。他保证遵守自己在海湾、德国、常规武器协议方面所作出的承诺，这样做既提醒了布什去注意同他合作的重要性，又避免了对美国发出威胁，即一旦美国由于立陶宛所受到的镇压而不再进行合作，他就可能改变这些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他是在提供一种保证，即无论如何都将继续这些政策。如果布什在这种保证面前还要进行制裁，那么他的做法看上去就过于粗暴，甚至有些卑鄙了。其次，他辩解说自己最近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军事政变而采取的策略，不是根本性的政策变化。〔473〕　　我并不相信他的第二种说法，尽管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戈尔巴乔夫正在他的头脑里为自己“向右转”的做法寻找理由。我得出的结论是，这只是因为他看不到鼓励强硬派并与其合作将会带来的危险。他们公开地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总统治理”，因为这样将使他们作为执法者而占有优势。一旦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或者继续加以拒绝，他们就会把他撇到一旁。

然而，我觉得没有理由用制裁来打击他，除非事实表明他确实在蓄意利用军队压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华盛顿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于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使用军队，所以布什威胁要进行的制裁从来没有实施过。

在我转交总统信件的时候，根据情况判断，在 2 月份安排莫斯科首脑会谈显然已不可能。除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形势得到明确，否则布什访问莫斯科在政治上将是困难的。而且海湾战争刚刚开始，对他来说，在战争进行期间离开美国也是不合适的。当我们讨论布什的信件时，戈尔巴乔夫提出如果计划中的首脑会谈推迟的话，他希望布什和他共同发表一个声明。很明显，他不希望这次延期加剧立陶宛的局势。

最后，当我们正式宣布延期的时候，我们的理由是总统必须留在华盛顿，全力关注海湾战争。

帕夫洛夫的烟雾

瓦连金·帕夫洛夫担任总理后不久，就宣布了自 1985 年禁酒运动以来最不得人心、极其失策的行动：政府宣布面值 50 卢布和 100 卢布的两种钞票作废——这两种面值的钞票在当时发行量是最大的。公众只能在几天内兑换所有这两种钞票，而且个人能够兑换的数量也有限制。这似乎是减少“卢布倒挂”的策略——虽然帕夫洛夫曾经告诉我他不担心“卢布倒挂”的问题。但是，这不是政府的解释。帕夫洛夫解释说，这次兑换针对的是那些从非法生意中获得了大量肮脏收入的“投机商和诈骗犯”。事实上，普〔474〕通人民

受害最深，特别是那些把积蓄藏在床垫下面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因为官方储蓄银行的利息只有 2.5%，而且常常很难提取大宗款项，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当人们在仅有的几家银行分支机构花几个小时排长队的时候，他们的愤怒被激发起来了。没人相信官方的解释，因为大家都知道“投机商和诈骗犯”能轻而易举找到兑换手中钞票的方法。管理兑换的政府雇员很容易被贿赂。

帕夫洛夫显然已感到公众舆论开始对他不利，于是就做出了一个更加不合理的解释。他显然希望苏联公众——习惯于相信关于阴谋的传言，但不信任外国人——能够更容易地接受这个新的解释。他在《劳动报》对他进行采访时说，兑换行动是为了阻止“外国银行”的阴谋，因为它们掌握了 80 亿卢布，并计划把这些钱突然投入苏联，以此搞垮苏联政府。（15）

苏联国内外的公众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愚蠢的指责上，但我却发现他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意见同样令人不安。他拒绝承认土地为私有财产，声称只有犯罪分子和黑市交易者才会提出这类问题。他暗示俄罗斯的立法将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只允许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和在土地上建筑房屋者；只能把土地卖还给当地政府，而不能卖给第三方。他呼吁从大量生产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这只能通过保留指令性经济才能实现。同时，他把苏联经济描绘为正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事实上，他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某些措施，那么六个月后经济就会遭到类似于 1918—1920 年内战期间那样的破坏。

当我看到这一则采访消息的时候，我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这种大杂烩式的评论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其强烈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在于其对外国银行的荒唐指控上，而且在其他段落之中也有。第二个个人不齿的地方在于他以歪曲的事实来支持自己论点的习惯。例如，有关俄罗斯土地法的指控就完全是一种错误引导。他最后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犯罪分子、贪婪的外国人和武断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经济在几个月内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为什么政府还会允许这些力量削弱本来可能健康发展的经济：〔475〕呢？换句话说，如果问题只是在执法方面，为什么还要在经济方面首先进行改革呢？而且这些互相矛盾的陈述明显没有提到苏联有必要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事实上，按照帕夫洛夫的逻辑，人们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世界经济，因为那些鬼鬼祟祟的外国人正在那里伺机强奸俄罗斯母亲。

结论：要么就是他对市场体制如何运转一无所知，要么就是他过于见风使舵，以至于根本没有信心迈向市场体制。

无知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吓走认真的投资者，而只给他留下他声称极其蔑视的小偷和囚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戈尔巴乔夫不马上另找一个总理的话，不仅销售合同不会迅速稳步增长，反而会出现商业兴趣锐减的状况。

帕夫洛夫对西方银行密谋搞垮戈尔巴乔夫的指控只不过引来了苏联国内外报界的嘲笑，美国国务院也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指出作为财政部长，帕夫洛夫印发的钱远比西方银行里的钱多得多。（16）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他的新闻发言人维塔利·伊格纳坚科来修复这种损害，后者指出：“我们的货币无法改变一种政治制度。”克留奇科夫的主要副手维克多·克留申科也宣布克格勃对类似的阴谋一无所知。《纽约时报》

以社论的形式反映了典型的国外反应：

帕夫洛夫总理的政策是明确的——既是明确的，也是错误的。在推动苏联经济走向市场上他已经止步不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了僵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排外主义攻击的混乱之中。这使得外来援助的一个来源被破坏了。

最终，苏联将被迫去敲响西方的大门，乞求投资、专家和援助。如果那时没人答应的话，苏联应该回忆一下这个星期，回忆一下帕夫洛夫释放的烟雾。（17）

这决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总理最后一次使他感到难堪。

自作自受的全民公决

12 月，戈尔巴乔夫劝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保持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他似乎自认为打了一张好牌。他原本期望利用共产党来推动这次投票，赢得公民对联盟的广泛支持。这样就会给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顽抗的领导人们带来压力，迫使他们同意他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他 11 月 17 日递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全民公决，但是这个建议却令人奇怪地也被交到了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手中，其中包括那些与他的分歧日益加深的领导人。虽然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最强烈拥护保留联盟的人之一，但是在审议完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之后，他提议除非确有共和国希望退出联盟或者共和国的议会拒绝遵守联盟条约，否则用不着进行全民公决。他警告说，要求在所有共和国里同时进行全民公决只会造成与加盟共和国的进一步冲突。（18）

然而，戈尔巴乔夫拒绝听从纳扎尔巴耶夫的建议。他向大会抱怨说，自己的建议被忽视了，坚持要求进行单独的投票表决。如同过去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代表都投了赞成票。戈尔巴乔夫以这种方法得到了他想要的全民公决，但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

全民公决的建议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由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它进行的修饰，它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问题。它最终出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各共和国主权平等的新的联盟加以保留吗？在这个新的联盟里，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虽然促成全民公决的人把它描述为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投票，表明是否赞成保留一个自愿的联盟，但是回答“是”既可以被认为是投票赞成社会主义，又可以被认为是赞成国家的现行名称，也可被认为是赞成重新谈判组建的联盟和个人的权利。然而“新的联盟”还没有产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也没有设计出来。这就〔477〕使得全民公决无法同特定的内容联系起来，因为对“新的联盟”的含义以及各种规划是否真正尊重了各共和国的“主权”仍然存在着争议。

此外，虽然全民公决应该在苏联全境举行，但是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府拒绝进行这一活动，而且还有些政府对建议的措辞做了修改或者加上了自己的意思。本来认为能够表现团结的这次公决在举行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不团结的例子。

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拒绝进行全联盟全民公决，经过辩论后，它们决定在 3 月 17 日之前先举行自己的全民公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全民公决，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甚至计划稍

晚将通过投票要求独立。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戈尔巴乔夫 1 月提出全民公决的时候就反对这个建议，他坚持在哈萨克斯坦对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征求意见。这个问题是：

你认为有必要把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平等的国家联里加以保留吗？

这里没有谈论“新的联盟”和个人权利，而是用“主权平等的国家联盟”代替了“主权共和国”。纳扎尔巴耶夫的措辞暗示联盟是由法律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戈尔巴乔夫暗示的是对现存的苏联进行重组。

乌克兰也提出了一个补充问题，即乌克兰是否应该根据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一个成员。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投票者们甚至有机会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乌克兰独立。

而叶利钦则把这次全民公决转变成为自己的巨大政治优势。12 月时，他坚决反对在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但后来他又同意了，条件是俄罗斯同时进行自己的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投票者将被问及，他们是否赞成设立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这一职位。（19）

直到那时，俄罗斯的立法机构一直拒绝修改宪法、设立总统。〔478〕而赞成总统职位的多数票将会有利于叶利钦的雄心壮志。因为他在俄罗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预计在总统职位问题上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赞成票。

戈尔巴乔夫施展出浑身解术，争取他的全民公决能够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他发动共产党的机构全力以赴争取赞成票。对他的这一策略进行分析时，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就算是多数人投票赞成他的建议，我也想象不出他能从中得到什么。这种投票的意义过于含糊，以至于不能把它看作是明显的授权。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的职位问题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这次全民公决导致修改俄罗斯宪法和赞成投票产生总统的话，叶利钦将轻而易举地赢得总统一职。相比之下，叶利钦的权力将显著上升，而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将显著下降，他现在只是一部残破的国家机器的非选举产生的总统。此外，如果乌克兰也投票反对联盟——哪怕只是表现出对联盟的冷漠，戈尔巴乔夫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同克拉夫丘克及乌克兰中央议会打交道时将更加困难。

由于错误地建议举行全民公决，戈尔巴乔夫愚蠢地为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2 月 7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同意在进行全联盟投票的同时进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叶利钦开始收网了。

叶利钦的直接挑战

立陶宛暴行发生之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已经出现了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但是叶利钦本人在一个月之后才提出了这个要求。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将俄罗斯总统职位提交全民公决的问题上，他已经确保能得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的批准。他还组建了新的顾问委员会，招纳了许多一年前还在戈尔巴乔夫麾下的改革者。（20）

叶利钦赢得了在立法和公共关系两方面的胜利，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由于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出现的暴力听之任之，未能挑选强有力的副手，未能采取可行的改革计划，对迅速衰退的经济束手无策，正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于 2 月 19 日晚出现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在回答了半个小时的问题后，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声明，开始宣读起来。〔479〕　　叶利钦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执行一种维持中央政府权力的政策。他的政策现在与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点可

以从他“ 操纵 ”货币和价格改革中看出。他的政策已经导致了民族间的流血事件和经济崩溃，改革已经变成了加强过去的指令性行政体制的努力。叶利钦还指出，中央不允许加盟共和国朝自治方向迈进。

叶利钦宣称，他曾真诚地努力以便同戈尔巴乔夫进行合作，但是这一切都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指责戈尔巴乔夫正在把国家引向独裁。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之前，戈尔巴乔夫应该辞去总统职务，把权力交还给联邦委员会。叶利钦的结论是：“ 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决不反悔。 ”

以前叶利钦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要么继续改革，要么就辞职，让其他人当总统。但是，现在他已经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挑战了。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反对派偶尔提出要求政府首脑下台，这在政治进程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苏联不是民主制度，更谈不上成熟的民主制度了。总统被认为拥有固定任期，不受立法机构信任投票的制约。在这种状况下，叶利钦的要求被理解为——毫无疑问，他本意也是如此——宣布了一场政治战争。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合作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一场没有约束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双方随即摊牌。在叶利钦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的要求之后，俄罗斯议会中的共产党立即展开了一场闹哄哄企图谈劾并罢免叶利钦的运动。在一次有计划的、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指挥的演习中，俄罗斯立法机关里的共产党忠实信徒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要求叶利钦辞职。这次运用的战术与 1987 年把叶利钦从政治局驱赶出去时所采用的战术一样：通过一系列的发言者来谴责他的行为，提出驱逐他的要求。

斯维特拉娜 · 戈里亚乔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地区的代表，也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之一。她宣读了一份由她自己和其他五〔480〕位副主席联名签署的声明，发动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声明指责叶利钦没有采取虽然不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直接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谈判从而破坏了联盟条约；未经授权即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政府签订协议；仅仅依靠亲密圈子里的私人顾问而无视立法机关；盗用最高苏维埃的名义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21）

然而，俄罗斯议会并非 1987 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再说，撤换叶利钦的运动完全是在电视镜头下进行的，他的反对者们如同邪恶的共产党特工那样出现在屏幕上，恢复了过去那些令人鄙视的习惯。大部分公民非但没有背弃叶利钦，反而批评戈尔巴乔夫违背民意、再次企图撤换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叶利钦的反对者们建议在 3 月 4 日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该机构有权罢免叶利钦）——这个时间早于 3 月 17 日全民公决的时间。叶利钦的支持者们进行了反击，第二天经过吵吵嚷嚷的辩论后，立法机关决定在全民公决投票之后的 3 月 28 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在电视上看过这些辩论之后，我作了如下记录：

双方的做法都不那么精明，但是如果我不得不赌博的话，我将把注下在叶利钦这一边。戈尔巴乔夫最有效的战术是“ 以仁慈将其置于死地 ”，一直敞开谈判的大门，并且确保共产党不会跟着叶利钦走。然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他施加报复的企图只会给叶利钦的殉道者形象增添光彩。如果叶利钦能够使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将全盘扭转劣势。

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的时候，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地面进攻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虽然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海湾问题表决时继续

同我们站在一边（有时候也是在经过大量劝说后才这样做的），但是他始终试图避免地面进攻，直到攻击开始之前仍在拼命提出和平建议。一方面，他向布什总统保证在谴〔481〕责伊拉克的问题上决不会三心二意，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劝说萨达姆·侯赛因不战而撤。由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打败一个主要由苏联武器武装起来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打击苏联的威信和自尊。在 1 月底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支持美国的批评显著增多了。

萨达姆·侯赛因的行为证明了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我们一直向他强调的一个观点：让侯赛因和卡扎菲这样不负责任的领导人影响苏联政策是一个错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大力协助下，他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战争对阵双方一个是以前的敌人，一个是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苏联盟友的国家，称赞以前的敌人发动的进攻在政治是困难的。

甚至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苏联官员就已经开始质问，难道空中打击还不够过分吗。例如，在 2 月 12 日，我拜访了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洛诺哥夫，敦促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投票中提供支持。而他则抱怨美国的空中打击造成了无数的平民伤亡。我向他保证，我们的军事指挥员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但是他却提出不应超越解放科威特和摧毁伊拉克之间的界限，如果出现这种超越行为，苏联将不得不在安理会提出异议。

这种意见必须予以驳斥，不然它们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频繁，还可能导致安理会对战术上的军事决策进行辩论。因此我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我告诉他我不理解他的评论。虽然美国担负起了执行安理会决议的主要责任，但是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责任。在这次行动之中，我们承受了牺牲我们年轻人生命的危险，从中我们别无所获，只是为了使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得到尊重而已。我们的公众决不会理解一个没有参与行动的人对我们的挑剔，这种挑剔暗示我们尽量减少自身伤亡的行为是不对的。虽然我感到美苏对伊拉克侵略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他刚才提出的威胁是不可原谅的。

别洛诺哥夫赶快做出了让步，他请我相信，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他也没有指责美国方面有任何不恰〔482〕当的行为。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他所作的澄清，通过他的解释，我认为今后苏联官员担心我们可能超出安理会授权的言论将会少

一些。

总的说来，苏联外交部确实没有在联合国破坏我们的外交立场。但是，军方发言人和一些记者继续对我们使用武力的程度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寻求在该地区的永久战略地位而不仅仅是解放科威特。因此，当我接到邀请要我去参加关于海湾战争的一次电视圆桌座谈会时，我意识到这是向广大公众介绍我们立场的有效途径，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座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善的，一位苏联与会者突然提出，美国可能在对付伊拉克的过程中使用了过分的武力。这正是我期待回答的问题，于是我向苏联观众发泄了我的不满。“我不能理解这种对侵略者的好心，”我回答说，“当你们的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你们对德国的毁灭并不担心。事实上，你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到法西斯野兽的巢穴中去消灭他们！’我们还没有达到‘消灭侵略者’的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应该把战争局限在科

威特的土地上。你们是不是准备争论说二战期间我们不应该轰炸德国呢？盟军是不是应该打到德国边境时就停下来呢？”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抗议声，他们说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当我离开电视台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瓦连金·佐林表示，他个人认为不会有人胆敢再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一个人不理解你的观点。”他说。

实际上，苏联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受到中东事件的深刻影响。尽管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受到了比较反动的苏联军官和保守的共产党官员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即使不是一个敌手，也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被投入了大量金钱的盟国在一夜之间被抛弃——但是苏联大部分人关注的是贴近他们的国内问题：商店里的货物短缺，日益增多的犯罪，社会混乱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

地面战斗一打响，几个小时以后便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总统的大部分影响力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在联合国仍然需要苏联的〔483〕支持，但是一旦海湾战火停息，苏联的支持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戈尔巴乔夫与那些在改革初期曾经成为他的宠儿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关系在 1991 年 1 月终于完全破裂了。一年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最大希望，叶利钦不过是取悦大众的政治家，不足以领导正确的道路。他们早先同叶利钦形成的联盟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战术性的。但是到了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压制举动使他们感到失望，再加上受到谢瓦尔德纳泽脱离这一阵营的鼓舞，他们便开始成批地离开戈尔巴乔夫，加入了叶利钦的阵营。

戈尔巴乔夫似乎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虽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再明显不过了。相反，戈尔巴乔夫产生了被出卖的感觉和一阵阵的恼怒。我 2 月 11 日拜会了切尔尼亚耶夫，向他递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协定时出现的问题。这一次，我间接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愤恨。

我指出苏联在削减某些武器上的立场不符合条约文本，切尔尼亚耶夫却笑着说：“不是苏联的立场，而是苏联某些将军的立场。”他向我保证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认真的处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任命了一个有文职顾问参加的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情，其中也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本人。

然而，当我转到谈论国内形势的时候，他那可爱的幽默便消失了。他说戈尔巴乔夫被国外的某些批评深深地激怒了（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来，但估计是对立陶宛的镇压和“向右转”的批评）。他接着指出，戈尔已乔夫曾经认为自己与西方领导人已经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似乎突然就不见了。既然戈尔巴乔夫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西方对他的敌意就是没有道理的。

“他似乎容忍了那些违反了他所签署的正式协议的苏联将军，而且当他的谈判伙伴们指出这种情况时他还为他们辩解。”我心想，但是没有说出来。我没有去罗嗦那些明显的事实，而是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夸大其辞了。美苏之间在包括海湾问题的许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相互理解与合作。但是，我们也确实存有焦虑，〔484〕尤其是对于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采取的行动。我们曾经得到了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是苏联军队在维尔纽斯打死了人，而莫斯科对此进行的谴责既不及时也不是无条件的。非法夺取电视台的流血事

件发生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为此被逮捕，建筑物也还没有归还到立陶宛人手中。戈尔巴乔夫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会给外界留下什么印象吗？我明知故问道。

我接着指出，戈尔巴乔夫正在偏离其曾经捍卫过的改革政策，对立陶宛的态度只不过是这一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他现在似乎有了一个不同的工作班子。

“你说不同是什么意思？除了谢瓦尔德纳泽还有谁？绝大部分人，包括切尔尼亚耶夫仍然同他在一起。”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第三者来举例，反驳我的说法。

我一方面承认他后来所举的例子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指出，除了谢瓦尔德纳泽以外，脱离这一阵营的还包括瓦季姆·巴卡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以及其他许多人。实际上，在 1987 年和 1988 年陪同戈尔巴乔夫访美的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的人还在同他一起工作。

他回答说，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并没有离开戈尔巴乔夫的阵营——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定期保持联系，并且将会得到有影响的职位。至于我提到的其他几个人，他们的离去算不上什么损失。事实证明了彼得拉科夫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叛徒，沙塔林精神失衡，阿尔巴托夫（我并没有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没能得到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就投奔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怎么能把政府建立在这些背叛他的人之上呢？”他问道，接着他又补充说，戈尔巴乔夫不理解为什么布什总统下定决心要惩罚他。

切尔尼亚耶夫平常很少发表这样激烈的长篇大论，这暗示出他现在更多地是表达戈尔巴乔夫的感受，而不是表达他本人的感受。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受到国外的批评——当然也受到了国内改革者的批评。同他辩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布什总统的态度。

于是我告诉他，他错误理解了美国总统的政策。布什总统无意惩罚苏联。但是，他也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下执政，因而他知道如果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继续出现暴力或者苏联国内出现一种压制而不是改革的趋势的话，他是不能向苏联提供援助的。在指出这些限制〔485〕条件的同时，他正尽力对戈尔巴乔夫坦诚相待，他钦佩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朋友和伙伴。

至于我们的看法，我指出，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 自从上个秋天以来，我们正在目睹苏联政策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苏联越来越相信压制的手段，对那些掌握着镇压工具的人所作的让步也越来越多。我们看到苏联在军控谈判问题上已经开始倒退，甚至在军控条约正式签署时也是这样。我们还看到对国内批评采取了日渐严厉的措施，政府任命的模式也暗示出一种强硬路线。在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中，一些承诺过的改革并来实现。例如，我们曾经得到许诺说，保障移民自由的立法将在 1989 年通过，但是目前这个立法仍然受到最高苏维埃的阻挠，而且戈尔巴乔夫似乎并不在乎。去年 6 月，布什总统曾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在移民法生效之前，他们签订的贸易协定不会得到实施。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去更加积极他说服最高苏维埃通过这个法律。

切尔尼亚耶夫避开了我谈话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单单挑出了我最后谈到的那个问题。他很不耐烦地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至今仍未使移民

法生效的原因：美国显然连目前允许离境的人都应付不过来。

确实，我们使馆当时有一份多达 30 余万人的申请移民名单，而我们一年只有能力颁发不到五万份证明文件。但是，问题当然不在于此，苏联公民应该有权离开苏联，如果他愿意的话。

在我离开之前，我要求切尔尼亚耶夫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总统，他为建立信任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不应该认为他所听到的批评抹杀了他的成就。他应该把这种批评视为友善的警告。事实是，我们西方人士对他的政策似乎要走的方向感到担忧，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他从前所确立的路线上来。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些曾经触怒他的批评一定会平息下去。

不到三个星期前，我曾向戈尔巴乔夫转交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与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应相比，切尔尼亚耶夫的反应要激动得多。然而，我感到切尔尼亚耶夫理解而且可能赞同我们的观点。出于忠诚，他不得不为自己明知是错误的立场进行辩解，由此而〔486〕产生的失望情绪犹如利刃搅动着他的感情。他在此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间接地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在攻打电视塔之后，他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提出辞职，而且曾向戈尔巴乔夫写过一封信，其中包含的指责比起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我所作出的指责要严厉得多。但是，他最终决定不文这封信，继续留在 “ 阵营 ” 里。（22）当他内心有一种辞职的诱惑时，我对阵营的变化所作的评论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推迟已久的白俄罗斯之行。虽然从莫斯科到明斯克乘飞机只需一个小时，但是自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戈尔巴乔夫从未访问过这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人早就察觉到了他明显的冷漠——他访问外国时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从来没有遇到麻烦——但是他们相信，他最终一定会为清理工作说点什么，并且会呼吁为这一工作提供财政援助。虽然那个核电站坐落在乌克兰，但是那次事故给白俄罗斯人造成的损失比其他共和国更大。掌管核电站的联盟中央政府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负有为消除危害提供财政支持的责任。

然而，戈尔巴乔夫满脑子装的都是与叶利钦之间的争斗以及同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疏远，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他只不过草草提了一下切尔诺贝利，然后便集中火力攻击改革派知识分子，严厉地指责他们不但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而且还充当敌对的外国势力的急先锋。他重复了克留奇科夫在 11 月所作的无根据的指责，说改革者正在利用虚假的口号来“ 掩盖影响深远的阴谋，这些阴谋都是从外国思想库和外国人的头脑里诞生的 ” 。（23）接着，他又攻击加夫里尔 · 波波夫主张把苏联分裂成 40 或 50 个小国家（事实上，波波夫只是认为在当时民族主义狂热席卷苏联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希望看到的结果来进行描述）。

但是，戈尔巴乔夫仍觉得意犹未尽。他讲得越来越起劲，他的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粗鲁。 “ 民主人士 ” 被指控利用 “ 新布尔什维克 ” 策略——即利用游行示威和罢工——来破坏政府机构的稳〔487〕定，为暴力夺权作准备（使共产党人最紧张的就是想到其他人也可能运用他们自己的策略来反对他们）。

戈尔巴乔夫没有点名指控民主人士正在密谋进行一场政变，但是他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

所以我要问：谁正在准备一场政变？谁在呼吁违宪的政治斗争方式？我

们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以暴力再次夺权权力的企图，这种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内战。我明确宣布这一点，而且我希望你们懂得我们正在谈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有这方面的教训，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包括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4）

这种描述很适合用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所谓的民族拯救委员会的行为，也适合用于其他地方的特工和军警官员暗中策划的阴谋，但是戈尔巴乔夫谴责的却不是这些集团。他似乎不能分辨合法的政治斗争形式和非法的政治斗争形式。他的唯一标准似乎是一个集团是否公开批评他。他的语言使人们怀疑他是否正在准备抛弃其反对用武力对付政治反对派的一贯立场。

自 12 月以来，我发现人们——主要是改革者，也有一些独立观察家——对戈尔巴乔夫是否掌握实际情况越来越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在私下谈话中小声说出来的。当我读到明斯克演讲的内容时，我不禁想道也许他们是对的。他对事情的错误解释看来要么出自于顽固的刚愎自用，要么来自可悲的错误信息。

他的演讲并不仅仅是损害了他同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关系。白俄罗斯人关注着切尔诺贝利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的健康和环境问题，戈尔巴乔夫却利用他们的讲坛来进行个人的政治斗争，白俄罗斯人将此视为天大的侮辱。他对明斯克的访问使苏联最忠诚的共和国迅速地背离了他。这种背离在 12 月达到了顶峰，当时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一所狩猎小屋举行了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

国务卿贝克 3 月中旬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尽力为他寻找一种既不冒犯戈尔巴乔夫又能与叶利钦见面的方式，并使他认识到加〔488〕盟共和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于同叶利钦的接触十分敏感，华盛顿的白宫官员（可能包括布什总统自己）觉得贝克不应该在叶利钦的办公室会见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又提供一个见面的机会，我们决定邀请所有 12 个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来斯帕索的住所吃晚饭（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导人应邀参加另一个会谈）。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几个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几个接近戈尔巴乔夫的官员，例如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伊万·拉普季夫、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我们知道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可能不能来莫斯科吃这顿晚餐，但是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能够出席。而且我们也知道叶利钦可能会婉言拒绝前来，除非他得到保证能够同贝克国务卿举行私人会谈。贝克也愿意饭后同他私下见面，我们希望这样能够让他满意。

起初，我们从叶利钦的人那里得到了接受邀请的回答，但是接着难题出现了。叶利钦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通知我们，要求贝克晚餐前先去叶利钦的办公室拜访他。科济列夫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在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之前曾经在苏联外交部担任中级官员。我们解释说，贝克的日程不允许他这样做。然后，他又询问贝克能否在位于列宁山的俄罗斯外交部“宾馆”简短地会见叶利钦。贝克的日程决定了这样做也不可能。于是，叶利钦拒绝前来参加晚餐，而委派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代替他出席。

我对这些花招感到有些生气，因为我认为会见贝克对叶利钦来说显然是有利的，他施展这些手段是期望得到与国家元首等同的待遇，这无疑是自毁前程，而且显得他很没有气量。然而，他的花招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戈尔

巴乔夫 1987 年使他遭到政治流放，他在拯救自己所进行的斗争中，已经习惯利用他手中的各级权力来争取自己的地位，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为了同样的目的避免同我们的接触。

然而，叶利钦并不是唯一有小孩子气的政治家。当这群人最终到齐参加晚餐的时候，我们发现出席的代表只是来自其中几个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当天正在阿拉木图接待一个外国来访者，所以安排晚餐后再与贝克见面。改革派〔489〕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沙塔林、《文学报》的主编费德罗·布尔拉茨基、加夫里尔·波波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来了，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基里尔。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阵营里的人一个也没来。有些表示了歉意，其他人干脆就没有露面。很明显，他们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指令，抵制这个聚会。

尽管这么多人缺席，但是这次晚餐还是非常成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先是通知说很抱歉来不了，但是最终还是同他的总理一道出席了晚宴。他明确表示格鲁吉亚将会离开联盟，甚至不会参加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公决。亚美尼亚总理瓦兹根·马纽基昂也讲述了亚美尼亚脱离联盟的计划，该计划将从 9 月份的全民公决开始。沙塔林嘲笑了联盟条约草案，讽刺地评论说，联邦委员会甚至在国家的名称上都无法取得一致，他预计帕夫洛夫政府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灾难。其他客人对于能否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联盟存在意见分歧。我们对苏联当前领导层的感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贝克都在为戈尔巴乔夫说话：他提醒客人们注意，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开创了改革，这次晚餐就不可能举行了。

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认为禁止他的助手同叶利钦同时出席社交聚会能使他收益。他常常私下抱怨苏联“缺乏政治文化”，但是他自己的行动却显示出这种情况不但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而且盛行于政府的高层。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没有在 1991 年 3 月中旬的这个对各自都有利的场合里露面。

当贝克在他的莫斯科之行中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发现了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敏感的一个原因。在一次私人会谈之后，贝克告诉我，戈尔巴乔夫说他从叶利钦的一个助手那里得到一份报告，报告说叶利钦曾经询问我如果他通过非宪法手段获取权力，美国将作何反应。贝克提出立即让我加入他们的会谈，对此作出评论，但是戈尔巴乔夫说没这个必要——他完全相信我的诚实与正直，不希望暗示我的行为不当。

我告诉贝克这份所谓的报告完全是谎言。叶利钦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他可能会考虑以违宪或非法的方式来获取权力。如〔490〕果他这样说过，我一定会立刻断绝与他的所有接触。此外，整个想法是荒谬的：在军队、克格勃和共产党的政治机构都反对叶利钦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发动一场政变呢？贝克建议我想个办法来说服戈尔巴乔夫。

首先，我拜见了切尔尼亚耶夫，并向他解释了整个事情。切尔尼亚耶夫向我证实，戈尔巴乔夫确实得到了他向贝克提及的那份报告。我解释说那完全是捏造的，切尔尼亚耶夫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他保证会告诉戈尔巴乔夫说那个报告是假的，但是他又建议我下次有机会直接向他本人提出来。

我十分幸运，两天之后我接到了布什总统的一封信要我转交给戈尔巴乔夫。美苏在如何履行削减欧洲常规武器条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误解，布什

针对这种情况在信里提出了解决这些误解的建议。通常，我是通过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转交这种信件，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力争解决提交的问题，信件交到戈尔巴乔夫手中时如果附上了他的意见，会更有帮助。然而，这一次更重要的似乎是抓住机会同戈尔巴乔夫直接交谈，以驳斥关于叶利钦的报告的慌言。

切尔尼亚耶夫迅速安排了约见，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刚刚在此接见一个以政党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身份来访的日本客人。我将布什总统在信中所提的建议又叙述了一遍，戈尔巴乔夫允诺他将尽快答复。然后，我提到了他同贝克谈论的那份报告，告诉他那都是假的：叶利钦甚至从来没有暗示过有可能通过违宪手段夺取权力。我还告诉他，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炮制这样一份报告，但我知道没有那回事。因此，他的情报来源要么是信息错误，要么就是在撒谎。

戈尔巴乔夫没有对我的话提出疑问，而是闲谈了大约 15 分钟。他说丽贝卡和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形象，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很好，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接触带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方面有必要谨慎行事。

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这种旁敲侧击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同叶利钦身边的人太亲近了，而应把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身上——说起来容易，实际作出判断就困〔491〕难了，因为他的任何一个亲密顾问在第二天可能就被认为是一个叛徒。在处理各种社交邀请以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会见时，我一直十分谨慎，力求在负责的政治派别间做到平衡；虽然我必须承认我们更多接见的是改革者而不是强硬派，而且很少同极端反动分子打交道，但我还是觉得暗示我们在打交道时有所偏向是不公正的。站在改革一边的知识分子当然更加容易受到我们的邀请，他们也比那些特工更容易接近。许多共产党官员似乎仍然不愿意保持频繁的社交接触。

我告诉戈尔巴乔夫，我意识到了表面看上去有所偏爱所带来的危险，但是我们确实在尽力同各种职业和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接触。这些接触的目的并不是要干涉或者搞阴谋活动，而是为了了解正在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不能拒绝或者减少同某些重要集团的接触，尽管这势必发出一些我们不希望发出的政治信号。

令我有点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称赞丽贝卡和我所取得的成就，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部分”。

切尔尼亚耶夫同我一起走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当我们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次会谈十分重要，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当天下午，塔斯社的一则短讯体现了他的评价：

3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美国大使马特洛克。美国大使转交了乔治·布什的一封信，美国总统在信中本着一贯的友好精神，继续讨论了苏美相互关系中的某些紧急事宜。

随后，他们进行了简短、重要的会谈。（25）

我猜测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和塔斯社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我传达的信息被接受了，但是对于这次交谈，我越想越觉得有些方面很奇怪。首先，戈尔巴乔夫根据一份捏造的谈话报告就得出叶利钦正在密谋政变的结论似乎完全不合情理。叶利钦如果得不到憎恨他的那些集团的支持，决不可能夺取权力。而且，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个阴谋，克格勃应该发现更多的证据，而不

应该仅仅只有同我谈话的报告。不仅如此，看来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492〕夫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份报告。如果他确实相信叶利钦正在试图通过武力推翻他的话（虽然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 2 月份在明斯克发表那样尖刻的讲话了。

第二个奇怪的方面在于，已经相信先前报告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我的驳斥。既然如此，为什么切尔尼亚耶夫要称这次会谈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呢？而且为什么塔斯社——毫无疑问经过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批准——要加上“简短、重要的会谈”这一句呢？

最后，这件事证实了我过去不无理由的推断：克格勃正在极力散布关于叶利钦、也许还有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假情报。（26）如果确实存在克格勃有计划地制造假情报的活动，那么，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戈尔巴乔夫有时似乎没有掌握真实情况的原因。如果他仍然相信兰茨贝吉斯只代表着立陶宛少数人的意见，那么他就可能相信任何事情。

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从 1990 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显然在竭力争取时间，以便尽早在一个自愿的基础上达成新的联盟条约。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中央——从理论上讲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拥有最大限度的权力，这种做法导致了持续的拖延。 1990 年 11 月发表的条约草案已经被证明对于几乎所有共和国的领导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它使人想到如果非要有一个条约的话，那么这个条约应该强加给戈尔巴乔夫，而无需同他谈判。

随着 3 月 17 日保留联盟问题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要求制订一个更加容易被接受的草案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大家对一个“新的联盟”进行投票，却不告诉大家这个新联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在全民公决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其他不合逻辑的成分，在任何社会里可以允许的混乱都是有限的。

11 月草案遇到的反对意见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他不可能简单地把一个条约强加给加盟共和国。因此，他邀请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到莫斯科，以便推敲出一个一致赞同的文本。多数——但是仅仅是勉强多数——加盟共和国对此作出了反应。三个波罗的海〔493〕沿岸国家、摩尔多瓦（摩尔达维亚现在希望人家这样称呼它）、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拒绝参加，而阿塞拜疆派出了一名只具有观察员身份的代表。虽然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正在讨论一个没有中央政府参加的条约，但是他们都委派了代表。因此，这次会议包括了后来被称为“核心”共和国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所有的中亚共和国。

在计划中的全民公决举行之前的一周，中央报纸刊登了修改后的文本。（27）正如人们所预测的，与先前的草案相比，它赋予了加盟共和国更大的权力。虽然在联邦司法管辖范围内联邦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新草案实实在在地削减了中央拥有的权力。例如，加盟共和国将可以制定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它们将拥有更广泛的财产权和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及其他联系的权利。

如同前一个草案那样，这个草案规定许多职能将由联盟权力机构和加盟共和国共同决定，但是还是没有写清楚这种联合权力如何运作。它同样没能解决一个基本争议，即自治共和国如何行使代表权。其中一个变通办法是，

在上院中只赋予加盟共和国平等的代表权。另一个变通办法是，把从前的自治共和国（它们现在都将自己称为“共和国”）视为构成联盟的平等成员，从而在联盟共和国委员会——相当于美国参议院的机构——中赋予它们同样的代表权。

戈尔巴乔夫决定邀请前自治共和国直接参加联盟条约的起草，第二种变通办法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是削减叶利钦权威的一种策略，因为大部分自治共和国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样做将加强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但是除了它们以外，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除了俄罗斯以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坚持反对给予“自治地区”平等的代表权，因为这样一来将会削弱它们在议会中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使俄罗斯在投票时拥有多数。而俄罗斯政府则疑虑重重，因为这势必分裂俄罗斯。

联邦委员会在3月6日讨论了这个文本，据戈尔已乔夫讲，除了前自治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以外，已解决了所有其他争议。(28)然〔494〕而，其他参加者没有他那么乐观，由于新草案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叶利钦当即表示拒绝。

戈尔巴乔夫把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说成是一次胜利，但是实际上，全民公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任何形式联盟的支持都已经减少了。不错，俄罗斯的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赞成票也占压倒多数。然而有六个共和国根本就没有参加，而且更加不祥的是，乌克兰的投票极其接近：联盟草案在基辅和其他西部州遭到了失败，这些地方大部分人都投票要求乌克兰独立。而最危险的事实是，在俄罗斯，更多的人是在投票赞成总统职位而不是赞成联盟。

又一次徒劳的武力炫耀

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1990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瓦季姆·巴卡金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结果在1990年11月被解除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然而，苏维埃法律赋予了地方和市当局同意举行示威游行的权力，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许多西部共和国里，这些权力机关掌握在受到广泛欢迎的民选官员手中，他们不仅原则上支持民主进程，而且也是大部分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受益者。当戈尔巴乔夫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同压制力量的联盟越来越深的时候，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为此发生的冲突也开始了。

新年前不久，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联合发表的一个声明令改革者们感到震惊，联合声明指出，为了确保大城市的秩序，将从1991年2月1日起组织军队和民兵的联合巡逻队。因为加盟共和国当局和市当局都没有要求在执法方面提供这种帮助，所以这个命令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事实上，包括俄罗斯在内〔495〕的好几个加盟共和国都一致反对这个命令。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无视他的文人参谋所提出的撤销这个命令的建议，在1991年1月29日颁布了一个总统令，使这个命令合法化。(29)实际上，这个总统令的效果很小；由于各个地方的当局都反对这种做法，所以只进行了为数很少的联合巡逻。随后，宪法监督委员会批评这个命令在法律上不健全。(30)

虽然这个特殊的总统令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是它表现出了长期以来在权力划分方面存在着争端。中央当局能够无视市当局和加盟共和国当局而禁

止和平示威游行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如何将其同修正后的宪法所保证的集会自由统一起来呢？戈尔巴乔夫签署的 1 月 29 日总统令清楚地表明,他已不再像当初那样认真地维护法制了——不过，对此他口头上还是支持的。（31）

3 月份的时候，这些问题到了摊牌的时刻，这一次莫斯科走到了流血冲突的边缘。共产党企图撤销叶利钦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民主俄罗斯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号召 3 月 28 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看起来，克格勃又一次捏造了示威者准备“突袭克里姆林宫”的报告。

俄罗斯政府和莫斯科市政府都强烈反对这个命令：他们争辩说，并不存在对和平的威胁，况且，派兵进入城市不仅将创下一个与改革发誓要加以保卫的民主进程不相符合的先例，而且会产生一种引起暴力行为的气氛。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固执己见。

随着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华盛顿的关注也不断增长。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出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28 日早晨，我在使馆接到了紧急通知，要求我找到所能找到的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向他提出警告：任何流血事件都会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障碍。虽然我认〔496〕为这个信息是不必要的——除了考虑美苏两国的关系外，戈尔巴乔夫还有更加强有力的理由去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我仍然很负责地同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联系，要他把这个消息带给戈尔巴乔夫。他向我保证说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不发生伤亡。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叶利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和他的支持者。俄罗斯议会的大多数代表都被戈尔巴乔夫篡　　夺该共和国的权力的企图激怒了，它以压倒性的投票宣布暂停实施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令，并且要求撤走军队。当戈尔巴乔夫坚持军队至少要呆到第二天的时候，俄罗斯议会便宣布休会，要等到军队撤走才恢复工作。

共有 10 万多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当政府希望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

军队于 3 月 29 日撤走了，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大再一次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他违反了严格的法律规定，企图去阻止人民以合法的方式表达意见，他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的对手下台，而不是维护秩序，但是他的行为使他实现自己的目的更为困难。在全民公决（大家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投叶利钦的票）以压倒多数票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后，俄罗斯议会投票反对叶利钦的机会本已十分渺茫，现在议会又不得不在不请自到的苏联军队的包围下开会，于是连这种微乎其微的机会也消失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没有完全放弃和解的希望。

军队进驻莫斯科面对示威者的当天，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创始入之一亚当·米奇尼科在莫斯科采访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于戈尔巴乔夫似乎正朝着与民主相反的方向前进，谢瓦尔德纳泽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预言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带来灾难。他接着又

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必要在目前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既然他能够同罗纳德·里根达成协议，为什么就不可能同叶利钦打交道呢？

我们的社会正在被严重的矛盾所撕裂，这些矛盾还使得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更加复杂。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对话消失了。没有了对话，就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

……这种冲突形势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一个独裁者。

……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重开对话还不算太晚。

我们与美国实现了相互理解。我们与里根开始了对话……为什么来自同一个民族的两个人不能达成某种形式的理解呢？（32）

感到茫然的并非谢瓦尔德纳泽一个人。

第十八章

戈尔巴乔夫寻求妥协

我们的国家和联邦处境危险……经济滑坡，权力机构瘫痪……我们必须捐弃前嫌，防止国家滑入灾难。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联邦委员会 1991 年 4 月 9 日①

我看真正的出路只能在于：总统赋予共和国更多的自由，而我们则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回报。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991 年 4 月②

冬天里政治形势比气候还要严酷,即使春天来临也没有出现缓解。 1991 年 4 月 2 日，粮食和许多主要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猛烈上涨，这并非是市场力量的调节所致，而是由于总统的法令。面包、牛奶和蛋类价格涨了一倍，肉类涨了三倍或更多。服装价格是原来的两倍。政府发放了收入补贴，但根本无法与价格的涨幅相比，有时看起来更像是在玩戏法。例如，人们的储蓄账目上被记上 40%的余额,但在两年中,他们提取的余额不得超过 200 卢布(在新旅游汇率中相当于 7． 25 美元）。

如果商场里商品充足，公众可能还会接受价格上涨，许多城市居民手中有钱却买不到东西。短缺却和以往一样严重，购物的长队蜿蜒好几个街区。

〔499〕 如果戈尔巴乔夫一年前同意实施沙塔林计划，他还可以把价格上涨归咎于共和国领导人，他们应当承担大多数经济政策的责任。但他坚持通过法令来治理（最高苏维埃多次拒绝价格上涨），使自己成为公众眼中的罪犯。

经济：能糟到何等地步？

3 月，罢工浪潮开始了，今年像以往一样，也是由煤矿工人发起的。顿涅茨克煤田的矿工从 3 月 1 日开始，随后，库兹涅茨克煤田、北冰洋的沃尔库塔煤田和哈萨克斯坦的矿工们相继罢工。与一年前以经济要求为主的罢工不同，现在矿工们要求政治改革：他们拥护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坚持举行新的全国性大选。罢工持续了一个月后，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法令，命令矿工回去工作，并对罢工领导人进行刑事处罚。罢工者对此不予理睬。

为了保持信誉，戈尔巴乔夫拒绝逮捕罢工领导人或派军队押送他们回矿山。相反，他选择了谈判。4 月 3 日，他和总理帕夫洛夫会见了矿工代表，并且在经济方面作出了广泛的让步，但在政治条件上寸步不让。他们保证在今后的 12 个月里分阶段加倍增长工资，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谈判在独立工会领导人与由共产党支持的“ 官方 ”工会之间持续进行。由矿工组成的工

会作为集体谈判代表，得到了实际上的承认。

4 月份价格抬升，明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工厂工人也开始罢工。在许多地方，共产党、官方工会组织和企业管理者明显失去了对工人的控制。与矿工的谈判由于附带政治要求而难以达成协议。数周过去了，越来越明显的是，只有叶利钦可以结束矿工们的罢工，因为他是唯一得到工人信任的政治领导人。

整个冬天，亚历山大 · 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一样成为局外人士。去年夏天，他离开了党的政治局，而他在总统委员会的职位也随着 1 月份该机构的取消而终止。不过，正如切尔尼亚〔500〕耶夫在 1 月份预测得那样，他最终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当我听说他的办公室已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搬进克里姆林宫、靠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我请求和他会面。

他把会面日期安排在 4 月 2 日，正是实行价格上涨的那一天。我注意到他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有过去副总理使用的那么大——而在苏联的官僚世界中，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我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可能考虑重组老队伍，或者只是试图保护一位老朋友不再受到沙文主义者的频频攻击，这些沙文主义者肃清“ 新思想 ”的决心和麦卡锡在美国社会清除“ 左派观点者 ”一样坚定。无论如何，由于雅科夫列夫除了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外，不再有政治基础，他的影响力无法达到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程度。

他的谈话像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我发现他比在最近的谈话中更加乐观。这并非因为他淡化了国家面临的困难，他说，改革遇到了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他说在土地上出现了“ 我们的新庄园主 ”，即国营和集体农场的经理。工业方面，反对派聚集在军工企业中的“ 超级爱国者 ”的周围。

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军队的情绪极为低落。主权“ 欣快症 ”支配着许多共和国，不仅在俄罗斯之外，其内部也一样。如果这还不够，那么雷日科夫政府的财政错误，尤其是过度发行钞票，已将他们置于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

他认为，国家正面临三个主要的考验：争取国民接受价格上涨，采取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最后，缔结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实现每一条都有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实际上，他认为九个共和国可能很快会同意签订联盟协议。

雅科夫列夫提到的所有考验都是事实，而且 4 月中旬公布的当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字证明有些人所说的经济危机并非夸张。〔501〕数据表明这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8%，对外贸易下跌 33.8%，进口下跌 45.1%，出口下跌 18.4%。而决定大多数外汇收入的石油产值减少 9%，煤产量下降 11%。

尽管预计全年预算赤字为 167 亿卢布，估计第一季度就达到了 311 亿卢布。这无疑对当时已由小跑转向飞奔的通货膨胀是火上浇油，到 3 月份为止，12 个月中通货膨胀率已达 22%，当然，这还是在 4 月 2 日价格提升之前。③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反应是继续采用威胁手段，这从上一年秋天开始就已经成为他的政策的标志。4 月 9 日在小范围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④他要求共和国多采取财政惩罚措施，并对那些不按要求履行对中央义务的或是拒绝签订联盟协议的共和国以赔偿相威胁。他还呼吁停止罢工，并在工作时间禁止举行政治示威活动。关于改革，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敦促在下一年的农耕季节开始之前实施“ 土地改革 ”，并建议实施某些服务业和零售贸易的私有化方案。⑤中央电视台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了全文报道。戈尔巴乔夫保证部长

会议在一个星期内将为最高苏维埃处理这次危机提出方案。帕夫洛夫总理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做好准备，4 月 20 日，他就草案，与政府外的杰出经济学家进行讨论。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得到支持，那么这次会议是个失败。例如，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指出帕夫洛夫的方案没有提到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工潮以及预算、收支平衡赤字。

4 月 22 日，星期一，帕夫洛夫勇敢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他的“ 反危机方案 ”。在对当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做出可能下滑 25%的最坏预测后，他严厉指责正在罢工的矿工们，并重申他的禁止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在许诺将迅速推进小型商业私有化时，他的方案实际上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例如，将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官僚机构来监督农产品运送和分配，使其与中央计划相符合。在提到这些改革措施时，使用的措辞很模糊，还〔502〕有一些是对未来的设想。立即采取的行动则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行政控制。

代表们对他的发言没有任何反应，即使是敷衍的掌声也没有。但经过短暂讨论后，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它。几乎没人喜欢它，但别无他计，况且很明显，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唯一参加会议的共和国领导人，他声明，在新政府第一次提出其正式方案时，他将表示支持而不使其难堪；之后，他敦促要对这一方案进行修改，减少中央化条款内容。他断言，有些条款将“ 把我们拉回中央的强制之下 ”，从而违反联盟协议草案已达成的规定。然后，他提出了一条尖锐的警告：

我坚信，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反危机方案的实施以及向市场过渡应建立在两项基础之上：实现全国经济环境的统一和承认共和国的国家主权。无论这一观念在这样或那样的会议中遭到多少攻击，都不该违背它。⑥换言之，只有将大多数经济决策权授予各共和国——即使对核心共和国也如此——才可以保证一个统一的经济环境。这是被政府发言人认为根本不现实的沙塔林计划的基本条款之一。其实，党内“ 保守派 ”已对改革完全失去信心，他们认为必须恢复中央计划调控。叶戈尔·利加乔夫当时还是最高苏维埃成员，他提出应“ 大力加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因素 ”，表现得比多数敢讲话的人还要强硬，而实际上，许多人赞同这一观点。

但是，对多数国民而言，急剧下滑的经济已使过去的机构和口号名声扫地。4 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被提问的人中只有 20%认为“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社会主义 ”，而将近两倍的人（38%）认〔503〕为“ 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了 ”。1990 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当时大多数人仍然赞同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⑦3 月 31 日，在苏联 15 个主要城市进行的另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政府的威信已降到新的低点，对帕夫洛夫的部长会议表示信任的人数不到 8%，而支持俄罗斯政府的占 25%， 15.7%的人希望看到联合政府， 11.8%的人希望由民主俄罗斯组成政府。同一调查表明叶利钦的支持率达到 61%，而共产党只得到 15%。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支持总统权力的努力没有奏效，在过去六个月中形势明显地在进一步恶化，只有井蛙之见的乐天派才相信帕夫洛夫的不足称道的政府能激起足够的忠诚或是畏惧来扭转正在瓦解苏联的离心力。

戈尔巴乔夫“ 摆向右派 ”的努力也没能使反对派走向中立。戈尔巴乔夫对于在立陶宛使用军队的反应含糊，他还以恶毒的措辞攻击“ 民主主义者 ”，

这些都大大激怒了改革派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与此同时，保守派力量也开始要求他下台。

1990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内部的保守分子已开始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联盟，反对在他们看来具有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势力。他们坚持 3 月份的全民公决，其中更加宜言不讳的成员则把矛头直指巴卡金、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美国使馆，我们看到这一组织中的许多极端分子把他们对维护联盟的支持和狂热的反美情绪结合在一起，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但是，“ 联盟 ”组织的成员并非都公开敌视西方。该组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有军工企业的代表，有来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也有一些非俄罗斯人，但他们或者已经被俄罗斯化了，从他们本来的民族中脱离出来，或者来自其他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他们担心权力从莫斯科转移到各共和国首府会带来歧视性政策。

我们和这一组织的成员保持着联系，包括一些社交性的邀请，但我个人还没有机会与其领导人进行一次认真的交流。由于他们〔504〕已成为苏联政治的一支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我认为进行一次会面是有益的，这将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团体可能会用何种方式维护联盟，同时也将提供一个机会，反驳极端分子所谓的美国正在阴谋瓦解苏联的指责。因此，我邀请这一组织的主席尤里·布洛欣和由他自己选择的其他几名领导人一起来共进工作午餐。他同意了，我们约好的日期是 4 月 11 日。

在我们约定午餐的前一天，整个新闻界都充斥着联盟组织正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让他要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总统管辖权，要么辞职的报道。布洛欣和其他人在 4 月 8 日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据报道他们对这次会面并不满意。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新闻界，他们反对目前的联盟协议草案，因为它赋予各共和国太多的自治权；他们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在南奥塞梯建立秩序（格鲁吉亚军队还封锁着它的首府），以及正在考虑把南千岛群岛交给日本；攻击谢瓦尔德纳泽，巴卡金和雅科夫列夫是向“ 他们自己妥协 ”；并正在讨论是否要求召开一次非常人代会来弹劾总统。⑧看来，我们计划的午餐将是非常有趣的。

布洛欣带着两名同事如约而来，他们是联盟组织的温和派：⑨格奥尔基·吉洪诺夫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族人，获有经济学学位，在部长会议里任职，负责处理燃料和能源问题；阿纳托利·切霍耶夫是南奥塞梯人，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机关任职。布洛欣本人是来自摩尔多瓦的俄罗斯族经济学家。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否认他们曾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更愿意戈尔巴乔夫运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秩序，通过恢复“ 垂直统一 ”——当然也就是指莫斯科的控制——来稳定经济，他们还否认他们认为美国企图使苏联解体，但希望我们能对维护联盟给予更多的积极支持。⑩布洛欣在整个交谈中强调，他的组织维护联盟的努力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有权对不安定地区行使总统职权，而这正是他们主要要求。

来进午餐的联盟组织领导人无疑想装出一副最温和，最民主〔505〕的面孔来掩盖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这个组织中不乏主张用武力维护联盟的人。到夏天的时候，它已成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克制政策和愿意在联盟协议谈判中向共和国领导人妥协的最强烈的批评者。

上升中的叶利钦

到 3 月 28 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党试图剥夺叶利钦议会主席一职的热情已消失殆尽。全民公决结果清楚地表明，叶利钦的受欢迎程度保持不变，而戈尔巴乔夫由于调动军队进入莫斯科去对付群众的示威活动，使得许多代表大为反感，他们原本并非叶利钦的支持者。

然而，叶利钦要想登上总统宝座，仍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刚开始，议会拒绝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的压力开始影响议会的投票。4 月 4 日，三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使事情出现了转机，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伊万 · 波洛兹科夫宣布 “ 现在苏联领导层不应有变动 ”，这是停止迫使叶利钦退职努力的信号；一名迄今并不引人注目的阿富汗战争中的退役飞行员亚历山大 · 鲁茨科伊宣布成立一个 “ 民主共产主义者 ” 固体，这为叶利钦阵营拉进一个重要的投票集团；以及在一个绝妙的时机，叶利钦要求授予他处理各种紧急问题的全权，类似以前苏联授予戈尔巴乔夫的权力。

正如我在数周之前在日记中所预料的，叶利钦成功地扭转了局面。他把他的攻击者们发起的推翻他的会议转变成一个政治发射器。他的敌人中有一部分仍在继续战斗。在对叶利钦的要求进行表决之前，在 2 月份最高苏维埃带头向叶利钦发动攻击的斯维特拉娜 · 戈里亚乔娃登上演讲台进行发难：

鲍里斯 · 尼古拉那维奇……很明显，总统之职是您的主要目标。为了它，您已陷入欺骗和颠倒黑白之中，并准备竭尽〔506〕　全力，为了权力，即使使国家陷入危机也在所不惜。您会做出任何事来。

……一想到您占据总统之位，我便感到恐惧和战栗。您要求额外的权力，而您对手中已拥有的权力都还不会正确使用。（11）

有一阵子，她的声音几乎被口哨声和讥笑声淹没，但担任会议主席的叶利钦仍一丝不动地控制着会场秩序，让她把话讲完。

尽管戈里亚乔娃进行了激昂的控诉，代表们还是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叶利钦的提案，并在第二天通过一项动议案，（12）不仅通过法令赋予他临时权力，还赋予他几个月来一直寻求的东西：进行总统选举的确切日期。尽管俄罗斯宪法尚未进行允许设置总统职位的修改,但决议仍宣布将在 6 月 12 日选举俄罗斯总统和副总统。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下一次开会时间定在 5 月 21 日，届时将通过必要的宪法修正案。然而，代表大会并未给予叶利钦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大会否决了他提出的组建苏联联合政府，与中央政府就新的经济计划进行圆桌谈判的要求。（13）

在东正教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叶利钦赢得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选票。星期六晚上，他出现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大教堂，参加了由阿列克谢二世主教主持的复活节庆祝仪式。电视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进场、手持蜡烛、恭敬伫立并随着仪式变换姿势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对信徒而言，这有力地象征着俄罗斯领导人已经与传统的俄罗斯国家教堂达成和解，在过去它曾一

直受到好斗的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的贬损和共产党政权的压制，数次濒临灭亡的边缘。

叶利钦再一次抢了重角戏。戈尔巴乔夫虽然放松了对宗教团体的官方控制，并吸收教士进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不时地向他们进行咨询，但他不愿打扮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在公众眼中，他在成人以后从未到教堂做过礼拜。（14）叶利钦仍没有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的姿态已表明他将

把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中真正的、有价值的一部分来对待。（15）

一周后，叶利钦开始了法国之行。当时，外国新闻界将它视〔507〕为一场公关的灾难，但俄国人的反应却相当不同。当他访问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时，欧洲社会主义立法小组主席吉恩·皮埃尔·科特当众攻击他为“煽动者”，以及与“我们认为更可靠的”戈尔巴乔夫对立是“不负责的”。（16）

这一事件，以及在法国之行期间受到的官方的冷遇，被苏联报纸作了详细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在晚些时候也作了报道（17）——多数俄国人对此表示愤怒。他们对外国人竟然放肆地侮辱他们新当选的领导人感到憎恨。并且，他们怀疑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有意纵容这种侮辱：一则新闻报道说，苏联驻法国大使尤里·杜比宁曾正式要求不要给予叶利钦特别待遇。

叶利钦表示无意取代戈尔巴乔夫，相反，更希望通过“圆桌会议”产生一个联合政府，并保证支持联盟条约。（18）当他从斯特拉斯堡回到巴黎后，他和密特朗总统及其他高级法国官员的会晤也被拖延。

叶利钦的法国之行意想不到地对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明显表示了不快的情况下，密特朗还是决定接待叶利钦，这表明不论西方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迷恋程度有多深，他们也不愿意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朋友高兴而无限期地无视颇受欢迎的叶利钦。同时，叶利钦公开表示希望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签订联盟条约以及使改革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实际上，这是他对 2 月份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作了让步。正如叶利钦对法国记者所说：

戈尔巴乔夫没有辞职；他是国家总统……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必须为俄罗斯和整个国家不再受苦难而努力工作。

尽管戈尔巴乔夫和我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也必须这样做。（19）

在 2 月和 3 月里，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任何和解似乎都是不可能的，现在突然出现了新的开端。两个人都已意识到，右翼力量正在不断加强，并决心把他们全部赶下台来。

〔508〕　当叶利钦还在法国的时候，我回到了华盛顿，希望在我们和叶利钦的关系方面能得到更多的令人满意的指示。自从他 1989 年被选进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就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从我的上司那儿却没得到任何鼓励。华盛顿从来没有要求我不见他，我在国务院的同事们都认为有必要和他保持联系，但白宫官员对他的政治持久力表示怀疑，总统则担心会冒犯戈尔巴乔夫。我怀疑他们没让我疏远叶利钦只是因为他们担心新闻界会走漏消息，在国内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如此，叶利钦的政治重要性正在急步上升，他的政策与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寻求大力削减苏联军费预算，取消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不负责任的政权的援助，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在国内，他支持真正的经济改革，包括承认私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无论怎样怀疑他的行政能力，或者民主原则不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时他遵循这些原则的决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同他保持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完全理解使苏联发生如此剧烈震动的变革。此外，由于叶利钦的力量和权威正在上升，他将有可能在某个时候通过民主进程掌握政权，因而，定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这并不是一个以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或是努力削弱苏联的问题，尽

管有些人在为白宫的态度辩护时，其谈话方式似乎是承认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当然不应把叶利钦当作苏联总统来对待，或者去损坏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像对待反对派领袖那样对待叶利钦并没有违背外交准则。

实际上，苏联宪法明确赋予每个加盟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的权利，并且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外交部，因此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时，在理论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比美国州长拥有更大的权力。我们的州长们在环游世界、与外国领导人会〔509〕面以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方面从不犹豫，而这些也正是叶利钦与我们交谈时也最感兴趣的话题。

有了这些理由，我不理解为什么白宫官员还认为我们应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进行选择。我认为我们应该在他们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同他们二人都打交道，同时放弃这是在玩弄权术的想法。到 4 月中旬，我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可能很快会作出另一番努力去与叶利钦合作。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与他们二人都有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这一努力。正如我在 4 月 5 日的日记中所写的：

最近七八天发生的事情似乎对改革者有利。如果叶利钦

下不了台，并继续巩固他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可能会被迫抛开个人恩怨，再次与他打交道。煤矿工人罢工可能将变成试金石，现在看来，似乎只有叶利钦有力量制止它。他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清楚表明，如果他寻求提高权力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不会为结束罢工做出努力。

至于戈尔巴乔夫，正如叶利钦一样，他也不可能没看到那些要求他下台的“ 右派 ”人士讲话的场面。遇到了像这样的朋友，他可能也会理解鲍里斯 ·尼古拉那维奇将做一笔什么样的交易。　　　　第二天，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 · 科济列夫路过斯帕索别墅，进来小谈，我们刚退休的国防部长弗兰克 · 卡卢奇也正进行一次私人拜访，我们三人回顾了近期的事态发展。科济列夫主动他说，形势正迫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寻求和解。3 月 28 日，戈尔巴乔夫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阻止群众示威，使得双方都感到害怕。突然出现的可能引发内战的危机成为一个威慑物。“ 它就像美一苏关系中的核武器，” 科济列夫说，“ 一旦我们认识到危险，就该想到我们必须合作，防止使用它们。 ” 他继续说，叶利钦可能当选，这将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让步，不论他个人喜不喜欢。他笑着不愿透露他讲这些话的根据是什么。“ 你只有具有实力才可以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 ”

〔510〕　　　摆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问题是，如果叶利钦访问华盛顿，我能否向他保证布什总统将接见他。他已接到国会以及好几个民间组织的邀请，但他更希望接到来自行政部门的邀请。我向他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似乎也接受了。但如果他得不到会见布什总统的保证，他根本就不想作美国之行。直到 1991 年 4 月我回到华盛顿之前，我一直被明确告知不要向叶利钦作任何这方面的承诺。

4 月 18 日下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布什总统，用大部分时间描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我认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是相关联的，不管他们如何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一事实。我指出，从去年秋天以来，戈尔巴乔夫已偏离了改革的轨道，同时也违背了他对叶机钦所作的承诺。队那时起，他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迎合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因为如果共和国控制了财政，他们将大量削减提供给军事部门的物资，我还提到科济列夫

的观察，即双方部受内战威胁的制约，他们的顾问都敦促妥协。到底双方能否取得和解还有待观望，但在我看来，除非授权叶利钦赋予煤矿管理自治权，否则结束声势越来越大的罢工的希望很小。这将要求摆脱中央部委——在工人看来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的管理。

针对目前的这种形势，我建议应和苏联国内各个派别进行交流，但不要被卷入到它们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去（为促使我们抵制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正在利用我们的国内政治斗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敷衍中央共和国，与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的地方，即城市和地区打交道。我还认为，援助应当直接给予私营部门，而不应该如戈尔巴乔夫所敦促的那样经过中央政府分发下去。

总统问及戈尔巴乔夫刚提出的购买美国农产品的 15 亿美元额外信贷保证要求，我告诉他我认为这纯属国内问题。国会己通过方案支持美国农产品出口。假如总统认为这对我们有利，而我们又相信苏联能偿还这笔贷款，那他应该批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对苏〔511〕联经济改革的援助，他不应同意这一请求，因为这笔贷款起不到那样的作用。实际上，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面临粮食短缺，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却正在使事情变得更糟。我认为任何大笔数额的贷款都应用来支持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我和布什总统谈话的第二天，已作为主要苏联事务专家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爱德华·哈沃特同我进行了联系，他说，我返回莫斯科后可以照会叶利钦，如果他来华盛顿，总统可以与他会晤。但在此之前，我应拜访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并向他解释布什总统将保证叶利钦不利用这次访问来破坏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关系。

9 十 1

4 月 23 日，在我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在郊区的一幢新奥加廖沃政府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在长达九个半钟头的马拉松会议上，接见了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晨，《真理报》刊登了由与会 10 人联名签发的一项声明，呼吁制定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采取措施稳定正在崩溃的经济。（20）这个宣言对正在加速瓦解的局势起到了刹车的作用。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准备向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让步了。

在制定联盟条约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每况愈下。事实表明，所有的共和国都不接受先前的草案，独立热正在扩散。经过几次拖延之后，有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正式谈判于 4 月初拉开了帷幕。（21）4 月 9 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经过表决，一致通过重建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退出谈判。

随着离心趋势的加强，4 月 18 日，5 个“ 核心共和国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基辅会晤——〔512〕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日本访问——协调它们在联盟条约中的立场。与会者赞同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提出的要求，即条约创立的是主权国家的联盟，而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或者说很像是 8 月份哈斯布拉托夫向我描述的那种松散的邦联。此外，他们反对给以前的“ 自治共和国 ”与新联盟共和国相同地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出自戈尔巴乔夫，他试图通过迎合俄罗斯“ 自治区 ”来削弱叶利钦（22）

4 月 23 日的协定标志着对于共和国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尽管许多细节还需协商，协定似乎为戈尔巴乔夫和大多数共和国，

包括几个最大的共和国进行一笔巨大交易提供了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称协定是联盟的一个重要胜利，并首次称之为“1+9”协定。但是与德国统一谈判中的情况一样，数字的排列顺序意义重大，几天之内，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坚持下，公式被改为“9十1”。

1991 年 4 月 24 日，联合声明在中央的新闻报刊上发表，为了响应前一周“核心共和国”在基辅的决议，它明确提出，新联盟条约针对的是“主权国家”，将需要一部新宪法，在条约签订后六个月内提交议会。然后，根据新宪法进行新的选举。

声明似乎巧妙地解决了脱离联盟的问题，它宣布凡签订了联盟条约的共和国将享受最惠国待遇。声明虽没有明确规定其他共和国的地位，但暗示了它们将被排除在新联盟之外，并将以主权政治实体的身分与联盟谈判它们之间的关系。当我问戈尔巴乔夫的一些顾问这是否属实时，有人承认这将为脱离联盟提供一条轻易而且自动的途径，而其他人说，不紧跟新联盟会使各共和国作为苏联的一部分，继续保持现在的地位。但他们无法解释如果新联盟取代了苏联会怎样；苏联的机构将会消失，将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来维持中央与共和国的现存关系。

〔513〕戈尔巴乔夫不仅被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新联盟的概念，还被迫缓和他先前颁布的增加税收和价格的命令。例如，他同意从 1 月 1 日起减征 5%的销售税，增加给学生的奖学金，并降低飞机和火车票价格。

戈尔巴乔夫似乎第一次走到了共和国领导人希望建立松散联盟这一要求的边缘。强硬派显然被戈尔巴乔夫的让步激怒了，如果戈尔巴乔夫能抵挡住强硬派的反攻，他也许还能在“核心共和国”维持住某种联盟结构，并在其他共和国有秩序的脱离时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推翻他在 11 月和 12 月组织的政治联盟，同时，能确保决心维护老帝国的人们无法推翻他。

保守派攻击戈尔巴乔夫

对戈尔巴乔夫的下一个考验来自“9+1”联合声明签署后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几周来，盛传着这样的流言：党内强硬派将利用这次会议攻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有些地区的第一书记还公开鼓吹，作为辞去总统职务的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将被迫辞去党内职务。（23）然而，最高苏维埃对帕夫洛夫“反危机方案”的批准，尤其是“9+l”声明的签署，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声明正好在中央全会召开的当天早晨发表，初看起来它似乎是走向团结的一个政治突破。它的深远影响是逐渐显示出来的。

此外，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宣布亚美尼亚政府把共产党的财产国有化是非法行为，以此作为平息党内保守派的另一步骤。（24）当时，我怀疑他如何才能实施这一命令，但这不是关键：他想挺身而出阻止共产党的进一步瓦解，并以此使人们不去相信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的传言。

有谣传说，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将认真考虑撤销戈尔巴乔夫的〔514〕党内职务问题，这一谣言流传已非一日。而从苏联最高官员们的行动来看，他们似乎也相信这一点。有一次国务卿贝克访问中东期间，我们准备安排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他在高加索山脉附近的一个疗养地会晤，但别斯梅尔特内赫请我向贝克解释他无法在贝克所希望的时间赴约，他说：“告诉吉姆，4 月 24 日我无论如何得呆在莫斯科。我不能缺席这次全体会议，因为戈尔巴乔

夫需要他所能得到的每一张票。”

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似乎又以智谋战胜他的批评者。他在开幕词中发出警告说，如果他被迫辞职，就会产生一个权力真空，导致独裁。他对“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都进行了抨击，以表明自己是坚定的中间派。然后进行了投票，结果要求讨论他的辞职问题和要求他递交一份述职报告的两项动议都失败了。另一项动议要求讨论将党的总书记和总统职务分开的问题，最后也失败了。

尽管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仍在继续，并且大部分相当恶毒。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通常有现场直播，或者只延迟几个小时转播，而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则不同，中央全会是在封闭中进行的。只有一些零碎的报道，会场外的人很难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 4 月 24 日会议后，大多数报道表明戈尔巴乔夫已击败了对他的地位提出的挑战。

4 月 25 日，全体会议继续进行，但是中午过后，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的谣言传遍莫斯科。那天下午，我在一个大型公共集会上发言并回答问题，会散后我立即赶往芬兰大使哈基·塔维蒂的宽敞宅邸参加一场音乐会。音乐令人愉快，但不能拴住我的思绪，因为我还没听说全体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场间休息时，编辑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告诉我，他已听说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消息，并差点在那天下午截稿之前把这则消息列为《论据与事实》的头条新闻。然而，他决定还是先不去冒险，等有了正式通告再说。

音乐会结束后，我渐渐地打听到会议的情况。在接受了一上〔515〕午的严厉批评后，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宣称，总书记只有在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才能工作，因此，“如果这就是你们支持我的方式，那我宁可辞职”！（25）

他的声明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会场，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立即宣布会议暂停。休息期间，中央委员会的 72 名成员联名请愿，如果戈尔巴乔夫辞职，他们也辞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事情突然变得很简单，如果同意戈尔巴乔夫辞职，将意味着共产党本身的结束。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将跟随他一道辞职，而且以他的地位，他可以利用国家官僚的权力来瓦解共产党的机构。叶利钦已经显示了一个脱党者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戈尔巴乔夫加入到他那边，来毁灭共产党，那么会场里多数成员也就前途渺茫。

会议继续进行后，伊瓦什科宣布政治局决定将最后一条建议从记录中删去。这一建议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在日记上简短地记下了以下评论：

其实，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辞职，可能对他也没坏处。例如，斯塔尔科夫就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机会去反对共产党机

构，因而将增加他的声誉。这是一种可能，但他也可能给人以一个受到致命伤害的领导人的印象，而反对派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把他从总统的位置上赶下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看来他已赢得了一些时间，也许还是相当充裕的时间，这要取　　　决于他与九个共和国领导人的交易是否坚定。

后来，我想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是否真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不稳。所有的选票绝对地支持他，这可能表明大家的情绪不像想象得那样消极。然而，我意识到投票结果本身还不完全说明问题，毕竟，几乎不会有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希望被人发现是在往失势的一方投票（尽管实际上处罚已大大减少了）。因此，许多反对他的人可能会投他一票，直到确信他的对手占据优势。那时，选票可能会大部分倒向对方。

事实上，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但 4 月份的全体会议上的确〔516〕有一个“ 倒戈 ”阴谋，是由后来参加 8 月政变的一些人组织的。随着政变领导人的被捕，调查者发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厂厂长、国营企业协会领导人亚历山大 · 济兹亚科夫在 4 月全体会议前组织过对中央委员会的一场电报战役，要求整顿经济秩序。他的目标是说服全体会议同意免去戈尔巴乔夫的职务，并成立一个类似于 8 月份组织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计划包括在会议上控制讲坛，以使“ 倒戈 ”更加有力，并把独立的新闻媒介排斥在会场之外。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将着手“ 恢复苏联共产党在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权威 ”。（26）

戈尔巴乔夫在 4 月 25 日的谋略为他赢得了胜利,但他的反对派并没有承认失败。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4 月 26 日，星期六，我总结了几天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本周非常重要。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意义重大的行动，叶利钦和其他几个主要角色也是如此。如我前面所说，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真的有失去党内职务的危险（虽然我怀疑他有），而且也不能肯定失去党内职务将会使他失去总统一职。无论如何，如果他要辞职，还是不要被迫辞职的好，时机最好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

目前，我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但是，他可能只是赢得了一些时间，问题是他是否能好好地利用它。在我看来，他已向极右势力显示，即使在共产党内，使用合法的手段，他们也无法撤去他的职务，同时他还迫使改革派看到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他离开。因此，现在是再次摆向“ 左翼 ”的理想时间。他似乎已为此搭好了舞台，但我不能肯定他会上台表演。

叶利钦在新奥加廖沃声明上的签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很难相信他真的支持宣言中的某些方面。但是，他一定已经认识到（甚至在去法国之前）：在自己的地位还不足以〔517〕 取代戈尔巴乔夫之前，迫使后者辞职对自己并无益处。因此，他至少也得表现出一个合作者的姿态。决定性的问题看来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在共和国权力上作出更多让步，以及叶利钦是否能解决罢工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推动力变得越来越大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会接受圆桌会议，甚至一个联合政府。而事实可能已经如此。

试金石：主管经济的部委将向何处去？只要戈尔巴乔夫继续依靠它们，他就会陷入麻烦。因为尽管这一体制将继续瓦解，但各共和国的观念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

“ 我们将拭目以待。 ”

并非所有的改革派都对戈尔巴乔夫努力维持其党内职务感到高兴。当下一周我拜访谢瓦尔德纳泽与他商讨即将对美国的访问时，他评论说，戈尔巴乔夫在挫败了逼他辞职的企图之后，应自愿辞去他的党内职务。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自愿脱离共产党，他将使自己从党组织中解脱出来，带着改革派离开共产党，并再次在公众中获得声望。这虽然会分裂共产党，但它将加强他们正努力发展的多党制，因而是有益的。他说：“ 应该让（共产党内的）‘ 保守派 ’和‘ 民主派 ’成立它们自己的政党，其他派别也一样。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继续成为强硬路线分子的俘虏，被迫采取可能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施的政策。在他看来，最近帕夫洛夫总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就是指的这个方向。（27）

但其他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经充分准备就试图分裂共产党将是鲁莽

的。就在我会见谢瓦尔德纳泽的当天，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对我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位，许多人将把它解释成是一次政治失败，它还可能导致他的总统职位也迅速垮台。

叶利钦，当选总统

1991 年 4 月 24 日，即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击退反对者的同一天，叶利钦越过了他成为总统的另一个障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法案。任何能征集到至少 10 万俄罗斯公民签名的候选人都可以参加 6 月 12 日的选举。投票以无记名方式进行，当选者须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这改变了议会选举中要求参选者所获系数须超过登记投票人数一半的规定。法案进一步规定，总统任期五年，在任期间须终止在政治党派和公共社团中的成员资格。同时规定：如果总统违犯了宪法、法律或就职誓言，经宪法法庭——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裁定、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 2/3 的票数通过，总统将被免职。（28）这一条款在两年后引发了一场冲突。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虽然通过了设立总统法案，但它还取决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俄罗斯宪法的适当修改，人代会召开的时间定在 5 月 21 日。叶利钦和他的对手都希望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一修正法案，叶利钦的敌人也不再反对修改宪法，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选举活动。

我不能不对苏联政治的反复无常感到惊讶：几个月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一直拒绝建立总统制，而且就在六周前，叶利钦还面临着被撤除议会主席职务的严峻考验。而现在民意已毫无疑问地转到他这一边来，甚至对他的领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迫于民意而支持他。

9＋1 协定和俄罗斯议会通过总统制法令后没几天，叶利钦结束了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的矿工罢工，从而显示了他的政治实力。叶利钦向矿工们许诺，接受他们的条件，把他们从联盟中央煤炭工〔519〕业部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通过结束罢工，叶利钦为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缓解了一些直接的压力，但也显示出他们已不能离开他的合作，此外，如果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不迅速取消的话，这种缓解也只能是暂时的。帕夫洛夫似乎从未认识到这一点，但戈尔巴乔夫似乎有一度已认识到了这一点。

叶利钦挑选的竟选伙伴着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他排除了曾给他不断支持的民主俄罗斯中的许多优秀领导人，而选择了阿富汗战争中的老兵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他曾在 3 月份叶利钦受到弹劾威胁时，率领民主派共产党员支持他。

当时，这看起来是很厉害的一招。多数军官本来是反对叶利钦的，但有了鲁茨科伊这一票，叶利钦可以希望吸引一些军人，甚至是仍在共产党内的温和的改革派。由于俄罗斯副总统和美国副总统一样，其职责规定非常含糊，看来谁当选副总统都不会有重要影响。因此，像许多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样，叶利钦的选择建立在短期政治需求的基础之上。

当俄罗斯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角逐结束时，除叶利钦外，产生了五名候选人。尼古拉·雷日科夫现在已从心脏病和在他看来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成为最难对付的对手。（29）他似乎得到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但也表现出失败者的形象。在戈尔巴乔夫的敦促下，力图阻止叶利钦获取多数票的瓦季姆·巴卡金也加入了竞争者的行列。在多数人看来，他似乎最有实力把选票从叶利钦身上拉走，因为他受到温和的改革派的支持，并且比叶利钦显得更具有民主作风，因为叶利钦不断地在民粹党的花言巧语

和地方共产党书记的独裁作风中摇摆不定。

如果俄罗斯政治还有主流的话，其他的候选人似乎已经脱离了这个主流。阿尔伯特·马卡晓夫，一位大胡子的三星级上将，其〔520〕竞选纲领充满了法西斯主义。阿曼格尔基·图列耶夫是一位来自克麦罗沃的哈萨克族人，克麦罗沃处在俄罗斯与哈萨克的边界上，他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候选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地方主义者。（30）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这些名气较小的候选人中最捉摸不定的一个，无论在组织工作或是资金方面，他似乎都有备而来，但这两者的来源似乎都很隐讳，而且，至少在竞选运动开始前，他的政治纲领也很含糊。

日里诺夫斯基首次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亮相是在1990年6月俄罗斯议会选举前几周。他的自民党是那次选举前第一个正式注册的，甚至在共产党之前，并且在电视黄金时间他还有几分钟的镜头宣布其政党参加竞选。他声称，他的党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自由民主。

我对此感到怀疑。1989 年 12 月，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的葬礼中，一个名片上印着沃罗尼的人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萨哈罗夫的亲密朋友，并帮助我们在人群中开路。他似乎是在帮助葬礼的组织者，当叶琳娜·波纳邀请我们去墓地时，他主动向我的司机指路。我们在车上攀谈时，我断定他没有明确的职业：他 50 刚出头，说是因残疾而退休，但究竟是什么残疾，他既没有谈，也看不出来。他自称是一个将“遵循萨哈罗夫的理想”的政党的组织者。但后来，当我问到叶琳娜·波纳是否认识他时，她断然声称他从来不是萨哈罗夫的朋友，而实际上是个“骗子”。我不再和他联系，但数周后，在匈牙利使馆的招待会上，沃罗尼和我搭活，并向我引见他的一些“政治伙伴”。他们说，他们正遵循萨哈罗夫的理想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共产主义政党。他们每人给了我一张名片，其中一张印有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名字。

回到使馆后，我叫我们的人调查这个组织。我们已经和莫斯科奉行民主政策的多数政治家们建立了联系，我很奇怪怎么会漏掉了这一个——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一方面，他们的态度令人〔521〕生疑，但同时我认识到我们并没有认识政治舞台上的每一个人，而新的领导力量可能来自社会的隐蔽之处。

几天后，我得到了答案：当我们的人打听这个组织时，得到的回答是，多数负责任的俄罗斯政治家怀疑它是由克格勃、或是　　　由其中的某些人资助的，用来分散真正民主力量的选票。我指示我们的外交人员避免进一步与这个组织接触。我们的联系已受到在政治上相当活跃的苏联公民的紧密注视，没有理由再用我们的注意力为日里诺夫斯基的组织增添合法性了。

1990 年春天，苏联新闻界对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党的重视程度似乎证实了我早些时候得到的报告。很明显，该“政党”在苏联官僚阶层中有实权在握的朋友，因为其他政党的注册困难重重，并总是被拖延，即使有机会上电视新闻，时间也少得可怜。

叶利钦在俄罗斯建立民选总统职位的成功，对其他民主运动政治家们通过选举在低级别的组织任职是一个鼓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市委员会的主席加夫里尔·波波夫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所在城市的市议会四分五裂，他们要想得到市议会的持续支持十分困难。因此他们建议修改城市宪章，经普选而不是由委员会选举产生市长。两个城市都采纳了这个建议，选民在选举总统的同时，也投票选举市长。正如叶利钦正在准备用直选挫败他在俄罗斯

议会里的对手那样，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在他们管辖的城市里采取了同样的手段。

竞选运动充满了活力，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自由和更有效率。民主党派、团体和联盟除了在支持叶利钦问题上能够团结一致外，自身仍在继续分裂。例如，由尼古拉·特拉夫金领导的俄罗斯民主党 4 月 25—27 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会议，尽管他呼吁建立广泛的联合来支持叶利钦的候选人资格，还是遇到了来自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和群众示威活动最有能力的组织者、物理学家阿尔卡·穆拉谢夫的分裂活动，他们放弃与特拉夫金联合而组成了自己的政党。

〔522〕在此次竞选中，戈尔巴乔夫没有像 1990 年 5 月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议会主席时那样，公开反对叶利钦。然而，几乎无人怀疑瓦季姆·巴卡金是他的代理人。尽管多数观察家认为叶利钦将获胜，有些人认为如果巴卡金获得 10%或更多本该投向叶利钦的选票，叶利钦可能将被迫与雷日科夫决一死战。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中以超过 57%的得票轻松取胜。如预料得一样，雷日科夫排在第二位，但得票比预测的 20—25%要少，他只获得了 17%的投票。而真正的意外来自第三名，他并非预测的瓦季姆·巴卡金，而是神秘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获得了 600 万张选票，将近所有选票的 8%。其他人获得 6%或以下的选票。巴卡金出人意料地落在了最后，仅获得 3%多一点的票数，选民的不满不是冲着他而来的，而是冲着戈尔巴乔夫的。

尽管这是一个严酷的政治打击，戈尔巴乔夫还是极有风度地接受了叶利钦的当选。1991 年 7 月 4 日，他出席了叶利钦在议会大厦的就职仪式。叶利钦对俄罗斯宪法和苏联国家主权宣言宣誓。在就职演说中，他明确指出，民选总统的产生标志着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与苏联可能出现的局势大不相同：

俄罗斯公民选举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名总统……他们选举的是我们的祖国要走的路。

大俄罗斯正在崛起……历经重重磨难，带着明确的目标，我们可以绝对相信：俄罗斯将再次振兴！（31）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大主教阿历克谢二世向这位俄罗斯新总统祝福。

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位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他也是自 1894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第一位在教堂中寻求赐福的俄罗斯领袖。

第十九章
盲人的讹诈

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的边缘……情况如此严重，必须实施紧急状态。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1991 年 6 月 17 日①

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不存在危机……有人就是喜欢在总统和总理之间拨弄事非。

米哈伊尔·戈尔巳乔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 1991 年 6 月 21 日②

我们（民主主义者）已瓦解了这个国家，但还未能将它重新组织起来。

加夫里尔·波波尔 1991 年 7 月③

1991 年春夏，苏美关系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海湾战争结束后，华盛顿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与苏联遗留的主要问题上来。两国外交部长每月会晤

数次，两位总统几乎每周都在电话上进行谈话。我在莫斯科的每一天都会见一位或几位苏联高级官员——如果不是总统、总理或是外交部长，那么至少也是他们的高级助理。

尽管戈尔巴乔夫竭力阻止由美国一家领导的海湾战争，但他还是恪守他在赫尔辛基对布什的许诺：与美国合作，结束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虽然戈尔巴乔夫好几次都快要下令或允许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但当我们声明这将会使我们的合作面临危险时，他都改变了主意。对此华盛顿一方面心怀感激，同时对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地位的关注也与日俱增。

但是，还有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苏联军方还在对在欧洲削〔524〕减常规武器协定推倭义务。谈判人员对战略武器协定的条款争论不休；尽管一年来已经就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核实方面的问题还是不断出现。最近的一个争论是关于减少弹头装载问题——是否同意及在什么条件下减少多弹头导弹负荷数量，使其低于过去试验的最高数目。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没有通过保证自由移民权利的法律（尽管实际上希望移居国外的公民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因此，1990 年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的贸易协定尚未递交国会审议。

布什对莫斯科的访问原来订在 1991 年 2 月，但由于海湾战争而推迟，新的时间安排尚未确定。总统希望访问莫斯科时签署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协定，但他知道，即使战略武器问题得以解决，在苏联还没有完全履行一年前签订的常规武器协定的情况下，这么做将是不明智的。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变得焦躁起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布什推迟访问苏联感到不舒朋。他没有预料到他在 4 月份提出的请求用于购买小麦的 15 亿美元信贷保证迟迟得不到批准；而对于他是否会被邀请参加 7 月份的七国首脑会议也没有把握。在国内，他也因“天真地支持西方利益，而不为苏联谋求同等的利益”而遭到政敌们的指责。

乔治不再爱我了！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签署的被专家们称为 CFE 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是标志着冷战结束的几个事件之一。它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欧洲的军队和武器，而且在许多地区对军队人数作了最高限制。为了实现最终达到均等的原则，苏联同意接受不按比例的裁军。

〔525〕然而，条约签署后不久，就有苏联最高指挥部试图违反其中某些规定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些（包括乌拉尔东部军队的突然移动）违反了协议的精神，其他的（不包括海军步兵部队——苏联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称呼）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违背了协议。戈尔巴乔夫无力保证苏联军事力量完全遵守协议是导致谢瓦尔德纳泽辞职的原因之一。

由于苏联的违约行为，美国及其盟国拒绝批准这一条约。有关纠正苏联行动的谈判从冬天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春天，从来都是寸步不让的苏联逐渐开始让步，但也只是一次让一小点儿。这是葛罗米柯战术的又一次重演。

但到了 5 月，只剩几个问题尚未解决。我受命去见戈尔巴乔夫，敦促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时间定在 1991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

戈尔巴乔夫会见我时只有切尔尼亚耶夫在场。他仔细地听取了白宫要我转达的几个问题。鉴于苏联外交部无力保证苏联军队遵守协议，我们建议戈尔巴乔夫派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塞耶夫将军去华盛顿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深知尽快解决有关欧洲裁军的一些遗留问题并使

条约能早日生效的重要性。尽管他认为他已经就解决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但他还是同意了派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

然后，他把事先准备的发言稿搁到一边，从桌子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开始用伤心的语调滔滔不绝他讲起来，并不时地沉浸于这种悲痛之中，这种做法常常能产生他所希望的效果。这时候去看手表是不礼貌的，但我肯定他持续了至少 15 分钟，更有可能是 20 分钟。

他说，令他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布什总统在“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在一系列问题上用的是批评的语气。此外，他已得知他请求购买小麦的信贷遭到否决，还有其他一些贸易障碍的报告。例如，尽管里根和布什都向他保证过没有出口限制，而一年前他在访问明尼阿波利斯时，也亲自〔526〕签署了有关的合同，然而美国还是拒绝出口能提高苏联核电站安全性能的计算机设备。他对我们为什么不把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能看成是共同的利益感到不理解。此外，他还获知一项开辟商业航线的协议合作工程在办理许可证时出了问题。

他在喋喋不休的谈话中，提到了我刚刚宣布的离任计划。“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呢？”他带些夸张的口气问，并补充说，我们已“卓有成效”地合作了好几年，他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决定结束我的大使生涯。“也许是你认为这条船快沉了？”他盯住我，随即又用一个突然的微笑化解了紧张气氛。

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解释道，布什总统并没有放弃对改革的支持，如果偶尔在华盛顿听到了批评的声音，那只是对诸如苏联违反了欧洲裁军协议一类的具体行为而言。至于经济关系，据我所知，关于购买小麦贷款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请他理解布什总统在做出任何积极的决定之前必须面对许多的法律和技术性问题，尤其是我们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提供贷款的可靠性，而这是法律所要求的。

我提到“信贷可靠性”再次激发了他的情绪，他抱怨说，布什在公开讲话中指出应对这一问题加以注意，而他的批评者们正利用他的这个讲话以及其他类似的讲话来反对他。

我指出他是在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牵强地联系在一起。我将离任纯属个人原因，在致力于研究苏联事务八年后，我感到我应该做些别的事情了，来一位新大使对我们大使馆也有好处。我认为布什总统仍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苏联的改革和他本人，而他则应该认识到，只要他坚持维护他的集权式的行政体制，我们要支持他就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例如，我们希望看到取消中央部门的垄断体制，而实际上，它们在新“内阁”中得到了维护。我说：“如何组织你的政府当然是你的事情，但我们无法帮助你让你的现行体制运作起来。我们不知该做些什么，况且，我们对操作你们这样的体制也毫无经验。”

〔527〕关于小麦贷款问题，我说我们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同时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改进苏联国内食品的分配结构。我用我们在 1985 年初次见面时，他对浪费问题的看法来提醒他，并指出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改变。我对用不断举债的办法来填补犹如无底洞的腐败的国家部门是否明智提出了个人的疑问。这笔贷款必须在三年内偿清，而苏联正需要资金来进行经济改革，这无疑将是新增添的负担。

顺着话题，我提出了移民法案的通过问题（我听支持法案的人如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说，在最高苏维埃，除非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它给予有力支持，否则它将无法通过）。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经常是冗长的，但他通常也是一个好听众，若有他手下的人在场则例外。我可能讲了和他一样长的时间，但他一直耐心地听我说完，不时地做点笔记。然后，就我的观点再谈他的看法。

关于中央经济部门，他说当然得取消它们，但还不能马上行动，否则会引起混乱。因此，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试探，以便合理地向市场体制过渡。他说，新化学工业部部长已经制订出取消该部门的方案。

关于移民法案，他说对其花费和实施方式有些担心，但他对法案将被通过表示乐观。我指出现在法案的条文为行政当局推行它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我希望这不要被用来作为再一次拖延的借口。

我们一致同意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他的观点，我还向他保证布什总统仍保持着与他的工作伙伴关系。

然而第二天，当戈尔巴乔夫接见报业大王鲁伯特·穆德赫时，他仍处于狂怒状态。实际上，他在公共场合里比在前一天会见我时更沉迷于尖刻的评论。在记者们面前，他也无所顾忌，居然暗示说布什政府正在冒险挑起一场新的冷战。

戈尔巴乔夫的话引起了布什总统的注意，正如两年前在得到类〔528〕似的模糊信息后所表现的一样，他迅速作出反应，保证将继续维持两国目前的关系。正巧布什总统计划在 5 月 8 日接见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领导——立陶宛的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总统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总理埃德加·萨维萨尔和伊瓦尔斯·戈德曼尼斯。我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报告在头一天送到，戈尔巴乔夫接见穆德赫时的公开讲话在 8 日早上也送到了，它们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使他似乎忘记了他的来访者的身份，他利用这次接见极力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简直是既不合情理，更让人难以置信。

甚至在他会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之前，布什就告诉记者他要把他与戈尔巴乔夫的“紧密的，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关系”公之于众，戈尔巴乔夫的成就是“巨大的”。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来寻求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完全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在会晤中，布什的话几乎成了一种侮辱。他们误解为布什很可能已经加入了他们所害怕的那种交易，即倘若戈尔巴乔夫同意东欧走自己的路，美国对它们的困境也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 月份，华盛顿发出的严正声明消除了他们大多数的疑虑，但此刻这种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的疑虑被再次唤起。

并不是说布什总统应该利用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会见的机会来批评戈尔巴乔夫，这既不合适，又毫无用处。即使私下告诉他们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正在阻止强硬派对他们使用暴力也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妥，但在他们的访问中，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他们的自由的承诺上。

应该找一个不同的、不相关的场合来向戈尔巴乔夫证明他的顾虑毫无根据、甚至是自我的。

戈尔巴乔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来自华盛顿的批评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例如，他允许对国内动乱进行镇压、无力应付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其他地区的暴力活动，对他的将军们违反庄严的条约被动无措，以及对高级官员们对西方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容忍……布什总统也可以列出一个单子，它将比戈尔巴乔夫的单子给〔529〕人更深刻的印象。布什没有必要强调什么“保证”，或好像自己是缺理的一方似的。然而，他明显同情他这位苦

闷的同事，他的反应方式向戈尔巴乔夫暗示出：无论何时戈尔巴乔夫需要布什的帮助，他只需要抱怨说乔治的热情已经冷却，这就足够了。

然而，布什并没有把他的反应只局限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访期间的公开讲话中，他还更加得体地立即致函戈尔巴乔夫，安抚他表现出来的忧虑。5 月 11 日，星期六，他拨通了给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向他保证他并没有拒绝贷款请求，但还有一些法律技术环节需要打通。同时，他还将派遣农业部副部长理查德 · 克劳德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考察用何种办法美国能够帮助改进粮食的分配方式。话虽不多，但足以表达良好的意愿，戈尔巴乔夫同意在代表团抵达后接见他们。

周末，当我把总统的信函交给切尔尼亚耶夫时，我也试图对戈尔巴乔夫的其他一些抱怨作了解释。我们的商务参赞吉姆 · 梅并未发现近期对电脑设备出口许可证有过拒绝，但他确实知道在支付款项未达成协议之前，向核电站出口他们订购的电脑设备的确被延误了。我给切尔尼亚耶夫写了封信说明这个情况，并告诉他，“ 有人让你们的总统相信是我们在阻挠这些电脑设备的装运，但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你们的官僚没有按时支付清单，还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

切尔尼亚耶夫轻笑着咕味着类似“ 全世界都一样 ”的话，向我保证他会向戈尔巴乔夫讲明这个情况，并还保证在莫伊塞耶夫去华盛顿之前把话带到，以便在他出发前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

与欧洲裁军条约有关的问题本身虽然相对较小，但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苏联军队已经在摩尔曼斯克和克里米亚半岛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装备，并想突破协议规定的最高限制。他们还坚持认为护卫战略导弹基地的军队的装备不应包括在内。然而，协议并没有规定这些例外。〔530〕5 月 20 日，莫伊塞耶夫带着一些新建议来到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直接磋商。在讨论过程中，他说这些部队的使命与其说是保卫外部安全，不如说是确保国内安全；它们将被用于平息内乱，而不是对抗西方的冲突。美国人对防御导弹基地表示同情，但认为应该严格将谈判达成的限制性条件应用于海军陆战队，因为这毕竟在条约中有明文规定。

莫伊塞耶夫的访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苏关系，但美国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不过，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他告诉我他已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实际上,协议是在 6 月 1 日贝克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在里斯本会晤时达成的。6 月 14 日，所有参加了欧洲裁军谈判的大使们汇聚维也纳，对条约有争议的解释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终于，布什总统可以带着欧洲裁军协议到参议院请求通过了。

数周后，布什总统才对信贷保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同时，克劳德代表团如约来访莫斯科，和苏联农业官员商讨了几项实验计划。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团召开了一个冗长的会议，热情地对计划表示赞同，但当克劳德说需要有关对苏贷款可靠性的更加详尽的材料时，他又被激怒了。

“ 我们总是按时付清贷款， ”他愤怒他说，“ 我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再多问简直就是侮辱！ ”克劳德解释说，我们的法律要求在决定贷款可靠性时有数据加以证明，这绝不是侮辱，但戈尔巴乔夫拒绝听这种解释。

无论何时，只要戈尔巴乔夫因受挫而发火时，脱口而出的都是当时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也不管是否与本题有关。当时，他说布什被身边的“ 反苏顾问们 ”所包围，他们尽向他灌输错误的信息。他甚至点了中央情报局官员罗

伯特·盖茨的名，他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的副手，并被布什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

说到这时，我也被激怒了。如果说有人因得到错误信息而应该抱怨的话，那应是我们。不只一次地，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向他指出，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向他汇报的显然都是假情况。就我〔531〕所知，美国情报机构和盖茨本人从未向总统说过谎。我们对事情的解释可能不同，但他们只是诚实地向总统呈报他们的看法，而不是虚假的事实。我决不能让戈尔巴乔夫为所欲为地释放他的主观臆断。

在他的指责被译成英语转达给我们的代表之前，我用俄语插话说：“你所说的既不正确，也不公正。盖茨的反苏情绪与克留奇科夫的反美情绪相比要弱得多！”

戈尔巴乔夫咕吹着说他对盖茨有他自己的看法，正如我们对克留奇科夫有我们的看法一样。然后，他把话题重新转移到请求贷款上来。“我本人已向布什总统申请了贷款，”他说，“如果他批准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批准，那是他的事。”

6 月 11 日，我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关于购买小麦的 15 亿美元贷款请求得到批准。

寻求支持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所承偌的他们间的友好关系的持久性感到优虑，部分原因在于克格勃的报告扭曲了事实，无论如何，即使不怀疑美国总统本人的忠诚，他也还是有理由担忧的。到 1991 年春天，苏联经济明显走向崩溃，所有的解救办法都含有一剂可能致命的政治毒药。而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有一位“解围之神”到来，要是他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朋友们汇集起来，动员一场巨大的国际援救行动该多好！他们毕竟曾为挽救弹丸之地科威特而倾注了几十亿的援助，并拿生命作出代价。可以肯定，为了让一个致命的威胁转变成一个合作伙伴，提供这笔甚至更多的援助是值得的。此外，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至少在私下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保证过对自己的永久支持。在一年里,区区 200—300 亿美元的援助只不过是他们削减国防预算所节省开支的一小部分，而这就能保住他的职位，况且，这笔节省的款项还是由于他的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梦想参加定于 7 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532〕济强国的首脑们的下一次七国会议。他确实期待着接到邀请，成为那个特别俱乐部的第八个成员。④4 月和 5 月份，戈尔巴乔夫经常通过私人电话来试探七国成员是否有邀请他去伦敦的可能性。

当我在 5 月初通过私人途径了解到这些时，我不禁焦虑起来。我并非怀疑他能接到邀请——七国中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愿意得罪他，或是由于公开拒绝而增加他的国内问题，而是现实根本不会有可能让他满载着承诺或是七国集团的完整的成员资格而归。

七国集团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和政治困难，使得对苏联的援助成为艰难的事情。美国预算赤字不断增加，近期实行了一项有争议的增税政策，而总统正面临着来年的竞选，在这个时候，任何额外的对外援助都无异于自杀行为；德国此时正开始动用庞大的资源财富，让东部国土赶上西方的水平；日本仍然坚持在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之前归还南千岛群岛，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权力显然还不足以可以割让土地，尤其是在“失去”东欧后如此短的时间

内。其余的各个国家都有充足的理由只提供很少的帮助。

此外，苏联还没有采取改革步骤，以便有效地使用外国援助。戈尔巴乔夫想要的诸如大笔贷款、对稳定货币的支持、对债务的重新安排只能是苟延残喘。这些措施有的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给改革带来更多困难。为了使外国援助有意义，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套有成功可能的可行性方案。

我还担心戈尔巴乔夫介入七国集团可能在苏联公众中产生负面效应，除非是以极周到的措辞向公众作出解释。必须在公众中留下这样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参加七国会议是因为他接到了邀请，而不是由于他自己邀请了自己：他参加会议是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而不是去争取对苏联的援助。否则，他将因为乞求援助，或者因为所得款项太少以至被否决而遭到指责。但问题是，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在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时，表现出极端地不老练。

5 月份，我和苏联外交部讨论了这些问题，建议他们等待邀请〔533〕来到而不是四处张扬，同时起草一份比帕夫洛夫的“ 反危机计划 ”更有说服力的方案。我还鼓励他们突出强调戈尔巴乔夫出访伦敦的原因在于苏联正在进入世界经济，以期其他主要大国能听到苏联的观点。实际上，如果有新的合作措施出现，这将成为好的新闻，但应避免使公众将这次访问的最初目的理解为寻求外援。

我的建议被置若罔闻。到 5 月中旬，新闻中开始出现有关戈尔巴乔夫正在坐等邀请的报道。⑤然后，在 5 月 22 日意大利总理朱利奥 · 安德雷奥蒂访问莫斯科期间，戈尔巴乔夫本人告诉记者：“ 对苏联至关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七国会议上表明苏联的观点。 ”并明确指出他希望得到巨大的对苏联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我又有理由乐观。我得到的第一个暗示来自 5 月 7 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向我抱怨布什的热情在冷却的同一天，我对叶夫根尼 · 普里马科大的拜访。有消息说实施现实改革方案可能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我提出的这次会面是对叶夫根尼 · 普里马科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委员会新成员的礼节性拜访，并希望同他讨论突出的军备控制问题。

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相当宽敞，和戈尔巴乔夫的一样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至少是有意要给安全委员会一种权力的象征。用华盛顿的话说，这就如同在白宫西翼得到了一间带窗户的办公室。当我提到一些当前的安全问题时，普里马科夫说他主管的并非安全问题而是世界经济问题。然后，他说他首要的任务是制定一种战略，将苏联引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七国集团等世界经济机构。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对美国政策也是牢骚满腹，我用同样的话作了回答。

〔534〕我告诉他，我必须找到一位认为“ 反危机方案 ”有可行性的外国经济学家，我还要问戈尔巴乔夫在去伦敦之前——假定邀请很快就要发出，这种可能性很大——是否对修改这一方案再作考虑。普里马科夫回答说，他的确正在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说他本人已和格里戈里 · 亚夫林斯基一起为世界经济论坛准备了一篇文章，深入的工作将由此展开。

4 天后，5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交谈中告诉布什，他已令亚夫林斯基制订一套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将派他和普里马科夫一起去华盛顿向布什及其他人作简要的报告。布什立刻同意了。

机会之窗？

亚夫林斯基重新参加改革计划是个好消息。在戈尔巴乔夫否决了“500天计划”以及亚夫林斯基得知也不允许俄罗斯独自推行改革计划后，在1990年底，他辞去了俄罗斯副总理的职务。从那以后，他在莫斯科负责一家经济机构。就我的印象而言，在众多的计划和方案中，他的主意对于苏联经济发展市场条件是最有实际价值的。

第二周刚开始，我就去拜访亚夫林斯基。他说他深信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了。亚夫林斯基参加了最近的一次内阁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五次对帕夫洛夫的“反危机方案”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告诉参会的每个人，他所交谈过的每个外国领导人，包括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都说这个方案行不通。然后，他还补充一点：“甚至连美国大使都对我说这个方案不妥，而他对这个国家是相当了解的。”（我心里想，我和帕夫洛夫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但这也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而我更惊讶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方式威胁自己的高级官员，即使是他们活该，他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忠诚呢？）

总之，亚夫林斯基可以肯定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了帕夫洛夫计划的缺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已经亲自对他保证过他的支持；他本人则声明，如果他的想法不能最终被采纳，他将不愿再做努力。

亚夫林斯基同时认为“500 天计划”的某些部分不再有效。此外，他承认以前的计划政治现实性不够。他打算下周到哈佛大学与〔535〕格雷厄姆·阿里森教授共同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将如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电话中安排的那样，在华盛顿与普里马科夫一道与美国官员举行会晤。

我向他解释，我担心有这样的可能，即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与七国领导人会晤可能被公众误解为其初衷是为了请求援助。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但觉得伦敦会晤的前景是戈尔巴乔夫考虑新的改革方案的主要动力，因此，他希望借此作为刺激。

亚夫林斯基似乎明白，制订一个可使西方确信苏联正在削减军工企业规模、认真地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又可缓和与各共和国紧张关系的方案是很重要的。他希望有一个现实的方案来吸引西方的支持，不论什么形式都可以。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对信贷表示怀疑，除非它们与具体的改革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信贷并非首要问题，对此，我百分之百地赞同。“钱当然能起作用，”他说，“但将其放在第3位、第15位或是第25位还有待观察。”其意思是说，任何物质帮助都只能是苏联本身的有序而协调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

格雷厄姆·阿里森是亚夫林斯基在哈佛时的伙伴，那星期也在莫斯科，我趁此机会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当我参加哈佛的一次美—苏关系讨论会时，我们曾见过面，此后只是偶尔联系。他对苏联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客观预测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阿里森说，亚夫林斯基在他们合作的报告中将准备经济方面的〔536〕问题，而他和他在哈佛的同事们准备政治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个方案在考虑政治因素方面比“500 天计划”更全面一些，阿里森尤其感到，伴随着发展民主机构和提高经济财政管理的开放性的努力，需要向共和国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权力转移。

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和我一致，但我指出，首要的问题是寻求某种机制来解决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收缩而招致的社会问题。当前向民用工业转变

的计划无法实施，政府不能只是简单地关闭国防工厂，而把上百万的工人抛向街头，这是一种冒险。我建议他们考虑类似美国军人法案的办法来解决国防工业的问题：用失业救济和再培训方案作为过渡。虽然这需要昂贵的开支，但比维持无用的国防工厂所耗费用还是要少一些。

5 月 19 日，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到马萨诸塞州汇合，研究被亚夫林斯基称为“机会之窗”⑦和阿里森称为“大交易”的方案。我明白并赞同“大交易”后面的逻辑（如果俄罗斯人愿意走向民主与合作的方向，西方将支持它的经济改革），但我更喜欢俄罗斯的标题。“机会之窗”向各个派别暗示，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对我而言，这是比协调冲突利益更好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交易”一词暗示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协调这一含义。无论如何，实质性的东西总比标题更重要，而所有政党似乎都明白如果它们要得到西方帮助，就得面对一场艰难的斗争。但他们深信，戈尔巴乔夫将支持这个方案。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显然希望他的西方朋友们能帮他摆脱困境，但同时他的公开讲话也开始闪现出现实主义的火花。在我会见亚夫林斯基的当天晚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当天在内阁讲话的电视新闻摘要。在列举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经济数据后，他说，外国人不会为他们挽救这种形势，苏联必须“自救”。“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即使投入 1000 亿美元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补充说。然而，他在私下里〔537〕对其外国朋友们不断使用 1000 亿美元这个数字。他也加强了对外国庞大援助方案的游说活动。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他说服的主要对象之一。

5 月底，撒切尔夫人以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客人身份来到莫斯科。尽管几年前撒切尔夫人在华盛顿私下会见里根时，我曾为他们作过记录，但我没有指望她在莫斯科期间还会记得我或者想见我。因此，当我的英国同事罗德里克·布莱斯威特爵士打电话告诉我说，撒切尔夫人希望与我商讨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时，我着实感到意外。由于她将和戈尔巴乔夫夫妇共进晚餐，布莱斯威特建议我与他的家人共同进餐，以便撒切尔夫人赴过戈尔巴乔夫的晚宴回来后能立刻见到我。我为这个机会而感到高兴，除了因为有机会听到这位前首相的看法外，还因为我知道布莱斯威特夫妇也是苏联问题最热心的观察家，与他们共度这个晚上将是非常值得的。

撒切尔夫人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穿过莫斯科河回到这家英国人的府邸，当时刚过 10 点，她在罗德里克的书房里加入了我们的讨论。通过书房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雄伟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和里面的建筑，它们在探照灯的强光下显得壮丽辉煌。然而，这种宁静只是表面的景象，一场政治漩涡正在得到精心保护的古老城墙里面发生。

手中端着餐后饮料坐定后，她直接进入正题。“请为我的老朋友乔治带个口信，”她说，“我们需要帮助米哈伊尔。当然，你们美国人不能也不应该独揽此事，但乔治将在其中起到领导人的作用，如同他在解放科威特时所做的一样。”

她顿了顿，然后开始解释她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在几年前，我和里根就已经告诉世界这里在发生什么事，”她继续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帮助我们结束了冷战，如果我们不能携手帮助他，“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晚上与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交谈使她相信，尽管他可能认为现在就公布还为时尚早，但他已就恢复私有制做好了准备。不过，她也同样感到，目前他的政治

地位发发可危。

她敦促应当邀请戈尔巴乔夫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首脑会〔538〕议，并且不要让他空手而归。她认为所有的盟国都应尽力而为，而不是在美国强迫大家“尽义务”的压力下才行动。她知道德国已经许诺提供巨额援助，但她认为德国人应当承担得更多一些，因

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为德国的统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日本，应当劝说他们先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等苏联更加稳定一些之后再说。如果戈尔巴乔夫现在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可能会被赶下台，无论是日本还是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都不愿冒这个风险。

我向她保证我将向布什总统转达她的意见，并对她关于苏联改革重要性的看法表示赞同。我相信布什总统会在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制订一套有效改革方案的实际困难。不幸的事实是，戈尔已乔夫还未采纳与外援相配套的政策：预算赤字失控；目前尚无可行计划将社会服务业从国营企业中分离出来；私营企业得不到保护；大部分经济还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另外还缺乏建立市场体制所必需机构的战略。在这个时候向这个国家倾注资金援助，不但不会带来好处，可能还会带来许多坏处。

“你讲话像个外交官！”她对我怒目而视，“只是为无所事事而找理由。你为什么不能像政治家一样考虑问题呢？我们需要一个政治决定来帮助这个转变过程，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然后，她语调稍事缓和他说，戈尔巴乔夫的话是对的，他指出帮助苏联转轨需要布什在保卫科威特时所表现出来的干劲。“只有美国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她最后说，“请一定把我的话带给我的朋友乔治。”

我回到斯帕索别墅后，起草了一份致总统的电报，把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作了汇报。然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话：

我想撒切尔夫人是对的。一个人可以为无所事事找到许多借口和实实在在的理由，但毫无疑问，苏联朝开放和民主〔539〕的进一步演变与西方利益攸关。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无力应付这个挑战，他们将丧失智慧或勇气，或者两者兼失。当然援助应当是依情况而定的，并且应当与具体的项目或目标挂钩。

但我们应当设计一个庞大的方案来支持和引导这里的改革努力。

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在我已向撒切尔夫人谈到过的那些问题上盲目地扔钱，但从根本上来说，她是对的，这些都是借口，是为援助本可成功但却没有去尝试这种行为开脱的。为了这种努力，我们必须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叶利钦）合作，建立一个国际结构来促进有效步骤，转变苏联经济，使这种结构帮助戈尔巴乔夫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使他的公众接受这些决定。亚夫林斯基是对的，尽管有时需要钱，但钱并非是最重要的。

机会清楚地摆在眼前，但我对它能否被抓住并不乐观。虽然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困难表示同情，并从政治上支持他，但他似乎并不愿意组织一个国际机构来帮助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伙伴加入世界经济行列，他对自己的领导力量如何能构筑将来缺乏想象，因此，他选择了反应性的立场：等待戈尔已乔夫自己找到改革之路，而他则不时地加以鼓励或者是给予责备，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具体行动。

然而，亚夫林斯基一阿里森研究方案可能会给一个新的具有想象力的政策提供一针催化剂；也许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这样的老朋友的游说可能

会对布什起到推动作用。

1991 年 5 月和 6 月，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证据，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某种事件，它将使我的政府相信我们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为他面临的问题寻找建设性的答案，这与我们利害攸关。

对聋子的警告

正当戈尔巴乔夫集中精力于如何才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时，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立法花招。6 月 17 日，瓦连金·帕夫洛夫总理，这位宪法规定的总统内阁首领，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他某些特别权力，而这些权力当时只授予了总统。⑧在被〔540〕问及时他回答说，他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商讨过这个提案。实际上，他是在没有和老板打招呼的情况下，要求得到老板的权力。

帕夫洛夫是在最高苏维埃的开幕式上讲这番话的，但大会进入执行会议来进行讨论。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表示支持。他们的发言概要很快被泄漏给新闻界⑨，使得许多政治观察家大惊失色：居然有四名内阁高级官员施展手段来破坏总统的权威，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感到不解。这样向总统挑战，他们将如何保住自己的饭碗呢？毕竟，这就如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连同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预先通知总统，就到美国国会要求允许他们来支配总统。

戈尔巴乔夫有权任命或者解除所有这些官员的职务，但是他对帕夫洛夫提案的第一个反应仅限于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提案。有些苏联观察家认为，他肯定因没有人能解释的理由秘密地支持了这场把戏。我知道他多么珍爱他的权力，所以我怀疑他是这个把戏的幕后指使人。然而，我发现他的无动于衷令人费解。我同苏联政治家、记者和外交方面的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能对所发生的事做出像样的解释。为了继续寻找答案，我邀请了几位政治领导人，包括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他和叶利钦一样，刚刚当选），于 6 月 20 日共进午餐。

那个星期，叶利钦在华盛顿，他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尽管他尚未就职，但已和布什总统约定于 6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点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

星期四上午，市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波波夫不能够来参加午宴，但希望在此之前来见我，向我告别，因为我计划于 8 月初离开莫斯科，在此之前他恐怕没有别的机会来跟我告别了，我回话说我可以在中午会见他，午宴被安排在下午 1 点。

波波夫很快就到了。我们在斯帕索别墅图书馆里见了面。男〔541〕管家端进来一些酒，但我们都要咖啡。我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他也询问了我离开莫斯科的计划。然后，当男管家关上门出去后，他取出一张纸，边说话，边写着什么，然后递给我。上面的俄语草草写着：

有人正在策划一场“倒戈”政变，我们必须告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我尽力保持着自然，小心地让谈话继续进行。在同一张纸上，我用俄语写道：

我会转达的，但幕后指挥是谁？⑩波波夫瞥了一眼我的问题，又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推给我。我看到了这几个名字：

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

波波夫随即把纸片抽回去，撕碎了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没有必要突然结束会面而引起怀疑,我们的谈话又进行了 10 到 15 分钟。我们谈到了竞选，波波夫进一步发展莫斯科的计划，以及他对私有经济的前景的看法。尽管我们都心不在焉，但可能已经足以应付克格勃的窃听器了。

12 点半左右，波波夫离开了。我立即写下这个消息，装在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通过一位美国使馆官员交给我的助理吉姆·科林斯，指示他用最快、最安全的途径送到华盛顿。它将被交给国务卿贝克（他当时在柏林），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及总统本人，除非他们下令，不得再经他人之手。由于时差的关系，在布什总统会见叶利钦之前，我们还有几个钟头的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我接到来自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凯米特的安全电话，他告诉我，布什总统会把消息转达给叶利钦，但我应当去见戈尔巴乔夫，向他发出警告。我同意了，但告诉他，虽然布什总统可能理所当然地会告诉叶利钦消息来自波波夫，但请一定不要把我的消〔542〕息来源人的名字告诉任何其他人。另外，我想提到任何个人的名字都是不妥的，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克留奇科夫或其他人正在阴谋策划推翻戈尔巴乔夫。因此，我计划只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得到一份无法证实的、但他应该知道的报告，有一股力量正在试图推翻他。凯米特同意这是合理的，并向我保证，除非是对叶利钦，所有的人都明白不提及波波夫的名字的重要性。

即使我们的消息再准确一些，我对向戈尔巴乔夫提供这些阴谋家的名字还是犹豫不决。由一位美国大使告诉前不久还是敌人的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说他的总理、情报头子、国防部长及议会发言人正在阴谋推翻他，这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呢？这岂不是自我麻烦，让人怀疑是一种播种猜疑和争端的企图？不，如果真是这样，精明的戈尔巴乔夫会看出破绽来的。想到最高苏维埃都在发生些什么，他就不需要太多的提示。

我打电话给切尔尼亚耶夫，要求立即安排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几分钟后，他回话说，我可以立即过去。此时莫斯科夜幕刚刚降临，但天还亮，因为这天正是夏至的前一天。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我没有带记录员，在切尔尼亚耶夫的陪同下走进去。他的情绪平和，似乎并不急于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称我为“ 大使同志 ”，并请我不要生气，他并非暗指我是在为本国以外的其他集团的利益服务，但他们逐渐把我看作是协调美苏政策联合小组中的一员。他继续说，我已经成为对他们的社会有影响力的成员，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而且是苏联内部改革的坚强的支持者。就像他在上次会面时所说的一样，他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去，两国都需要我的帮助，使事情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他希望下个月他从伦敦七国首脑会议返回后，我们能有机会会面，做一次从容的告别。

戈尔巴乔夫的赞美之辞让我浑身不自在，至少切尔尼亚耶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反映在他对这次谈话的报告中。（12）我心里想的〔543〕只是我受命传达的口信，在恭维话一句接一句地从戈尔巴乔夫的嘴中说出时。我只能在心里想：“ 我将如何把他的话写进我的报告中呢？ ”一般情况下，我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都依照记忆和简要的笔记逐字记下来，但如果我还用这个办法把这些恭维一一记下，即使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也将显得是在自我拔高，而有些官员们甚至可能怀疑我是故意夸大其辞，他们对同事表露出的任何傲慢态度都是极其敏感的。我决定在报告中把这部分的整段对话省

略，只简短记录他对我不久后就要离去的夸张询问。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的长形桌边坐下，当时我对它已相当熟悉了，我面对窗户而坐，戈尔巴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坐在对面。戈尔巴乔夫问布什总统派我来有什么事。我用精心准备的措辞回答：“总统先生，布什总统让我来通知您，我们接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属实。它的来源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也不完全是谣传。它说的是有一股力量正试图赶您下台，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就在本周内。”

戈尔巴乔夫摇着头轻笑起来，然后变得严肃了：“请转告布什总统，我对此很感激。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伙伴，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的关心，他做了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但请他不必担心，我完全掌握着局势，明天你们就会看到。”

我说，我很高兴地得知这个报告是毫无根据的。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无法证实它，尽管它的严重性看起来足以引起重视，而布什总统也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然后，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所喜欢的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他承认到处都有关于推翻政府的传言，政局确实不稳定。帕夫洛夫虽然是一位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但还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还正在学习之中。他已经承认了他在星期一犯的错误。但最近政治和解的趋向比较明显。就连叶利钦也开始养成合作的习惯。联盟条约很快就要签署了，他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的伦敦之行将表明向世界经济又跨出了一步。公众支持经济改革，这在投票倾向叶利钦中已表现出来，但他们也希望结束政治对峙局面。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然而，也有势力试图阻碍改革。他们中有些〔544〕人甚至就在议会中，这是联盟议员团中许多人的看法，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他不排除有些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我们的报告的根据。（13）

我对他说，听到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就放心了，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看到他与叶利钦的合作也在发展，如果这种关系停止了，就难以对未来抱乐观情绪了。

送我出来时，他重申明天我会看到事态还控制在他的手中。事实上，第二天他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绝对多数票，否决了帕夫洛夫特别权力的要求。但在同时，他突然对那些试图在他和总理中间“插入楔子”的人进行了攻击。我为不去提波波夫和其他名字的决定而高兴，因为这可能增加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报告的怀疑。很快，我就得知，戈尔巴乔夫可能认为我们的报告来自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等那类人的牢骚，而不是正试图劝说最高苏维埃控制他的权力的那些人的阴谋。

难道说波波夫的报告是一个错误的警报（在 6 月 22—23 日那个周末，看来似乎如此），或者它是有关计划的一份准确报告，只是计划被推迟到更为合适的时机，直到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但仍受控于克格勃之时呢？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知道真相，但实际情况支持后一种解释。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两位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处理这份报告的方式都暴露了他们行动中的不成熟之处。6 月 20 日，我还不知道，但后来得知，甚至在波波夫的消息被转达给叶利钦之前，国务卿贝克就坚持紧急约见正在柏林的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并向他转达了报告的内容（虽然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对苏联的政治运作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无论别斯梅尔特内赫抱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他都无法做出任何举动来使戈尔巴乔夫警〔545〕觉起来。苏联所有的官方联系都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而报告中说一个主要的阴谋分子就是克格勃的负责人。值得称赞的是，别斯梅尔特内赫告诉贝克，鉴于所说的介入者的情况，他无法私下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希望他肩所警觉，还是由我来做这件事为好。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别斯梅尔特内赫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时候通知他这样一个敏感的消息，真是愚蠢至极。即使他有办法保证通信安全，他也可能会为传递这样一份报告而犹豫不决，消息来自外国人，内容涉及他的内阁同僚，准确与否尚不确定。

贝克的反应是不假思考，而总统也是鲁莽行事。在他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向他证实叶利钦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不忠诚的行为时，也告诉了他波波夫是消息的来源，而且就在一条克格勃监听的电话线上！谈话过后，我被告知，尽管我们先前有君子协定，但总统在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中走漏了消息的来源。我没想到一位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会干出这种事来，他一向以他自己的职业专长为荣，对泄露任何无关紧要的信息都能迅速作出谴责，但这也能衡量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迷恋有多深。

波波夫后来告诉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再次见到他时居然是在 7 月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的国宴上，他用手指指着他问：“ 你为什么要对美国人编故事呢？ ” 仅仅不到三周后，波波夫所披露的这个集团便试图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而波波夫的名字被列在逮捕名单的前列。如果这次政变成功，乔治 · 布什的草率行事可能造成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他将是损失最大的一个，他像一个梦游者，四处徘徊，对周围环境不以为然。他对谢瓦尔德纳泽 12 月发出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且满怀憎恨；他牺牲了像巴卡金这样忠诚的助手，忽视亚历山大 · 雅科夫列夫及其他最初帮助他实施改革的人们的建议，反而继续信任口是心非的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这样的轻率小丑。

据切尔尼亚耶夫说，尽管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美国轻信的谣言，但我在 6 月 20 日带来的消息确实引起了一些注意。他当时想起〔546〕叶夫根尼 · 普里马科夫前一天告诫过他，不要过于信任克格勃和他的私人保镖。戈尔巴乔夫倾向于把普里马科夫的怀疑当作官僚们忌妒心的反映，但切尔尼亚耶夫建议他还是小心为好。他本人在莫斯科也听说过令人生疑的有关军事调遣的消息。

但是，尽管在 6 月 21 日的最高苏维埃大会上作了严厉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阻止他的安全负责人参与一场政变的企图。

6 月 21 日，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到莫斯科，并在第二天陪同戈尔巴乔夫一起献了花圈。私下里他提到了在柏林与贝克的谈话，并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得到了我报告的消息。戈尔巴乔夫说得到了，并补充说，他已经给“ 那些官员 ” 作了很好的回答。然后，他问贝克是否说过政变可能发生的时间，别斯梅尔特内赫回答说没有，但贝克说过“ 现在它随时可能发生 ” 之类的话。（15）别斯梅尔特内赫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推断出消息中的几个人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当时实际想到的似乎只有他在最高苏维埃讲话中批评过的联盟议员团的领导人。

1992 年 3 月，当我请求波波夫同意我在书中写进这件事时，他立刻同意了。然后，他评论说，最初当他得知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是消息的来源时，

他非常愤怒，毕竟，他的消息并不是提供给我们的，而是为了给叶利钦报信，并为我们的可靠性下了极大的赌注。不过，当他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感到这个漏洞可能还是有利的。

他推测说：“当阴谋家们得知我得到过他们的计划后，不得不把计划限制在小范围内，因而无法把政变策划得十分周密。这可能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就算是如此吧，但那是将来的事。

官僚主义者再赢一轮

甚至在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在剑桥研究他们的“机会之窗”（或者说是“大交易”）时，莫斯科的官僚们就已开始发起了攻势来抵消他们的努力。尽管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都得到过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他将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5 月中旬，在他们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简要汇报时也得到了有力的鼓励，几天后，我们得知，苏联已经发出正式请求，要求在月底由帕夫洛夫的总助理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会见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戈尔巴乔夫曾通过电话告诉布什，他将派亚夫林斯基和普里马科夫去讨论新思维。而现在看来，谢尔巴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到华盛顿来是为了维护帕夫洛夫的“反危机计划”，亚夫林斯基将被搁在一边。

我立刻去拜访普里马科夫商讨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总统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即由他和亚夫林斯基去华盛顿协商后者正在哈佛研究的课题。布什认为亚夫林斯基的主张将是讨论的焦点，而普里马科夫的来访将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态度。然而，尽管戈尔巴乔夫有权派出他希望的人代表他去华盛顿，但他应该认识到，由总理的代表率领的代表团并非布什总统所期待的。

普里马科夫说，亚夫林斯基将是代表团的一员——他们两人正在一起工作——但由谢尔巴科夫率领代表团应该没有错。于是我问这个代表团的目的是什么（通过 5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对布什所提的建议，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来讨论亚夫林斯基的建议的，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理由来让谢尔巴科夫来率领代表团）。普里马科夫回答说，是来帮助戈尔巴乔夫准备他所期待的伦敦七国集团的会晤；戈尔巴乔夫希望提前征求布什的意见，并了解他的态度。

〔548〕 “很好，”我回答，（根据我的笔记）“我相信总统会为咨询感到高兴。但您和您的总统必须清楚一件事——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只能直言不讳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贝克主要感兴趣的是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想法。如果谢尔巴科夫的来访是为了给予这些想法以官方色彩，您将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如果这是为了抢亚夫林斯基的戏而耍的花招，是为了使我们接受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那你们将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普里马科夫反驳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同意他的政府无法吸收的任何方案。如果要进行经济改革，那么实施它就要与帕夫洛夫政府合作，而不是反对它。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个问题看来已经牵涉到官僚政治问题了，这也是可以预测到的，但普里马科夫对帕夫洛夫方案的明显支持令人失望。可以设想，他已经得到了要求戈尔已乔夫的新安全委员会寻求新途径的经济文件。即使抛开亚夫林斯基的评论不谈，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对“反危机方案”不满意，

正在寻找替代方案。但是，他的关键人物普里马科夫似乎要把赌注押在官僚派一边。

无疑，我在回答时语气是严厉的，我说，当然任何改革计划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但是如果普里马科夫建议他的总　　　统带着类似“反危机方案”的东西去伦敦，他是在为灾难铺路。戈尔巴乔夫最好还是不去伦敦，除非他能带去更好的东西。我强烈建议普里马科夫能保证亚夫林斯基有机会在华盛顿向布什总统和其他官员介绍他的想法，并能仔细听取他们对此的反应。这样，他在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以便将最有成果的方案带到伦敦时，将处于更好的地位。

为了避免一次毫无意义的会晤，布什总统再次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并强调说他正在期待听到亚夫林斯基的意见。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普里马科夫减少亚夫林斯基参加华盛顿会晤机会的不断努力。华盛顿本来残存着一线希望，即戈尔巴乔夫最终可能愿意采纳有成功前景的经济改革方案，但结果他们粉碎了这一希望。（17）

5 月 31 日的会晤给布什总统的影响正如我对普里马科夫预言〔549〕的那样：这使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一套方案来证明投入大量的财政援助是值得的，他开始怀疑让戈尔巴乔夫去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晤是否对戈尔巴乔夫有利。（18）不幸的是，他并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戈尔巴乔夫转达这一意见（这本来可能成为有力的警钟），而戈尔巴乔夫认为布什总统的犹豫不决只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好处。（19）最后，曾向戈尔巴乔夫许诺过支持邀请他的科尔和密特朗说服了布什，如果戈尔巴乔夫遭到七国集团的拒绝，将对他的地位不利。到 6 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接到英国首相梅杰的正式邀请，他将作为一名客人，而不是集团的一名成员参加正式会议之后的讨论。

亚夫林斯基和阿里森继续共同工作着，尽管有人企图阻止他参加 5 月底在华盛顿的会见。实际上，他对普里马科夫的私下评论所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但他们因布什和贝克在会见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而受到鼓舞。（20）到 6 月中旬，他们完成了草案，给华盛顿的布什和贝克寄去一份，给戈尔巴乔夫带去一份。亚夫林斯基后来就此评论说：

6 月中旬，方案呈交给了布什，他的助手们告诉我，他们肯定他将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还说，我应该留心贝克 6 月底在柏林的讲话……如果其中有一个特定的提法，这就说明这个方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我回到莫斯科，难题就一个个接踵而来。我与波普林斯的会面最为艰难，（21）我告诉刚刚当选总统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我与美国人达成的默契：我正在等待贝克的讲话，看他是否会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提法。他们瞪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但是，贝克的确说了那句话，就在这时叶利钦离开莫斯科前往美国。在那里当被人问起新方案时，他说他还没有读过它。至于戈尔巴乔夫，他的反应就更有趣了。他把〔550〕　方案交给瓦季姆·梅德维捷夫，用来为他的伦敦之行做准备……他向我保证他总是这么做的，他们将会使用我的方案中所有好的部分。当他完成这项工作时，我总算弄明白了所谓“所有好的部分”是什么含义了。

6 目 6 日，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前往伦敦之前的星期六，我收到了布什总统致戈尔巴乔夫的紧急信件。当我要求呈交它时，被告知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城外的一所别墅里办公，但他愿意在下午接见我。苏联礼宾司负责人乘一辆公车来为我的司机引路，来到城西沃林斯科伊的一套别墅里。戈尔已乔

夫正在一幢斯大林时代的房屋里办公。据我的陪同说，斯大林过去经常用这幢房子。

我们的汽车驶向主楼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在周围走动，有的敞开了衬衫（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周末），有的放松了领带，夹克衫搭在肩上。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来专门接待我。

礼宾司主管陪同我上了楼，戈尔巴乔夫把我让进一间令人愉快的房间，这间房子有点像被屏风隔断的阳台。他穿着一件很薄的短袖衫，没有系领带。他感谢我为他带来信件，并说他正在会见他的顾问们，为伦敦之行做准备。我告诉他，亚夫林斯基的方案给布什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知道，并说他们也正在“好好利用”这个方案中的思想。然后，我们讨论到总统的来信，是关于结束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遗留问题的，并为布什的莫斯科之行确定日期——在离开之前，我问戈尔巴乔夫，他对即将成行的伦敦之行有何感想。

他回答说，感觉很好，他将带去的方案写得很好，他期待着看到“非常重要的讨论和重要的决定”。这种期望给他带来的快乐看来是真的，他终于能在世界级的大集团里发挥作用了，甚至是在经济问题方面。考虑到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以来他的艰难经历，看来他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且信心十足。

离开之前，我与等待会议继续开始的官员们握手告别。他们中有总理帕夫洛夫（我向他打招呼时，他脸上堆着笑）；他的副手谢尔巴科夫，普里马科夫；总统顾问斯捷潘·西塔里扬，雷日科夫的经济〔551〕改革助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亚夫林斯基以及与他有关的人都不在场。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奥列格·波格莫洛夫，尼古拉·彼得拉科夫，弗拉德伦·马季诺夫，或者说与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有关的所有人都不在场。

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对迅速解决被延误了的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问题并在月底安排一次首脑会议感到乐观。但我也知道，只要把经济引向混乱的官僚们还在，戈尔巴乔夫肯定无法利用伦敦会晤可能提供的任何机会。

患难之时的精神同盟？

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虽未使他公开丢脸，但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七国”同意苏联成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兄弟机构——世界银行的联系成员国，并让这些机构制订出有关方案以便协助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23）

至于美国，总统布什在其赴伦敦前几天已经致函戈尔巴乔夫，他们将以如下方式资助苏联：采取小规模试验计划将某一地区的食品批发业私有化，派一些人调查军转民的可能性，另外一些人负责能源部分。在信中，布什警告说，如果苏联执意维持在“反危机计划”中所描述的指令性行政控制，那么它将很难得到帮助。同时，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将食品供给制度私有化，并明确能源所有权以吸引外资，而且布什也不鼓励重新组织安排苏联外债的支付计划，尽管美国并不是主要债主。

布什所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也没有就全面的政策提出建议，而这是使各部门的改革切实可行所必须的。而且，反对重新安排苏联债务支付计划实际上堵塞了西方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主要途径。我们如果是采用以下的说法，很可能更将有裨益：如果有必要重新安〔552〕排债务，那么苏联对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态度将有助于商定其条件。最后的结果是，债务最终还是进行了

重新安排，但却没有换回任何改革措施。

即使戈尔巴乔夫不去伦敦，七国集团也照样会作出以上决定。但这些决定为苏联经济过渡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七国没有认识到仅仅依赖目前的体制，他们是无力完成这个史无前例的任务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有丰富的经验帮助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稳定货币市场，但对目前苏联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它几乎一无所知。世界银行的工作重心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像苏联这样的经济发达的混乱的国家。这两个组织也许会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发挥有利的协助作用，但如果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苏联经济过渡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最后成果甚微是戈尔巴乔夫的错。如果他不去伦敦可能会更好些，尽管他歇斯底里地争取西方的援助，但却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计划，由此也损害了本人的信誉。尤其是他说服布什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出他多么没有说服力。

他们是在 7 月 17 日的工作餐上会晤的。最后谈到的一点是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随后儿分钟，戈尔巴乔夫的保安部队全副武装，直奔温菲尔德宫——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现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在两位总统手里，他们都知道，不到两星期他们还会见面，不过是在莫斯科，他们将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当时亲切友好的气氛对倾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是天赐良机，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任何计划而错过了这个机会。〔553〕　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乔夫竟采取了发牢骚的办法。他最忠实的助手也不理解他究竟在想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引用了他的会晤记录，它表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是多么的不合适。午餐的谈话刚变得严肃起来，他就开始了散漫的独白，就像 5 月份对我讲话时一样。切尔尼亚耶夫将它归纳如下：

我知道美国总统布什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对自己所做决定的政治含义审慎周密，而且他从来不随心所欲。关于安全政策，得益于他的决定，我们的收获颇丰。但同时，我感觉我的朋友美国总统布什先生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未给予答案：美国到底希望苏联成为什么样子？只有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双边关系的许多问题才能明了。然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切尔尼亚耶夫注意到当时布什很不高兴，脸色微红，但是他不动声色，继续就餐。戈尔巴乔夫接着说：

于是我问：乔治·布什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如果我“七国”的朋友们在我们后来的会晤中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他们愿意支持我，但开始时你必须“自作自受”一阵子，那么我必须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在一个大家庭中。集中几百亿美元去解决一个地区性冲突，这不奇怪吗？支持其他计划的钱会有的。但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实施一项工程：改变苏联，赋予它新的性质，使它融入世界经济，它将不再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不再是威胁的根源。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伟大而重要的使命！

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布什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漠。他回答说显然他对自己的观点解释得还不够，他认为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想看到一个民主的苏联，拥有市场经济，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成功地联合。他指出并非每个美国人都会支持　　他对苏联的态度，而且那些人也的确制造出一些现实的难题。但是，没有人希望见到苏联经济崩溃，而且他认为苏联解体有悖于美国的利益。

切尔尼亚耶夫察觉到紧张局面缓和了一点，但却未能完全消除〔554〕戈

尔巴乔夫的长篇大论给布什及在场的其他美国人留下的阴影。这是一个绝望的人的哀叹，他正在失去他对他的国家的控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并不理解他所竭力追求的是什么。〔24〕据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特伯·泰伯特说，布什一回到美国就说：“真是可笑。他一直善于推销自己，但这次却不是。我想，他真让人难以理解。”（25）

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推测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的自我挫败行为的原因时，提出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克留奇科夫在许多报告中都要指斥所谓的美国的欺诈行为，尽管戈尔巴乔夫对此十分怀疑，但它们仍留下了阴影；其次，布什总统对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为使双方成为伙伴关系的种种努力不太合作，这一态度使戈尔巴乔夫受到伤害。（26）

我相信，这两种因素均影响了他的情绪，再加上第三点：由于他没有在伦敦会议上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改革措施而产生的受挫感。即使只是在下意识里，他一定已认识到，他缺少勇气利用亚夫林斯基提供的机会。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另一种结果是否有可能发生。从某种程度看来，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自从马耳他会晤以来，他们一直以一种直接的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交流，而不像两个疏远的大国的领袖。他们相互间的个人信任非常之深，虽然还不是无条件的。尽管如此，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似乎失之交臂。

戈尔巴乔夫不能直陈他心中所想，至少从 1989 年以来，他没有道出他深深的、也许只是半意识的渴望。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便为自己判了政治死刑。但如果这样做可行的话，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没有人确切知道，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凭我多年的就近观察，我猜想，译成地道的美语，大概如下（其中有 95%是我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所听到他的讲话，另外的 5%则基于我的直觉）：〔555〕 我的国家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也从未体验过民主的滋味，一直是由上自下的统治。这是它的悲剧，也是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根源。看一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我知道成功的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鼓励他们的创造性，同时又收获其成果。我希望我的国家也这样，因为如果它不改变，它将落后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保持目前这种制度，不仅仅美国、西欧和日本会遥遥领先，我们会甚至连韩国、台湾和新加坡都赶不上。我不可能公开地这样说，但是我真想以你们为榜样缔造我的国家。

这听起来也许很简单，但是相信我，它并不简单。俄国整个历史都是在逆行，所以我必须扭转乾坤。彼得大帝可以残暴统治，但你不能期望这样会产生民主，我要达到民主的目标更难。我们的人民从未被允许自己做主，所以他们也没学会如何去做。你们曾用了 200 多年的时间完善民主制度，而我们从未拥有过民主制变，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建立它。尽管这样，我却不能接过你们的制度，然后把它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并期望它奏效。我们要屏弃旧制度，并给人们一段适应时期。我只能利用现有的人和物，我不可能重新发明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历史。

对于我们要走的路，虽然我有大致的轮廓，但从未有人给我一张图纸，告诉我如何达到目标。前面可能会有无数的曲折和错误，不要以为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时得到了许多帮助。

大多数国家或者不理解或者反对，尤其是与旧体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我将不得不改变或战胜后者，教育前者，这样会使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些怪异。

我希望我能争取到足够的共产党员而缓解我们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共产党将不得不让位。我必须加倍小心，以免被它围困。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有时我不得不左右逢迎，但不要把它想得太坏。

那么，我究竟需要你们做什么呢？首先是理解，理解和尊重。我正尽力做自二战以来你们一直祈祷的事：消除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打开国门，建立法制，建立民主制度，转入市场经济——你们在意识中喜欢把这些称做资本主义，但我想你们知道我不会这样说——至少现在。这正是数十年来你们所〔556〕梦想的，但却从不敢指望它会发生。

我决心成就这番事业，不是因为你们要我这样做。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的国家需要它。如果它不实现现代化，到 21 世纪也许它还不过是个跛子——如果它真能熬过来的话。如果问这个世纪真正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只有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具有竞争力。我不是为了帮助你们才这样做的，但你们不得不承认，它客观上确实于你们有利。想想过去 45 年里你们耗费了多少金钱来抵抗苏联的威胁？（对了，顺便说一下，尽管有时你们夸大其辞，但它的确是个威胁。）

当我说理解和支持时，我的意思是不要视我为战败的敌人。别再说什么赢得冷战了，如果你们把我当作一个输家，你们又如何能指望我领导我的国家向前艰难地迈进呢？此外，我难道真的不该得到一点点夸奖吗？是我降服了苏联的军官们，并且强迫他们、有时甚至耍点小手段欺骗他们做些非做不可的事。我不让他们成为威胁东欧的力量。我创造了一整套的哲学解释为什么结束冷战对我们有利。在此方面，我想我未得到丝毫的帮助。让我们面对现实，乔治，是你、里根和我共同结束了冷战。没有必要为谁赢了而趾高气扬，难道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吗？

我真正需要帮助的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我清楚地知道我到底该往那里走。我毕竟是学过法律的，虽然这法律有点可笑，可他们毕竟教会了我“资本主义法律”的原则。我可能并不总是显示出这一点，但我知道在此方面我们到底该如何做。但经济却另当别论。老实说，我知道我们得改变现有体制，但我不愿承认的是，我不知该如何去改，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你们的制度在你们的国家是很管用的，但搬到我的国家就不灵了，除非是人也发生了改变。

不过，说句实活，当我说我需要帮助时，我不单是指钱。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想一想我应该做些什么。人民感到不知所措，他们和我一样都不知道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年前，他们还在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但现在他们却说每件事都不对头，但只要照他们说的去做，就不会有什么麻烦。如果我把他们中的 25 人集中在一个屋里，我会得到 39 种建议。

你们想要作壁上观，想管的时候就出出主意，直到我们有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体系，然后你们才知道你们能做些什么。

你们本该是个银行家，我听说你们的金融机构从来不随便借钱给别人，除非借钱者能证明其实他不需要这笔钱。但我认为政治家就不同了。我认为他们是领导，而并不仅仅是在玩〔557〕一场胜券在握的赌博。难道你们不愿意冒点风险从而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吗？

好吧，告诉我当前的计划不会奏效。我知道你们是对的，这也是我今天如此急躁的原因之一。但是，近两年来，我一直在暗示我们会采纳一些建议。

我不想听“如果这样做很痛苦，那么就快点做”之类的废话。远在与吉姆·贝克会面之前，我就从马奇亚维尔利那里获得了这个建议。你去年派了一大批商人来见我，他们支持我拒绝沙塔林计划，但现在呢？

每个人又都说我应该接受它。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真见鬼，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我可能会说，即使形势恶化了，也不关你们的事。但是，如果你们让我知道你们会帮助我——

哎，那么情况就会大不同了。

请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你们也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我该做些什么。而且，我当然也不想你们从此后开始教我们该如何做。你们的制度在这里可能不会奏效，除非对它做很大改变，这件事要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也相当傲慢，不习惯外国人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不会自诩我们是世界上最容易相处的人。但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你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我们的一场悲剧，但同时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太多过。如果我们的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政权，你们

每年到哪里去找那多余的四五百亿美元做国防开支呢？现在我们还有三万多枚核弹头，你们知道，它们只不过是给发动战争者准备的。

推行市场经济，你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点也没有，但是很清楚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个社会。在此方面，为什么我们不携起手来呢？两家联合共同解决一个难题。1947 年，杜鲁门和马歇尔在西欧问题上找到了办法，我们的人民也告诉我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制度、合作的习惯以及知识的集中。我们属于不同的情况，但原则不会不同，难道你们不会想想办法，集中智慧，加上七大国，大家共同协作，想出些适当的办法来？如果方式得当，我会采纳你们提出的合理建议，但我要你们保证如果我在采取了你们的建议后陷入困境，你和你的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一把，不要寻找借口——

即使是不错的借口——而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遇，我们的形象在历史书本里可能就会显得不够光彩，我指的是你们和我。

痴心妄想吗？当然是。千真万确吗？我敢打赌是这样的。

有什么话布什本该说却没有说吗？也许是吧，但也许已经太〔558〕迟了，即使说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了。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私下场合，布什能够通过给戈尔巴乔夫提一些大胆的建议更有效地表示友好——而且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也会郑重采纳他的建议。

当我陷入于想象世界之中时，我能想象出当饭后甜食端上来时，布什会将戈尔巴乔夫请到旁边屋子里私下聊聊，当时只会有翻译在场，也用不着做什么记录。特别是他很相信屋子里不会有克格勃的窃听装置，我想，他很可能会直截了当他说出他的想法，他的观点大致如下所述：

“米哈伊尔，我能理解你的处境。我们没有做一些本该做的事　　　情来帮助你，你有权利指责我们。但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想帮助你。我们确实想帮助你，但老实说，是你将事情搞得棘手了。我没有搞到资金，就算我搞到了，如果把它投到国营企业的无底洞里，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这样做不会奏效，而且只能让人们很快放弃帮助你的念头，所以我不会这样做，尽管后来你给了我一个很合理的计　划。

“我知道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做成什么，但你得寻找途径发动各种力量，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帮助你进入市场经济。你不可能自上而下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你必须从这些官僚手中夺回经济大权。留一点缝隙给私营

部门，让人们自由运作。是的，起初可能会有一点混乱，但我猜想贵国的人民会比你想象得更富责任心和创造力。如果你能下个果断的决定而带来一个成功的前景，那我一定会团结我周围的人为你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但你的计划一定要具有可行性，而且要依附具体的项目。我没有办法筹集资金去支撑那些即将倒闭的国营企业。

“我坦白承认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但是我有一种忧虑，我感觉你现在做得不对。我们也许该想一想是否应该将我们欧洲和日本的两个朋友团结起来，共同寻找一个答案。如果这想法你赞成，那你不妨告诉我，让我来努力尽快把事情办好。

“还有，我不想让人们以为我是因私人感情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建议你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不告诫你，你们的总理是个祸害，那么我也称不上是你的朋友了。除非你能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或者你亲自来领导内阁（我就是这么做的），你要让人们相信你对经济改革是认真的肯定会费一番周折。

〔559〕 “我很高兴 6 月份议会里没有发生问题，但我仍不免有些担忧。我希望你能重视我给你的那份报告。我知道，你可能觉得那是无稽之谈，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仍有点不安。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我可以保证我个人的安危不是掌握在中央情报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手中，这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他们。把如此大的权力集中在某个机构的手中是不明智的。还有，顺便说一句，好像有人在向你灌输一些关于我们的胡言乱语。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他们骂回去，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给你捣乱或伤害你的国家，如果有谁这样说，他就是个骗子。你应该设法找到这些人这样说的原因，因为他们所说的对你没有好处。”

我的臆想就此打住。我所想象的没有发生，就算它发生了，也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领袖的私人关系曾十分融洽，以至他们之间可以像我刚才描绘的那样直言不讳地进行谈话，而且这种谈话能够对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所作所为产生重大影响。

想真正奏效，布什就得做出某种许诺，但他不愿意那样做。1991 年，虽然他对戈尔巴乔夫无限同情，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回避帮助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发雷霆的原因在于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挪威议会授予戈尔巴乔夫 1990 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未能如期到奥斯陆去发表受奖演说，却不得不留在国内处理紧急事务。当他终于在 1991 年 6 月 11 日来到奥斯陆发表演说时，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而在当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560〕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了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但从 1988 年到 1989 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 70 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 1991 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

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

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 7 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27）

苏联《独立报》以恰如其分的标题《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对此作了报道。戈尔巴乔夫迫使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 1991 年 7 月 25 日通过了新的党纲草案，并获准于 11 月或 12 月举行一次党代会。在很多人看来，戈尔巴乔夫终于走上了分裂共产党的道路。他的拥护者们将支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那些顽固派则被迫要么退出，要么赶走这些改革者。

7 月 20 日，即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叶利钦反对共产党机构的斗争开始升级。他颁布了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28）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就将对俄国共产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正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

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561〕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

党内官员拼命向戈尔巴乔夫游说取消叶利钦的法令，但是他拒绝了。〔29〕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与顽固派的联盟正在分裂。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叶利钦的法令，但这当然完全没有法律效果，共产党干部只好就此罢休。

同时，改革创始者中的几个人开始在党外组织政治运动。其中，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等仍是正式党员。另外有些人，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最近刚离开了党，组建了名为“ 民主改革运动 ”（许多人知道它的俄语开头字母为ДДР）组织，这一组织吸引了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如戈尔巴乔夫以前的知己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他曾于 1989 年接受了管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这一出力不讨好的任务；叶利钦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众议院的发言人伊万·拉普季夫，《消息报》的前任主编，都加入有一时期像是一个政治名人集会的“ 民主改革运动 ”。

许多人曾怀疑组织这次运动是为了在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中失去地位时，给他提供另一个选择，虽然他不赞扬这个团体，但他也不轻意贬低它，就像他过去对待 “ 民主俄罗斯 ” 运动那样，后者的许多领导者已和新建立的 “ 民主改革运动 ” 结成了联盟。当然，有些组织者是要显示，在共产党外组织起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他们成功了，如果行将召开的党代会导致分裂，那么他们的行动将为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而分裂的势头在 1991 年夏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恰好是共产党内保守分子所害怕的。他们极力反对 “ 民主改革运动 ” 的领袖，虽然他们仍是共产党员。谢瓦尔德纳泽 6 月初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报社采访时曾提出有必要成立 “ 民主党 ” 来和苏联共产党相抗衡，保守派要求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最高纪律监察机构——出面调查。谢瓦尔德纳

泽不想坐以待毙，于〔562〕 是立即宣布脱党。加夫里尔·波波夫则相反，他等着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他。而就在曾有权驱逐党内成员的基层党组织做出反应之前，雅科夫列夫自动辞职，并当众抱怨说“一个强有力的斯大林主义团伙”已经在党的领导层中产生。（30）

7 月末，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久，我曾和民主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莫斯科市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讨论民主运动的前途。他对“民主分子”能否统治这个国家三到五年表示怀疑。他们散漫、缺少组织纪律性是其中的原因，但同时，他还感觉到苏联的高压经济机构仍丝毫未损，被共产党内的官员所掌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共产党对军队、法律执行机构和传媒机构的控制。这当然是叶利钦法令的目标之一，但除非是戈尔巴乔夫能签署类似的法令，否则很难对军队和克格勃产生任何影响。

波波夫看到民主改革运动有可能团结民主力量，但他对其领导者们不能决定是否成立一个政党而感到气愤。他个人认为它或者组织一个政党，或者解散。他觉得“民主分子”内部虽然存有分歧，但却占有天时。他说，他最大的忧虑不在于共产党内保守分子的活动，而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类狂热的反动分子的潜在威胁。如果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恶化，像他们那样的投机党派不仅会赢得大量的选票，还会争取到军队和警察组织的支持。

虽然波波夫作为政治领袖有其局限性，但事实证明他不愧为一个一流的政治分析家。

布什的莫斯科—基辅首脑会晤

1991 年 7 月 29 日晚，乔治·布什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莫斯科。正如布什上任伊始我所建议的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两国〔563〕每年都有互访。在第三国的其他会议，如果有必要或者机会方便，也时常召开，比如 1990 年 9 月在赫尔辛基以及两周前在伦敦的会议，现在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他们会轮流在彼此国家每年举行一次“全方位的高级会议”。

去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现在大多数已经得到解决。一个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条约，经过 10 年的谈判，终于做好了签署准备。苏联已经同意了在欧洲削减常规武器的条约，总统也已经将它送交参议院审批。苏联议会终于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移民的权利，总统已经将去年签署的贸易协议送交国会。美苏贸易将建立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无任何歧视性关税。

留待讨论的有争议的双边问题已经不多了。当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签署时,最初由里根总统于 1984 年和 1985 年提出的四方协议已经得到完全实施。实际上，到 1991 年，我们已经超越议程上升到合作领域。这些在 80 年代初想都不敢想，甚至在 1989 年，布什总统还执意不肯研究此问题。即使如此，要谈的还很多。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国家显然正在走向崩溃。两位总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也是他们私下谈话的主要内容。

两位总统都极其关注各共和国首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布什在正式拜访叶利钦并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后访问了基辅，并借此机会邀请了几个共和国首脑参加他的国宴。戈尔巴乔夫则邀请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与布什共进工作餐，以此组成苏联代表团参加讨论。

纳扎尔巴耶夫特意从阿拉木图赶到莫斯科，结果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问题成了会上讨论的主要议题。叶利钦却坚决回绝了戈尔巴乔夫的邀请，并声称他宁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布什，而不愿意参加与其他人的小组会

议。

在就职俄罗斯总统的前几周，叶利钦已经进驻克里姆林宫内戈尔巴乔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工作过的办公室，他特意在这里接待布什，而不在俄罗斯“白宫”里他自己的办公室。我希望他最近的政〔564〕治胜利能使他不再像个衣衫不整的受压迫者那样行事。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喜欢出风头和在一些小事上胜人一筹的毛病并没有改变,会谈开始前布什等了他差不多 10 多分钟，会谈时间又大大超过了原先的安排——尽管他所讲的并无多少实际的内容——而且他不通知他的客人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国宴上，他差遣妻子越过接待人员，等所有的客人都进入房间后，试图陪伴芭芭拉·布什入座，仿佛他才是此间的主人。（31）

叶利钦的行为未免粗鲁和孩子气一些，由于他有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使得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很不自在。过去，他在使用这类伎俩时总是说，为了防止他的对手阻碍他和公众的联系，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我很痛苦地注意到，在他赢得了直接的政治目标、这种借口已不复存在之时，他却继续使用这一伎俩。然而，这些社交中的不协调微不足道，只是在它们暗示更深一层的问题时才值得一提。

7 月 31 日，当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中会晤时，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美国大使馆接到报告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夜间袭击了立陶宛海关署，有六位官员死于非命。美国大使馆官员通知了别墅的有关人员，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这一事件。乍听到这个消息，戈尔巴乔夫极为尴尬，不仅因为发生了此种暴行，而且因为首先获悉的是他的客人。看起来，这一暴行好像是某些人精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让戈尔巴乔夫在与布什的会谈中难堪。而实际上，这也表明他的权力在削弱，他手下的人员正变得越来越不中用。（32）

布什产生访问基辅的念头十分自然。去年访问美国时，戈尔巴乔夫曾访问了明尼波利斯—圣保罗教堂、旧金山以及海湾地区。随着所有的共和国都变得越来越自主，布什认为不仅应该在莫斯科拜访叶利钦，而且至少应该在某个共和国的首府逗留一下。借此机会，他将发表演说，提请人们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文化和民族性给予注意，欢迎他们加入到民主运动中来，因为它正波及很多——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国。

基辅首当其选。它是苏联第二大共和国的首府，其民主进程〔565〕比中亚许多共和国快得多，也没有发生类似高加索地区的那种冲突。而且这也很方便，布什于 8 月 1 日在此停留几个小时后，仍 可以在同一天回到华盛顿。

我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访问基辅的想法，他们不反对。于是我们又开始和乌克兰官员讨论行程安排，他们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们曾在基辅安排了几个外交官，准备建立一个总领事馆。访问计划顺利进行着，但令我吃惊的是，7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埃德·哈韦特从华盛顿给我打来电话说，苏联驻美国代办来到白宫，带来了苏联总统办公室的信息，说基辅目前局势紧张，布什最好别去那里，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旅游区度过这一天。

显然，如果戈尔巴乔夫建议布什不要去基辅，布什就不能再去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取消他的行程肯定会给公共关系带来极大不利。因为事前我们已经与乌克兰方面就此次访问联系过，现在就得告诉乌克兰方面为何要取

消它，说戈尔巴乔夫不允许去，无疑会成为此次首脑会晤的重要新闻题材。考虑到公共关系，这样肯定会给其他每件事都罩上一层阴影，必将破坏此次会晤的目标。

为了故意让克格勃和有关官员知道这件事，我们在公开电话上讨论了取消此次访问的后果，然后我通知外交部说我明晨得见见别斯梅尔特内赫。当他见到我时，他坦诚地告诉我说对于华盛顿的消息他一无所知，不过他答应他会调查此事。几个小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如果布什总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按计划访问基辅。后来，他解释说他向戈尔巴乔夫询问，虽然后者有些不悦，但还是同意布什应该去他想去的地方。（33）

这样，布什和他手下的人更加谨慎，避免在访问中发生任何可能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设想如何能够“帮助戈尔巴乔夫”。演说起草人认真检查稿件，删除可能〔566〕使戈尔巴乔夫不悦的言词。正如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显然做得有些过了头。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与莫斯科大使馆的或者基辅的外交官员商量如何来翻译这篇演说词。

在从莫斯科飞往基辅的旅行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篇演说稿的全文。我们乘坐的是新的空军一号——一架宽敞豪华的波音-747 飞机，它和以往总统乘坐的狭窄的波音- 707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飞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为了方便向报界传播，布什向乌克兰议会发表的演说也被重新修改。我又匆匆扫了一遍，发现有很多出色之处，尤其是它警告说独立和民主其实是两码事。

但是，其中有几处堆砌起来赞颂戈尔巴乔夫的地方则没有必要，也不太合适。对他开创民主制度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表示赞同会更好些。只要人们觉得戈尔巴乔夫在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那将成为一个间接的赞扬。大张旗鼓地夸奖他可能会令他本人很高兴，但在政治上对他没有丝毫好处，因为批评家们已经攻击他，说他是布什的仆人，再这样大加赞许只会给批评家们提供更多攻击他的材料。

在演说中特别称赞新联盟条约是否合适我也拿不准。条约无疑是多方政治妥协的成果，有些地方很微妙，有些地方还模棱两可。作为一个外国政治家，搅和在其中不仅是胆大妄为，而且也很危险，会造成与设想相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英国或者法国的首脑在 1789 年和 1790 年的宪法辩论中建议美国如何投票，美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布什总统可以避免这种错误，而且仍可以坚持他的重要原则，他只要强调各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协议而不是强迫的基础上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至于协议采取何种形式得由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外人。

我把一个撰稿人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文章中大部分我是赞赏的，但有些语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特别指出了其中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和对条约的称颂。“他不该使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这类将事件私人化的措词，”我说，“他也不该暗示我们反对独立，”我又加上一句，“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明白你的观点，”他回答，“但是我想我们不可能修改了，〔567〕因为复印件已经送给报社了。而且，这些是总统本人加进去的，他想这么说。”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该降落了，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但我还是再一次提出建议：“我看到你在行文中多次写到‘这个乌克兰’，你应该确保总统不用‘这个’，他应该说‘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美国人会认为加上‘这个’，

就使乌克兰像个地理名词，而不像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提到美国时也使用这个冠词，对吗？”他反问道。

“请别介意，”我说，“我并不是说这是个逻辑问题，我只是说许多人会对此有强烈反应。如果总统说‘这个乌克兰’，那么白宫下周就会收到数以千计的抗议信件或者电报。”

他最后同意在提到乌克兰时，不再加上定冠词“这个”。后来，布什总统来到我们这边问候时，我相信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图。

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安排此次访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乌克兰人的感情，这篇演说可能会更加困扰我。比如，我们已经意识到 7 月初科尔总理访问基辅时，戈尔巴乔夫不让乌克兰人参加其间的几次会议，对此乌克兰人极其愤怒。所以我们同意布什总统私下会见其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其间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其他来自莫斯科的代表将不出席。所有的演说和祝酒词都将使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总统也将使用一名乌克兰翻译（虽然克拉夫丘克谙熟俄语）。简单他说，我们已经有点儿出格了，以往的来访者从未像我们这样把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鉴于有这些安排，我认为总统的演说中即使有一两处辞令不当也无大碍。

我不该自鸣得意。甚至在我们到达基辅前，一些民族主义的乌克兰领袖就对我们为安排此次行程所付出的努力采取明显的漠视态度，他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美—乌关系上，向美国记者批评布什总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鲁克的主席伊万·德拉奇声称“布什总统像是被戈尔巴乔夫施了催眠术”。列夫科·卢卡年科〔568〕更令人费解，他声称美国总统“一向藐视发生在各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而实际上，除这次访问外，他（布什）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上一次与三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袖会面，和叶利钦也有三次，和纳扎尔巴耶夫也有数次，一年前布什总统在华盛顿还拒绝会见乌克兰共产党总理，原因是布什认为他不能够代表乌克兰民意。考虑到三年来美国官方代表和鲁克领袖们频繁接触，他们也不应该提出如上指责。实际上，鲁克领袖们收到美国的邀请远远多于乌克兰境内其他政治运动派别加起来的总和，而他们在乌克兰却只获得不足 1/4 的选票，所以如果要指责美国偏心的话，那就是我们本不该给鲁克那么多的关注。

鲁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也很反常。当一个人在政治上进行垂死挣扎时，他可能就不记得过去了，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乌克兰共产党施加压力，大多数的鲁克领袖们可能还在监狱里，更不用说参加竞选、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参加为美国总统举行的正式宴会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们，如谢尔比茨基，竭力反对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自由化。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丢下鲁克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反抗 80 年代未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他们将永远也不会取得他们现在的成就。

这次访问本身就将过去和现在许多新的因素串联起来。

在基辅波里斯波尔机场的欢迎仪式让人想起了过去。精心挑选的一群人欢迎总统的到来。他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同时也挥舞着乌克兰苏维埃官方旗帜——由苏联国旗稍加修改，红底，接近底部有一条细细的蓝色条纹。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用乌克兰语致欢迎词。布什用英语致谢。接着，就是拍摄数张照片，麦克风中传来乌克兰语的翻译。我记得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基辅时情景很相似，只是当时讲的只有英语和俄语。

我们的车队一离开机场，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很多人聚集在〔569〕机场

广场前，手中挥动着蓝黄相间的乌克兰独立运动旗帜，呼喊着独立口号，向布什总统舞动春控诉当前共产党政府和共产主义的条幅。在去市区的路上也有类似的示威游行，甚至在城内也随处可见。这种气氛与尼克松访问时以及在不久前 1988 年国务卿舒尔茨访问时形成的对照让人瞠目结舌。 1988 年时，道路专门为车队清理干净，人们甚至不许站在两侧的人行道上！

布什总统和克拉夫丘克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当中我和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以及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在旁边的房间里一边等候一边聊天。福金特别忧虑，害怕今年冬天粮食会短缺。虽然乌克兰一直是闻名的苏联的“粮仓”，但斯大林强行采取的国有化政策曾于 30 年代引起过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令许多人丧生。现在日益加剧的经济混乱已经威胁到从那时起就不能满足需要的农业生产。共产党政府仍不愿意打破斯大林的集体化农场，恢复私营农业，尽管国有体制已名存实亡了。福金像一个绝望的人谈论着未来；鉴于当前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他似乎仍看不到任何避免经济崩溃的妥善办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不会停止反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活动；他们首先要独立，然后才考虑如何对付这种局面。

继与克拉夫丘克会面之后，布什总统对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他的讲话虽然中途未被掌声打断，但结束时议员们纷纷起立欢呼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精心布置的巴洛克式的玛林斯凯皇宫中举行了正式宴会，参加者有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其中包括五名鲁克领导人。祝酒词用乌克兰语和英语，没有人翻译成俄语。坐在丽贝卡旁边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说，幸亏他懂英语，否则他还真的不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离开皇宫，总统接着访问贝比亚。这是当年纳粹德国施行残〔570〕酷暴力的遗址。在这里，布什和克拉夫丘克都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演说。然后，他们回到机场，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之后，空军一号起飞，从基辅直返华盛顿。

整个访问只持续了五个小时，但对于一个了解过去的观察家来说，它却是史无前例的。自从 17 世纪初期以来，这是一个大国的首脑首次来到乌克兰，待其领导人犹如元首，而且特意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交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坚持所有重要的政治派别都加入到他的访问中来，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布什曾赞扬戈尔巴乔夫，并赞同联盟条约（乌克兰人也参加了条约的起草），这个事实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布什来访本身所包含的真正意义。毕竟，他强调说未来要由他们自己来选择，这一点对于乌克兰朋友来说至关重要，对苏联其他的共和国也是如此。

拙于政治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未能抓住主要问题。他们忽略了这次访问的实质因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一篇演说中几个不当的辞令上，他们错过了推进他们最终目标的机会：使乌克兰被视为一个有别于俄罗斯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主权国家来定义与周边国家、包括与俄罗斯共和国的关系，这比谈论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不同看法以及联盟条约的优缺点要重要得多，因为这显示出乌克兰有权自己作出决定。

当然，美国报界报道了鲁克领导人的抱怨。他们没有对官方态度的历史性转折进行哲学家式的讨论，而是制造出了更好的新闻。专栏作家威廉·塞法尔一向喜欢让布什难堪，这次他抓住布什在乌克兰议会演讲时的某些不当辞令，然后给他的演说起个绰号叫“软弱的基辅”。这个玩笑从性质上讲不准确，但这并不防碍人们记住它。（34）

塞法尔的文章可能讨美国人喜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对于乌克兰国内形势的发展却无丝毫作用。鲁克领导人的前途显得更加渺茫，他们是否会将国家的表面形式置于民主和改革之前呢？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将继承了一个软弱分散的国家，它将难于维持他们所要的独立。他们将依靠外来者的恩赐来得到他们所渴望的未来，还是将共同努力在乌克兰缔造一个健康的全民一致的社会？

布什总统讲话中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独立和民主自由不〔571〕是一回事。对它的公众来说，一个压制性的独立国家和一个帝国一样糟糕。首要的目标应该是民主，因为只有有了民主，独立才会令人向往，人们也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反对的联盟条约保留了各成员国退出联盟的权利，而且确保独裁的中央机构无法剥夺这个权利。

民族主义者经济上的主张也着实让我吃惊，他们企图在经济上维持官僚控制，并从莫斯科发起的改革趋势中分离出来。它或许很快会带来国家外表的独立，但结局将只会是这样一个国家：缺少必要的内部凝聚力来推进必需的基本改革，这最终只会威胁国家统一。而独立的允诺最终也将化为灰烬。

我的许多乌克兰朋友们对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无动于衷，我对此十分担忧。

布什夫妇在基辅的波里斯波尔机场重新登上空军一号，我和丽贝卡向他们道别。然后，我们走到将把副总统亚纳耶夫送回莫斯科的苏联民航客机上。他请我们和他一起回去，随行的还有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和他的妻子阿拉。

我们五个人在这个中型客机的贵宾舱中坐定后，鱼子酱、熏鲑肉、香槟和上等的法国白兰地就端了上来。我们为这次看似成功的美国总统来访而干杯。亚纳耶夫似乎对自己在基辅所受的冷遇毫无温色，反而很高兴，因为乌克兰人似乎很满意。

丽贝卡把话题从闲聊中转移开来。“告诉我，副总统阁下，”她说，“你们的国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亚纳耶夫沉思起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人们很不安，”他说，“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就会有人站出来，答应给他们稳定、伏特加和香肠，而我们呢，都得滚蛋。”

一个更加松散的联盟

从 5 月到 7 月，曾经签署了新奥加廖沃（9＋1）声明的 9 个共和国的谈判者（通常是总统们本人）与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一直在商讨可接受的联盟条约文本。有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曾希望条款在他赴伦敦与七大国成员会面之前达成，但这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7 月 7 日，《消息报》登载了对格里戈里·列文科的采访（他受戈尔巳乔夫之托掌握谈判的进程），他提出了一个比 5 月份的设想更实际的时间表，他说目前的草案要在 6 月份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 7 月份将进行最后一轮的谈判。在他看来，这些谈判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他认为在年底前可以签订条约。

与此同时，各共和国并没有坐等协议的签订，而是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刊登着对列文科采访的同一期《消息报》还报道说，乌克兰苏维埃已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共和国接管乌克兰境内迄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的所有的公司和组织，并拒绝给中央任何补偿。

乌克兰议会是根据他们去年公布的《国家主权独立决议》采取这个行动

的。他们解释现在开始行动的原因时说，中央各部已经开始将各企业转为股份公司，而事先却并未将其产权转交各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未能打破垄断进行私有化，也未能把转变过程的控制权转交各共和国，现在他们正为此付出代价。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削弱，各共和国要求控制其国内国有资产的呼声愈来愈强。与其他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更容易使当地的共产党经济官僚与迄今一直充满敌意、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推动的独立运动联合起来。在此之前，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力量还在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则团结起来，共同反抗专制的中央政府。乌克兰所发生的这一切极有可能在许多其他共和国发生。

7 月 18 日，列文科宣布草案将被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573〕虽然有些问题尚存争议，其中包括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税收制度、军事力量的控制、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前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鞑靼斯坦。鞑靼斯坦是前自治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它曾宣布主权独立，并要求与其他各联盟共和国拥有平等地位，并威胁说如果这个要求被拒绝，它将退出联盟。

乌克兰议会于 6 月 26 日星期三讨论了草案。在发言的 35 名代表中，24 名有这样或那样的反对意见。议会主席克拉夫丘克听取了这些意见，但没有发言。议会最后以压倒多数票决定，以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审查草案，并于 9 月 1 日提出报告，政府和学者将就中央被授予权力的法律影响提出报告，由大会主席团评估这些报告，于 1991 年 9 月 15 日将其观点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许多支持独立的人显然对此程序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认为各方面的报告必将暴露联盟条约的各种缺点，这可能无限期地推迟它的实行。（36）

至少从 4 月份起，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深深感觉到拖延条约会使许多其他事情被束之高阁：经济改革、外国援助、中央政府重新改组……这只是其中的几个。列文科在 6 月初所说的延长期限是戈尔巴乔夫不能接受的。整个 7 月份他在拼命催促，以便在夏末之前能完成关键性的讨论。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于 7 月 12 日在原则上同意了其中的条款，但建议有些地方需要改动，这遭到各共和国领导人的拒绝。戈尔巴乔夫已经与各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在月底达成协议，正如他告诉布什的那样，他认为他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安排。

8 月 2 日，即布什离开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条约可于 8 月 2 日“ 开始签订 ”，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将于当天签署。（37）其他共和国要稍后一些，因为它们必须先满足国内法律的要求。

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称此条约公正地反映了备方利益，它将为建立一个“ 崭新的、各主要国家自愿联合的同盟（38） ”奠定基础。

除戈尔巴乔夫外，对条约表示热心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它赋予了各共和国史无前例的权力，抛弃了国名中“ 社会主义 ”和〔574〕“ 苏维埃 ”这两个词，这肯定会激怒党内保守分子以及帝国的拥护者，将近 7 月底时，在戈尔巴乔夫向各共和国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之前，现存帝国的许多声援者便开始发表公开信，呼吁他不要接受拟定的条约草案，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苏联解体。（39）

其他人则因为草案中保留了太多的苏维埃国家的成分而反对它，虽然草案实际上包含了他们几个月来的所有的建议，但一些较激进的改革者仍持反对态度。8 月 8 日，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 · 波纳，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及

其他著名民主人士给叶利钦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不要签署草案。（40）第二周，民主俄罗斯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提出只有包括下列条款，条约才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草案中没有这些条款：

1.草案至少要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加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乌克兰加入，草案无效）。

2.最后条款须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公众事先讨论。

3.删除允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批准新宪法的条款。

4.包含明确的退出条约的程序。

5.条约中要有明确条款规定新联盟中的成员不得侵犯

人权或者实施种族屠杀。

鉴于叶利钦最有组织的支持者给他施加了这么大的压力，有些人怀疑即使戈尔巴乔夫赶回来参加签字仪式，叶利钦 8 月 20 日是否会真的签署条约。（41）但不管怎么说，当叶利钦和纳扎巴耶夫 8 月 18 日在阿拉木图会面时，他们似乎是准备好了要在条约上签字。

我和丽贝卡把离开莫斯科的行程推迟了 10 天,以便在斯帕索别墅接待布什夫妇的来访。我们 8 月 1 日从基辅回来后，就开始打点行装，计划 8 月 11 日星期日离开。我们在莫斯科任职的最后〔575〕10 天被一系列的活动所纠缠：除了收拾东西外，就是参加一系列的告别宴会，每天接受几家新闻单位的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一次是用俄语对苏联记者，一次是用英语对美国记者。

通常，我是每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英语、俄语轮流进行。大部分属于背景情况介绍，不允许记者们公开地引用我的话。如果他们想采用我说的东西，他们会说“ 一位资深的西方外交家这样说 ”。

我们接到了参加最后一次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邀请，这样，我对过去四年半经历的评论将会被记者们引用。开始我有些犹豫，我知道我得应付关于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的微妙问题。假如我说我们认为有人在搞阴谋，企图推翻他，那我就不应同意搞公开的记者招待会。（42）美国大使不能被报界引用他的话说，他估计戈尔巴乔夫会离职。否则到处都会把这看作是一个信号，说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戈尔巴乔夫，这只会鼓励反对他的企图，因为它暗示美国将默认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我一直认为背后搞阴谋的人不可能推翻他，但他们可能会试一试。由于外面盛传戈尔巴乔夫会被赶下台，我认为如果我能找到某种方式警告——有可能发生政变，但如果政变真的发生，它很可能失败——将是有益的。于是，我同意去参加公开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定于 8 月 5 日举行，有几十名记者参加。正如我所预料的，一名记者问道，在联盟条约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如何，我回答说，只要他和叶利钦保持合作，直到下届的选举，他的前景会很不错。选举大概在一两年后举行，到那时形势如何，我就无从预料了。

另一名记者问我是否认为民主变革已经深入社会而不可逆转。这倒给我开了个头，我于是做出如下回答：（43）

我认为改革的势头和程度已经使苏联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或者独裁统治。当然，这不排除某些人会做这样或者那〔576〕样的努力，而且我怀疑一些企图这样做的人正在背地里活动，但形势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允许这类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有人问“ 他们是否能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方式回到计划经

济？我将回答“不”。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企图在这里或者那里施加压力，也只是使事情的进程慢一点……但制度已经被摧毁了，我看不出任何办法可以使它得到恢复。

至于以独裁方法统治，就更不必说了。我知道存在这样一股势力，他们要求和呼吁其他治理方式……然而，我认为应该禁止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真有这种企图，那么天理难容；如果真的有，我想，他们最终会土崩瓦解。我不是说不存在篡权的企图，不难想象有可能存在这种企图，但我想它们终将失败。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报道，就算有报道也都是说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不错”，只是他们没有提及我那个表达虽然有些笨拙、但却是经过仔细推敲的限制条件。没有人报道说，我曾说过推翻戈尔巴乔夫的企图不会得逞。

用空话无法解释当时事态发展的复杂性，但如果谁不讲空话，得到的反应通常是一个哈欠。当然，批评家们后来毫不迟疑地批评我们根本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夜也许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度过的最难忘的一夜。谢尔瓦德纳泽夫妇邀请我们赴晚宴。在场的只有我们四个成年人，我们想这是结束我们在这个国家任职 11 年的最好方式。

当然，我们谈论了政治。谢瓦尔德纳泽仍担心右翼会篡权；他认为去年 12 月他警告的那种危险并没有消除。但假如他知道谁会篡权的话，他的态度似乎过于谨慎了。我想他只是有一个总的预感，而并不知道具体的阴谋。

〔577〕　尽管谈论了一些政治，但这是一个充满了浓厚家庭气氛的夜晚。谢瓦尔德纳泽不像我曾拜访过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他们的住宅里通常充满了矫饰的奢华。而这里更像一个典型的格鲁吉亚上流社会的家庭。谢瓦尔德纳泽语气温和，举止文雅，表现出他是一位富有深刻文化内涵、情感丰富的人。

在我们入座前，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跑进来。他们介绍说这是他们的孙女，从第比利斯来。她刚学会了一点俄语，讲话大部分还用格鲁吉亚语。他和我们一起就座，谢瓦尔德纳泽的夫人问我们是否介意孩子做个祈祷。我们当然赞成。于是我们颔首直立，她用格鲁吉亚语祈祷。祷告不是像我们美国孩子们那样只是简单地背诵“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仁慈的，感谢他赐予我们食物。阿门”，而是我们在格鲁吉亚教堂里通常听到的那种祷告，它持续几分钟，以抑扬顿挫的语调结尾。当她结束时，我们的主人画了一个十字，我们都低声说“阿门”，然后就座。

30 年了，我和丽贝卡一直和这个国家打交道，亲眼目睹了它　的传统文化遭受毫不留情的破坏。共产党统治集团用尽办法使丰富的传统文化变成一个众人相似的“新苏联人”。但在那个星期六晚上，　1991 年 8 月 10 日，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还被人铭记，这个用格鲁吉亚语吟诵祷告的稚童向我们显示出过去的价值观在将来还有一席之地。

这实在令人振奋。但我并未因此而陶醉，我不禁想道，随着优秀传统的复兴，那些既为这个警察国家所利用，又为其所限制的丑恶的、破坏性的东西，是否也有可能重新泛滥呢？

第二十章
失败的政变

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已不能行使苏联总统之职……我从 1991 年 8 月 19 日起履行苏联总统的职务。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政令①

鉴于一些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我在这里宣布如下命令：这个委员会的言论违犯了宪法，其组织者的行为已构成图谋军事政变的犯罪行为。

鲍里斯·叶利钦政令 1991 年 8 月 19 日②

如果他（戈尔巴乔夫）签署《联盟条约》后再去度假，事情的发展将会对他有利。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 1991 年 8 月 17 日③

我认为历史将这样记载： 20 世纪实际上结

束于 1991 年 8 月 19—21 日。

鲍里斯·叶利钦 1994 年④

1991 年 7 月 29 日，也就是布什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汇聚在新奥加廖沃别墅。他们同意定于 8 月 20 日签署联盟条约，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坚持要对苏联政府进行重大改革。根据叶利钦的建议，戈尔巴乔夫同意签署条约后不久撤换克留奇科夫、普戈和帕夫洛夫。⑤虽然会议是在他们三人认为非常隐秘的状况下举行的，但是后来却在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他们谈话的记录。⑥8 月 4 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度年假。克留奇科夫于是马上派一小组人到郊区马斯基诺村的克格勃秘密活动场所制定一个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计划（相当于实施军事管制）。⑦但当 8 月 8 日这些人向克留奇科夫报告说情况还没有达到非要这样做不可时，这位克格勃主席反对说此事不得耽搁，理由〔579〕是一旦联盟条约签订就不可能再宣布紧急状态。

第二周，克留奇科夫叫这些人回到马斯基诺村继续筹划紧急计划。他这样做的同时，又告诉他们当中的一个克格勃官员阿列克谢·叶戈罗夫，鉴于戈尔乔夫从心理上不能应付当前这种形势，所以将不通知他而宣布实施紧急状态。⑧8 月 16 日，星期五早晨，宣布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实施军事管制的计划草案摆到克留奇科夫面前。他马上命令克格勃副主席派技术人员到克里米亚去切断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⑨但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个应急计划。几个主要人物尚未同意。

浴室里的交易

在美国政治中，曾有一个阶段政治上的决定都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达成的——或者这只不过是个传说。在俄国，与之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一个不仅可以放松、饮酒、聊天的地方，而且可以讨论大事，特别是秘密的事。8 月 17 日，克留奇科夫邀请了几位同仁去克格勃在莫斯科的一处秘密场所洗蒸汽浴，这个地方的代号为“ABC 小屋”。“ABC 小屋”拥有豪华宾馆的所有康乐设施，比美国政治家通常光顾的宾馆还要奢华。

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接受了邀请。波波夫 6 月份曾给我一份指控阴谋者的花名单，他们和克留奇科夫都是列在名单上的人物。另外，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负责军事工业的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兰诺夫、负责人事的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也在其中。

根据政变后俄罗斯大检察官的证词，这伙人用过蒸汽浴后一同去冷却

间，那里摆放着饮料和各种便餐。亚佐夫、舍宁和帕夫洛夫挑选了伏特加．其他人和克留奇科夫挑选了苏格兰威士忌。克〔580〕留奇科夫对帕夫洛夫说，他很快要被撤职了。话题就此打开。“我现在正准备辞职呢！”帕夫洛夫虚张声势地嚷道。然后，他便嘟嘟囔囔地谈起了目前国家的形势，说这几乎是场大灾难，马上就会闹灾荒了。所有的纪律都消失了，没有谁再愿意听话。他认为只有宣布紧急状态才能挽救国家。

帕夫洛夫的抱怨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一直是他的帮腔。克留奇科夫同意他的见解，而且补充说，他过去一直向戈尔巴乔夫报告国内的困难状况，但戈尔巴乔夫一直不很积极。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不想听到真理，每次当克留奇科夫在这个问题上启发他时，他总是打断讲话，然后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

有鉴于此，克留奇科夫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实施紧急状态，然后派一个代表团去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如果他拒绝，那么就让他留在克里米亚并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就说他无能为力。亚纳耶夫将成为代总统，之后，在克留奇科夫的帮助下，最高苏维埃将召开会议，使整个程序合法化。

伏特加酒喝完了，一直致力于应急计划的克格勃官员叶戈罗夫被派去再多搞些酒来。当他回来时，话题集中在谁去见戈尔巴乔夫（看来大检察官所用证词是由叶戈罗夫提供的）。

一些重要人士当时都不在场，当亚佐夫建议军队、克格勃和民兵团结起来采取行动时，克留奇科夫告诫大家说，普戈对这个计划还一无所知。亚纳耶夫呢？他也不在圈内，但是舍宁坚信他肯定会合作的。对于卢基扬诺夫，他们还不能确定，就像舍宁说的，他还在举棋不定。⑩下午 6 点钟多一点，当这群人散会时，阴谋的主线条已确定。但就在那时——他们一行人将在不到 48 个小时内去克里米亚见戈尔巴乔夫之时,他们还未得到一个关键人物的同意，要使这次行动具有法律效果，这个人物的加入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亚纳耶夫拒绝合作，不承担代总统之职，该怎么办呢？策划者们显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他肯定会接受的。

阴谋集团成立

1991 年 8 月 18 日，星期天，下午 5 点钟之前，有人告诉戈尔巴乔夫说，有伙人来看他，现在正在克里米亚海滩的总统度假室中。戈尔巴乔夫没有约过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伙人未经他的允许就能进来感到很吃惊。他听人说他们之所以能进来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和他们在一块儿”。尤里·普列汉诺夫负责克格勃第九局，肩负保护总统以及其他政府要员的人身安全的职责。大致他说，在美国和他角色相当的就是美国秘密机构的头头。

为了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戈尔巴乔夫拿起电话寻问。没有声音。他又面带恐惧地匆忙试拨桌上的其他电话——每部专用电话都连接着不同的设备，没有一部可以用。他把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召集到跟前，告诉他们说他们被禁闭了，有人可能打算要他们的命。（11）

直到那时，戈尔巴乔夫才看到这些不速之客，他们未经通知就闯到他楼上的书房里。除安全总长普列汉诺夫外，这行人中还包括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两名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和奥列格·告宁，以及苏联陆军司令瓦连金·瓦连尼科夫，苏联军界中著名的大嗓门、好战的顽固派之一。当波尔金在浴室会议上被选派担此任务时，亚佐夫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一见他准会嚷嚷；其实，波尔金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为信任的下属之一。

起初，这群人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赞成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将权力交给亚纳耶夫，当他拒绝时，瓦连尼科夫愤怒地要求他辞职。戈尔巴乔夫说，他曾竭力和他们讲道理，预言他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可能会导致一场残酷的内战。但是，当他发现木已成舟时，他便骂他们退下。（12）

当“代表团”成员们飞回莫斯科时，他们的同伙开始在克里姆林宫汇合。根据检察官后来搜集的证据，帕夫洛夫来晚了，他〔582〕在星期日傍晚就已经有点儿醉了。亚纳耶夫更迟一点闯了进来，他醉得更厉害。接着是卢基扬诺夫，当他进来时，克留奇科夫让出他坐的上首位置，坐到了桌子的旁侧。

虽然克留奇科夫做出服从的姿态，但会议仍由他主持。首先，他向到会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不听从到克里米亚去的“那群同志”的建议。然后他又补充说，总统已无法行使他的职责，因为他患病了。

“如果他真的病了，应该有医生诊断书或由他自己宣布出来。”卢基扬诺夫面带焦虑他说。

“稍后，我们会拿到诊断书的，”克留奇科夫回答，“而且，那些同志回来时，他们会把他们的印象说给我们听。”

接着，卢基扬诺夫提出他不想加入紧急委员会了。作为立法机构的代表，他认为他那样做不太合适。其他人便开始与他争辩，直到 10 点 15 分，巴克拉诺夫、舍宁、波尔金和普列汉诺夫走进来（瓦连尼科夫当时去了基辅以争取使乌克兰当局加入）。他们几个都醉醺醺的。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描述了他们和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以及戈尔巴乔夫如何断然拒绝成立紧急委员会或宣布紧急状态。

焦点于是转移到亚纳耶夫那儿，刚才他一直没怎么发言。他还没有签署文件行使代总统权力，而且看起来他还在犹豫。据传说，克留奇科夫曾告诉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如果我们不去收获，就会发生灾荒，几个月后，人们就会走上街头，我们就会面临一场内战。”

亚纳耶夫没有被说服，他很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没有病，因为在同一天（戈尔巴乔夫的联系被切断之前），他还和戈尔巴乔夫就其第二天计划返回莫斯科的事通过电话。他然后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阅读那份准备让他签署的文件。

“我不会签字的，”他突然宣布。屋子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亚纳耶夫接着说，“我相信总统休完假后会回来的，病会好的，他会康复的。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道义上的权利也没有必要履行他的职责。”〔583〕　发表这篇证词的检察官后来评论说，现在回顾起来，很难说当时亚纳耶夫是真的有疑虑，还是故意推托一下以免以后有人控诉他追逐权力。但无论如何，他不久之后还是垮下来了。其他的同谋者们都安慰他说，他们都将各自承担责任，而且总统病情一旦好转就将回来重掌局面。

直到 11 点后，亚纳耶夫才颤抖着拿起笔，在宣布履行代总统职务的文件上签下了他歪歪扭扭的名字。亚佐夫、普戈、克留奇可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诺夫即刻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号命令，宣布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

正在白俄罗斯度假的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被召来参加会议。当他进来时，文件刚好签订。当时他正身着牛仔裤和斜纹布夹克衫。

一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后，别斯梅尔特内赫抓起笔将自己的名字从紧急委员会名单上划掉，抗议说将他的名字写在那上面，真是荒唐。如果他真的

那样做，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会再同他打交道了。

所有的文件都签订后，克留奇科夫说还准备拘留一些民主领袖，并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 10 多个人的名单。“ 你应该抓 1000 个。 ” 帕夫洛夫用嘲弄的口吻大声建议说。

午夜过后不久，一些策划者回家了。亚佐夫后来证明说，当他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大门、面对红场时，他看了看塔楼上的钟，当时已是凌晨 12 点 16 分了。（13）

政务会接管

塔斯社大约于 5 个小时后,即莫斯科时间 8 月 19 日上午 5 点半钟前首次宣布接管。（14）接下去还有各种宣言，主要内容包括：亚纳耶夫将履行总统职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级权力机构都要服从于它，否则就中止其活动。还有，紧急委员会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政治党派及公共团体停止其活动，禁止罢〔584〕工和上街游行，对舆论工具重新实行监督，不管何时何地如果有必要将实行戒严。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又有命令封闭了最具独立性的报纸的发行。

虽然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成为紧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允许外交部向驻在各国的苏联大使发出命令，让他们以紧急委员会的名义向其所驻国政府送交一份公文。这一公文由亚纳耶夫以代总统身份签署，并由塔斯社公开发表。它向外国政府保证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是暂时的，他们不会影响苏联在国际上的承诺。

卢基扬诺夫实际上给了紧急委员会更强有力的隐蔽帮助。在他发表的关于第二天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草案的一个重要声明中，他指出草案没有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起初要求的条款（这些条款被各共和国领导人拒绝），他坚持认为在签署前应该经“ 最高苏维埃，或者人民代表大会 ” 的进一步讨论。〔15〕虽然卢基扬诺夫并没有把这一声明和紧急委员会扯在一起，但是它紧随紧急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之后，并作为一系列声明的一部分由塔斯社发表，其目的无疑是为拖延 8 月 20 日签署联盟条约提供借口。（16）

另外，又有两个人于 8 月 19 加入紧急委员会，一个是工厂经理亚历山大 · 济贾科夫，他数月以来一直谋划以一个政务会取代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瓦西里 · 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一个集体农庄主席，他领导着苏联农民工会，它是一个游说团体，但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国营和集体农庄主的利益。他们都不是政界要人，但是他们却能够以公众代表的身份出现。

一些组织和政界领导很快同意了政务会的成立。这些组织和个人包括弗拉基米尔 · 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17）——他不该把他的党叫自由民主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分裂后，他们一直忠于莫斯科 (而且他们也曾参〔585〕与今年初民族救亡委员会的活动)（18）。还有谢尔益 ·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从度假地克里米亚匆匆赶回莫斯科为紧急委员会出力。

整整一天，军事装备从四面八方被运往莫斯科。但除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和跑马场上的示威者，执行宵禁的军队不过就是站站岗而已。许多民主运动的政治领袖都被置于监视之下，其中有两个被抓了起来，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逮捕。

但紧急委员会及其支持者并非那天唯一的积极活动者。

叶利钦采取行动

8 月 18 日，叶利钦正在阿拉木图与纳扎尔巴耶夫磋商。他原定于下午 5 点乘苏联政府飞机离开，但纳扎尔巴耶夫逼着他留下来吃晚饭，所以直到晚上 8 点他才登机离开。负责后勤的哈萨克斯坦官员不太熟悉叶利钦所乘飞机的通知程序，所以苏联空军保卫队未接到修改的飞行计划。（19）后来便谣传飞机时间的突变挫败了政变策划者们欲将飞机射下来的命令。（20）至今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曾颁布过此命令，但有一点属实，政变策划者的确发布过命令，将叶利钦的飞机转向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飞机一到马上就逮捕并将把他监禁在莫斯科以北扎维朵夫的政府狩猎处。但在飞机到达前，大概是克留奇科夫改变了命令。飞机同往常一样降在民用机场，叶利钦则驱车回到他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

克留奇科夫没有马上逮捕叶利钦，而是吩咐克格勃监视他。他似乎已下定决心等叶利钦违反紧急委员会颁布的命令，这样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抓起来。

第二天早晨，叶利钦被女儿塔尼娅叫醒去看一个电视公告。他说他当时马上意识到发生了政变，在俄罗斯政府成员陆续到达他的别墅的同时，叶利钦开始和其他各共和国的首脑进行电话联系。〔586〕7 点刚过，他便打电话给亚纳耶夫，但被告知亚纳耶夫工作了一夜，正在休息。然后，他又竭力和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但等了一会儿后，被告知克里米亚的官员不给他接通戈尔巴乔夫。费了好大的劲，他终于和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以及白俄罗斯领导人尼古拉·德蒙特伊通了话，但令他吃惊的是他们都不愿意在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以前表态。（21）

俄罗斯议会的代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当时还没有被确定接替叶利钦的位置，他不久后便到了别墅。陆续到达的还有其他俄罗斯政府官员：谢尔盖·沙赫赖，根纳季·布尔拉茨基，伊万·西拉耶夫，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和维克多·亚罗申科。（22）他们集体起草了一篇告俄罗斯人民书，他们先写下来，然后又给每个人复印了几份留待分发。这时，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顺道来看望叶利钦，呆了一小会儿便匆匆赶回去了。

一起草完呼吁书，他们便决定迅速赶回白宫，那幢面临莫斯科河的俄罗斯政府所在地。他们意识到别墅已处于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但他们不清楚保安部队究竟接到了什么样的命令。凌晨一两点钟，驻守在叶利钦别墅的克格勃分遣队显然只是被命令监视这幢房子。所以，他们眼看着叶利钦和其他俄罗斯官员离开别墅赶往市里，未采取任何行动。（23）

大约 10 点钟，他们到达白宫，公布了刚刚写好的呼吁书，然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哈斯布拉托夫召集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叶利钦接见了请来的各国驻苏外交人员。中午刚过，他得知来自于塔曼的坦克已到达白宫而且很友好（他们接到命令驻守白宫）。他于是走出来，和士兵们谈话，然后登上其中一架坦克，创造了 10 年来一次最佳摄影镜头。

苏联的大部分新闻媒介已向俄罗斯领导人关闭，但后来证明由于还有别的渠道，只产生了一些很小的不便。独立的新闻社〔587〕“ 国际文传电讯 ”像外国记者一样，立即报道了他们的全部声明，对外的电话线路以及电视线路仍保持畅通。如果由克拉夫琴科控制的塔斯社和奥斯坦金诺频道拒绝报道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市民们仍可以从国外广播中获知详尽的事实。就连被困于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也已从英国广播公司、“ 美国之音 ”和“ 自由

之声”听到了全部消息。

俄罗斯政府呼吁举行总罢工，但一开始好像没有人太在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在白宫。中午，还只有几千人的队伍到傍晚时已壮大到几万人。中午，库兹涅茨克盆地煤矿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电告亚佐夫让军队将他们抓起来，但亚佐夫未采取任何行动。他后来告诉调查人员说，他认为帕夫洛夫一定是喝醉了。（24）而实际上，帕夫洛夫主持了 8 月 19 日下午的内阁会议后，便回到他的别墅，以后在政变中再没有听说过他。

虽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摩尔多瓦新当选政府立即对政变进行了谴责，但仍有几个共和国领导人，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丘克，白俄罗斯的德蒙特伊，赞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其他人最初看起来还有些犹豫，但等到 8 月 20 日星期二早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和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已都宣布这场阴谋政变是非法的。但乌克兰共产党却表示同意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法令。

沉闷的反应

布什总统正在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度假，这时传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已被免职。据消息可靠人士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泰尔勃特的说法，国家安全顾问伯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午夜塔斯社报告前已通知布什此事，意识到明日凌晨布什就要发表宣言，他们讨论了布什该说些什么。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斯考克罗夫特说这次政变很可能会成功。鉴于我们或许要和政变领导者们打交道，他说，我们不该“不留一条后路”。所以，他建议不要使用像“不合法的”、“非法的”或者“不符合宪法的”等字眼。〔588〕布什同意他的建议，最后他们认为用“超越宪法”或许更合适些。（25）

第二天早晨，布什打电话给一周前接替我的驻苏联代办吉姆·科林斯，得知科林斯已见过叶利钦，后者表示要决心抵制这次政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也给过布什一份分析报告，告诉他这次政变计划得很糟，但斯考克罗夫特好像说：“在这点上，该报告不过是推测，无疑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成份。”所以，当布什总统向报界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听起来似乎他认为政变已经成功了，而且他有意和紧急状态委员会交往。当他谈到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时用的是过去时态，他希望政变领导者们能履行苏联的国际义务，将其显然是非法的行为轻描淡写为“超越宪法”。

虽然当晚他会发表一个更为严厉的讲话，但是他的第一次讲话却起了破坏性的作用，尤其在苏联。8 月 19、20 日，政务会在他们控制的传媒中反复引用布什的话，丝毫不考虑布什后来作的修改。19 日，关键的一天，布什一直回避直接与叶利钦联系，即使叶利钦曾通过科林斯请布什打电话给他。（26）布什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显得他已放弃了戈尔巴乔夫，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叶利钦一直公开地争取恢复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与叶利钦直接联系将被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虽然布什 8 月 19 上午的错误后来得到纠正,最近事情的发展也证明这个错误并未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但是它表明了白宫对苏联事态判断的缺陷，这一点在布什的整个任期都让布什一班人烦恼。

首先，鉴于苏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解释它的第一个标准不应该是“历史上的经验”。在许多方面，苏联已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她最不可能重复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然而，斯考克罗夫特猜测政变会成功，并认为美

国中央情报局提出的政变领导者组织不当不过是异想天开恰恰是基于这个原因。

〔589〕 但这不是唯一的错误，而且也不是最严重的错误，布什讲话后面所隐含的更深刻的错误在于他对政变领导者的评价以及他应采取什么策略同他们打交道。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帕夫洛夫是什么样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赞成用铁腕政策中止苏联的解体，他们显然都在阻挠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期望他们会继续改革过程简直是愚蠢至极。

而且，他们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同美国及整个西方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达成的妥协。克留奇科夫编造了一整套的无稽之谈诋毁美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削弱苏联。亚佐夫则用尽手段违反欧洲裁军条约，以其不妥协的立场使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订被拖延多年。而帕夫洛夫呢，从他上任的第一周就一直责备西方银行家、工业界人士以及西方政府使苏联面临种种难题，并明确提出他反对与西方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就算这伙人能执掌政权一段时期，美国总统难道就有必要与他们周旋吗？给政变领导人留情面，美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最后，避免阻断联系渠道——其实从来也不存在——的做法忽视了美国的声明和政策对苏联形势发展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领域，因为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去领会某些话，但毫无疑问，美国能够推进有利形势和阻止不利发展。一个明显例证就是罗纳德·里根使用了“罪恶的帝国”这个词。尽管因此惹恼了苏联统治者，但它却有力地动摇了苏联帝国自封的合法性——尤其是因为里根看到了那里发生的有利变化。

正像政务会的第一个宣言所表明的，政变者不准备大规模动用军队及警察以武力夺权，他们指望给政变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使得其行为看起来具有合法性，人们自然会归顺过来，那些不能保持中立的也可以以违法为借口抓起来。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得不到人们对其合法性的承认。〔590〕与外界同他们建立联系的需要相比，他们更需要外界的认可，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认可。

那么，总统究竟该说些什么呢？如果问到我，我将会建议他简单阐述三点：1.夺取权力的企图是非法的；2.我们继续承认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3.如果无法取得和苏联总统的联系，我们将努力与选举产生的各共和国政府联系，因为根据苏联宪法，他们有权与外国缔结关系。

这样的声明将使政务会惊恐万状，如果其他西方领导人愿意仿效的话就更是如此。他们也不会痴心妄想西方会默许他们篡权，更重要的是，应该警告他们，除非戈尔巴乔夫复职，否则我们将和各共和国直接交往，就当苏联政府不存在。这才是我们反抗莫斯科那个反西方小团体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运用这一武器就意味着以实力同他们打交道，而不是去祈求他们。

从 8 月 19 日晚上开始，布什总统开始正确行事。他的第二个声明已开始谴责政变是非法的、违宪的，这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叶利钦，之后一直和他保持紧密联系，直到他可以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整个星期二政务会一直播放第一个声明，而不理睬第二个。

尽管政府对莫斯科局势的理解已逐渐抓住了重心，但布什似乎仍然是从个人角度而不是从政策和利益的前景来看待那里的政治对抗。他一直不能摆脱曾诱使他发布 8 月 19 日凌晨那不幸声明的本能。

这些本能反映了布什和里根工作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人们滥用“保

守派”和“自由派”，或是更肤浅的“左派”和“右派”这类错误对比没有关系。但它肯定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有关。〔591〕　里根认为，会有好的变化出现，而且他将起到有影响的作用。所以他不大可能犯布什 1991 年 8 月 19 日早晨所犯的错误。他将有一种本能的自信，相信他的讲话将导致局势发展的不同，他将设法不求宠于不受欢迎的政权，而是把它拉下来。他将有信心应付一个动荡形势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局面。

另一方面，布什则对变化感到不舒服。即使是一种好的变化，他最初也将很难认识到这种进步。他似乎总是落后一步，一个不会给他带来任何致命危险、却足以让他坐失良机的一步。而里根则很可能抓往机会。布什不相信他可以塑造未来，于是他集中力量搞好现在，不重蹈覆辙。里根因为对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根基很自信，所以他愿意抓住机会，而布什却总是左顾右盼。

这次布什总统很幸运。这个自封的莫斯科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后第二天就开始分崩离析，不是来自外界压力，而是由于它自身的虚弱和无能。

政变垮台

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在俄罗斯白宫内度过了最为痛苦的两夜，他们当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闯过这一关。然而现在看起来，政变的失败命运在第一个宣言发表后十四五个小时就已确定了，此间，他们未能马上监禁叶利钦，叶利钦公开反抗，众多军队不愿向自己的人民施用武力，大城市示威者的人数不断壮大，最后，政变领导者在晚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亚纳耶夫、普戈、巴克拉诺夫、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和济贾科夫都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没有出席很明显是为了强调政务会的非军事特征。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个灾难。因为所有的政变领导人都心怀恐惧，亚纳耶夫的手不停地颤抖着。亚纳耶夫似乎心怀歉意，翻来覆去地许诺说他们的统治是暂时的，他〔592〕们希望戈尔巴乔夫早点回来。当问及戈尔巴乔夫到底患了什么病时，亚纳耶夫则闪烁其辞，只是说“他现在正在休息，接受治疗”。

随着记者招待会的进行，问题变得越来越不严肃了，甚至有些无礼。《独立报》的塔基亚娜·马尔金娜问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商人报》记者问他们这样做是否和皮诺切特将军协商过。最后，从侧影看让人想起希区克克的亚历山大·鲍文用亲近的口气问他从上学时起就很熟悉的斯塔罗伏杜勃茨耶夫，“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27）政变发生时，我们的儿子戴维和他的妻子为了写一本书，正在亚库特旅行，收集关于西伯利亚自然方面的资料。他们告诉我们，最初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放逐，他的苏联朋友们是何等的恐惧，但看完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令人惊奇地轻松地笑了起来。他们所看到的不是自信的领袖，也不是可以恐吓一个国家臣服的暴徒，他们不过是胆怯的、竭力自保的官僚，他们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

俄罗斯人可以原谅领袖们的邪恶，但却永远不能容忍他们的软弱和懦弱。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作为被鄙视对象出现在人民面前时，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人们不会跟随他们，他们也没有强迫人们那样做的意志和手段。大多数人们似乎在 8 月 20 日星期二早晨已经感觉到了这点，虽然很多人仍担心他们会孤注一掷，对白宫进行军事袭击，这样可能会造成几千保卫者遭杀害的修案。

当天，紧急状态委员会自身已开始瓦解：帕夫洛夫因“病”离开，亚纳

耶夫不久后也不见了。苏联宪法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关于紧急状态委员会合法性的严肃问题。卢基扬诺夫星期二早上报告说，通过星期一与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磋商，他确信他不可能得到 2/3 的选票来使他们的委员会具有合法性。他们许诺的关于戈尔巴乔夫身体情况的医生报告也没有兑现。

直接的反抗也逐渐升级。瓦季姆·巴卡金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都是被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取消的戈尔巴乔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发表声明宣布政变是非法的，科学工业联盟的阿尔〔593〕卡基·沃尔斯基主席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28）共产党的青年附属团体共青团的领导人也谴责这场政变，他们要求面见戈尔巴乔夫，并呼吁士兵们不要用同胞的血玷污他们军人的荣誉和良心。

群众们不仅在莫斯科的白宫周围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且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其他城市聚集。外国首脑们也日益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心怀恐惧，害怕他们可能会在 8 月 20、21 日夜里进攻白宫。关于 8 月 19 日进攻白宫的报告已证明是假的，(29) 但军队仍然包围着这所建筑，随时有可能轻而易举攻下它，尽管可能会有许多人丧生，因为那么多人聚集在它的周围。

人们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经过一天的踌躇不决，克留奇科夫终于下令逮捕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亚佐夫尽力一个接一个地劝说军队指挥官们进攻白宫。有些人，如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和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断然拒绝了。沙波什尼科夫甚至威胁说如果有人进攻白宫，他就炮轰克里姆林宫。其他人也只是到了半路就停下了。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从莫斯科南部的图拉调兵过来，但他马上告诉叶利钦他不会进攻白宫。他手下的一些士兵甚至一度加入到叶利钦的队伍里来保卫白宫。

克格勃特种部队、曾于 1 月份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网的鼎鼎有名、极具威慑力的阿尔法小组也不准备向他们的同胞开火。当他们得知三名副指挥官中有两名反对动用武力逮捕叶利钦时，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他们对 1 月份他们采取行动以来所受到的待遇不满，特别是他们之中的一名遇难士兵的家属未得到任何帮助。除此之外，打击立陶宛“叛军”是一回事，进攻一个民选的俄罗斯政府却是另一回事。就连克格勃精英也不想参与一场内战。

精通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学家、国会图书管理专家杰姆斯·布林顿当时正在莫斯科，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绪。（30）整个城市都谣传下午 4 点钟白宫就会遭到袭击。但 4 点钟什么也没有发生。于〔594〕是他们确信晚上肯定会发生。那天晚上实行了严厉的戒严，但这并未阻止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白宫周围向政变者们挑战，看他们究竟有没有胆量杀害他们。在圣波得堡集结起来反对政变的群众更多。但莫斯科更紧张些，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反抗的焦点是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俄罗斯政府的群众不仅包括许多年轻人，还有很大数量的中老年人。女人和男人一样多，正像一位年老的图书管理员 8 月 20 日晚动身到白宫去对布林顿讲的那样。他们这一代加入其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保持沉默很久了”。（31）1989 年 12 月在安德烈·萨哈罗夫灵柩上留下“原谅我们”、“永远不要再这样了”字样的那种感情好像又复苏了。

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当然也在那些用自己的身体来捍卫俄罗斯政府的人们之列，同她一样的还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亚历山大·雅科

夫列夫和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他带着他的大提琴从巴黎飞来。很多保卫者曾严厉谴责过戈尔巴乔夫，他也曾严厉责骂过他们，同时还为那些要将他赶下台的人找借口。人们不会忘记这些分歧，但一个比个人更重要的问题正摆在面前：俄罗斯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还是和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正如叶琳娜·波纳对与她一起保卫白宫的伙伴所说的　　　　那样：

戈尔巴乔夫是我们的总统。只有我们、而不是他们，才有资格评论他。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统治我们，指使我们……

但我们要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是人，真正的人，而不是牲口。（32）

人们担心的对白宫的袭击没有发生，但是夜里，还是留下几具尸体。三名年轻人，德米切·科马、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迪米尔·乌索在美国使馆旧楼前面的街心花园与坦克兵遭遇，结果被打死。虽然这次事件不是军事袭击造成的，但它使示威人群明白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同时它也使军事指挥官们知道：只要存在重型军事装备，而且操纵者又是一大群未经训练的士兵，那么就会有更严重的流血牺牲的危险，即使士兵们并不是按照命〔595〕令对示威者采取行动的。

星期三凌晨 3 点钟，也就是阴谋者决定性的克里姆林宫会议结束后还不到 51 小时，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已看到成功无望。亚佐夫命令军队撤离莫斯科，回到驻地，克留奇科夫则电告叶利钦说不会再进攻白宫了。

几小时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还可以行动（帕夫洛夫和亚纳耶夫晚些时候被逮捕，烂醉如泥），他们飞往克里米亚，显然是想向戈尔巴乔夫弥补过失。戈尔巴乔夫拒绝见他们，并于深夜回到莫斯科，随行的有苏联政府的官员以及他的随从，如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巴卡金和普里马科夫。

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们活跃的同谋者都被逮捕，其中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者，最高苏维埃先投票取消他们的议会豁免权，然后再将他们逮捕。有几个人自杀：当官员们去逮捕内务部长普戈时，发现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开枪自杀了。两天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叙述了他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并给家人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之后便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自缢了。他还极具个性地留下 50 卢布支付他在食堂的饭费。（33）

戈尔巴乔夫的双重磨难

在克里米亚经历了 72 小时的磨难，8 月 21 日星期三晚上，戈尔巴乔夫和家人在由俄罗斯政府组织、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指挥的人员陪同下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没有做公开讲话。当他面对着摄影机镜头走下客机的梯子时，他看上去像是受了惊吓，赖莎则是被搀扶下来的。

〔596〕　第二天，他举行了一个很长的记者招待会。三周前就在这同一个大厅里，他曾接待了布什。（34）他详细叙述了他在福沃斯的经历，然后开始回答问题。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很明显的：同以往相比，他的回答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有时竟在中途突然转变思路。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诚恳是毫无疑问的。

这使得他对国际文传电讯新闻社记者瓦拉迪斯拉夫·特里克霍夫所提问题的回答更加令人吃惊，也更加令人忧虑。特里克霍夫注意到，共产党在其

领袖被非法监禁的三天里始终保持沉默，于是他问道：“ 难道您不认为现在应该认真注意苏联共产党的问题吗，作为一个工具和政治组织，它总是不能跟上当前形势。 ”

人们可能会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会回答，共产党近几天的活动将受到认真审查，以确定它的构成、组织和结构是否适合一个民主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

相反，他却从整体上维护共产党，并重申他珍视已久的期望，将它变成改革的工具：

我知道我的职责——我将履行它直到最后，只要我有力量，我就会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牵制、阻止甚至铲除反动势力，将他们赶出苏联共产党。我认为在我们提出的新纲领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团结所有进步人士，所有思想正确的人士……

我们必须尽力确保改革我们的党，使其成为改革的有生力量。（35）

接着，一位墨西哥记者问他会不会将“ 拥护新路线的力量 ”领出苏共，他反驳道：“ 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36）虽然他继续争辩说“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组织 ”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一定要废除。像西方的许多人士一样，改革者们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从最近的经历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从福沃斯回来后，戈尔巴乔夫重新取得权力的渺茫希望被这次记者招待会留下的印象彻底毁灭了。（37）〔597〕　同一天下午 9 点，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讲话中他丝毫未提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感谢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称赞那些敢于站出来维护他的人，同时承认他的某些错误，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他说人民代表大会拒绝接受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是正确的，他不该坚持第二次投票，说到未来，他建议继续他的既定路线：签订联盟条约，采纳新宪法，举行新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与他早期的计划（反对变换人选）相比，有一点微小变化，即他评论说：国家的安全体系已经证明是“ 不太可靠的 ”，需要对它进行“ 最痛苦的研究 ”。

就在第二天，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当众以最屈辱的方式，面对他的政府及共产党领导层中大部分人的背叛行为。

当戈尔巴乔夫于 8 月 23 日出现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时,叶利钦迫使戈尔巴乔夫宣读会议记录，那上面记载着他最亲密的部下曾支持政变。内阁中直接反对政变的只有环境部长尼古拉 · 沃龙佐夫。不巧的是，他又是内阁成员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员。（38）

叶利钦很快转向反对共产党。他禁止《真理报》和其他党报的发行，命令封闭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那里保存着最敏感的档案），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戈尔巴乔夫则不支持禁止共产党本身。在俄罗斯立法人员再三追问下，他顽固地认为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将是一个错误。

但无论如何，第二天，即 8 月 25 日星期六，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只好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作为苏联总统签署〔598〕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按照苏联及共和国法律处理它。第二个是停止军队、民兵、克格勃、其他执法机关和所有党政机关中政治党派的一切活动。（39）

戈尔巴乔夫随后解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所有成员，任命俄罗斯总理伊万 ·西拉耶夫领导一个委员会来掌管苏联经济。改革派经济学家格里戈里 ·亚

夫林斯基——一个月前他的建议遭到唾弃——现在成了西拉耶夫的助理。这样俄罗斯政府就控制了苏联残余的经济机构。

一天前，即 8 月 24 日，戈尔巴乔夫让巴卡金掌管克格勃，并命令他对其进行彻底改组。与此同时，疯狂的人群挤满了克格勃总部所在的捷尔任斯基广场，捣毁了克格勃前身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克格勃总部里，官员们在巴卡金上任前疯狂地毁坏显示罪证的文件。（40）

于是，从本周开始的准备搞垮戈尔巴乔夫、恢复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的努力，到周末时已使得共产党不能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继续存在。虽然有几个成员仍然有权从事政治活动，包括组建新党派，情况和以往却再也不会相同了。

苏联共产党并非人们通常使用这个词汇时的含义，它不是一个政党，它一直是政府的工具，或者反过来说，是控制政府的工具，它有权支使整个国家机构。即使一些类似共产党的组织，不管叫不叫共产党，在苏共残存的基础上再建起来，它也不可能再把触角伸向国家和共和国各个组织中去发挥作用了，它也不会成为国家施行强制统治的工具。换句话说，它将被迫成为一个普通含义上的政党。

他们为什么失败？

在一个始终是由极权主义政权、而通常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599〕家，一个包括副总统、政府首脑、各种武装力量、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领导人物的图谋竟会失败，按照常理判断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更让人费解的是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中，总统不受人欢迎，而这次图谋又得到议会主席的默许，或者说是宽容。实际上，属于和同情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就是苏联政府，只有总统除外。在一个法律细节在政治发展中从来不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他们怎么能失败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他们的失败在于自身的无能，他们匆忙组织政变，在开始时没有采取逮捕叶利钦这类必要措施，后来又缺少成就一桩事业所需要的冷酷无情。

显然，紧急状态委员会既没有效率又优柔寡断。但大多数的苏联机构都缺乏效率。它的敌手也缺少周密组织；他们有热情和决心，但没有可以帮助他们抵御有组织进攻的机构。直到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夺权的那天，他们还在争吵不休，而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后没几天，他们又开始了争吵。

政变组织得太糟糕了，但这不是它失败的原因。它失败是因为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使人们根本不可能成功地组织一场非法夺权。组织者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了，他们认为他们所应付的还是 60 年代的苏联：宣布夺权，在街上部署几辆坦克就成了。人们会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事。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但大多数都不会太在意。只要答应他们生活会好起来就行了。他们信不信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对左右局面无能为力。

政变领导者们是其自身偏见的牺牲品。克留奇科夫一直争辩说，只有用铁的手腕才能恢复秩序，保证苏联完好无损，而且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也许曾以捏造或者歪曲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是他想要相信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不过是自欺欺人。这个国家再也不是他以及他的同谋们想象得那样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错。大多数人对政变不会公开反抗。但〔600〕问

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因为莫斯科有足够的人坚决反对回到过去，阴谋家不经战斗就休想夺取胜利。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决定而产生的民选机构，使政变在许多共和国未得到轻易的默认。对政变的反抗就是以许多地区领导人为中心展开的，叶利钦不过是他们之中最突出、所处地理位置最具战略意义的一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走上街头表示反抗，只要能向阴谋家们显示，他们必须流很多血才能执掌政权就足够了。

“共产主义者什么时候害怕过流血呢？”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问，回答是：当要流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血时。1991 年 8 月 19 日、20 日，莫斯科的事件显示了那些早就该明白的道理：苏联的军队不是用来镇压俄罗斯民众的可靠工具（可以想象，在某种情况下，军队可能会进攻非俄罗斯共和国，一年以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一直被这种威胁困扰着）。军队里的应征士兵被训练抵抗敌军而不是普通民众。毫无疑问，指挥官们会找尽借口不进攻白宫。令人吃惊的是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竟认为他们的命令会被执行。

很明显，如果政变领导者们坚持的话，他们可能会找到某支军队愿意执行那个很简单的军事任务。但那又会怎么样？想一下在其他城市聚集起来的民众。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辅、利沃夫和基什尼奥夫到处都是。但又有多少军队或者克格勃成员可以信任呢？有多少会加入到另一方去？如果事件发展下去，世界上其他国家又会如何对待呢？1918 年德国人曾攻到基辅，当然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内战并不是政变阴谋者们所希望的选择。当这种前景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

一个意外？

〔601〕　每当政府或者共和国感到意外时，它们就会指责说“情报不利”。然而，政治上出现意外往往不是由于情报不利，而是因为判断失误。

既然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可以合理地断定它为什么发生和怎么发生，我们可以判断出哪些是可以预测的，哪些不能预测。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夺权之前的几个月里，共产党、军队和克格勃中已有多种势力制定应急计划，对经历政治动荡的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统治”或者“总统直接治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选举产生的议会尤其令他们担忧，但他们知道，从总体上讲，民主运动对他们个人来说才是最危险的，所以必须镇压。随着共产党的失势，军队在中欧和东欧已失去资源、特权和基础。警察则面临着结束过去滥用权力、服从法律的压力。这些群体一度曾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权决定每一件事”，而现在如果他们所害怕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的话，他们就要面临失业。

最初，他们竭力劝说戈尔巴乔夫宣布总统直接治理，“中止”选举产生的机构，授权他们采用必要的高压政策，将社会引入正轨。起初，他给他们的印象是他有可能采取合作态度——这是他们从他 1990 年秋“转向右翼”得到的暗示。1991 年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塔并不是紧急状态委员会夺权的演习，而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逼迫戈尔巴乔夫使诉诸武力合法化，以便铲除立陶宛政府。

不知是因为信仰还是怕失去西方帮助，或许两者都有，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但他没有完全排除实行总统治理的可能性，只要在他看来形势需要。因此，他身边的那些亲信——克留奇科夫、巴卡金以及帕夫洛夫（一度曾担任总理）——便竭力使他相信确有这种必要。1 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屈从了他

们的愿望，他命令军队进驻莫斯科，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

同时，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每次他们来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从 1990 年夏季开始——他们都发誓将迫使戈尔巴乔夫要么授权实行铁腕统治，要么退位。每次他都能出奇制胜，一方面他暗示他们他正在认真考虑实行总统治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相信，他们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选票来免除他的职务。 1991 年 7 月，叶利钦〔602〕为戈尔巴乔夫扭转了局面。由于叶利钦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国家机关设立组织和进行活动。这样，他比总书记给共产党官员们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毫无疑问，在济贾科夫的文件中，期望采取的行动和类似的紧急计划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但地方党的书记们、下属的军事或者克格勃指挥官们不可能自己组织一场成功的政变。要阻止对共产党机构的严重威胁，需要这些关键机构的领导者的赞同，还要有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足够的帮助。

1991 年 6 月，当帕夫洛夫向最高苏维埃要求更多的权力时，阴谋集团的核心已固定了下来。但他们的计划仍然似乎是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而不是要将他一脚踢开。给他的选择是，或者自动交权，或者被监禁起来。当小集团的重要人物得知不久后戈尔巴乔夫将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签订联盟条约，而他们将因此而被免除职务时，“ 倒戈 ”意识愈来愈强烈了。

驻在莫斯科的消息灵通的各国大使馆对动荡的局势心领神会。西方政策上也相应作出反应。西方一年来一直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不让他实行总统统治。这被看作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抵御他从克格勃、军队和许多共产党书记那里感受到的压力。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谁会站在哪边，而且我们的预感总是要比戈尔巴乔夫的好些。

但我们是否知道 8 月 18—19 日晚会发生政变呢？不，当然不知道。我们不可能比阴谋家们更了解当时的情况，而他们的计划是在最后一分钟做出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足以制定出一个正确的政策来。

首先，我们知道某些重要势力决心对这个国家的主要地区实行这样或那样的军事管制，但他们的计划却受到越来越大的挫折，因为戈尔巴乔夫一直拒绝这样做。我们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导致他们孤注一掷，采用强制手段，但会采取哪种形式却难以预测。社会新的开放性使阴谋计划不可能停留在一个肯定会成功的小规模〔603〕范围内，任何一个范围广泛的重要计划总会泄露的，波波夫能于 6 月份得知他们的阴谋就证明了这一点。不与指挥官们进行高层协商，就不可能保证克格勃军队的可靠性。所以，阴谋者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最佳的机会来实行他们的计划。

在福沃斯面见戈尔巴乔夫，如果他拒绝他们的要求就囚禁他，这个想法似乎只是在 8 月 16 日星期五才形成。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准确计划只是在福沃斯遭遇后才定形。实际上，在亚纳耶夫于 8 月 18 日莫斯科时间晚上 11 点签订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文件之前，没有人可以完全肯定计划会继续实行下去。

除了知道可能有一场酝酿中的政变外，知道它是否会成功也很重要。秘密情报对形成这样的判断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的是对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透彻了解。

1991 年夏天，我们的大使馆就反复评论说，尽管逼戈尔巴乔夫退位的企图有可能成功，但一场非法的暴动却不可能成功。这也是我 1991 年 8 月 5

日在莫斯科向美国记者们竭力解释的一点。

如果说 8 月 19 日早晨白宫显得惊愕和毫无准备,那么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也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歇斯底里地惊呼戈尔巴乔夫“ 被放逐 ”，好像这已成为定局了（即使是政变领导人也只是宣称这不过是暂时的），星期二的报纸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而其截稿时间是在莫斯科灾难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几小时，此时政变瓦解的势头已初见端倪。

例如，《纽约时报》，比其他报纸登载了更为详尽的细节，它在 8 月 19 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宣称：

戈尔巴乔夫被放逐，显然是发生了政变发起者是苏联武装部队和强硬派戈尔巴乔夫被控将国家引入“ 死胡同 ”标题中有两处歪曲了事实：第一，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被“ 放逐 ”(虽然官可能是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最终目标)：第二,政变不是“ 苏联武装部队 ”的杰作——国防部长并不等于“ 武装力〔604〕量 ”。至少，一个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纽约时报》的这些歪曲——实际上，在同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小标题用了“ 戈尔巴乔夫显然已被放逐 ”这样的词句——但是大多数地区的报纸没有这样定位。第二天，8 月 20 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再一次宣称：

克格勃以及军事统治者们强化统治

但那时，很明显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统治并不像头一天人们想象得那样紧张，虽然传媒被严加控制，还是有大量消息传出来。

虽然存在着上述失误，但《纽约时报》的报道比美国的其他大多数报纸还要好一些。《圣路易斯邮报》使用“ 放逐 ”一词时不带任何限定性修饰，不仅是在 8 月 19 日，而且在 20 日至少在 4 篇不同的报道中用了这个词。它的分析家们无一例外地认为政变已经取得成功 ;其中一人甚至宣布它已经“ 把美国政府的最高愿望抛到地狱去了 ”。两天后，读到政变已被“ 挫败 ”，它的读者们一定吃惊不已。

而电视从总体上讲消息也不够灵通。8 月 19 日，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采访时说，政变不可能成功，所有的评论员都表示怀疑：他们不仅排除了形势逆转的可能性，而且暗示克格勃或者军队不能按自己希望的去控制局面的想法是愚蠢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军队，都不是坚如磐石，两者在不得不应付民众反抗时，都可能变得不可靠。

很少有观察家意识到苏联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虽然在许多时候，他们观察他们、写他们，实际上，他们往往犯政变者所犯的错误。

第二十一章

帝国的解体

我们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改变旧的权力结构。我想到了国家的官僚主义……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决定性的民主变革。

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 1991 年 8 月 26 日于苏联最高苏维埃①

今天，我比几个星期前，即失败了的叛乱之前，更信任戈尔巴乔夫。

鲍里斯 · 叶利钦 1991 年 9 月 4 日②

很难说会有多少共和国加入联盟，但我确信联盟将继续存在。

鲍里斯 · 叶利钦 1991 年 11 月 14 日③

是的，他们现在说：我们要创立一个邦联。

停顿了一下他们又补充说：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那

可能吗？

列昂尼德·克位夫丘克 1991 年 11 月 26 日④

到 1991 年 8 月 25 日傍晚——在根纳季·亚纳耶夫同意行使总统权力之后仅仅一周——他和他的所有共谋者不是进了监狱，就是丧了命，苏联共产党的活动被中止，大多数共和国开始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后尘，纷纷脱离联盟。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更糟的是，苏联中央政府处于全面的混乱之中。内阁被解散，克格勃受到了冲击，担忧着自己的命运，并被一位改革分子所领导，军事指挥受到了全面的震动。

叶利钦利用政变的机会，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以前曾属于中央或联盟权限的地方。戈尔巴乔夫不在莫斯科期间，他只能批准叶利钦所做的一切，因为这对于拯救他自己是必要的。但其结果是，政治主动现已完全由叶利钦所掌握。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由于对是否反对共产党并否认他同“ 社会主义 ”的联系犹豫不决，叶利钦的政治主动地位更趋加强。

〔606〕　如果没有叶利钦的帮助，戈尔巴乔夫就不能够挽救他的总统地位，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叶利钦的积极合作，戈尔巴乔夫此时也就不再能够维护任何类型的联盟。幸而这时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放心的是，叶利钦重申了他早些时候的声明，即他相信联盟条约将会签署并得到履行。

但是，并非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莫斯科。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将缩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选择范围。

独立热

政变策划者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实行军事戒严令，中止其立法机构，结束那里煽动独立的活动。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后，第一批举动随之而来，当时，波罗的海军区司令费奥多尔。库兹明将军宣称，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应服从他和持强硬路线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阿尔弗莱兹·卢比克斯，并宣布成立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军队和警察部队占有很多通讯设施，并占据着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其他许多战略要地，但暴力行动很少，在他们采取反对共和国政府及其立法机构的行动之前，政变就失败了。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议会和政府没有被 8 月 19 日和 20 日的力量显示所吓倒。它们立即谴责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中两个尚未明确宣布独立的国家迅速地宣告独立，爱沙尼亚于 8 月 20 日宣布独立，拉脱维亚于 8 月 21 日宣布独立。⑤当然，立陶宛早在一年前就宣告了独立，而恰好在政变发生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立陶宛订立条约，承认了它的独立。⑥当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宣告独立后，俄罗斯立即予以承认。

戈尔巴乔夫对是否批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仍感到犹豫不决，他坚持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但他批准采取步骤，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再受到苏联军队军事干预的威胁。库兹明将军被撤换，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务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公民被遣散，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克格勃的财产由选举出来的政府接管。8 月 24 日，拉脱维亚当局以参与政变罪逮捕了卢比克斯。〔607〕　9 月 6 日，新成立的苏联内阁一致通过，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尽管有许多事务留待谈判解决，包括从该地区撤出苏联军队的时间表等，但三国的分离是正式的和最终的。很多国家已经对三国的独立予以承认，在苏联承认之后，它们的独立实际上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承认。⑦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联合国的下一届大会上已成为联合

国成员国。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正式退出苏联一事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苏联第一次允许共和国行使斯大林宪法伪善地给予它们的脱离权。假如戈尔巴乔夫在1989 年就宣布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苏联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而它们能够以一种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方式脱离苏联，那么这种先例很可能会减弱其榜样作用。在那个时候，他也很可能有权谈判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保持军事基地，并保护在该地区的其他苏联利益。由于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戈尔巴乔夫被迫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一种从总体上最有损于苏联的情况下脱离：除了鼓励了其他国家之外，它还表明，中央不再有权力违背一个共和国的意志而留住它。

在一段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以及世界上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非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要求。虽然有许多共和国宣告独立，但是否所有这些宣告都代表一种取得完全独立的认真意愿，目前还不清楚。其原因，不同的共和国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宣告独立是在公众的压力下作出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宣告代表了当地共产党统治者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他们想使自己同莫斯科可能决定进行的改革隔离开来。

无论原因是什么，政变刚刚失败，各共和国的独立宣言便几乎每天出现。8 月 24 日，乌克兰宣告独立，并有待于 12 月 1 日的公民投票。8 月 25 日，白俄罗斯宣告了“ 白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8 月 27 日，摩尔多瓦议会批准了它的独立宣言。8 月 30 日，阿塞拜疆宣告独立。8 月 31 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宣告独立。格鲁吉亚早在 4 月份第比利斯大屠杀两周年纪念〔608〕 日的时候就宣布了独立，9 月 6 日它宣告，鉴于苏联没有将其独立宣告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它断绝同苏联的一切联系。塔吉克斯坦因纠缠于内部权力转移问题，直等到 9 月 9 日才宣告独立。亚美尼亚推迟了独立宣告，9 月 21 日，它进行了久已计划的公民投票。近 95%的人投票赞成独立，⑧亚美尼亚议会遂正式宣布独立。

这样，到 1991 年 9 月底，在苏联的所有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之外，其他共和国都宣告了独立。土库曼斯坦于 10 月也宣告独立。尽管如此，多数共和国仍继续参加现存的苏联各个机构的活动，并同戈尔巴乔夫就新的联盟条约进行谈判。

骚动中的共和国

流产的政变加强了那些同莫斯科的中央当局有关的所有共和国领导人的地位，同时，它所激起的冲击波改变了许多共和国的内部政治。有些共和国领导人——通常是那些反对政变的领导人——得分；其他领导人则失分。

白俄罗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杰缅捷伊⑨没有谴责 8 月 19 日和 20 日的未遂政变，8 月 21 日，恰好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前，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它。由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领导的议会温和派加入了国民阵线反对派，他们要求召开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8 月 24 日星期六，该会议召开。

杰缅捷伊出席会议，并因他在 8 月 19—22 日的行为而受到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为自己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说他的行动被曲解了，但在当天晚间，压倒多数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然而，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足法定人数，因而该投票没有法律效力。第二天，会议重新召开。

恰在此时，政治气氛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星期六的会议休会后，代表

们得知，戈尔巴乔夫已经辞去总书记职务，并且中止〔609〕了苏联共产党的活动。政变期间，党组织的活动将受到调查。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突然意识到，宣布独立是阻止莫斯科对其活动进行含有敌意调查的唯一途径。星期天重新开会，他们行使了其正常的反对权，投票选举了国民阵线，赞成独立。杰缅捷伊被迫辞职，让位于他的第一副主席舒什克维奇。⑩其后，在 9 月 18 日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们将国家更名，选举舒什克维奇为议会主席（和国家元首）。舒什克维奇是一位物理学家，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多年从事专业工作， 1989 年他 55 岁左右时才进入政界，当时他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 1992 年，他在一次谈话时告诉我，他对共产党随意处理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粗暴方式感到愤怒，这迫使他在竞选一旦成为可能时，立即进入政界。（11）

选举舒什克维奇为议会主席的那些共产党代表很可能认为，他有着温和改革者的名声，能够对继续已往的生活方式提供某种保障。如果这样，他们就看错了。虽然他举止文雅，说话温和，但他努力推进着——尽管是无效的——市场方向的改革，并在摧毁出去，后以他的家乡纳希切万为基地重新确立了其地位，纳希切万是位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阿塞拜疆飞地。

与此相反，亚美尼亚保持着国内的政治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 1990 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正领导着国家有秩序地脱离苏联，他在政变刚刚发生就表示坚决反对政变。然而，该国在运输问题上经受着长期的联合抵制,承受着从 1989 年地震灾害后重建家园和进行对阿塞拜疆的未宣布的战争的双重负担，经济上一片混乱。它的未来将继续陷于有关卡拉巴赫的冲突中。

中亚各共和国对莫斯科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反应差异最大。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都在政变刚发生时就对它加以谴责，随后，阿卡耶夫支持宣布独立。与此相反，纳扎尔巴耶夫仍对戈尔巴乔夫保持忠诚，并且实际上是为签订联盟条约，重组联盟或邦联而努力的最后一位共和国领导人。

南方的三个共和国仍处于旧的共产党机器的控制之下，它们对政变曾持欢迎或者默认的态度。政变流产后，它们宣告独立，以免被莫斯科吹来的自由主义浪潮所波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姆·卡里莫夫和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还由此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开始对抗在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反对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一直有压力，民主反对派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土库曼斯坦，民主反对派的发展微不足道，对莫斯科试图建立的更自由的标准，它从未保持一致。

从常规经济指标来看，塔吉克斯坦是各共和国中最穷的一个，〔612〕它也陷入到政治冲突之中。该国有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主反对派，他们强迫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卡哈尔·马“ 德涅斯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与此相似，在德涅斯特以西地区居住的讲土耳其语的民族加告兹人也试图建立一个自治地区，但他们只是一个较小的威胁。

8 月事件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没有引起直接的反响。高加索地区有大多的自身麻烦，不允许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转移其注意力。

当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周末试图在莫斯科接管权力时，格鲁吉亚正处于民主政治危机之中。5 月份，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选举中以压倒多数获胜，此后他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专横作风，使得其同盟中的主要成员同他

疏远。1991 年 8 月 17 日，他因强迫温和派离开其政府而引发了一场危机，他粗暴地将总理田吉兹 ·西谷阿及副总理、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解职。(13) 8 月 19 日，他继续其清洗，将格鲁吉亚国家卫队司令田吉兹 · 基脱瓦尼解职。然而，国家卫队成员的反应是转而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至于莫斯科，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还是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都失去了对格鲁吉亚局势发展的影响力。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依然支配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政治生活。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 · 穆塔利博夫可能希望在这一斗争〔611〕中得到莫斯科的更多支持，因而最初赞成政变企图，但当政变流产后，他支持宣布独立，以免自己遭到莫斯科的惩罚。他的突然转变，以及他未能按照阿塞拜疆的条件解决有关卡拉巴赫的争端，削弱了他的地位，并使他易于遭到阿塞拜疆国民阵线的攻击，1 月份，苏联军队镇压了阿塞拜疆国民阵线，但它的力量现在重新集结起来。此外，穆塔利博夫还要同海达尔 · 阿利耶夫进行竞争，阿利耶夫曾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被排挤出去，后以他的家乡纳希切万为基地重新确立了其地位，纳希切万是位于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阿塞拜疆飞地。

与此相反，亚美尼亚保持着国内的政治稳定。列翁 · 捷尔-彼得罗相于 1990 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正领导着国家有秩序地脱离苏联，他在政变刚刚发生就表示坚决反对政变。然而，该国在运输问题上经受着长期的联合抵制,承受着从 1989 年地震灾害后重建家园和进行对阿塞拜疆的未宣布的战争的双重负担，经济上一片混乱。它的未来将继续陷于有关卡拉巴赫的冲突中。

中亚各共和国对莫斯科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反应差异最大。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 · 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 · 阿卡耶夫，都在政变刚发生时就对它加以谴责，随后，阿卡耶夫支持宣布独立。与此相反，纳扎尔巴耶夫仍对戈尔巴乔夫保持忠诚，并且实际上是为签订联盟条约，重组联盟或邦联而努力的最后一位共和国领导人。

南方的三个共和国仍处于旧的共产党机器的控制之下，它们对政变曾持欢迎或者默认的态度。政变流产后，它们宣告独立，以免被莫斯科吹来的自由主义浪潮所波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姆 · 卡里莫夫和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帕尔穆拉德 · 尼亚佐夫还由此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开始对抗在改革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主反对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一直有压力，民主反对派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土库曼斯坦，民主反对派的发展微不足道，对莫斯科试图建立的更自由的标准，它从未保持一致。

从常规经济指标来看，塔吉克斯坦是各共和国中最穷的一个，〔612〕它也陷入到政治冲突之中。该国有一个持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主反对派，他们强迫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卡哈尔 · 马赫卡莫夫辞职，因为他曾支持政变。然而，他们对共产党政治机器的胜利为时很短。马赫卡莫夫的继任人卡德林金 · 阿斯洛诺夫上台后立即取缔了共产党，但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由共产党所控制的立法机构否决了禁党令，并帮助马赫卡莫夫的前任拉赫曼 · 纳比耶夫重新掌权，纳比耶夫是在 1985 年被戈尔巴乔夫撤职的。在随后进行的总统选举中，纳比耶夫取得了胜利，但是外国观察家发现了广泛作弊的证据。

结果，“ 民主派 ” 开始同两个穆斯林派反对党联合起来，国家处于内战

的边缘，由于穆斯林集团得到了阿富汗穆贾迪迪派的支持，局势更加险恶，穆贾迪迪在战胜了苏联所支持的喀布尔政权后，有多余的武器可提供给边界那边的朋友。

苏联的转变

莫斯科不愿卷入这些地方斗争，尽管叶利钦曾同纳扎尔巴耶夫一起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作短期停留，试图调解那里的冲突。首都的注意力集中在试图支撑风雨飘摇的苏联政府，稳固地扩展俄罗斯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以及为签订新的联盟条约而进行的狂热谈判等等问题上。

9 月第一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因流产政变而引起的问题，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议案，满足了参加新国务会议第一次会议的 10 个共和国领导人的要求。人们认为，这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终结。

虽然某些人认为在几周内将签订联盟条约，因为反对建立松散联盟的派别已经崩溃，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建立了一个新的苏联政府组织，它将维持到新的联盟条约或新的宪法生效。其主要机构为：国务会议，它由那些希望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总［613］统组成，苏联总统任主席；经过重组的最高苏维埃，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经济政策的跨国经济委员会。然而，企业的主要管理权将移交给各共和国，实际上，各共和国已经宣布控制位于其领土内的国家财产。

辩论极为激烈，因为多数代表并不愿意投票通过设立现存机构之外的新机构。他们最终被收买了，保证让他们享有现在的工资和特权直到 1994 年底其最初的任期届满为止。

尽管许多人认为，匆忙设计的新的国家结构只能维持很短的过渡时期，但如果在更顺利的环境下，它所包含的某些妥协折衷，本来能够使它解决在 8 月份之前拖延了联盟条约谈判的某些争论。例如，作为立法机构的上议院，拥有对下议院所通过法律的否决权，其组成成员为：每个参加联盟的共和国各出 20 名代表，再加上每个前自治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由于多数前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境内，这一规定给予俄罗斯比其他共和国更多的席位。然而，每个共和国在上议院只有一票表决权，因此，额外的代表只不过给俄罗斯提供了更大的声音，而不是更多的票数。

另一项革新是，即使那些不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也可以参加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如果签订了联盟条约，该机构能够为各独立共和国提供协调经济政策的途径。一年以前，它还会被看作对各种独立运动的一项根本让步。当时，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争辩说，独立同经济合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1991 年秋天的政治气氛改变了，以至拟议中的机构改革方案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戈尔巴乔夫还以一个新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取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他的主要顾问班子所采用的第三种形态。总统委员会存在了近一年后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取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组建，其领导人又试图夺取戈尔巴乔夫的权力。〔614〕这一次，戈尔巴乔夫不再虚假地容忍党内的保守派和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任命了一些他最信任的顾问进入国家委员会，例如瓦季姆·巴卡金、经济学家尼·彼得拉科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物理学家叶夫根尼·维利霍夫，还包括一些激进改革派，例如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长期支持叶利钦的尤里·雷若夫、圣彼得堡市

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莫斯科新闻》的编辑、刚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台负责人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还提名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进入该委员会，但他拒绝接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能够听从与此类似的委员会的劝告,他或许可以避免他所犯的某些最严重的错误。然而，这些委员会实际上只是摆设，而不是实在的机构。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组织对其成员进行咨询，而只是与个别的顾问打交道，并凭一时的兴致，接受或者拒绝其意见。在这方面，政治协商委员会并不比其前任的境况更好，从它成立时起，苏联政府中已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对事变进程施加影响了。

多数人不大注意新的政府机构，而是注意两个老的机构，克格勃和武装力量。这两个机构的首脑都曾参与未遂政变一事，使他们很容易遭到清洗，虽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武装力量）并未一致支持政变的策划者。

最初，克格勃比陆海军的组织变化更剧烈。未遂政变刚刚结束，保卫部门、总统通讯部门和阿尔法小组就脱离了克格勃的管辖，转归总统直接控制。接着，在 10 月 11 日，国务委员会决定解散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并建立三个独立的机构：边界保卫机构、外国情报机构和跨共和国内部安全机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外国情报部门的首脑，瓦季姆·巴卡金则负责在克格勃剩余人员的基础上重组新的国家安全部门。继起的跨共和国安全机构的俄文缩写是 MSB，在苏联解体之前几周才正式组建，后同俄罗斯安全部门合并。

尽管克格勃的某些高级官员因直接参与企图废黜戈尔巴乔夫〔615〕的活动而被逮捕，但其大多数雇员仍留在剩下的机构中。巴卡金坚持认为，他所领导的部门的活动是在执法机构的职责范围之内，他反对进行普遍清洗，反对开放克格勃的档案以确定谁曾经是告密者。他认为，后者将导致对无辜者的不公正的和常常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

巴卡金同各共和国进行了充分的合作，以切断中央对其领土上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控制，他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将位于各共和国领土上的克格勃财产转交给它们。他还与俄罗斯当局合作，建立了俄联邦的联邦安全局。（14）

武装力量不像克格勃那样遭到解散，但对其高层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到 10 月份，国防部各口（15）半数以上成员被更换。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曾拒绝同政变领导人合作，现在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曾拒绝进攻莫斯科叶利钦所在的白宫，现在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尽管沙波什尼科夫、格拉乔夫及其他高级军官表现出忠于宪法秩序，但是没有人怀疑，自 1990 年以来所采取的削减军队举动将加快进行。前军队领导人曾对削减军队的做法加以抵制，为了阻止或至少是延缓这种削减，他们对大规模的军官复员一事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准备。新的国防部领导将被要求处理其前任因怠工所造成的问题。

10 月初，格拉乔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他个人认为至少应削减 120 万部队人员。当时，苏联军队达 350 万人，因而这一削减约占总数的 35%，然而没有制定出任何安置军官的计划，他们在刚退役时不得不转入民用经济。即使军队不从东方及中欧撤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军队的撤回则使情况更趋恶化。从德国撤军还将持续三年时间。

即使如此，人员削减也并不是苏联军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616〕题。

由于政治变化无常，年轻人开始抵制征兵。目前还不清楚，苏联军队是否会保持在格拉乔夫所建议的减少了的部队水平上。此外，越来越多的共和国计划建立它们自己的军队，有些共和国坚持，在苏联军队中服役的该共和国公民应该回去，在其本国的独立军队中服役。鉴于苏联军队不是按单一民族特性而组织——军官和应征士兵常常被派往远离家乡的单位，并有意将所有人员混合起来，以防出现具有民族特性的军事单位——这种做法将影响各地苏联军队的效能和准备就绪的待命状态。

乌克兰的抱负对于苏联军队来说似乎特别不利。10 月 23 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以驻扎在该共和国的苏联军队为基础，建立 45 万人的乌克兰军队和 3 万人的国家卫队。

乌克兰的观点是，除非签署联盟条约，否则苏联军队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中没有存在的必要。统一的苏联军队应划分为更小的军事组织，它们可以彼此合作，或者与此相反。即使最大的一部分军队无疑将留在俄罗斯，其现有的原则和基础理论也必将改变。

俄罗斯登上舞台中心

9 月 9 日，鲍里斯·叶利钦正式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府手中取得对武装力量、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控制权——政变期间他曾就此颁布法令，并在其后不久突然休了三周假。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正在为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俄罗斯究竟是应该支持建立一个由共和国自愿参加的有意义的联盟呢，还是宣布独立，并在双边基础上处理同其他共和国的关系，或是通过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一类的有限多边组织来处理这种关系。

当叶利钦组织其权力机构时，他从三个主要方面获得人员：（1）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党机构中的前同事,例如该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尤里·波波夫，他成为叶利钦班子的头；（2）国家经济管理官僚，其中多数人来自军界一工业界联合体；（3）民〔617〕主运动的政治家，其中多数为三四十岁的人，由于其年龄和比较激进的态度，他们常常被外界称为“激进派”。（16）

最初，叶利钦让前两个方面的人控制俄罗斯政府，而让“激进派”进了顾问班子国务委员会，他们在那里不能够直接管理俄罗斯政府。那些掌管俄罗斯政府的人，包括总理伊万·西拉耶夫，赞成保留联盟，而“激进派”认为，俄罗斯最好获得完全的独立。他们感到，同其他仍由前共产党人控制的共和国建立联盟，可能妨碍俄罗斯需要进行的经济改革，而且将把俄罗斯的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耗光。一个独立的俄罗斯还将为他们提供更重要的工作。例如，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将不再居于苏联外交部长之下。

对这一团体的许多人来说，实际考虑因如下观点而产生或得到加强，他们确信，俄罗斯在建立帝国时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错误，现在必须像其他 20 世纪的宗主国那样摆脱其属地。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不能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那些反对“激进派”俄罗斯独立主张的人并不都是老人、共产党人或具有帝国思想的人。很多民主改革派，包括阿那托利·索布恰克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都力求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他们争辩说，如果俄罗斯离开联盟，特别是让出它的现有边界，它就将丧失部分领土。

哲学家亚历山大·茨普科，作为公开性的早期试验，曾在苏联新闻媒介上第一个著文直接抨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此时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反对俄罗斯任何破坏联盟的企图。他在 1991 年 10 月的《消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一个联盟，如果没有其财产，得不到对其总统和作为联盟各种制度象征的宪法的尊重，没有共同的联盟军队，它对［618］　　任何人都是毫无用处的。只要俄罗斯作为统一的要素而存在，联盟就能够存在。但是，俄罗斯使自己离开了核心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成为分裂的因素……

苏联在其现有内部边界内的解体，不仅将导致苏联帝国的死亡，而且将导致国家历史核心的瓦解。几世纪来俄罗斯人所居住的地区现在将位于新的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之外。（17）

茨普科把离心倾向归因于共和国领导人的个人政治野心。他们掌握地方政治经济权力的愿望肯定很强烈，但这并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因素。随着联盟结构的力量日趋衰微，人们开始看到，继续进行改革的唯一途径是不理睬联盟，并在共和国或地方层次上继续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要求俄罗斯进行政府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叶利钦离开莫斯科期间，俄罗斯总理伊万·西拉耶夫辞职，他因俄罗斯政府未能有效地进行改革而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在未遂政变失败后，西拉耶夫又担任了苏联临时经济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在辞去俄罗斯的职务时，西拉耶夫实际上已将其命运与联盟绑在一起。无论如何，他辞去俄罗斯总理职务一事，造成了俄罗斯政府高层的真空，“激进派”很快便利用了这一状况。

10 月中旬，当叶利钦从其度假地返回莫斯科时，政治不满情绪正在上升。8 月底的欣快气氛烟消云散，国家又陷入政治阴谋的纠纷之中。新闻媒介中充满了这样的评论，认为由制止政变所创造的机会已经因争吵和优柔寡断而丧失。共产党的活动被中止后，在很多地方，共产党的官员公开接管了地方和州的政府，使很多共和国蒙上了反改革的色彩。

灰色、阴冷的 10 月天气宣告冬天即将来临，但是经济衰败如此严重，饥荒和寒冷已经伸手可及。最终，激进改革派的声音开始引起叶利钦的注意。

10 月下旬，叶利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使俄罗斯能够据以从联盟政府和其他共和国独立出来。　10 月 28 日，他向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并要〔619〕求给予他一年的权力，以便依法实行经济改革及任命各州的领导。很多代表反对这一要求及改革计划，但是代表大会最终批准了它。它还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宪法法院，并选举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 8 月份之前，哈斯布拉托夫在几次选举中失利，没有得到多数票，但在政变后的气氛中，叶利钦的强有力支持使他当选。

11 月 4 日，苏联国务委员会的共和国领导人会议同意将国防部、外交部、铁道部、电力部及核工业部以外的苏联各部废除。

11 月 6 日，叶利钦颁布法令，任命他自己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他还任命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布利斯以前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马列主义教员，曾主持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议会主席的竞选班子，被人们认为是“激进派”的领导人。其他副主席有叶戈尔·盖达尔——他是一家经济研究所的领导，深受芝加哥学派货币金融经济理论的影响，以及曾任劳动部长的亚历山大·索辛。

每个副主席将监督若干特定部门，布尔布利斯负责监督外交、司法和新闻媒介部门，盖达尔负责监督经济部门，索辛负责监督社会福利部门。叶利钦本人则负责监督国防、安全和执法部门。这些任命使激进改革者掌管了俄罗斯联邦政府机构。他们不再仅仅是顾问，作为顾问，他们的意见很可能被忽视。但是，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即国家的关键性金融工具仍被联盟政府所控制。叶利钦迅速采取措施对此加以纠正， 11 月 15 日，他颁布了 10 项法令,宣称实际控制所有的苏联金融机构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产的石油、黄金和钻石的出口许可证。

一周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开会，接管了苏联国家银行。由俄罗斯议会控制银行，而不是让银行从属于行政部门（像苏联时期那样）或独立（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或德国联邦银行那样），在日后将激起巨大的反响。

〔620〕 为了抑制对其计划进行的改革的有组织的抵抗，叶利钦还颁布法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较早发布的中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非通过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律禁令（18））。叶利钦在 11 月 6 日这天宣布对共产党的禁令很可能并不是巧合，根据惯例，这一天应由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表讲话，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恰好在四年之前的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纪念革命节的讲话，中央委员会曾讨论其内容，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了对叶利钦的攻击，并要求把他从政治局除名。1987 年 11 月 6 日，叶利钦曾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坐在议会大厅内的椅子上，情绪激动，他完全知道大厅中充斥着他将被撵走的窃窃私语。现在，他进行了全面的复仇。共产党力图扼止他的政治生命，现在，他以自己的笔使共产党遭到了同样命运的打击。（19）

到 11 月底，联盟的政府机构已经所剩无几：一片混乱的陆海军，正在经受着肢解阵痛的安全部队，没有明确权限的法院和检察官，总统的办公室，以及刚刚更名为对外事务部的外交部。

与西方的共同事业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受到了攻击，并因给予西方，特别是美国过多的优惠而遭到更多的攻击。某些反对者甚至指责他与美国共同策划肢解苏联。

对任何尊重事实的人来说，这种指责是荒谬的。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显然是辉煌的成功。从改革一开始，其目标就是减少苏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以便把它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到内部的改革上。戈尔巴乔夫达到了这个目标，他的方法是制定一种政策，使之符合苏联和其以前西方对手的共同利益。

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当苏联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其外部环境是宽松的。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人们都愿意帮助苏联渡过它所选择的困难的过渡期，而不是利用其困难并使它更糟。

〔621〕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对于苏联的好处，在 1991 年秋季国家处于分裂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以它所理解的方式表示了善意，而不是敌意，这就为苏联人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能够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不能弥补苏联政治过程的缺陷，但是这一因素并未改变下述事实，即当苏联处于衰落的时期，当时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国际环境使它受益匪浅。

在未遂政变之后的几个月内，苏联外交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被指控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夺权时表现得“过于消极”，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不久就辞职了，并由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鲍里斯·潘金接替该职，这是对潘金的奖赏，因为他是在政变破产前公开谴责它的少数几个苏联大使之一。很多被认为曾不恰当地同情并执行政变政府命令的大使被召回，外交部裁减了大批人员。

尽管苏联外交部在这段时间内很忙——它是 9 月份一个重要的人权会议的东道主，要接待很多外宾，（20）还要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即 10 月 30 日在马德里召开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同乔治·布什担任联合主席——但是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正在转移到各共和国。若干共和国的领导人到国外旅行，并且都受到当地政府首脑的接待： 10 月份，叶利钦访问德国，纳扎尔巴耶夫访问英国。11 月，阿卡耶夫和捷尔-彼得罗相访问美国。12 月，叶利钦再次去国外旅行，这次是去意大利。与此同时，当外国政治家前往苏联时，他们通常要同叶利钦会面，并经常在某些共和国的首都略作停留：当美国国务卿贝克 9 月份访问苏联时，他去了阿拉木图和莫斯科（以及当时已独立的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10 月份，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奇·金克尔访问了基辅。这里仅仅是举一部分例子。

尽管苏联的各共和国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注意，但是外国的〔622〕外交部长们仍然更重视莫斯科。在七国集团的催促下，国际机构加快了提供援助的速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都宣布了重要的方案。然而，苏联公众并不理解，这些方案只是为了促进成功的改革措施，在任何情况下其作用都不会持续多年。

由于主张军事强硬路线的人现已不再受宠，戈尔巴乔夫迅速解决了美苏关系中的少数遗留问题：当贝克 9 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他最终与苏联达成协议，终止向阿富汗各派提供武器。戈尔巴乔夫还同意从古巴撤回剩下的苏联军队。几星期后，作为打算建立信任关系的姿态，瓦季姆·巴卡金向我的后任罗伯特·斯特劳斯提供了图表，标明克格勃在新建的美国大使馆设置窃听器的地点。当然，我们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些窃听器，但是巴卡金的姿态仍然是值得欢迎的，它表明，我们现在已能更坦率地进行相互交往。（21）

11 月中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终于被说服，回到已变更名称的苏联对外关系部就任部长，此时已是该部的最后几周了。当时，叶利钦正强迫该部削减 80%的工作人员，但削减还未进行，苏联对外关系部已经同安德烈·科济列夫领导的俄罗斯外交部合并，不久前，科济列夫还是谢瓦尔德纳泽手下的一个低级官员。

一个独立国家的联盟？

直到 1 月中旬，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退出后仍留在苏联的 12 个共和国似乎还有可能组成某种形式的国家，也许仅仅是一个过渡类型的国家。9 月初，10 个共和国（22）的领导人达成了共识。无论如何，原定于 8 月 20 日签署条约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打算改变了，戈尔巴乔夫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现在决定建立邦联制国家。政变前，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邦联是行不通的；现在，他的地位十分虚弱，〔623〕以至于认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就是他所希望的最好选择。叶利钦也指出，他现在反对关于新联盟构成的想法。他认为，对于新的联合体来说，联盟条约将建立在完全合法的基础上。

然而，并没有立即就此进行谈判。假如经济混乱状况加剧，那么国务委员会首先关注的是达成协议，以调节跨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它表明，从一开始，各共和国就决心从中央手里夺走大部分权力。

9 月份，在格里戈里 · 亚夫林斯基主持下准备了最初的协议草案，并把它提交给若干共同机构，其内容包括：建立中央银行和外贸银行，许诺促进私有财产，保持共同货币，开放边界，分担苏联的债务，协调财政政策，等等。然而，当来自各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审核该草案时，他们删除或削弱了很多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款。

例如，当乌克兰对协调联合伙伴的预算和税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时，俄罗斯代表也否决了将卢布区扩展到拟议中的经济共同体的所有正式成员的议案。各共和国还否决了建立一种具体机制以确保向苏联支付欠款的规定（即通过从出口所得的硬通货收入中征税来支付），而代之以各共和国分担应支付苏联债务的一般性义务，并将这笔钱应如何征收留给各共和国去决定。很多共和国对保护私有财产的议案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在经过一轮谈判之后这一议案被撤消，但它以后又被重新采纳。（23）

亚夫林斯基对于各共和国正在施行的外科手术感到十分悲伤，他公开表示，他不知道他“将要医治的病人”（即苏联）是否仍然活着。

尽管有这样的阻碍，8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仍然在 10 月 19 日签署了一个建立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条约。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时拒绝签署该条约，但在几周后也签署了。然而，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一直没有签署。

尽管签署条约时大肆夸耀，欢呼它是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实际上该经济条约只不过是继续进行谈判的一个保证。尽管它声称建立了一个经济共同体，但在真正的经济共同体产生之前，还需达成 24 个附加协议。某些根本问题仍悬而未决：经济共同体各机〔624〕构的地位和权力，联盟银行的章程，所有权，人员跨边界的流动以及外债机构。所有这些很可能都是有争议的。（24）

有关经济条约的经验表明，政治联盟——它是一个比经济合作更敏感的问题——如果最终能够建立，也只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 10 月末，叶利钦在未征求戈尔巴乔夫意见的情况下宣布其改革计划，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叶利钦试图摧毁苏联，但是叶利钦仍说他赞成保留联盟。实际上，在 11 月 4 日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他的讲话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他宣称，俄罗斯无意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叶利钦说这番话之前，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在报告中预言，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苏联将变成“一个彼此争战不休的公国的混合体”。（25）

叶利钦第一个对沙波什尼科夫所做的预言加以评论。他说，不管其他共和国可能干什么，俄罗斯决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军队。他以强调问题时总是那样洪亮的声音宣布：“我们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这就是俄罗斯对那些担心它可能威胁其他国家的人的回答。”接着，他借用了戈尔巴乔夫常用的语言，补充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既然我们试图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主权国家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它应该拥有一支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武装力量。”（26）

在讲话中，叶利钦不仅赞成戈尔巴乔夫对武装力量所持的立场，而且当他谈到创建一个“新国家”时，还使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一

措辞表示，联盟将是一个拥有真实权力的国际法主体，而不仅仅是个讨论和协调的联合体。

叶利钦反复无常，人们不能肯定他对自己的观点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而实际上，当国务委员会 11 月 14 日在新奥加廖沃的别墅——4 月份曾在那里达成了 9 加 1 协议——再次聚会时，叶利钦公开提出了新的联盟是否应作为一个“国家”的疑问。〔625〕 叶利钦在发言中反对创建一个“统一国家”，他的讲话得到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支持，但是使其他与会者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叶利钦更愿意把这一国家简单地称做邦联。戈尔巴乔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对此提出反对，认为尽管他们在建立邦联制国家上已取得一致，但它的结构不应是松散而杂乱无章的；戈尔巴乔夫试图恢复“联盟”一词，但叶利钦和其他人都拒绝接受它。

对于那些从事过有关学习的人来说，这些定义是模糊的，因而这种争论似乎毫无意义。但它并非如此；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要创立的联盟是否是一个拥有总统（或者是由总书记而不是总统管理官僚机构）和立法机关的国家，是否能够派出和接待大使，是否属于若干或者某个国际组织，是否是其成员的唯一依靠。戈尔巴乔夫可能感觉到脚下的土地正在崩溃，他顽强地争辩说，任何有用的联盟都必须具有国家资格的属性。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拒绝屈服，戈尔巴乔夫发出了命运攸关的挑战：

如果不准备建立任何有效的国家结构，我们何必还要总统和议会呢？如果你们作出那样的决定，我准备辞职。（27）

根据格拉乔夫的记录，叶利钦对这一声明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于是戈尔巴乔夫站起来，坚持他不对一个不定形的国家负责，然后突然转过身来，直接朝着叶利钦，间接提到了布尔布利斯和“激进派”，愤怒地发出了挑战：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想一想那些希望俄罗斯甩掉每一个人而独自前进的人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28）

叶利钦十分惊讶地转过身，咕哝着：“我并不支持过激分子。我的主张是建立一‘邦联制国家’，它已诚实地记载下来。”（29）

经过进一步讨论，该委员会达成共识，决定将新的联盟称做邦联制国家，但它没有任何宪法，而是以他们将要签署的条约及 9 月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的权利宣言为唯一基础。

会议结束前，舒什克维奇建议再次开会草签条约，以承诺在〔626〕各共和国立法机构审核该条约时对它持支持态度。人们普遍赞成在年底前签署该条约，但纳扎尔巴耶夫以半开玩笑的态度提到了 8 月 20 日：“这一次，我们不要预先规定时间了。”

与会者鱼贯而出，汇集在明亮的电视灯光和不耐烦的新闻记者面前，这些记者在另一个房间中已经等了几个小时。

戈尔巴乔夫请叶利钦第一个讲话，叶利钦宣告：“很难说将会有多少共和国参加联盟，但在今天的讨论后，我确信一定会产生一个联盟。”（30）

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哈萨克斯坦一贯赞成建立联盟，但决不是旧的那种，而是“今天确实存在的联盟，是独立与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联盟”。他又说，只有未来才能告诉人们，这个联盟究竟是“邦联制的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

舒什克维奇也认为很可能会建立一个联盟，来自中亚的三位总统同意他的判断。

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叶利钦就当天的协议做了更明确的回答，他说他

们赞同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邦联制国家，并根据签署该条约国家的授权发挥作用”。（31）

各共和国总统证实，在该文件签字之前，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同各自的立法机构进行讨论，并可能做某些小的修改。

然而，该文件本身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它在某一段指出：“主权国家联盟根据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行事，该联盟是国际法主体，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继承者。”但在后面的条款中它又宣称：“构成联盟的这些国家是国际法的充分资格主体。”换句话说，它们将拥有外交部，可以任命外交官，是国际组织的独立成员——这表明它们可以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即使它同联盟的外交政策相冲突。很难知道在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条款。

同武装力量有关的条款看来也叙述得很模糊，很可能引起争　　议。各共和国有权建立军队，但其规模和作用留待以后的“跨共〔627〕和国协议”来决定。主权国家联盟将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及对战略力量，包括核导弹力量的集中指挥”。假如多数共和国都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国防部和军队，那么显然，除了对核力量负有重大责任之外，在其他方面不会达成任何具体协议。毫无疑问，对各共和国的军队规模和归属问题将会发生进一步的争论。

戈尔巴乔夫设法保留了总统一职及由总理领导的大大压缩了的政府，联盟也将设有最高法院、仲裁法院、国家检察官，但是大部分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了各共和国，所以，上述机构所拥有的权力，比起原苏联各相应机构的权力大为缩小。少数未引起争议的权力留给了中央当局。（33）尽管留待戈尔巴乔夫去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但他仍尽可能从各共和国的领导人那里去打听消息。

戈尔巴乔夫计划，当国务委员会 11 月 25 日在新奥加廖沃再次聚会草签条约时，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他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安排了很多新闻记者和电视记者在身边，以便记载和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

然而，这一会议并未像他所期望得那样进行。

戈尔巴乔夫刚刚召开会议，叶利钦就宣布，他不能在那天草签该文件，因为他在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进行磋商后，感到不能根据该文件的现有形式批准它。他又说，俄罗斯的议员们不喜欢统一国家的想法，他们甚至也不接受一个邦联制的国家。因此，他建议使用“民主国家邦联”的措辞。

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指责叶利钦从其早期立场上后退，但是舒什克维奇支持叶利钦。尽管正是他提议在这次会议上草签条约的，但他现在争辩说，既然他的议会中的有关委员会尚未完成对条约文本的审议工作，因而草签工作不妨推迟进行。使所有人都感到很惊讶的是，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也表示同意推迟草签。〔628〕　争论趋于白热化，在争论中，叶利钦又说，在乌克兰的选举之前草签条约是不明智的，因为那可能使乌克兰人对联盟更持否定态度。戈尔巴乔夫反驳说，与此正相反，重要的是向乌克兰表明无论怎样都要建立联盟。他争辩说，如果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计划，那么乌克兰除了参加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舒什克维奇试图使戈尔巴乔夫确信,他们很可能准备在 10 天之内草签该条约，他不必对此感到焦虑，但戈尔巴乔夫知道，推迟很可能是致命的。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看来是别有用心。

最后，戈尔巴乔夫恼怒地告诉那伙人，他们不再需要一位总统了，他站

起来，像以前对待不顺从的共产党下属那样，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们。格拉乔夫引述了他的话：“ 我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当你们建立一个贫民窟、而不是统一的国家时，你们将使人民遭受苦难。事实上，我们正在谎言中窒息！……如果你们拒绝邦联国家的想法，那么你们干吧，我走！”（34）

他说完便昂首阔步走出房间，后面跟着他的所有随行人员。

与会者对戈尔巴乔夫的退场有不同的解释。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诸如巴卡金，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拉乔夫等人认为，尽管他很生气，但他宣布了休会，因为他想给那些共和国总统们一个机会，趁他不在场时整理一下他们的想法。格拉乔夫解释说，当戈尔巴乔夫在那次会议那一时刻说“ 你们现在不需要总统 ”时，他心里就是那么想的。当请他去总结讨论时，他是希望回去的。戈尔巴乔夫的盟友还认为，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一定事先策划好了他们的行动；依靠提出编造的问题，他们设法使谈判中断，以便为其后来的行动找到正当的理由。（35）

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的说法则不同。他们声称，戈尔巴乔夫的暴怒使他们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认为，尽管谈判延长了时间，但它毕竟正在取得进展。舒什克维奇一年后告诉我，他和叶利钦感到，他们正在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他们在同各自国家的议会磋商的基础上总是能够达成协议——但是戈尔巴乔夫只能听得进〔629〕他愿意听的话，并总是藏着一份有条件的协议，好像那就是最后协议。他说，他和叶利钦都表示要拟订出一份乌克兰能够接受的协议，但戈尔巴乔夫总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他们的关心，并提出乌克兰所不能接受的协议。结果，当 11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退出会议时，他们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该有个了结了。戈尔巴乔夫离开房间后，他们决定不久在白俄罗斯召开会议，并邀请克拉夫丘克参加。（36）

当戈尔巴乔夫在楼上的书房里等待时，各共和国的总统们讨论了该做些什么。新闻媒介的代表们正在等候着，他们仍希望能够亲眼目睹草签条约的情况。各共和国的总统们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该条约应提交各共和国立法机构批准，并在年底前签字并通过。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被委派将这个坏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

当他们走进楼上戈尔巴乔夫的书房时，叶利钦开玩笑地说，他们是被派来向“ 沙皇磕头 ”的，戈尔巴乔夫则把称他做“ 沙皇鲍里斯 ”进行回击。两人的话都很尖刻，叶利钦想让人们注意戈尔巴乔夫的帝王作派，而戈尔巴乔夫所说的“ 沙皇鲍里斯 ”则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俄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沙皇鲍里斯，但许多人认为他篡夺了皇位，他的下场很悲惨。（37）

不过，戈尔巴乔夫似乎很欢迎叶利钦帮助他打破僵局，他们一起下楼，重新开会，迅速同意了各共和国总统拟定的公报。但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拒绝一起会见新闻记者，就像他们在以前的会议上所做的那样。这一次，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单独面对照相机和速记员的笔记簿。

戈尔巴乔夫并未试图掩盖他的不满，他说，各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了从联盟条约后退的步骤。

这是一个巨大的后退步骤。自此，国务委员会再未开过会。

第二十二章
致命的打击

俄罗斯决不会带头使苏联解体。

鲍里斯·叶利钦 1991 年 10 月 18 日①

苏联的三个创始共和国已终止了自发的解体进程……我们找到了在新的条件下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行途径——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实体的存在即将结束。

鲍里斯·叶利钦 1991 年 12 月 12 日②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背着总统，决定不理睬联盟条约……我们本来可以找到打破同乌克兰谈判僵局的办法——例如，建立一种伙伴成员的关系。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的形势。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1 年 12 月 12 日③

尽管在 11 月 25 日已经宣布，将把联盟草案送交各共和国议会审议，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托词，以避免不得不宣布会议因陷入僵局而结束。戈尔巴乔夫急于尽快了结此事，他仍然不赞成这种解决办法，因为那将剥夺中央所拥有的真正权力，并使他失去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共和国的领导者们——特别是叶利钦——并没有如此急切；他们在确切了解乌克兰的做法之前，很难确定哪种联合是适宜的。

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构成中，如果有一个特别大的单元和若干小得多的单元，那么一定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比现有的那些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的问题要大得多。罗得岛同阿拉斯加的面积相差甚远，阿拉斯加同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也相差悬殊，但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差别比起来，这些差异便相形见绌了。俄罗斯毕〔631〕竟占整个苏联领土的 3/4 以上及其一半人口。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只有一个州，而所有东部各州保持其现有的边界，那么就很难使联邦制顺利运转。而苏联的情况比之更甚：在那里，大多数共和国里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曾长期对其他国家实行帝国统治。

在某些人看来，努力创建一个单一国家就等于让一条巨大的鲨鱼、一对金枪鱼和半打小鲤鱼在一起游泳。不管这个单一国家以何种方式构成，不管那条大鲨鱼可能提供多少保证，其他人都只能感到心惊胆战。

只要马克兰还是联盟版图的一部分，建立联盟看来就更为可行。乌克兰的人口为俄罗斯的 1/3，它有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同其他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中，它能提供反对俄罗斯控制的坚实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乌克兰的参加，任何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的联合都不能同俄罗斯的规模和权力相抗衡。

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一个缺少了乌克兰的联盟必然缺少号召力。不管是对还是错，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资源正从俄罗斯流向中亚各共和国，并以较小的规模流向白俄罗斯。人们认为，同那些共和国结成的联盟将是一个俄罗斯资源的输送管，这是不能允许的，很多人反对它。

乌克兰做出了选择

乌克兰已决定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就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一事举行全民公决；后来又决定在同一天举行乌克兰第一任总统的选举。直到 8 月的未遂政变之前，在乌克兰，除了西部几个州外，支持独立的乌克兰人不占压倒多数。当我在春天访问基辅时，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全民公决将会反对独立，而选择尊重乌克兰主权的联盟条约。大多数人在 3 月份毕竟还是投票赞成保留联盟的。

然而，在春末和夏季，主张完全独立的情绪迅速膨胀。正在〔632〕恶化的经济状况，加之莫斯科不肯放弃对经济的控制，不能执行一项前后一致的经济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感到，避免经济崩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离联盟。到了 8 月 1 日，当我陪同布什总统访问基辅时，高级官员——并不是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赞成独立——告诉我，他们认为，很快将会就独立问题举行投票。

莫斯科的未遂政变加速了这一进程。乌克兰共产党曾大力支持维护联盟，但它在政变流产后瓦解了并遭到禁止。大多数人，包括讲俄语的人，都不愿意把他们的未来同莫斯科政治稳定的机会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足一打的一伙官员们试图控制整个苏联，那么唯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脱离苏联。

1991 年 12 月 1 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投票和总统选举，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独立并选举了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然而，选票的比例和分布却使观察家感到很惊讶。84%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0%以上的人投票赞成独立。即使在居住着众多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东部各州、克里米亚和敖德萨市，大多数人也投票赞成独立。

克拉夫丘克的胜利就不是如此一边倒了，他在全部七位候选人中得到了近 62%的选票。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是位曾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得到了 23%的选票，占第二位，其中多数来自他的故乡乌克兰西部地区。

俄罗斯联邦在 1991 年 12 月 3 日得知了乌克兰公民投票的结果后，立即正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波罗的海三国、东欧各国和加拿大（那里的人口中有很多乌克兰人后裔）也迅速予以承认，但是俄罗斯政府的承认是最重要的。三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第一次不再坚持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罗斯的承认并非没有政治代价。许多俄罗斯人情绪激动，不想接受乌克兰从俄罗斯分离出去一事，叶利钦因此而受到指责，说〔633〕他背叛了居住在乌克兰的 1000 万俄罗斯族人——尽管那里的大多数俄罗斯人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

在乌克兰 8 月份宣布独立之后仅仅几天，我同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 科济列夫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们两人都参加了布达佩斯的会议，在吃饭时他把我拉到一边，表示了对乌克兰独立的关注。“这是很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他说，“我们该如何对待？”

我告诉他，我认为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乌克兰人民投票赞成独立，那么俄罗斯或者承认它，或者陷入一场不可能取胜的长期政治斗争，并因此而大伤元气。“如果那是他们的决定，”我指出，并加强了语气，“尽量对他们宽厚些。不要像戈尔巴乔夫对待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样对待他们。你们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合作，而只有当俄罗斯真正接受乌克兰独立时，这一合作才有可能。”

然而，因形势需要，俄罗斯所做的远不止一般的宽宏大量。它也同叶利钦一直遵循、或至少从 11 月中旬以来一直遵循的政治斗争计划相吻合：以乌克兰拒绝参加联盟为借口，放弃不倡导联盟解体的长期承诺。现在，他可以争辩说，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乐于发挥其作用。 12 月 15 日，乌克兰立法机构通过法令，退出导致建立苏联的 1922 年条约，第二天又投票决定不签署任何联盟条约，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受到这些行动和他本人选举获胜的鼓舞，克拉夫丘克接受了舒什克维奇

和叶利钦的邀请，准备在第二周周末与他们在白俄罗斯会晤。离开基辅前，克拉夫丘克明确阐述了他对联盟条约草案的态度，他指出，乌克兰将“与共和国联盟建立政治联系”，但它决不参加任何具有中央统治机构的联盟。④这当然意味着乌克兰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能够接受的任何联盟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联盟指的是戈尔巴乔夫在 11 月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一再提到的那种含义。

狩猎小屋的会议

在布列斯特以北几英里的地方，沿着白俄罗斯同波兰的边界，有一片禁猎的森林，它是残存的欧洲野牛后代的栖息地。在俄语中它称做“白俄伏茨基森林”或“野牛森林”。尼基塔·赫鲁晓夫喜欢在这里打猎（他的目标很可能是动物而不是受保护的野牛），在他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时，禁猎区里建起了一座精美的狩猎小屋。自那时起，这里就常常由白俄罗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们使用。

鉴于那里偏僻、质朴和舒适，舒什克维奇认为，在 11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退出国务委员会会议后，它是同叶利钦举行所商议过的会议的理想地点。但为了使会议能够不受打扰地秘密举行，事先宣布的会议地点是明斯克。

尽管会议秘密举行，但三位领导人将会晤一事并不是秘密。一周前，新闻界已经报道，叶利钦将前往明斯克同舒什克维奇会晤，克拉夫丘克很可能也参加。最初，记者们认为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协调经济政策，俄罗斯宣布将于 12 月 16 日放开许多商品的零售价格一事，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遇到了很大麻烦。⑤然而到 12 月 7 日星期六早晨，情况清楚了：三位领导人将就联盟的前途进行讨论。当天《消息报》的通栏大字标题是：《在明斯克会议前，他们缔结三国同盟了吗？》。⑥叶利钦通报了他在离开莫斯科前往白俄罗斯之前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他们两人都认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乌克兰的联盟。显然，他们都还不知道克拉夫丘克那天所说的话，因为戈尔巴乔夫仍然认为，乌克兰最终将签署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的话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欺欺人，他说，乌克兰投票赞成独立一事，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以便在未来的联盟中确立同其他共和国的平等基础。“我确信，”他继续说，“在今天的乌克兰，人民所考虑的是联盟，正像在我们宽广的国土上其他地方的人民所想的一样。”⑦〔635〕　12 月 7 日星期六，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及其若干助手在明斯克一下飞机，就被送到野牛森林。每位领导人由该共和国总理——俄罗斯则由新任命的第一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及少量其他助手陪同。那所狩猎小屋不能接纳大的代表团。会议也没有邀请任何新闻记者。

三位领导人都否认事先知道该会议将会产生的结果。⑧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说，他们不能肯定，克拉夫丘克能否被说服接受任何类型的联合，因为乌克兰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独立，克拉夫丘克在总统就职的典礼上还发表了那种讲话。至关紧要的是弄清楚它们同乌克兰的边界是否仍然开放，这对白俄罗斯来说尤为重要。乌克兰不参加联盟，边界开放就不再能从联盟条约中得到保证；只有同独立的乌克兰缔结单独协议才能达到这一点。

自从 1990 年秋季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对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联邦进行了自由的讨论，这也是各共和国之间的协商内容。两国那些反对联盟条约的政治家认为，该条约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乌克兰或俄罗斯的主权，因而他们制定了联邦协议草案。在俄罗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他的助手们也试图起

草松散的协议，以便为俄罗斯找到借口，吞并苏联各机构，成为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当布尔布利斯随叶利钦参加狩猎小屋的会议时，他带来了这些草案。

叶利钦后来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最初，他问克拉夫丘克，是否能够对正在同戈尔巴乔夫谈判的联盟条约做某些修改，以便使乌克兰能够接受。当克拉夫丘克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时，他们转而讨论如何起草乌克兰可以接受的协议。它意味着，联盟不能是一个国家或国际法的“主体”，不能具有任何可能限制其成员主权的政府属性。

工作人员整晚工作，当他们准备好星期天上午签字的文件时，三位主要领导人与纳扎尔巴耶夫取得了联系，邀请他前来参加会议，纳扎尔巴耶夫当时刚刚飞抵莫斯科，一个多小时后可能飞往布列斯特。最初，他答应来，但在同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后他又变卦了。他后来说，他感到不再能够对谈判施加影响，而且不想被人们看作是同谋。

〔636〕　然而，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并未得知纳扎尔巴耶夫不来开会的消息。他们让人为签字仪式准备了一张大桌子，邀请了新闻记者，并去机场等候纳扎尔巴耶夫。虽然纳扎尔巴耶夫没有来，他们仍按原定计划，签署了联合声明及建立独联体的协议。尽管某些评论家认为它是一个“斯拉夫联合体”，但它显然不是。联合声明规定，它向所有前苏联成员国以及其他“承担协议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开放。⑨作为会议的东道主，舒什克维奇被委派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并将所发生的事情通知他。叶利钦自愿给布什总统打电话，并第一个接通了电话。舒什克维奇后来对我说，那样做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他说，他并不想通过公开的电话线路把这个消息告诉戈尔巴乔夫，而在狩猎小屋中也没有保密的政府电话，所以直到返回明斯克后，他才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不管这样做是否事先计划好的（很多人认为，舒什克维奇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在政府小屋中一般要安装保密的电话设施），可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得知首先通知了布什时，他感觉受到了伤害。
舒什克维奇告诉我，当他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后，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我怎么办？”⑩是“联合体”，不是国家

在野牛森林小屋中建立的联合体下设任何总统、总理或总书记。实际上，该协议没有规定任何永久性机构，而只决定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成立一个“协调机构”。（11）

协议只规定了一般原则或协调义务，联合体本身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威，而只有其成员的共同意愿。如果其成员决定不再承担它们以前曾承担的义务，不得强迫它们。独联体也无权征税。

然而，某些承诺是重要的。其中最具体的一项是“保留和维〔637〕持对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及核武器的统一指挥”。但对如何做到这一点尚未拟订出有效的办法。

还有一项承诺也很重要，即“承认和尊重联合体内各国的领土完整及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因为直到八九月份，某些俄罗斯发言人还声称有必要修改边界，把那些居住着讲俄语人口的地区并入俄罗斯。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的州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北部地区就是与此有关的敏感地区，因而这一条款是俄罗斯领导人为了让其他共和国加入联合体而向它们付出的代价。尽管今后若干年这一条款在俄罗斯仍要引起争议，但既然它主张放弃几个世纪来俄罗斯一直宣称拥有的领土，它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保护人权的承诺也是值得注意的，该协议借用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9 月宣言的话，指出在保护人权方面要“ 根据公认的国际准则 ”。尽管它无法由独联体来加以实行，但它承认国际标准适用于国内法律，提供了一种据以判断各成员国人权状况的衡量尺度。然而，独联体协议中的人权条款远不如苏联人代会的宣言那么明确。

协议还指出，其成员国将“ 保证履行前苏联所签订的那些条约和协议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但其措辞指的是一个一个成员国去承担这些义务，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独联体，各成员国将决定它们自己应承担哪些义务。因此，与各国在独立宣言中所承担的义务相比，该协议没有增加多少承诺。

协议的其他条款看来大多是值得称赞的抱负，而不是义务：各党派将就外交政策、经济战略、运输和通讯、环境保护、移民政策和防止犯罪等问题进行合作。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任何一国只需提前 12 个月通知其他成员国，便可以退出独联体。〔638〕　　　　位总理也签署了一个简明的经济合作协议，承诺进行协调与合作，但这些承诺很空洞，缺乏协调机制，事实上不能保证各种政策的协调一致。

例如，政府领导人同意“ 实行同步的根本性经济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改变财产所有关系，保护自由企业制度 ”，但在协议中并没有提到叶利钦已经宣布而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拒绝进行的那些改革。

同样，独联体准备缔结一个“ 银行间协定 ”，以控制货币发行，确定预算赤字的上限，但这一承诺也缺少一个一致同意的政策准则。

总之，在野牛森林举行的会议对很多问题都未做决定，而决定了的事情则较少。不管独联体实际上达成了什么协议，它都有赖于今后的谈判。由于没有任何强制机制，这些协议不能保证履行任何承诺。然而，该协议有一点是明确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不复存在。签署该协议的三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这一点，而且也只能保证这一点。

无益的抵抗

叶利钦受其两位同僚的委托,在 12 月 9 日返回莫斯科后向戈尔巴乔夫解释了该协议。他还在有纳扎尔巴耶夫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解释。与此同时，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安德烈·科济列夫在一次国际性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有关独联体协议的问题。他们争辩说，该协议是“ 拯救苏联仍能被拯救事物的唯一途径 ”，因而并不是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恰恰相反，它阻止了在其领土上的政府机构的进一步瓦解。（12）

人们本来并不指望戈尔巴乔夫接受这一解释，但他最初的公。〔639〕开评论与他私下的反应相反，他并没有对此加以否定。在 12 月 9 日星期一晚间的新闻广播之后，他来到莫斯科电视台发表讲话，他指出，该协议有积极的方面，但它宣称苏联不复存在一事是不合适的。他承认，每个共和国都绝对有权利退出联盟，但他认为，“ 一个由众多共和国组成的国家的命运，不能由三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意志来决定 ”。他建议，独联体协议和联盟条约草案应由各共和国议会及苏联最高苏维埃进行讨论，或许应该举行全民投票。（13）

无论如何，纳扎尔巴耶夫的反应更为重要。在共和国领导人中，他是联盟条约的主要拥护者，并始终反对取消新联盟的国家地位属性。他也是最后一位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担任政治领袖的人，他将就独联体一事挑起争论吗？

他最初提出了慎重的批评，那是在同一个星期一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的，他指出，他事先对斯拉夫领导人达成那样一个协议一无所知，他认为应该由所有共和国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进行讨论。他并未完全封死哈萨克斯坦参加独联体的大门，而是清楚地表明，他仍然赞成联盟条约，并相信独联体协议不过是三个缔约国的一项建议，可以同联盟条约一道讨论。（14）

还有许多人也反对独联体协议，其中不仅有顽固守旧的帝国主义分子，例如工会成员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前共产党机关组织成员，也有受人尊敬的民主主义者，诸如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民主党人尼古拉·特拉夫金以及民主改革运动的多数领导人。然而，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苏维埃很快批准了独联体协议，三国政府命令其代表不得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这就使上述机构的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使反对独联体的人失去了法律依据。纳扎尔巴耶夫立即认识到他于 12 月 9 日在莫斯科所提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他开始鼓励中亚各共和国接受独联体协议，唯一的条件是作为其创始成员。哈萨克斯坦议会最终于 12 月 16 日宣布独立，以便在最后谈判中与其他共和国享有同等地位。

《消息报》每天以大字标题介绍有关情况：

〔640〕　　12 月 11 日：

独联体协议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批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军事问题寻求共识：俄罗斯总统保证军事与社会安全

12 月 12 日：

支持独联体发展的人：俄罗斯议会批准独联体协议

中亚各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打算支持独联体

白俄罗斯代表团脱离联盟议会

12 月 13 日：

阿什哈巴德会议的参加者准备成为独联体成员，但需享有平等权利

联盟议会从对抗退缩

华盛顿承认苏联已不复存在

12 月 14 日：

阿什哈巴德会议的结果使国家和世界松了一口气

武装部队服从最高统帅和国防部长

12 月 16 日：

詹姆斯·贝克开始从苏联到独联体的旅行

民族自决斗争可能威胁俄罗斯的完整

12 月 17 日：

俄罗斯议会宣布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财产所有权

12 月 18 日：

俄罗斯议会接管克里姆林宫苏联议会成为历史

12 月 19 日：

通向独联体之路：明斯克—阿什哈巴德—阿拉木图

未能达到法定人数：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了不可避免的死亡

五个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斯坦的议会批准

苏联历史在哈萨克斯坦结束

11 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独联体宣言

国家领导人把武装部队指挥权交给沙波什尼科夫，直至军事改革进程确定

1991 年 12 月 21 日，所有前苏联共和国——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签署了加入独联体宣言。

11 月和 12 月，除了军事基地和军队之外，俄罗斯有条不紊地接管了在其境内的苏联机构，其他共和国也对其领土上的苏联机构如法炮制。到 12 月 23 日星期一，尚未决定的唯一一件重要事情是：戈尔巴乔夫何时辞职。

它合法吗？

不久，戈尔巴乔夫在评论独联体协议时就不再保持最初的节制态度了。显然，他既不能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进行辩论，也不能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更不用说举行公民投票了，他变得越来越爱骂人。他开始把野牛森林会议称做非法政变，就像紧急状态委员会在 8 月份的所作所为。他认为，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失败而后者成功。

〔642〕 政治家和法律专家仍在就那一问题进行辩论，而历史学家无疑将在未来几代人中继续争论。那些为苏联的终结感到哀痛的人，自然倾向于把虚弱的独联体看作阴谋的非法产物，而那些不希望对共和国主权施加任何实际限制的人，将认为一切都是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

不管宪法法律专家做出何种裁决，它显然都不同于 8 月政变的性质，当时政变的组织者发布了欺骗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在生病，制造了合法的假相，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都有清楚的病历。他们都是各自共和国的首脑，是经符合宪法的程序由各自的共和国所选出，其中两人是经公民投票选举的。这三个共和国都宣称自己是主权国家，其中两国是完全独立。它们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创始国，（15）苏联宪法规定各成员国有权退出，联盟条约的创始国因而也有权终止它，特别是当条约中保留了共和国主权的原则时。

某些人确实承认这种权利。各共和国可能的确拥有退出苏联的固有权利，但是，那些参加野牛森林会议的领导人并未被授权作出这一决定。毕竟，这三个共和国的公民在 3 月份的公民投票中赞成保留联盟。

然而，3 月份的公民投票被认为过于混乱，难以产生合法的结果。就乌克兰的情况来看，后来占压倒多数的人投票赞成在法律的基础上完全独立的主张，议会也禁止当时的乌克兰政府同联盟条约保持联系。而在白俄罗斯，议会的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宣布独立。在俄罗斯，叶利钦的授权不太明确，但是，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一样，他后来也使独联体协议得到了俄罗斯议会的批准。多数俄罗斯公民可能更愿意有一个包括乌克兰的联盟，而不愿意独立，但如果没有乌克兰，多数人可能就不会支持联盟了。

然而，无论对导致苏联终结的秘密会议怎样辩护，独联体的创立者们显然并不在意是否符合苏维埃的法律程序。野牛森林会议的秘密状态，在苏联解体这一问题上没有在各个共和国进行全〔643〕民投票，拒绝就联盟条约和独联体协议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论，图谋阻止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为结束自身存在和废除苏联宪法而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这一切为攻击 1991 年 12 月 8 日达成的协议的合法性提供了批评弹药。

苏联议会最后一位发言人康斯坦丁·留本琴科最初认为独联体协议是非法的，他在 1992 年 3 月告诉我，他相信，如果各共和国总统提出直接的要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本来能够以无可指责的合法方式终止苏联的存在。代表们已经认识到，面对来自各共和国的反对，无论如何遗憾，他们已不能继续行使职责了，他们应该同意这种要求。作为专业法律教授，留本琴科认识到，被迫解散苏联国家结构的悲剧逐渐损害着人们对法律准则的尊敬，这一问题仍然是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薄弱环节。此外，他认为它也为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合法性蒙上了污点，并为不满现状的人以违犯宪法的方式进行活动提供了论据和鼓励。（16）

俄罗斯独自去干

先不谈合法性——因为，关于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结束苏联时使用的方法是否恰当，永远也不会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支持独联体设想的人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说，实际情况使得共和国的领导人除这样做之外已别无选择。

苏联立法机构和苏联政府的表现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制定一个有效的改革方针。但只要联盟机构存在，它们就会反对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改革努力。与此同时，经济不再仅仅是下降；而是开始走向崩溃。如果俄罗斯还想在外表上维持其改革政策的连贯性，它就不得不解决联盟机构。否则，管辖权限问题将会产生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且苏联的官僚政治将会阻挡任何真正的变革。此外，九十〔644〕月间进行的有关经济共同体的谈判已经显示出，除俄罗斯外，各共和国政府都反对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联盟政府将向它们提供各种手段，使它们能够据以改变甚至摧垮俄罗斯的努力。

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及其当时领导的“激进派”的这种论点很有道理。即使在 11 月签署了联盟条约,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它是否能坚持六个月，也是值得怀疑的，与独联体相比，它同床异梦更多，合作的义务更少，很可能因此而崩溃。

如果新的俄罗斯政府能够在俄罗斯贯彻一个有效的改革计划，在许多人看来，它就进一步证实终结苏联的确是合理的步骤。然而，如果俄罗斯的改革努力证明更具有破坏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那么，旧有的不满将会充斥于新的生活之中。

尽管叶利钦设法成功地使苏联不复存在，但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也开始表现出分歧，它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由叶利钦于 11 月任命的俄罗斯政府支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反对改革计划的人，反对派表现得意外强大。叶利钦最终得到了他一年来一直追求的依法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如果他的政府方案不能迅速产生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摩擦。

12 月初，正当叶利钦准备前往野牛森林时，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宣布，他反对叶利钦刚刚任命和正式领导的俄罗斯政府，他在 8 月曾坚定地站在叶利钦和俄罗斯白宫保卫者一边。他嘲笑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和沙赫赖是缺乏经验的“理论家”，他们的政策将产生无法预见的并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他特别谴责了放开零售价格的决定，该决定最初预定于 12 月 16 日实施，后来延期到 1992 年 1 月 2 日。

鲁茨科伊的口头攻击很猛烈，但当人们问他是否打算辞职时，他说他决定留在政府中，同那些他认为对俄罗斯有害的政策进行〔645〕斗争。小道消息猜测，如果发生反对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的政变，一定是由鲁茨科伊所领

导。（17）

因此，俄罗斯即将获得独立，摆脱陷入自身政治危机的苏联政权。该政权仍在根据旧的苏联宪法运转，然而，这一宪法最初制定时的情况与现在相比已经是南辕北辙了。当然，该宪法已经做了 100 次左右的修改，但结果只产生了一个充满矛盾和解释模棱两可的大杂烩，把每次政治性争论都引入到宪法斗争中。

1991 年秋季，当政变后的震荡使得有可能就俄罗斯新宪法迅速达成协议时，叶利钦决定不去起草新宪法并为之而努力。他把精力用于摧毁联盟政府。尽管他达到了这一目标，但他所继承的是一个充满政治陷阱的国家。今后如果政治改革失败，就再也不能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了。

最后一幕

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命运，他保持着尊严，但并非没有抱怨。实际上，直到他辞职，他每天都发表讲话，举行会谈，就废除联盟国家后可能出现的危险提出警告。他预料将出现民族冲突、经济混乱、俄罗斯及其他共和国将瓦解，并很可能出现内战。

几乎没有什么人听他的，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是不了解，就是不在意。即使当他辞职一事已经确定无疑时，他仍然对共和国总统们高谈阔论。然而，除了偶尔会见叶利钦之外，他的高谈阔论已经没有什么重要对象了：他会见新闻记者，传播塔斯社发布的消息，对访问团体发表讲话。各共和国的总统们明确拒绝邀请他参与他们的聚会。

12 月 17 日，我参加了由伊利 · 威斯尔和维塔利 · 科罗季奇所组织的讨论民族仇恨的莫斯科会议，并和其他代表一起拜访了戈尔巴乔夫。当他一个一个地欢迎我们时，他称我为“ 大使先生 ”，并补充说，“ 我们有一个习惯，一个人一旦当过大使，就永远是大使 ”。

“ 我们也有同样的习惯， ”我说，“ 只不过它是‘ 一个人一旦当过总统，就永远是总统 ’。 ”

他平静下来，显然对他的命运感到无可奈何，他告诉我们，他〔646〕还没有确定辞职的日期。他想先了解预定于 12 月 21 日在阿拉木图召开的共和国领导人会议的情况。他显然希望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但他看来已认识到他不可能受到邀请，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要给他们发去贺信。

在同我们的会晤中，戈尔巴乔夫首先详细地谈到了他写的书在国外受到的欢迎。他知道该书印行了数百万册，并对它仍在带来的巨大版税感到自豪。不是因为他个人得到了那些钱，他赶紧补充，因为他已将这笔钱全部捐给了慈善组织，而是围为他乐于看到人们对他的书感兴趣，并注意他的意见。当他反复考虑他暗淡的政治前途时，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他显然是重要的安慰。

他在发给阿拉木图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若干适度和有潜在价值的建议，它们包括：必须加强保护人权、拥有共同的国籍、由中央保持对核武器的控制，在结尾，他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式宣布苏联的终结，他对其建议的解释如下：

我们应该庄严地并以合法的标准开始国家历史的新时

代。我们的人民之所以遭受历史性灾难，原因之一在于严重地缺乏连续性、毁灭性的革命以及施之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一个民主政治结构中做事，既需要民主的前提条件，也需要民主的经验。（18）

就阿拉木图会议来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在白俄罗斯签署的独联体协议的主要精神没有改变。

有关戈尔巴乔夫个人前途的谈判是他所进行的唯一有实际意义的谈判。他在私下就此与叶利钦进行了谈判，会谈延续了 10 余小时。叶利钦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要价太高，但某些西方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得到的待遇与一位国家元首并不相称。戈尔巴乔夫可以支配一幢楼房用作公共事务基金会，它曾是某个共产党机构的所〔647〕在地。这是一个重要的先例：因为，俄罗斯第一次允许一位领导人在退休后继续参与公共事务。

尽管叶利钦曾同意，苏联将在 1991 年 12 月 31 日午夜正式终结，戈尔巴乔夫将在 1 月中旬辞职，但他后来很不耐烦，催促早些移交权力。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在他经常举行重要会议的房间对着电视摄像机发表了辞职演说。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命令把发射核武器所需要的密码移交给叶利钦派来的沙波什尼科夫将军。

第二天，当戈尔巴乔夫去办公室参加预定同外国来访者的会见时，他停在半路，并说，叶利钦的工作人员已经占用了那些办公室，此时，俄罗斯的三色旗正飘扬在克里姆林宫议会大厦的圆顶上，那里设有俄罗斯总统的办公室。

第二十三章
对某些答案的思考

所发生的一切当然自有它发生的道理，但这决不意味所有其他联合是不可能的……

亚历山大·赫尔岑 1851 年①

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2 年 3 月②

在 1991 年，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帝国和旧的权力，而我代表俄罗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一个崭新的、在当时还不存在的国家。……失去帝国形象，苏联就不能存在。如果没有暴力形象，帝国形象也就不能维持。

鲍里斯·叶利钦 1994 年③

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导致了世界上三个深刻的变化：结束了冷战，结束了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统治，结束了苏联本身。这三个事件在时间和逻辑上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

由列宁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注定要灭亡，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的基础上。只有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隔离的警察国家才能让这种类型的政府存在几十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了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明显依据，正像它为共产主义政权提供了内部和外部敌人。非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成分的存在威胁着苏联的统治制度。

因此，只要主要大国不处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第二次世〔649〕界大战后的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

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

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相反，苏联的国家则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尽管它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但它在形式上却是主权共和国的自愿联邦。戈尔巴乔夫对此进行了挑战，他要使之名实相符，把帝国国家转变为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基础上的国家。当这一努力失败时，这个国家本身也就解体了。

当戈尔巴乔夫 1985 年掌权时，苏联的经济正面临危机，虽然其政治制度看来还非常稳固。感觉敏锐的观察家们自信地预测，苏联经济将不能同蓬勃发展的世界经济进行竞争，由于它排斥根本改革，它将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必将加剧，并伴有潜在的爆炸性压力。然而，没有人能够肯定事件究竟发生在 10 年内，还是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中。

对于那些强权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历史经验并不令人乐观，更不用说那些比苏联的强制手段远为逊色的国家。在凯末尔及其“青年土耳其党”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前，它被称做“欧洲病夫”的时间有一个多世纪。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拼凑帝国受到 1848 年革命的剧烈动摇后，它延续了 80 年，在它同匈牙利达成重要妥协、建立了奥匈帝国后，它又延续了 50 年。中国的王朝在度过了兴盛期后，一般还要苟延残喘一个多世纪。

为了理解为什么冷战在 1989 年结束而不是在 2089 年，为什么苏联在 1991 年解体而不是在 2091 年，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发生在帝国的心脏地区而并未伴随大规模的暴力，我们必须考虑人民所做的实际决定。人们做决定的环境受到社会和经济趋势的影响，而与个人感情因素无关，但政治领导人所做的决定，却可以规定事件的时机和性质。

谁？什么时候？

在苏联解体以后三个月，我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并分别会见了 10 余位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我把有关过去事件的特定问题拟了一个目录，但我更想深入了解的是，对于苏联解体如何发生，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因此，我每次谈话都以两个问题开始：“谁是苏联解体的关键角色？”“决定性的事件是什么？”后来，我还访问了其他人，并以若干回忆录中的内容加以补充。

当然，我并不期待人们，特别是亲身参与其事的人们对如此复杂的事件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意见所涉及的范围是惊人的。

一些人认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苏联的制度注定要被忘却，因为把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阻止那种使它能够生存发展的变革。尽管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最终能够拯救它，但多数人愿意指出某些政治领导人，他们的决定加速了该制度的解体。其他人则认为，把苏联转变为近代民主国家并使其领导人对人民完全负责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关于关键的角色，至少有五种意见：有人认为是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也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还有人认为是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或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最后，一两个人把这个荣誉（或罪名）归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每个人对其回答都有充足理由。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认为是克拉夫丘克，因他领导乌克兰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致使任何可能的联盟都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乌克兰，他们认为，联盟就难以运转，因为俄罗斯与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在面积和人口上都相差太大。要在联邦甚至邦联中建立一种平衡，至少要有一个中等大小

的共和国。

其他人，例如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最后一〔651〕位发言人康斯坦丁·留本琴科，不同意这个逻辑。他们认为* 使没有乌克兰,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以及或许一两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就能构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联盟。只有一个共和国是不可替代的，那就是俄罗斯。因此，叶利钦是关键角色。如果不是他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协力建立了独联体，那么，为了共同的利益，就可能拼凑出某种邦联。

“ 不对。”其他人说,这些人包括弗拉基斯拉夫 ·斯塔尔科夫和谢尔盖 ·斯坦凯维奇，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刚愎自用，不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忠诚于一个已名誉扫地的社会主义，其个性具有独裁主义特点，这使他不能自愿地把各共和国领导人所要求的那种权力移交给他们。总之，他领导上的失利决定了他所领导的国家的解体，没有其他任何政治人物能够拯救它。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永远忠实于主人，他对上述说法都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在 8 月份不发生那次未遂政变，就有可能签署联盟条约。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关键角色。毕竟是他组织了那次政变，没有他的合作，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动政变。

斯塔尔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主要的罪犯，他还指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应承担重要责任，因为在他任苏联领导人期间，忽视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及民族问题，允许地方“ 黑手党 ”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在苏联许多共和国里攫取关键性权力，这一切为瓦解苏联提供了条件。

当我问到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事件时，意见依然不一。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认为， 1989 年 11 月推倒柏林墙是关键事件。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提及此事，并使用了他特有的夸张语气：“ 砸在柏林墙上的第一锤宣告了苏联的终结。 ”④然而，这并不是他在 1990 年或 1991 年初的判断，而似乎是后来的追述。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 1990 年 6 月的主权宣言是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俟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652〕就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正式从属于俄罗斯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可原谅的。

伊万·拉普季夫认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90 年夏季批准成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是关键事件。由于新的俄罗斯共产党为党内保守分子所控制，使党严重分裂，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改革。

其他人，包括前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根据他的辞职演说来判断）认为，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秋季“ 转向正确方向 ”一事是决定性事件。1990 年秋，戈尔巴乔夫背弃了他同叶利钦的协议，不再执行沙塔林计划，也不同那些后来背叛他的人组成政府，他为持续到第二年的戏剧性事件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亚美尼亚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认为，关键性转折点是在 1991 年 1 月 1 日，当时各共和国开始控制税收，并开始限制移交给中央预算的税款。⑤“ 不，那些的确是严重的问题，但在 1991 年初，还是有可能拯救国家的。 ”另一派意见指出。有些人认为， 1991 年 1 月在立陶宛使用武力一事是不可逆转的关键性时刻。“ 半心半意 ”地使用武力使每个人都感到不满：那些主张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谴责戈尔巴乔夫使用武力和杀人，而那些主张不

惜任何代价保持苏联完整的人认为他背叛了他们，因为他后来也谴责使用武力。

维塔利·特雷季雅科夫是影响很大的《独立报》的编辑，他认为，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一事是转折点。“当 1991 年 6 月即将过去时，”他在一年后写道，“苏联的解体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⑥其他人认为，那个时间仍不准确。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从立陶宛的 1 月暴力和把军队开进莫斯科的 3 月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迅速采取行动加以改正，那么，建立不同类型的联盟还不算太迟。如果他在 1991 年夏初就同 9 个共和国缔结联盟条约，并以诸如索布恰克甚至亚夫林斯基那样的人来取代帕夫洛夫，并迫使共产党组织成为反对派，他本来能够重新恢复改革势头，并阻止那次未〔653〕遂政变。

对那些持同样看法的人来说，8 月政变注定要使苏联解体。当时已绝对不可能返回到从前；以后也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维持联盟。

然而，有些人认为甚至在 1991 年 8 月的最后 1 周，完全解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许多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政治野心及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对抗，某种形式的联盟——或许是部分邦联，部分联邦——仍是行得通的。在他们看来，直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的狩猎小屋中进行了成功的“密谋”之时，建立一个松散而又民主的邦联仍是有希望的。他们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长期积怨，解体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历史中的个人因素

到 1991 年 12 月，即使不谈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个人积怨，俄罗斯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摧毁苏联。俄罗斯并没有继承苏联的全部遗产，由于俄罗斯基本上是由中央各部直接控制，所以俄罗斯或者利用联盟的机构；或者摧毁它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自己的机构。否则，行使权力的竞争只能导致大规模的政治对抗。

然而，这种考虑以及人们所提出的其他理由很难说是最终的。有些人也提出了若干有充分根据的论点，主张俄罗斯仍作为一个更大的联邦或者邦联的一部分，即使它不包括乌克兰。首先，一

个更大的国家将更容易处理大量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如果由联邦控制核武器，就能够避免经年累月的谈判和不确定性。联邦也将有权保卫其边界，而同时不会刺激俄罗斯，使其重新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此外，联邦所保持的开放的内部边界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有利于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联邦制度也可以提供一个〔654〕途径，以便更好地处理各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冲突，如果所有共和国都是完全独立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关系更好些，叶利钦完全可以选择保留某种形式的联盟政府。事实上，是否让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舞台，很可能取决于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的某些朋友认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决不可能进行合作，因为叶利钦一直想取代戈尔巴乔夫，他绝不满足于处在从属地位。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能够同叶利钦合作，利用他的能量和对公众的感染力，以支撑改革努力。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在 1987 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力图加快和扩大改革的努力反应过度，导致了相反的效果。如果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推动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他需要领导层中有叶利钦这样热情支持改革的

人，以保持对保守派的压力。然而，个人因素战胜了政治考虑：戈尔巴乔夫不希望与一位有感染力的同事分享明星的荣耀。他只有同沉默和平庸的伙伴在一起才感到舒服，这就是导致他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不但对叶利钦是这样，而且通常对他所挑选的所有人员都是这样。

很难相信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一直非常憎恨。直到 1989 年春，他在私下和在公开场合还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队伍中。他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从不满足于充当一个小伙伴。我们永远不会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在 1988、 1989 或 1990 年都没有得到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当时是存在的。

即使叶利钦证实他无疑在公众中很受欢迎，他有能力推销戈尔巴乔夫想推行的计划，戈尔巴乔夫仍继续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反对他，甚至仍在利用克格勃的卑鄙伎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确曾暂时停止批准对叶利钦有人身危险的行动）。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后，他决不会再被漠视，每当他们俩达成协议，总是戈尔巴乔夫违约，他总是指责叶利钦玩政治游戏。叶利钦的滑稽动作和哗众取宠的嗜好无疑令人厌烦，但〔655〕他从不违背主要协议，而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 10 月有关沙塔林计划的问题上,以及 1991 年 5 月有关亚夫林斯基改革尝试的问题上，都违背了原来的协议。

看一看公开的记载，就很容易理解像叶利钦这样自傲的人是怎样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发自内心的憎恨的。

说到那一点，人们必须承认，叶利钦常常以不负责任的要求来使关系恶化，他的观点常常前后矛盾。尽管他嘴上不承认，但他的行为，特别是 1990 年和 1991 年的行为通常是有意尽可能向戈尔巴乔夫展现他最恶劣的一面。他知道该如何从心理上激怒戈尔巴乔夫，并善于选择时机。 1991 年 2 月，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循例辞职：叶利钦毫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将试图利用党内强硬分子来赶走他。但这种展现在电视摄像机前的企图，正是叶利钦所需要的，为他竞选俄罗斯总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未意识到，正是他反对叶利钦一事，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使得叶利钦受到公众的欢迎。对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豪而且——直率地说——因其智力而傲慢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令人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如果误入歧途，羞辱其潜在对手，然后他所采用的策略又使其对手深受公众欢迎，那么他便不可能保持敏锐的判断力，以引导国家渡过艰难的危机。

苏联能够和平地（或者比较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唯一实际希望在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能够及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进行合作。直到 1991 年 7 月 29 日为止（在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同意将帕夫洛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解职），他们并未开始进行合作，应该为此受到更多指责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而在 1991 年 8 月 21 日以后，正是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帝国变为联邦或邦联国家的希望破灭。就个人关系来看，两个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关系方面，历史将把他们两人都视为不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他们都让个人因素遮住了双眼，看不到他们竞争的政治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遗产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竞争，尽管在 1991 年 12 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但它决不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方面。从 1985—1990 年年中，叶

利钦只是一个边缘问题。对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任何评价，都必须超越他的个人关系。

俄罗斯人目前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分歧很大，并常常受到评论者同戈尔巴乔夫个人关系的影响。如果撇开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付钱或不付钱的“代理人”的歇斯底里和非常不负责任的指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种不同的思想派别：

1.戈尔巴乔夫只是“俄罗斯历史表层的一个脓包”，⑦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他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增加其权力，如果这些事情导致了改革，那也只是其他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

2.戈尔巴乔夫最初的确进行了改革，但他后来迷失了方 向。社会变革的速度超出了他理解和控制它们的能力。因此， 戈尔巴乔夫最终成为他所发动的改革的牺牲品。⑧3.戈尔巴乔夫是真正的改革者，无论如何，他不得不对付党的领导，党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如果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改革，党就会剥夺他的权力。因而他采取了战术上的妥协，并设法使自己不受党的控制。他认识到需要进行改革，但这一认识是逐渐形成的，并变得越来越激进，如果他再能得到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成功地摧毁共产党，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并保持一个以苏维埃共和国为核心的邦联制联盟。⑨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和彻底的改革者。他在 1992 年 3 月的谈话中指出，以前每一个在其统治初期试图进行改革的俄罗斯领导人，在其统治的末期都变成了反动分子。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即为一例：亚历山大最初支持国务大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宪法改革，但在保守派的反对面前，他自己也把宪法改革看作革命活动，逐渐变成反动分子，建立了一个警察国。〔657〕家。“改革者就是那样因环境的压力而改变！从而开始反对他们当初所向往的事物并反对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戈尔巴乔夫大声说。⑩接着，他否认自己是这种类型的人：

始终维持道义立场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决不放弃我最重

要的政治选择。这是道义的选择。我认为，归根到底，正是他们所说的我的战略和方法的“优柔寡断”和“缓慢”（我把这些话放在引文中），使得进步势力在社会中发展起来，正如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成为维护和发展民主改革的基础。（11）

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慕尼黑讲话中所说的是正确的。有些人否认他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其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他们没有看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即正是戈尔巴乔夫在 1988、1989 和 1990 年初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使得独立的政治力量有可能逐渐损害并最终摧毁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他支持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变革，但这一支持并不总是无条件的，有时也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但是，只要共产党仍然掌握着权力，就决不可能发生任何根本变化。与他的大多数政治局同事不同，从 1988 年起，戈尔巴乔夫通常支持民主变革，而不是仅仅维护共产党的狭隘利益。当这样做不成功时，戈尔巴乔夫首先避免被剥夺权力，然后再推行其计划。

当然，他的判断并不总是无可指责，他的许多错误——我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其内容，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尽管他在 1990—1991 年的冬天同反对改革的人结成了暂时同盟，但他始终拒绝授权使用武力来维持其权力。实际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正如他在慕尼黑演说中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所有具有改革思

想的执政者，当他们发现自身地位受到了威胁时，都放弃了改革的努力。在1990 或 1991 年，戈尔巴乔夫有好几次可以宣布实行总统统治，并将苏联社会中被压制的力量重新集结在他的身边，但是，尽管他有时已经极为接近这样做，但他最终还是拒绝镇压处于萌芽状〔658〕态的民主组织和民主活动。为了这种贡献和这种先例，俄罗斯向他表达了他应得的敬意。

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也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不过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传统民族主义的、排外的、苏联偏狭观念的教　　　条主义卫道士，变成了一个为人类普遍价值而战的战士。他抛弃　　　了阶级斗争观念，这对克服由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孤立、敌对和同外部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他并未制订出结束冷战、消除东西方分裂的特别方案。但他逐渐认识到，苏联能够因加入世界大家庭而获得好处，当他为了与世界和平相处、找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依据以论证自己的行动时，他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如果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那么意识形态的声明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声明不仅仅是修辞上的变化，因为戈尔巴乔夫根据它们重新确立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针。他依据他所宣布的新的原则行事：同意最终在平等的基础上削减武装力量（而不是按比例削减，以保持苏联的优势），终止苏联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允许东欧脱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进行合作，反对它在中东的前保护国的侵略行动。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每个决定都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

在自命为“现实主义者”的人看来，建立在“普遍人类价值”或“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带有某种感情用事的色彩，但这是不正确的。任何外交政策，如果建立在使邻国贫穷的基础上，或以牺牲他人来获取单方面利益，从长远来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往往还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就出现了毁灭性冲突的危险，它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可能得到的任何正当利益。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经过精心拟订，以便不违背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就是所谓“外交政策应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这一命题的确切含义。它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应该忽视其自身的利益，而是认为，其利益不应理解为只是单一的阶级、集团、意识形态或民族的排〔659〕他性利益。国际社会将不会因冷战结束所创造的机会而得到好处，除非它找到一种方式，能把这种哲学原则应用到正常的国际活动中去，否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新秩序。

戈尔巴乔夫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并没有抹煞这一事实，即他显然没有达到他的更宏伟目标——把苏联转变为依据法治进行管理的自愿的国家联盟，建立起按照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标准运作的市场经济。对一代领导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梦想。要走的路太远，障碍太多，范围太模糊，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够完成这一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朋友认为，如果在 1989 年或 1990 年初，他就能够提出他在 1991 年夏天愿意接受的那种邦联，他本来可以维持苏联，至少以一种缩小的规模，没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但包括其他多数共和国。他们指出，各共和国领导人和各种民族主义运动都非常高兴他们没有以这个“礼物”做交易——当他们就各自共和国经济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仔细的考虑时，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他们需要某种中央机构。

1992 年 9 月，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我向他提出了该问题。我问他，他

是否认为没有更快地准许各共和国享有真正的独立是犯了错误。

“杰克，可以看出你现在是教授，因为你的问题书生气十足。”他回答，“在某种抽象意义上，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走得太慢，但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严酷政治环境的现实世界。让我问你：如果我在 1989 年提出邦联，对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中央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会罢免你。”我回答。

“是的，而且他们将会提前开会，毫不迟疑地把我赶走。甚至可以说，直到 1990 年初我开始谈到邦联时，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还是反对的。我不得不自始至终与他们进行斗争。我根本不可能自由行动，不应该以我有行动自由的假定作为评判我的依据。”（12）

戈尔巴乔夫有一个观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改革派评论家对此都不赞成。他认为，对于党的领导强烈反对的政策，他不能〔660〕公开表示支持。他在进行改革时，必须经过精心准备，有时还要采用欺骗手段。他必须设法掌握权力，迫使或者欺骗共产党去做它一直反对的事情。有时，甚至他的错觉也能起某种作用，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

戈尔巴乔夫误认为，苏联共产党能够变为进行根本变革的工具，这种错觉搅乱了他的政治判断力，直到叶利钦迫使他公开面对共产党背信弃义的证据。但客观地说，该错觉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它对采取步骤降低共产党的权威，并最终使之解体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步骤恰好需要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认可，而其权力又正在遭到逐步削弱，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能使共产党的官员确信，尽管在进行改革，党仍然能够继续掌权，他就不能采取这些步骤。

撇开他的错觉不谈，戈尔巴乔夫的策略也常常不是根据明确的战略考虑。他不应以共产党组织机构需要安抚为借口，在 1987 年那样处理叶利钦。他未能使改革派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从而不得不使自己摆脱其控制，而他没有寻求尽早——比如说， 1989 年的某个时间——实行总统普选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他鼓励改革派在 1990 年党的大会之前脱离共产党，允许反对派在俄罗斯共产党组建时控制该党，这些完全是自拆台脚。即使他不能公开支持诸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夫里尔·波波夫等改革派，他也可以避免侮辱他们，并提供暗中的保护，而不是进行恶意的公开批评。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对于改革的成功是关键的，但从 1990 年起，戈尔巴乔夫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就改革策略进行的争吵毁坏了本应很默契的战略联盟。

戈尔巴乔夫还低估了自 1989 年以来公众态度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在私下里，他抱怨不能使改革的速度超过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实际上，公众的认识走在了他的前面。正是党的组织机构，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没有跟上前进的步伐，当戈尔巴乔夫推迟改革的时候，他便疏远了社会的大多数人。当民意测验结果显示，60%以上的群众认为社会主义已经破产时，他却仍在坚持捍卫“社〔661〕会主义”。由于不了解（也很可能是拒绝了解）社会上日益增长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戈尔巴乔夫把一个又一个问题留给叶利钦利用。

我们该怎样解释戈尔巴乔夫那种似乎是故意视而不见的现象呢？如果他真诚地赞成改革，他怎能在判断人民时犯如此多的错误？他掌握着一切消息来源，他怎能对社会的变化和其本国人民的看法一无所知？

我认为，他的个性因素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

从天性上说，戈尔巴乔夫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这使他很难建立有效的顾问和咨询机构。他既没有正式的顾问班子，也没有非正式的顾问班子。当然也有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其成员进进出出，不时同他会面。但它们从来不是有效的顾问班子，原因有两点：第一，戈尔巴乔夫所选择的人常常不能在一起共事；第二，他从不把它们看作是真正的顾问班子，定期向它们咨询，认真对待它们。此外，他总是对它们说，而不是听它们讲。

戈尔巴乔夫的社会生活似乎不是从事官方活动和公众事务，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圈，能够为他提供同更大范围的人联系的哪怕是脆弱的纽带。赖莎是他唯一的亲密朋友，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他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她的心理支持支撑着他，但是，她不能提供亲密的朋友圈所能够给予的广泛而深刻的咨询。此外，如果像瓦列利 · 波尔金一类奸诈的助手的确是靠拍马屁来维持其地位，那么她对人的判断力也像他的丈夫一样有毛病。（13）

人们注意到，除了外国同僚，他没有任何私人朋友。 1991 年，若干苏联高级官员分别单独对我谈到，戈尔巴乔夫感到，与外国人相处比同本国人相处更自在。“ 他对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和你比对我们中任何一位都更亲密。 ” 某个人说，“ 你可以与他进行更坦率的谈话，我们则不行。他在这里确实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建议，也在于他总是任命二三流人物担任关键职务。由于他的形象日益退色，他对〔662〕任何比他更受公众瞩目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特别是当他的权力衰落和他更不受欢迎的时候。因而他总是任命像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一类虚弱无能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即使不谈他们在 1991 年 8 月的背叛，他们的无能也导致了他的垮台。

最后，他对弗拉基米尔 · 克留奇科夫的信任和对克格勃错误消息的轻信，都证明是致命的弱点，他不仅没能摆脱克格勃对其个人安全的控制——在 1988 年克留奇科夫取代切勃里克夫时他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还因相信对国家真实情况的歪曲报道而误入歧途。任何国家首脑都可能偶尔被虚假报道所欺骗，但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发现和纠正长期存在的固定模式的虚假报道，他就不能做好他的工作。

列举戈尔巴乔夫的缺点很容易。更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是弄清在各种不同时期，在不会被罢免的情况下，他究竟能走多远。我们不能肯定他在哪方面的判断是错误的。如果他的改革进程走得更快，一个与 1991 年 8 月形成的阴谋团伙类似的小集团很可能更早发难，即在 1990 年秋天发动政变。那时的政变很可能有着比 1991 年 8 月政变更好的成功机会。叶利钦还没有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莫斯科人还没有从立陶宛人那里学会如何亲自去保护议会；人们还不那么担心内战的可能性；比起九个月以后，“ 民主派 ” 的人数还不是太多，组织得还比较差，也不那么自信。

在 1990 年，由于没有一位副总统和一位抱合作态度的总理的参与，没有任何一次叛乱自认为具有 1991 年的政变领导人所追求的那种合法性。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预防措施：更换国防部长，分流克格勃的某些关键性岗位，任命一个有能力的忠诚的总理，对任何人来，要组织政变本来都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在 1991 年之前面临被罢免的严重危险，他将因未能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而受到责备。

然而，这些错误和错误判断不应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663〕不到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变他所继承制度的勇气。如果像某些批评者所称，他的唯一目的是积聚更大的权力，那么，他所做的所有改革努力就讲不通了。只要继续使国家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下，他就能够保持他的个人权力。他改革这一制度，建立有限权力的代议制政府的努力，不应被解释为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他的改革是真诚的，尽管这些改革产生了他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说，俄罗斯今天之所以具有建立民主体制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出现了由他所倡导的变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我相信，俄罗斯最终将会承认，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带领它摆脱了奴役和束缚。而他未能到达希望的彼岸则是次要的。

叶利钦的记录

在写作本书时，鲍里斯·叶利钦仍是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他作为政客和政治家的记录仍在继续写。但我们对他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作用能说些什么呢？

同时代人对他作为苏联政治家的政绩意见分歧，就像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一样。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唯一不变的追求就是对权力的渴望，他的活动方式保持一个州级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特点。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粹派分子，是随风转舵的政客。其崇拜者否认上述特点，并指出，从 1987 年起，他始终支持最初的自由化和后来的民主化。他是前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同共产党完全决裂并彻底反对它的人。他们还指出，尽管他具有共产党的经历，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他从不回避直接选举的考验。（14）

无疑，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戈尔巴乔夫更有思想，更能谋划，叶利钦则更多地凭直觉，更为冲动。戈尔巴乔夫受过更好的正规教育，他享受了国家第一流大学所提供的很多有利条件，超过了叶利钦进入的州级建筑学院。但两人都因在共产党组织机关中长期和成功的工作而获得了专门的经验；〔664〕他们最初都是因为担任州的第一书记而出名。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他的父亲是个拖拉机司机，但他有幸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的出色记录——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作为共青团领导人的，使他在回到家乡后仕途一帆风顺。他先是担任共青团领导人，然后担任党的领导人，他迅速地而且似乎是自动地晋升到一个个要职。

叶利钦没有从最初的有利条件中得到好处：他不得不靠着他的智慧、意志甚至蛮劲奋力向上爬。其结果，两个人对权力有着不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认为那是他应得的，而叶利钦则认为那是他争取到的和赢得的。

叶利钦确实是一名斗士。但他是根据规则来战斗。人们认为，他的竞选运动，他在议会中的策略，直到他 1991 年 6 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活动，在任何民主国家中都是正常的。他当然也攻击其对手的弱点，利用他们的错误，有时还作出他不可能完成的许诺，但是，只有那些仍拘泥于一党专政思想的人，才认为这种行动是反常的。

1990—1991 年冬，当戈尔巴乔夫正在为是否授权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使用武力而踌躇不决时，叶利钦的坚定立场及西方的警告，可能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避免了一个将造成悲剧和流血的错误。尽管叶利钦出于自身的政治

利益，捍卫民选议会，反对武力解散，但他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一事，不但要有政治上的勇气，也需具备自身的勇气，正像他对 8 月政变进行迅速而明确的谴责时所需要的。

如果不是因为叶利钦,那些企图在 1991 年 8 月罢免戈尔巴乔夫的强硬分子很可能已在戈尔巴乔夫勉强的默许下，于当年控制了苏联。他们掌握权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他们的政策将会毁　　灭新的民主制度，破坏经济，并有造成广泛流血的危险。

鉴于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是鲍里斯 ·叶利钦拯救了俄罗斯的民主(因为俄罗斯的民主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毫不夸大地说，　1991 年 8 月，当民主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时，正是叶利钦的行动保护了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可能性。

8 月政变后的情况则是另一回事。叶利钦虽有机会，却没有去〔665〕全力从事制度建设，例如起草和采用新宪法，改革和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帮助建立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为发展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等等。相反，叶利钦竭力同中央斗争，毫不客气地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破坏了法治的尊严，而且把很多以前的责任和义务强加给俄罗斯政府。此外，他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引入国际社会并没有经过人民的明确授权，而是根据一个不起作用的宪法。这些成为改革的严重障碍，如果叶利钦愿意更谨慎地进行转变工作，这些障碍本来可以减轻。

鲍里斯 ·叶利钦在 1991 年的工作无疑将同他后来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经历综合起来加以评价。如果国家能够确立民主政体，建立可行的市场经济，那么没有什么人想去仔细研究他的缺点。他将被视为适应 21 世纪及其以后时代的新俄罗斯的创立者。但是，如果国家进一步分裂，逐渐陷入犯罪和腐败的困境，并因蛊惑人心、要求恢复帝国的呼吁而深受折磨，那么，他将作为悲剧性的沙皇鲍里斯第二被拉下台，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它将导致困难的时代和民族的耻辱。

破坏者克留奇科夫

如果由我来回答我对俄罗斯政治家提出的问题，即谁应对苏联的解体负有最重要责任，那么我的回答是弗拉基米尔 · 克留奇科夫。

他是 1991 年 8 月夺权企图的组织者，政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并使至少在帝国的部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愿的联邦变得更为困难。如果没有克格勃首脑的支持，就难以发动任何有把握的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这也是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有预料到政变的原因之一。他完全错误地相信了克留奇科夫的忠诚。

克留奇科夫对总统的背叛，证明他就是最直接破坏苏联的人，但他声称拥有这一权力却并非仅仅基于行动本身。〔666〕　　他始终没有履行他的基本职责，即向总统提供准确情报。他的报告故意歪曲事实，以利于他所支持的特定政策。此外，当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同僚不赞成他的看法时，他便用彻头彻尾的谎言破坏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没有看到公众对共产主义日益增长的憎恶，他应负重要责任。他对虚构的外国干预的强烈警告，或许有助于维持一个膨胀的情报预算，但它转移了人们对苏联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而他所赞成的那些 “ 解决办法 ” 无疑将使问题更严重。

认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能够变为民主国家那种法律执行机

构，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它习惯于超出法律范围行事，并庇护其特工人员，使之不须对外界做任何说明，这种习惯如此之深，即使有一位有决心的主席也难以完全克服。

在这点上，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决不是一个有决心的主席。尽管他不具备其前任贝利亚和尼古拉·叶若夫那种真正残忍的习惯，他领导的克格勃也没有犯下对无辜者大规模屠杀的罪　　　　行，但他却使这个组织超过法律范围行事，服务于他所偏爱的政策而不是合法当局。此外，他继续从事已明令禁止的活动（例如　　　　暗中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有的时候，他的活动显然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批准。

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应为此承担责任。例如，本来不应该对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监视，但叶利钦却似乎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下，包括在其住宅中安置窃听设施。戈尔巴乔夫得到了有关叶利钦的报告，他不可能不知道消息的来源。例如，叶利钦曾问我，如果出现违宪夺权之事，美国会做何反应，有关此事的报告只能是来自向克格勃告密的人或者窃听器。

如果不使用这种做法也能使戈尔巴乔夫了解到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那么他是会同意甚至鼓励克格勃那样做的。令人费解的是，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屈从于这些习惯的克格勃主席也能使戈尔巴乔夫本人受到监视，甚至在他的私人工作班子中招募特务。（15）

瓦季姆·巴卡金说，在他任职期间，戈尔巴乔夫一直对克格勃〔667〕有种敬畏感，就像州的共产党首脑那样。（16）每天早晨，当他拿到标有“仅供总书记阅”的文件夹时，他都很激动，他确信，他所得到的是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情报。他在 1986 年尼古拉·达尼洛夫被捕时表现出来的容易受骗的弱点，始终没有改变。他一直按照克格勃的要求去做，即使这样做不利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例如，当奥列格·卡鲁金在 1990 年与克格勃决裂并谴责它继续进行非法活动时，戈尔巴乔夫却非法地剥夺了卡鲁金的退休金和他以前的奖品，而不是利用卡鲁金的指责，迫使克留奇科夫改变他的做法。（17）等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克格勃的忠诚时，已为时太晚。

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如果以为任何克格勃主席会彻底改革该组织，那是白日做梦。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可以推测，如果克格勃由不同的人来领导，它会发生什么变化。例如，如果在 1990 年和 1991 年由瓦季姆·巴卡金而不是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负责克格勃，肯定就不会发生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同时也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监视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将会终止，阿尔法分队也不会被用来对维尔纽斯的电视联合企业发动猛攻，有关国家情况的报告很可能更为客观。巴卡金指出，克格勃的职业情报官员并不喜欢克留奇科夫篡改证据的嗜好，他们更倾向于提供更准确的报道。

西方的作用

在结束冷战和苏联解体中，西方特别是美国起了什么作用，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就像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评价一样。在这方面，人们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依据他们个人对有关政治家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依据对事实的不带偏见的审核。那些对里根、布什、撒切尔夫人或科尔持好感的人认为，当时发生的多数事件应归〔668〕功于他们的政策。而那些在政治上持相反观点的人则丝毫也不承认这些政治家的作用。他们认为，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例如，挪威议会似乎就属于这一派，它将 1990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一人。

为了清楚地考虑责任问题，我们必须区别三种转变：结束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结束苏联自身。尽管三者有明显的联系，尽管结束冷战所引起的事态发展导致了另外两个事件，但　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分歧。

冷战按照美国所确定的条件结束，从开始美国对此就有所考　　虑，1984 年 1 月，里根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想伤害一个和平的、实行改革的苏联的真正利益，尽管它涉及苏联统治方式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无疑将改变苏联政权的性质。

从担任苏联领导人之时起，戈尔巴乔夫就认识到，只要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他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内部改革。最初，他试图仅靠军备控制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但它没有奏效（转折点很可能是 1986 年 10 月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于是他便开始全面响应美国的四点议程。然而，这根本不是对美国的让步：国内的事件使他确信，如果他设想的改革是可行的，那么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开放苏联社会，并开始民主化进程。这样，美国及西方的议程便开始与他的计划不谋而合。

由于就议程的四个主要问题取得了进展，具体问题便非常迅速地解决了——那正是美国的政策计划加以鼓励的事情。移民更加自由；新闻媒介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举行真正的选举；而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取消中程核导弹，以促使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并帮助安哥拉、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和柬埔寨的各方调解当地的战争。某一地区情况的改善有助于解决其他地区的问题。

如果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一切还能够以这种形式和这种速度发生吗？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莫斯科做出决定时的处境，便〔669〕 不会说一切仍将如此发生了。

有些人主张更软弱的武器政策：冻结或单方面削减核武器，拒绝以在欧洲部署军队来对付 SS—20 导弹，这决不会鼓励苏联减少军备。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此有足够的理解，这些政策也将会逐渐破坏很可能是唯一的论据，使苏联军方难以相信应该削减核武器。苏联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而它必须找到结束这种竞赛的方法，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付持强硬路线的批评者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我们的“鸽派”将使他丧失这个武器，并很可能延长冷战，增加那些以为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苏联将军发动不计后果的战争行动的危险。

某些西方政治家想用武力控制国际关系及一切有关的事情，如果让他们来制定政策，冷战也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结束。军备控制协议有可能更快地签署（尽管这一点并不肯定），但是，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可能要推迟数年，直到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仅靠减少军事负担并不能解决更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如果仍以阶级斗争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那么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可能会变为进一步争论的源泉，而不是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

怀疑论者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达成并遵守一个合理的协议，如果让这些人来制定政策，也会阻碍冷战的迅速结束。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缔结协议，那么，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妥协的努力就会停顿下来，他将被迫更早地中止改革，并变得比他最终显示的更加强硬。

总之，我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在于，在 80 年代中期出现了某种一致性：

（1）西方进行公平谈判的政策及其相应的力量、决心和愿望；　（2）苏联领导人最终认识到，苏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670〕了，它必须进行内部变革，但它只有同西方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里根以及美国的盟国在这一进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值得受到称赞。任何单独的个人都不可能使之成功，绝对不可能。方案是在华盛顿制订的，但它未必能在莫斯科制订出来，即使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足智多谋的领导人。

当里根政府明确表达了结束冷战的战略时，它并没有计划结束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统治。这并非因为那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而是因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明白，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里根总统希望苏联停止威胁他国，并相信，掌握了情况的苏联公众对其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够有效地制止苏联的侵略倾向。他支持鼓励苏联的民主化、人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政策，但他没有试图为苏联人民规定政治结构。那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如果共产党政权能够逐渐演变成一个根据人民的意愿进行统治的政府，美国就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某些人可能立即表示反对，如果的确是那样，美国政府就是难以置信的天真。一个共产党政权怎能逐渐演变为它的对立物吗？美国人民一定知道，民主政治、自由迁移和自由获取信息与维持共产党统治是不相容的。或者新的自由是个骗局，或者共产党统治垮台。

是的，从理论上我们懂得这一点。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我们也如此。没人能说出需要有多少自由（假如自由能够测量）才足以推翻这一制度，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这一制度根本不会显示出它改变其自身的意外能力。那些发动改革的领导人毕竟是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受到西方政策的鼓励，但他们之所以采取改革路线，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利益。愤世嫉俗的人一直不相信，受到苏联制度制约的领导人能够理解〔671〕真正的改革，更不用说坚持改革了。很多愤世嫉俗者拒绝承认所发生的变化。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出现了，其他许多改革者也出现了。像杰斐逊那样的民主主义者是难以产生的，但是很多人更接近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约瑟夫·斯大林。

改革——如果可行的话——是他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如果他们能够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不会有损于美国或西欧，即使他们希望继续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并把他们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

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是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但这与其说是苏联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由其生活状况造成的。民主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富裕和自由与大多数苏联人晦暗压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旦不断增加的接触和信息使得这一对比更加明显，对现存制度的支持就会逐渐消失。

事实证明，苏联制度变革的速度不可能满足其人民所渴望的与外部世界进行竞争的要求。苏联人常常看到，外国的情况比严格的新闻检查下的报道要好一些，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数十年谎言的一个后果是，人民已习惯于相信与他们被告知的情况相反的消息。

然而，如果我们要确认某一个人应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负责，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他所坚持的改革最终把共产党

从统治地位拉下来，他拒绝同意使用武力去维护旧制度。在相继发生的危机中，他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

苏联第一位把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是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位领导人。这难道不是很恰当的吗？

当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显然将要结束时，美国和大多数（或许是全部）其他西方国家希望，戈尔巴乔夫将成功地建立一个自愿的联盟——当然，它不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或许也不包括诸如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其他几个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信任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已开始注意以前不太在意的叶利钦，但他们〔672〕仍认为叶利钦反复无常，不太可靠，不如他们所熟悉的戈尔巴乔夫。

个人的作用是重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显然，就有关核武器一类问题同 1 个国家达成协议，比同 12 个国家要简单得多。很多制定政策的人担心，苏联的解体可能导致类似南斯拉夫的那种民族冲突。

如果美国和西欧有权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联盟，它们一定乐于做这件事。但这当然不会由它们负责。所以，当苏联帝国分裂时，它们只能沮丧地看着，然后匆忙地竭力设法同那些意外出现的共和国建立联系。

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最终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正如我所指出的，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而不是其他任何个人，很可能应就此承担更大的个人责任，这令人啼笑皆非，但也许又是恰如其分的。

结束与开始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我没有为它的灭亡感到哀痛，但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也没有感到特别想庆祝一下。束缚在一个帝国中的 15 个国家终于解放了，所有自由的朋友们难道不应为此而欢欣鼓舞吗？我认为应该如此，但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声音又说：“不，等一等。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两者不能画等号。我们怎能知道人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更好呢？”

我之所以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我喜欢熟悉的东西，对新的不熟悉的东西感到困惑。苏联制度中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事物都在大声疾呼改革。到 1991 年 9 月，它们被改变了。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创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将俄罗斯历史颠倒过来”，创立一个新的社会，那里的决定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

〔673〕　任何国家的领导都不可能直接做这样的事。政治领导人不必再假装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应该自愿站到一边，允许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建立文明社会，确立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如果政治家们能够设法鼓励这种变革，事态发展就会更好。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不让那些曾管理过旧的、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人阻碍新事物。然而，各共和国多数政治领导人是旧的国家机器的代表，不能指望他们自愿把权力交给其他人。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支持独立，恰恰是因为那能够使他们更牢固地控制权力。

除了俄罗斯、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后者已经取得独立——没有一个苏联共和国在任的政治领导人想实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即便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面临着可怕的障碍，尽管经过几年的讨论，却根本来采取任何措施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从国营经济转变为私营经济的过渡时期保护平民百姓。

如果在 1991 年能够真正实现过渡时期的安排——例如联盟条约,使政治经济改革得以持续进行，使得新机构有时间适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那么它比实际已发生的苏联的突然解体更为可取。然而，到 1991 年底，渐进的变革在长期推迟之后，已不可能再进行下去。只有激进的改革是可行的，但激进的改革肯定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政治骚乱。除非那时管理俄罗斯的“民主派”极为灵活和幸运，否则，大多数人将对民主政治丧失热情，并对旧的帝国产生新的感情，记忆力的选择性就像哈哈镜，它在人们头脑中美化了旧帝国的形象。

尽管突然的独立意味着不适应改革需要的中央机构被多数前苏联共和国继承下来，但无论如何，到 1991 年底，渐进的变革已不再可行。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比，这些机构在个别共和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肯定要小得多，因为，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政府或经济是为独自运转而建构的。

以后的发展如何，我将拭目以待。

由苏联帝国的分裂而形成的国家今后要为它们自己的命运负责。但是，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极为重〔674〕要的。如果俄罗斯逐渐演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满足于在其现有边界内生活，集中精力开发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那将有助于所有继承苏联遗产的国家的发展。反之，如果俄罗斯沦为独裁统治或恢复为帝国，那么对其他继承了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发展可操作的民主政治，建立健康的经济将是极为困难的。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也面临非殖民化的痛苦。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一过程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因为它要为自己重新定位。苏联帝国是否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如果是，那么俄罗斯便失去了一半人口及大片领土。俄罗斯曾是共产主义帝国的殖民地吗？如果是，那么它现在便避免了一位帝国统治者，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实际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身兼二任，既是宗主国，又是殖民地。在 1991 年 12 月，叶利钦的行为就像俄罗斯是个殖民地，他坚决放弃了迫使其他共和国加入一个新帝国的努力。他和俄罗斯政府承认了其他所有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和它们的边界。

为了理解那件事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也要考虑如果俄罗斯的领导人在 1991 年坚持这一传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记录是一部帝国强权的记录。从 14 世纪初，当古代的编年史作者第一次开始记载很小的莫斯科公国的活动时，国家统治者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扩张热情。首先，莫斯科吞并了其他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公国；接着，它又占有了在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非俄罗斯人居住的疆土。它在 19 世纪的最大疆域，西到瑞典、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边界，东达太平洋。它在西半球也曾占有土地，拥有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定居点。

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赞扬帝国的扩张。有些人曾对专制行为加以批评，但他们却赞扬领土扩张，赞成加强国家权力。甚至像伊凡雷帝那样残酷的暴君，也因其增强了俄国的实力而赢得很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赞扬。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民族的尊严、荣誉、安全、甚至幸福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帝国。〔675〕 苏联宣称它不是俄罗斯帝国，但其领导人聪明地利用了这种帝国情结，它成为俄罗斯政治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沙皇后没有几年，苏联领导人就把帝国的传统攫为己有。历代沙皇获得的领土成为苏联历史中的光荣篇章。

这就是被叶利钦及其政治伙伴在 1990 年和 1991 年 12 月所抛弃的传统。1990 年，他们正忙于宣布俄罗斯的主权；　1991 年 12 月，他们强迫俄罗斯尊重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边界。

假如俄罗斯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方针，会对事态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看看南斯拉夫的情况。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在 1990 年或 1991 年都决定解散联邦，走各自独立的政治道路，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塞尔维亚愿意承认现有边界，克罗地亚和其他共和国也愿意承认，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发生某种经济混乱，但不会发生任何战争；将会出现政治斗争，而不是流血冲突。

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许多人都担心，如果各共和国独立，苏联将会陷入内战的地狱之中。但这并没有发生。独立后进行的民族斗争，在苏联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它发生在边远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带。为什么苏联的解体比较和平？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没有仿效塞尔维亚的做法，没有企图重新划定边界，或把所有俄罗斯人都集中在大俄罗斯，并把非俄罗斯人都从该国赶走。如果他们那样做，苏联很可能变为另一个南斯拉夫，一个非常大的南斯拉夫，因为，与南斯拉夫不同，苏联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它们很可能脱离负责任的控制。

叶利钦对俄罗斯含义的重新定位是历史性的决定，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维持其统治同样重要。如果它能够保持下去，如果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逐渐接受它，它将是俄罗斯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它像结束冷战、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独裁统治一样，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 1991 年 12 月，人们还不清楚俄罗斯民族将如何确〔676〕定其新的特性。比较聪明的俄罗斯领导人知道，帝国将不再是荣誉和权力的源泉，而是沉重的负担。这种看法不是很普遍。多数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于相信帝国的意义。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有多少人会把经济上的贫穷和失去帝国一事联系起来呢？肯定有很多顽固守旧分子和政治投机分子会怂恿和利用这种失落和被出卖的情绪，正像本世纪早些时候，德国法西斯以指责其敌手在德国的背上刺了一刀而赢得了权力。

从感情和精神上来看，民主政治要想获得一个机会，俄罗斯仍需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当俄罗斯民族满足于居住在其现有边界之内，建立同其邻国的平等关系，它才能够获得发展和繁荣。如果它试图重新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自身的独裁，这对它的每一个邻国都是悲惨的。

认识到前面仍有如此严酷的斗争,使我在 1991 年圣诞节没有去庆祝苏联的终结。

分析报告

回顾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并成为历史的过程，我们现在能够以一份死亡鉴定书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作一概括。

苏联的死亡

死者曾是一位有恶习的病人，医生开始为他治病。他们设法减轻病人的偏执狂，控制他的侵略行为，但是所用的药逐渐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他最终死于感染扩散，这种疾病不会威胁到健康人的生命。

鉴于该病人的恶习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并继续威胁　　　　着几十亿人的生命，显然，医治那种习惯比拯救那个病人更重要。此外，该病人长

期滥用强权，这已使他建立起一个对治疗最不敏感的僵化系统。因而，人们认为，有责任心的医生已经　　达到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该病人未被治好一事，是他自身疾〔677〕病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治疗不当。

15 个子女（其中 3 个是不合法的）幸免于难。他们都表示，一定要避免那种逐渐损害死者的行为方式，因为他们也确实深受其害。然而，应该指出，这些子女很可能携带着某些致病基因。实际上，恶性肿瘤显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医务当局应该对幸存的一代进行仔细的但又是同情的观察。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苏联并未完全死亡。它只是缩小到和俄罗斯一样大。

维塔利·特留季亚科夫 1992 年 7 月①

在俄罗斯，从没有一次改革努力被贯彻到底。

鲍里斯·叶利钦②

不实行改革，俄罗斯就不具备帝国的力量。

实行改革，俄罗斯就失去了帝国的愿望。

小杰克·F·马特洛克 1995

年正如戈尔巴乔夫所预言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作为一体化机构或者协调机构是无效的，至少在其最初四年如此。那些留待以后谈判解决的问题，不是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达成的条件过于笼统，仍需继续争论。即使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没有任何强制措施，所以独联体不过是为其成员国及其政府首脑定期开会的一种安排。他们的确举行了会议，但他们回去后，通常继续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除了已经获得民族独立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外，其他前苏联共和国需要立即为它们自己定位，决定其民族形象和地位，决定它们将建立哪种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它将重新确定它在世界和历史上的地位。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都必须决定，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否有利，或者说国家能否依法对少数民族和〔679〕少数宗教提供平等的保护和权利。

即使经济能够平稳过渡，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易于造成分裂。但是经济并未平稳过渡。国家身份的定位——对俄罗斯来说是重新定位，恰好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情况提供了进行蛊惑宣传的炮弹和避免做出向必要的市场经济转轨的艰难决定的借口。在中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仍然为共产党的官僚所控制，虽然共产党已经正式取消或者更改了名称。官僚机构的腐败却从未消除过，现在它像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一样迅速蔓延，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利用了官僚，两者常常同流合污。

最初的独联体协议规定，其成员国将“维持和支持一支共同拥有和共同指挥的军事战略空间部队”。③但是，统一的指挥结果只维持几个月。在阿拉木图签署了独联体条约后仅仅一周时间，乌克兰和俄罗斯就对指挥方式发生了争执，到 1992 年 1 月初，乌克兰坚持要求拥有在其领土上的所有多用途部队和黑海舰队。④到夏天，实际上所有独联体成员国都开始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1992 年 5 月，俄罗斯建立了它自己的国防军，在这之后，它接受了留下来的独联体指挥系统。⑤从那时起，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就取决于双边谈判，虽然有几个成员国仍坚持由俄罗斯发起的独联体集体安全协定，允许俄罗斯军队在其他前苏联国家以多国部队的“名义”进行军事活动。由此看来，独立国家联合体并不是一个实体。

独联体在维持一个单一的“经济空间”方面，并不比保持一支统一的军队所取得的成功更大。每个前苏联共和国都宣称拥有对其边界之内所有财产的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赞成俄罗斯在 1992 年 1 月推行的激进的改革计划。经济政策实际上五花八门，各国鼓励采取保护措施，并给相互间的贸易——现已变为国际性贸易——设置障碍。

所有前苏联成员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保持共同国籍的建〔680〕议，这个建议是他最后一次对各共和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提出的。谁有资格确定国籍已成为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共和国之间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

曾经被苏联所占有的领土上的历史,从 1991 年起,成为不是由 1 个国家，而是由 15 个国家所拥有的历史，在试图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时，它们要同巨大的内在压力做斗争。 1995 年，在苏联解体四年之后，独立国家联合体仍然只是个概念。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其成员国似乎很有可能让它成为实体，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采取渐进的步骤，因为真正的行动还不存在。

俄罗斯的阵痛

叶利钦最初把政府交给了年轻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这些人乐观地认为，只要采取自由价格、取消对企业的补贴、实行有节制的预算等，他们就能使俄罗斯迅速建立起市场体系。他们最初的政策后来被称做“休克疗法”，特别是批评它的人这样叫。波兰早些时候曾使用过“休克疗法”，一些有严重财政金融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也曾这样做，实际上，俄罗斯并不存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许多要素。因而，把俄罗斯政府最初的经济改革政策称做“休克疗法”属于用词不当。

不管该政策的恰当名称是什么，它的确引起了震动。1992 年元旦，当许多日用品的价格放开后，一夜之间价格暴涨，不到一个星期，很多商品的价格比以前上涨了 10 倍以上。工资并未同步增长，存款已经一钱不值。

然而，失控的价格并没有引起竞争，因为大部分生产仍然由国家所垄断。除了最小的零售企业之外，私有化推迟了一年，由于毁灭性的高税率和官僚机构的敌意，新的企业步履维艰。官僚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改革或缩减，它仍然阻碍着私人的努力，共产党时代的规章成为腐败的温床。

俄罗斯议会从未同情过改革计划，它很快成为活跃的反对派。〔682〕立法机构行使其宪法权利控制了中央银行，任命前苏联银行行长维克多·格拉什琴科管理它，并坚持继续向国有企业和农场发放大量补贴。税收减少了，这一政策仅仅有助于增加预算赤字，加剧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尽管日用品价格在 1992 年 1 月的初次暴涨中上升了 245%，但它继续上涨，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500%，接着，1993 年在此基础上又上涨了 847%。⑥货币贬值甚至更迅速，到 1995 年初，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为 4500 比 1，而我在 1991 年 8 月离开莫斯科的职务时，这一比价为 27.6 比 1。

很多必不可少的公共事业仍由国有部门管理，这意味着，缺少一个政府管理的保险网，需要对公共事务给予大量补贴，不允许工业和农业中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破产和进行结构性重组。

甚至在苏联正式解体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就已经宣布，他反对经济改革计划。由于 1992 年经济混乱更为严重，他同叶利钦的不和加深了。当我于 1992 年 3 月拜会鲁茨科伊时，他仍然表示忠于叶利钦，但是他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到夏天，他开始公开反对政府，并参加了“中

间派”联盟，他们要求向市场经济进行渐进的过渡。曾经是戈尔巴乔夫忠实信徒的阿卡尔基·沃尔斯基也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领导着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该组织把中国看作市场改革的样板。他们欣赏中国所实行的那种保持政治稳定，推行渐进改革，迅速发展经济的做法。但是，俄罗斯不可能不加改变地实行中国的这种做法，即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实行自由化，同时实行最小限度的政治变革。俄罗斯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维持、即使暂时维持这种做法的政治结构。

叶利钦的另一个重要盟友是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他对叶利钦的改革计划也有不同意见。他和议会中持批评态度的人进行日益密切的合作，他开始公开反对叶利钦在 1992 年全年的政策。⑦叶戈尔·盖达尔是 35 岁的经济学家，叶利钦曾让他负责经济政策，他最初担任第一副总理，然后是代总理，他成为反对激进〔683〕改革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人们公认他是一位正直诚实，智力超群的人。他身材矮胖，长着一张娃娃脸，因而不具备在选举政治中十分有用的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他在阐述其政策时所使用的术语，也使那些对市场经济很不了解的公众难以听懂。他信奉“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创立的货币金融经济学，但他对管理官僚或管理使市场运转的机构毫无经验。

结果，当盖达尔政府宣布某些显著的成就，诸如放开价格、使多数私人经济活动合法化、允许卢布自由兑换、颁布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生产急剧下降以及垄断组织的欺骗榨取，公众的骚动不安也在不断地增长。此外，议会控制的国家银行无限制地印刷钞票，逐渐破坏着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即改革的关键举措。私有投资得不到什么保护，税务负担过重，以致企业家在交税后不能做到收支平衡。由于人们隐瞒收入，潜在的投资基金逃到国外，国家的税收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到 1992 年秋天，据熟悉情况者的估计，流出的资金达到 180 亿美元以上。⑧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批评，叶利钦在 1992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支持盖达尔及其政府。9 月份，叶利钦在一次私人谈话时告诉我，他认为盖达尔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并断然拒绝“将他解职”。⑨但是到了 12 月，叶利钦屈服于议会的要求，以温和的行政官员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他曾管理庞大的国营天然气垄断集团。

叶利钦总统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多数派的让步，并没有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议会拒绝扩大他依法统治的权力，并试图推翻某些已经推行的改革措施。在他们的压力下，叶利钦进行了谈判，但是，他同哈斯布拉托夫及最高苏维埃的其他领导人达成的每一个协议，都是还没有贯彻实行就不了了之。叶利钦希望举行全民投票，批准实行“总统制”共和国，而不是由立法机构享有最终权威，采用新的宪法，并批准提前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一贯断然拒绝他的建议，冲突变为各倾全力的政治斗争，议会威胁要弹劾叶利钦，叶利钦则威胁要在新的选举期间中止议会。

1993 年 4 月，就叶利钦同议会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所确定的〔684〕四个问题举行了全国性投票，结果显示，叶利钦仍然得到国家大多数人的支持，对他的改革政策，赞成者多于反对者，大多数人希望举行新的选举，特别是议会的选举。⑩叶利钦试图利用公民投票，迫使最高苏维埃提前进行选举，授权宪法会议采用新的宪法。一方面，他提议进行总统选举；另一方面，他又提议选举新的议会。然而，俄罗斯议会继续进行抵制，不仅拒绝提前举行

选举，而且让宪法会议准备起草新宪法。新宪法草案于 1993 年 7 月完成，但是，只有获得各州和各共和国的批准，新宪法才能生效，这一过程至多也就需要几个月，但因不够法定数量，它从来没有被正式通过。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 1991 年 3 月以他的政治前途为赌注举行公民投票一样，叶利钦希望 1993 年 4 月的公民投票授权他继续其改革政策，制服难以驾驭的立法机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夏季，叶利钦同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分歧扩大了，此时，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已能控制大多数选票。实际上，分歧已演化为全面斗争，每一方都力图摧毁另一方，成为俄罗斯的最高权力机构。俄罗斯那个拼凑的宪法不适于解决权力斗争问题，在新宪法应如何在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划分权力的问题上，双方继续进行争论。

行政一立法之争的双方开始违犯现有的宪法。诞生不到两年的俄罗斯宪法法院已证实它毫无能力处理这一危机，因为其首任主席瓦列里·佐尔金超越了法官权限行事，并企图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佐尔金不明智地去调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问题，当这样做不起作用时，他同议会中的过激分子站到一起，而坚决抛弃了合乎法官身份的不偏不倚和法定的程序。拘于党派偏见，他甚至宣称，叶利钦宣布的法令在得到议会批准和详细条款公布之前是违宪的。佐尔金把宪法法院牵涉到政治斗争中去，超出了这〔685〕个羽翼未丰的法院的能力，实际上摧毁了这个机构，阻碍了在俄罗斯建立起司法制度并确立法治的努力。

与此同时，由鲁茨科伊副总统和哈斯布拉托夫议长共同领导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过激分子，从激烈的言语转向暴力行动。哈斯布拉托夫无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一再裁定会议达到法定人数，而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他还不顾在投票时所发生的公然的违法行为；有时候，甚至电视摄像机也拍摄到这样的情况：在同伴缺席时，许多代表篡改桌子上的电子投票器。这就使少数派代表变成了多数，从而赢得了真正的多数派未必同意的选票。

最后，它导致了全面的战争，当叶利钦于 1993 年 9 月 21 日解散了最高苏维埃时，残余的议会（其成员远少于必需的法定人数）在俄罗斯的“白宫”设置了路障，投票选举了鲁茨科伊取代叶利钦，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并以这些非法行动为借口，建立了一支主要由反对苏联解体的无赖和强盗组成的私人军队。10 月 3 日星期天，鲁茨科伊派遣他的“杂牌军”去占领莫斯科的重要建筑。他们迅速占领了议会大楼对面的莫斯科市长办公室，并几乎成功地占领了几英里外莫斯科奥斯坦金诺区的电视广播大楼。他们还没有控制电视塔，就被忠于叶利钦的军队挡住了，但是已经有许多人死于战火之中。

俄罗斯议会的过激分子把政治斗争转变为武装起义，在几个小时内，他们似乎成功地控制了莫斯科。警察不是接到命令不得抵抗，就是因过于胆小而不敢抵抗；他们对星期天的进攻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抵抗。午夜前不久，叶戈尔·盖达尔在电视上呼吁莫斯科市民挺身而出，保卫他们的合法政府，就像他们在两年前所做的那样。

叶利钦莫名其妙地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他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克里姆林宫，据传说，他经过几个小时的说服，使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确信，应使用军队对付那些在议会大楼设置路障的议员。第二天，1993 年 10 月 4 日黎明，军队和坦克包围〔686〕了俄罗斯白宫，正像他们在 1991 年 8 月所做的那样，但这一次他们进攻了大楼，迫使残余的议员们出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摄像机拍下了全部过程，向世界展示了坦克向大楼上层开火

以及穿着肮脏衣服的议员们在军队的警戒下从大楼里鱼贯而出的情况。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被逮捕。

1993 年 12 月 12 日，俄罗斯人民得到了选举新议会的机会，但是要根据新的章程，而不是苏联时期的老章程。叶利钦在挫败了旧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后，提交了一个新的宪法以供全民投票来批准。它基本上是宪法会议制订的那个宪法草案，但删去了给予前“自治”共和国的某些特殊优惠。新的立法机构有不同的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下面的最高苏维埃由两院制立法机构所取代，一个是下议院，它像沙皇时代一样称做俄罗斯国家杜马，一个是上议院，即联邦院，它有些类似美国的参议院，但它的权力要小一些。

选民们以近 60%的多数票通过了新宪法，但是国家杜马的选举却使俄罗斯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国家杜马的半数议员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另一半则按地区选出。使大多数国家感到震惊的是，由自由民主党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提出的选举名单，得到了比其他政党名单更多的选票，而该党的党纲看上去更像是法西斯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尽管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最终比自由民主党赢得了更多的议席，因为它在个别地区的选举中更为成功，但是自由民主党、共产党和其他反对激进改革的政党——农民党和俄罗斯妇女党——的选票加起来足以使各种改革政党处于少数地位。（11）

各“民主主义”政党未能赢得国家杜马的多数议席，有几方面因素。“民主派”内部分裂，进行愚蠢的争斗。（12）叶利钦回避选举运动，拒绝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民族主义者和新的共产主义政党能够利用经济困难，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困难是改革者而不是以前的共产党制度造成的。

根据 1993 年 12 月通过的新宪法，俄罗斯议会所享有的权力要小于前届议会，一些批评叶利钦的人谴责该宪法专制。但在我〔687〕看来，他们的指责夸大其词：1993 年宪法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性总统职位，但它也规定了许多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防护措施。实际上，它所包含的特点，几乎都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其个或者更多的宪法中找到。例如，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至少是名义上的权力——并不比法国总统的权力更大。

俄罗斯国家杜马成立后所通过的首批法令,包括同意赦免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和 1993 年 10 月议会起义的所有参加者，这实际上是宣布它独立于行政首脑。叶利钦试图说服检察官否决议会的大赦，不要释放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的亲密伙伴，但是没有奏效。检察官阿列克谢·卡扎尼克将军命令将他们释放，然后提交了自己的辞呈。卡扎尼克不仅是由叶利钦所任命的，而且恰好也是前苏联人代会的议员，他在 1989 年曾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议席让给叶利钦。

国家杜马不再依法起诉前阴谋者的行动，使俄罗斯的法治可作两种解释。释放违犯前宪法的人，便难以增强法律的权威，但与此同时，社马拥有宪法权利，可以批准大赦或赦免，而叶利钦不能否决杜马一事，强调了新宪法所提供的权力分立。此外，卡扎尼克拒绝屈服于行政的压力和杜马的决议，体现了司法独立，尽管他随后的辞职表明，这种独立性今后不可能再采用。然而，新宪法通过了它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没有受到损害。

但是，一部宪法如果想产生效力，仅仅作为一个正式文件是远远不够的，1993 年俄罗斯宪法实施的时间还不长，因而目前还无法检验其活力。在 1994 年，叶利钦同国家杜马的关系，不像同其前任那样有那么多的风波，但这主

要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不理睬杜马。宪法允许他根据政令管理国家，只要这些政令没有被立法机构所撤销，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那个权力。

然而，依法治理并未加强叶利钦对国家的控制，因为这些政令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实际上，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日益脱离了莫〔688〕斯科的直接控制。尽管叶利钦任命了大部分地区的官员，但他们总是自行其是，只要符合他们个人的或者地区的利益，他们就反对莫斯科。俄罗斯迅速变成了一个联邦，不仅在理论上是联邦，在实际上也是如此。

到 1994 年底，大多数俄罗斯国有企业都正式实行了私有化，（13）但是，使很多人感到惊恐、少数人感到惊讶的是，新的所有者多数是以前的“ 社会主义 ” 经理。一些人非常迅速地学会了在新的准市场条件下如何进行有利可图的管理，他们常常只是把国有财产转为个人使用。其他人，特别是国家和集体农庄的经理和国防工业的经理，仍然在国家控制并享受国家补贴的旧体制中举步维艰，继续要求从预算中得到救济或施舍。

官方统计显示，如果它可信的话，生产的下降已经达到灾难性的比例：在 1994 年 9 月底，工业生产仅仅相当于 1990 年 1 月的一半。然而，这个数字是有疑问的，因为很多生产数字对税务检查人员及统计人员隐瞒了。其他资料，例如通常与生产相关的电力消耗的资料，则显示生产并没有出现那么严重的下降。（14）

苏联之后的统计数字看来被人为地缩小了，就像苏联时期的生产数字被人为地抬高一样。此外，某些种类工业生产的下降不会减少日用品的供应：如果国家生产更少的坦克、导弹和潜艇，在

这些行业工作的工人的收入可能会受影响，但是人民作为一个总体并没有丧失基本的生活资料。

事实上，尽管有很多困难，但是多数俄罗斯人仍设法克服了 困难，某些人还干得十分出色。从 1994 年第一季度的官方统计数 字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情况，它显示出，有 112.7 万人每月的收入在 2.5 万美元以上！他们只占人口的 0.7%，但是统计部门认为，人口的 10%是富裕的，大约 30%属于“ 中产阶层 ”。但还有约 27% 是“ 贫穷 ”的，即他们的收入在购买食品之后所剩无几，约 30%的人属于赤贫，几乎没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15）

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抱怨,但当民意调查人员在 1994 年向人们询问其家庭状况时，50%以上的人回答不错或更好。然而，在同一份抽样中近 70%的人认为国家的情况不好或者很糟糕。（16）分析人员指出，认为自己或者国家的情况不好或者很糟糕的人，在 1993〔689〕年 12 月大多投了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

到 1995 年初,甚至官方的统计数字都指出,工业生产的下降减慢了 :1995 年 1 月，工业生产只比去年同月降低了 0.7%。（17）

遗憾的是，向市场经济和法治转变的缓慢步伐，不仅因生产下降、剧烈的通货膨胀和意识形态的多变而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因为两种社会痼疾而深受其害，这两种恶性肿瘤不但发展迅速，而且开始相依为命，相互影响：他们就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在合法职责缩小的情况下反常膨胀的官僚主义。

犯罪活动深深植根于苏联的制度之中，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但只要苏联仍是一个警察国家，这种情况就不会为公众所清楚了解，尽管周期性丑闻———它通常因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而曝光—

—仅限于影响政府政策，或扩大在社会边缘的夹缝中活动的范围。

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这些限制因素不再存在。但同样重要的是，人民不了解使自由经济运转的观念、惯例和道德。几十年来，苏联公民被告知，贱买贵卖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而现在，俄罗斯人却被告之，这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认识到，所有束缚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

国有财产从未像个人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它是每个人的财产，那么它就谁的财产也不是。在整个苏联时代，小偷小摸行为很普遍。但是，大规模的盗窃和贪污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有时还要处以死刑，因而不是很普遍。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在 1989 年和 1990 年，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军官开始把国家财产转归自己使用，开展自己的业务，并在执法部门和税务部门建立起保护网。

当苏联最终解体时，这个有害的过程加快了速度，政府对控〔690〕制它看来无能为力。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用法律来控制因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产生的利益冲突；（18）结果，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他们只知道，如果他们同有权势的人关系良好，他们就不可能遭到清算。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是彻头彻尾的贼，但是，国有企业的经理组建同一类型的私人公司，然后再利用其官方地位为该公司获得有利可图交易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不仅政府公务员，而且选举出来的官员、军官和警官也常常一方面继续履行公职，一方面也从事第二职业。

官方机构似乎越来越不能完成哪怕是最基本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对履行商业合同几乎从没有提供任何保证，甚至不能保护企业家不受勒索。其结果是，提供武装警卫和其他安全服务的企业在 90 年代初发展得很快。那些不能负担安全服务费用的企业便成为绑匪勒索的对象，勒索者常常同更大的犯罪组织有关系，开始时他们要求获得利润分成，如果公司发展了，他们的要求便逐步升级，先是要求得到部分所有权，最终要求全面控制公司。

像其他社会的情况一样，不同的犯罪组织之间为控制地盘相互厮杀。被暗杀行刺的人数不断增加，某些著名人物也牵涉进去，新闻媒介对此很重视。人们常常不清楚，受害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同犯罪组织有关系，还是因为他们反对这种关系。有关的官方资料很少，也不可靠；暴力犯罪问题显然很难解决。

政府看来对解决不断增长的犯罪活动无能为力。部分原因是，杜马迟迟未能通过确认敲诈勒索为犯罪的法规，但更重要的是，犯罪团伙已经渗透到了官僚机构和执法机构中。尽管政府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不再管理所有的经济活动，但是文职人员的数量却增加了。俄罗斯不仅接管了苏联的官僚机构，还增加了这些机构的人数，而前苏联管辖地区的人口要两倍于俄罗斯。总统办公室成为官僚机构膨胀的一个突出例证：到 1994 年春天，叶利钦的办公室有 2 万名雇员，其中很多人的职责与政府其他机构重叠。

在多数政府部门中，工资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有时候，在预算紧缩期间，文职人员连续几个月得不到工资。由于常〔691〕常得不到好的指导和清楚的指令，即使很诚实的官员也禁不住尽量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谋取私利。

此外，腐败现象并未局限于政府的中下层官员。尽管证据只是一些趣闻轶事，但是多数寻求投资机会的西方商人发现，关键部门在其申请获得必要的批准和颁发执照前，通常要求他们向幕后的“顾问”付出大笔好处费。一

个在州里管理一家中型国营公司的俄罗斯朋友告诉我，1992 年曾让他去莫斯科担任部长职务，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把那家公司看成是他私人的，他想完成由公到私的转变。六个月后，一位新任命的内阁部长找到他，要求在他的公司投资 100 万美元。

“我认识‘萨沙’（即提到的那个部长，但这并不是他的真名）已有些年了，”我的朋友说，“在他到莫斯科工作前，他一个戈比投资也没有。但在 6 个月内他就拥有了 100 万美元的现金。许多人的情况都是如此，虽然切尔诺梅尔金和叶利钦很可能不是这样。”

普遍的腐败和暗中投资还导致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严重堕落。卫生保健的管理从来就不是很好，而现在就更糟了，某些已近乎绝迹的流行性疾病又开始流行，婴幼儿死亡率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日益下降。政府的教育、科研和文化资金严重削减，使许多知识分子不知所措，他们的工资降低了，工作保障也不复存在。在以前由国家给予补贴的部门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迅速适应由市场重新定价的局面。

俄罗斯民主发展和经济体制中的缺陷极为惹人注目，并被广为宣传，以致很多观察家都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某些良性事态发展。政治上混乱无序，但公民能够成立政党和团体而不受当局的横加干预。尽管有政府的压力，资金不足，新闻界仍保持着自由。到国外旅行最终不再受到政府的限制，虽然它取决于每个公〔692〕民的财力。尽管在 1993 年 10 月发生了流血冲突，但仍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并举行了选举，由反对总统的政治反对派所支配的议会也建立起来。甚至释放了那些企图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并允许他们恢复其政治生活。新的宪法为人权提供了基本保证，尽管司法制度还无法为履行这一保证提供充分依据，警惕的新闻界和有献身精神的人权战士保证，有组织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可能再被秘密掩盖。

甚至极为糟糕的经济也出现了某些光明。几个月时间内，价格放开了，商品短缺的现象无影无踪，仿佛有魔力似的，在城郊的商业中心，人们实际上发现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而且不需要排队等候。按照传统标准来看，价格很高，很多人买不起新的奢侈品，但在市场经济中表现积极主动的那些人是买得起的。当我们在 1992 年 9 月访问莫斯科时，丽贝卡的一个俄国朋友抱怨说，新鲜菠萝的价格太贵。丽贝卡说，她在莫斯科住了 11 年，但直到我们一年前离开时，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卖菠萝的。她的朋友笑了，并说：“看看我们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什么都买不着的时候，我们从不为价钱着急，而现在价钱却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

尽管俄罗斯人对广泛的经济混乱、失去工作保障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感到焦虑，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适应了新的环境。虽然只有少数人——最多占人口的 1/3，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但是根据民意调查，赞成回到过去的人甚至更少。人们所进行的真正争论是改革的速度、方式和公平程度，而不是其方向。

1994 年秋天，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诞生近 3 年时，在很多人看来，它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仍存在大量问题，但多数问题看来正在逐渐得到解决，或至少是有所改善。尽管总统与议会的关系既不亲密也不热乎，但已不像一年前那样一触即发了。资金从国家流出的情况似乎有所缓和，一些资金已开始回流。在 1994 年的春天和夏天，外国投资开始增长，人们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实际支持以稳定卢布，〔693〕

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够减少 1995 年预算赤字的话。

1994 年夏天的谨慎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整个秋季，卢布都在急剧贬值，资金开始重新流出。（19）恰在此时，在 12 月，当叶利钦总统命令俄罗斯军队进攻车臣时，国家陷入一场政治和道德危机，主张分离的车臣政权宣布了独立，武装其人民，并抗拒莫斯科的命令达三年时间。但在考察那场冲突的根源和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苏联统治下的另外 14 个共和国中发生的事件。

波罗的海国家情况

在所有脱离苏联的国家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显然为独立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它们以前曾是独立国家，一旦它们在 1989 年决定坚持恢复独立，它们便开始有组织地重整或建立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机构。

然而，经济转轨并不是很容易，特别是在立陶宛，它的经济没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么发达。经历了一年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之后，前共产党——它现在更名为拉脱维亚民主劳动党——控制了议会（塞马斯）。接着，在 1993 年 2 月，那个曾经公然反抗戈尔巴乔夫，领导多数立陶宛共产党人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在直接选举中当选为立陶宛总统。（20）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曾领导国家取得独立，他成为保守的反对党家乡联盟的领导人，该党由非共产党的萨尤季斯残存分子所组成。虽然有些报纸声称，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一事是“ 回到共产党统治 ”，但这是不公正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更像西方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前苏联的共产党。

不久，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经济开始好转，而立陶宛则依然如故，但这并没有及时地阻止那里的政治转变。独立后不久举行的〔695〕自由选举选出了由更年轻更激进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许多曾推动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落选。1992 年 1 月，爱沙尼亚议会以前运输部长季特・维亚希取代埃德加・萨维萨尔任总理，但他只担任了 9 个月总理就被 32 岁的马尔特・拉尔所取代，拉尔是一位历史学家，领导着基督教民主党。到 1992 年秋天，爱沙尼亚采用了新宪法，根据其规定进行了议会选举，以更年轻更激进的伦纳特・梅里取代阿诺尔德・昌特尔任国家元首，他成为新爱沙尼亚的第一任总统。（21）以前的共产党在新的议会中没有得到一个席位。

拉尔担任了两年总理，在这段时间内，他稳定了货币，撤除了多数关税壁垒，减少了补贴，以此促进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拉尔的党在 1994 年的地方选举中遭到惨败，他的两个盟友抛弃了他，选举之后几个月，即在 1994 年 10 月，爱沙尼亚议会迫使他辞职，并以看守政府取而代之，直到 1995 年 3 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22）通过那些选举，更关注社会保护而不是改革速度问题的政党控制了爱沙尼亚议会，并使季特・维亚希重新担任了总理。（23）

尽管个别党派的命运起伏不定，但是，爱沙尼亚的基本政策路线已经确立，政坛上党派结盟情况的变化不可能使之有很大的改变。

拉脱维亚直到 1993 年才举行了它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并也由此导致了政府的变化。只有战前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公民及其后裔才有资格投票，因而 34%的拉脱维亚居民不能参加选举。即使如此，选票也分散到了很多小的党派中，由两个最大政党组成的联盟仅仅控制了议会（塞依马）中的微弱多数，即 100 个议席中的 51 席。其结果，新任总理瓦尔迪斯・比尔卡夫斯仅仅担任了一年总理，他在第二年夏天被迫辞职，以支持曾担任其副总理的马利斯・盖

利斯。

爱沙尼亚前进的速度非常快，并成功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它同芬兰和北欧国家密切合作去做这些事情。爱沙尼亚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第一个建立了本国的货币克朗，并成功地使它同德〔686〕国马克相关联。虽然在1992 年曾出现短时间的通货膨胀，但不久物价上涨率就降到每月 4—5%，这一上涨率在西欧是非常高的，但比起其他前苏联国家达两位数的每月物价上涨率来说，它还是适中的。

拉脱维亚的变化过程类似于爱沙尼亚，但它同芬兰没有那种特殊关系，其大型工业设施的私有化速度也比较缓慢。它使其货币与美元相关联，但它的通货膨胀率比爱沙尼亚更高。然而到 1994 年，两国经济调整中最糟糕的情况看来已经过去。爱沙尼亚该年同芬兰的贸易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同俄罗斯的贸易。俄罗斯仍是拉脱维亚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但拉脱维亚与西方和北欧国家的贸易在增长。甚至有着更多麻烦问题的立陶宛，也显示出经济更为稳定的某种迹象。

苏联解体时，苏联军队仍旧驻扎在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基地中。说服俄罗斯撤走这些军队成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外交界最重要的目标。立陶宛与莫斯科迅速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在 1993 年撤离。然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得不进行更长时间的谈判，这是由于两国拒绝让苏联占领时期移居于此的俄罗斯人自动享有公民权，从而遭到俄罗斯的抵制。协议最后终于达成，驻扎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最后一批苏联军队于 1994 年 9 月 30 日撤离。

公民身份问题继续影响着俄罗斯同波罗的海沿岸北面两个国家的关系。立陶宛的人口中只有 20%的非立陶宛人，它对所有居民都给予了公民权；而很多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太小，不能同化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并保持其民族特点。因此，一方面，他们没有把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赶走；另一方面，他们剥夺了其中大部分人的公民权，并使加入所在国国籍一事极为困难。

在拉脱维亚，公民身份问题特别尖锐，因为拉脱维亚族人只占人口中的微弱多数。1992 年出台的法律使 1940 年之后来拉脱维亚定居的非拉脱维亚人很难获得公民身份，甚至连他们出生在拉脱维亚的后裔也是如此。这个法律障碍激怒了很多曾捍卫拉脱维亚的权利并追求独立的俄罗斯族民主派。它也震动了西方的人权拥护者，欧洲议会推迟接纳拉脱维亚，直到它放宽了公民身份法的限制。1994 年底，塞依马修改了这项法律，允许大多数现有居民在〔697〕2003 年年底之前享有拉脱维亚公民身份，几个月后，拉脱维亚加入了欧洲议会。

到 1995 年，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似乎都渡过了最艰难的转折时期。然而，它们决不是无忧无虑。所有三个国家继续为贸易不平衡问题所困扰，俄罗斯在 1994 年拒绝对它们的出口商品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使这一问题愈加严重。通货膨胀依然存在，尽管它们的货币在外国的交易市场上已经比较稳定了。多数人的生活标准继续下降，或停滞在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水准上。虽然犯罪问题和腐败现象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是两者已成为突出的问题。逃税现象很普遍，税收日益下降，为减少预算赤字，采取了克扣养老金和政府雇员工资的办法。

然而，比起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前苏联共和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不管其内部的政治运作如何，所有这三个波罗的海

国家的人民看来都知道其归属和目标。总的方向是西方，而对爱沙尼亚来说则是北方。不要多久，它们大约就能达到其目的地。

乌克兰：新的东西方斗争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主要来自乌克兰西部，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主要来自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他们的联盟使他们在 1991 年秋天有关独立问题的投票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票，但这种联盟是不合常理的，他们很快便分裂了。其结果是，乌克兰在它独立的头三年内没有就改革战略取得一致意见。它在经济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同俄罗斯完全一样，但在形式上更为夸张。它的通货膨胀甚至比俄罗斯更严重。乌克兰发行的代金券——打算在使用新的货币格里夫纳前当作临时货币——在 1991 年与卢布等值，但是 3 年后，它贬值为不到卢布的 1/20，此时，10 余万代金券才值一美元。

乌克兰的经济因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而深受打击。俄罗斯是其主要供应者，乌克兰独立后，俄罗斯立刻开始要求乌克兰以世〔699〕界市场价格支付其能源产品。每隔一定的时期，乌克兰便会积攒过多的未支付账单，致使俄罗斯中断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并总是在经过若干谈判，并支付了部分欠账后才恢复供应，但到这时候，能源供应的中断已经损害了乌克兰的工业生产，造成了消费品的短缺。

与此同时，乌克兰与俄罗斯就政治和军事问题的争论正在逐步升级。苏联军队解体时，乌克兰不仅要求得到驻扎于其领土内的陆军和空军——俄罗斯立即答应了这一要求，尽管交换军官和士兵的工作需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而且要求得到黑海舰队。俄罗斯人一直把黑海舰队看作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大多数军官也把他们自己看作俄罗斯人，但自从赫鲁晓夫在 1954 年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后，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便位于乌克兰的领土之内。一开始，俄罗斯拒绝了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要求，但是后来它又同意由两国分割该舰队。谈判进行了约两年，双方达成了解决办法。乌克兰同意只拥有远少于一半的舰艇，而俄罗斯则购买乌克兰的部分所有权。然而，就使用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一事的谈判在 1995 年继续进行。（24）

驻扎在乌克兰的苏联核力量，成为乌克兰与苏联和美国的另一个争论焦点。苏联解体时，这些核力量形式上由独联体指挥，但是叶利钦控制着“ 黑盒子 ”，并于 1992 年代表俄罗斯承担了正式的有效控制。尽管乌克兰政府早些时候曾同意放弃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但是乌克兰议会拒绝授权把核武器转移到俄罗斯。

乌克兰议会企图控制核武器一事，（25）造成了它与美国之间的不和。美国在承认乌克兰独立时有一个谅解，即乌克兰遵守它与苏联所签汀的战略武器协议，承担核不扩散条约的责任。1994 年 1 月，该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美国的斡旋下，俄乌双方达成了协议，乌克兰同意将导弹交由俄罗斯销毁，俄罗斯则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核电站所需燃料。（26）随后，乌克兰议会批准了该协议，1994 年底，乌克兰作为无核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1992 年和 1993 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经常加剧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它发出了帝国主义的叫嚣，许多俄罗斯的“ 爱国主义者 ”〔700〕仍然不承认乌克兰有权获得独立，他们鼓吹由俄罗斯完全控制黑海舰队，并使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1993 年 7 月，俄罗斯议会甚至批准了一个议案，宣称塞瓦斯托波尔“ 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俄罗斯联邦领土的一部分 ”。这就直接违背了 1991 年 9 月它通过投票所做出的选择，当时，俄罗斯议会批准了独联体条约，承

认所有独联体国家的现有边界。（27）

乌克兰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胡闹在俄罗斯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使乌克兰与俄罗斯很难进行合作，虽然这种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乌克兰不仅拒绝加入独联体的集体安全条约，而且在一开始还反对所有协调经济政策的努力。1992 年 9 月，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告诉我，他甚至反对乌克兰参加非官方的经济咨询委员会，如果俄罗斯也参加的话。一年后，乌克兰继任的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他曾任乌克兰东部一家导弹工厂的领导人——对修复与俄罗斯破损的关系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在基辅做东道主召开了一次会议，组建了一个非官方的协调机构。然而，他还没有做多少事就辞职了。

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经济继续滑坡，公众的不满情绪上升了。由于随之而来的地方主义，局势变得特别危险：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各州，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许多原有的乌克兰人在文化上也俄罗斯化了，他们比住在乌克兰西部的人更为不满。然而，除了克里米亚之外，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次要因素：重工业大部分位于乌克兰东半部。那里巨大的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它们不但人员严重超编，管理混乱，而且技术落后。很多企业污染严重。需要进行改革，在乌克兰建立可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不可避免地使东部地区人民的负担格外沉重。某些观察家开始怀疑，如果地区之间相互疏远的趋势继续下去，乌克兰是否能够维持统一。

1994 年 6 月，我去基辅参加乌美联合举办的有关国家安全决定因素问题的讨论会，我发现，乌克兰的官员和学者们对这些词汇的使用与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主要是指能够有效地抵抗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乌克兰人则关注来自内部的威胁。他们对我们说，民意调查显示，政治态度出现了危险的两极分化。他们感到，对〔701〕乌克兰独立更直接的威胁，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不是俄罗斯，尽管他们也抱怨，俄罗斯人倾向于把他们看作任性的亲戚，而不是地位平等的邻居。

最尖锐的地区问题发生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占该地区人口的 2/3 以上，在过去 200 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此外，它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的旅游业和黑海舰队。尽管该地区大多数人在 1991 年 12 月投票赞成乌克兰独立，但他们只是赞成从苏联获得独立，而并不赞成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人。当乌克兰经济迅速恶化、比俄罗斯更严重时，乌克兰要求得到黑海舰队一事，疏远了许多现役和退休的海军家庭，俄罗斯旅游者不再去克里米亚的旅游胜地度假，克里米亚人选举了一个要求自治的立法机关和一位要求独立的总统——很多人认为，这是它同俄罗斯重新统一的过渡步骤。

基辅政府处理克里米亚的独立倾向很成功，比它进行经济改革更为有效。它准许克里米亚在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家中享有自治地位，但拒绝克里米亚脱离基辅的最终控制。在 1994 年的大部分时间，基辅和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间进行了一场“法令之战”，但是基辅当局尽力不使用武力，实际上，当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尤里·米什科夫——他于 1994 年 1 月当选为克里米亚总统——卷入与克里米亚议会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时，独立倾向似乎烟消云散了。到 1994 年底，地方议会剥夺了米什科夫的大部分权力，大大削弱了推动克里米亚独立的力量。此外，俄罗斯政府认识到克里米亚问题的潜在煽动性，他们开始设法冷却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发热的大脑。无论叶利钦还

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拒绝同米什科夫打交道，并且重申，俄罗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1994 年 7 月，当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宣布该城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时，俄罗斯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正像辛菲罗波尔的克里米亚政府所做的那样。〔702〕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克里米亚人都愿意脱离乌克兰的管辖。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占人口的 30%以上，其中包括被斯大林流放到中亚，后来大批返回故乡的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宁愿由乌克兰控制该地区，而不愿受俄罗斯的统治。

1995 年 3 月，库奇马总统利用克里米亚的政治分裂，取消了克里米亚的总统一职，解散了地方立法机关，并命令举行新的选举。他清楚地表明，克里米亚宪法必须进行修改，删除与乌克兰宪法相抵触的条款。他的行动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中激起了一阵愤怒的抨击，有个右翼议员甚至在争论中焚烧了一面乌克兰国旗，但是，叶利钦政府断然拒绝支持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者。俄罗斯同车臣已经有很大麻烦，它不想再对公认的国家边界提出异议。

尽管在基辅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爆发了春季危机，但是在 1995 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而相互大打出手危险比 1992 年和 1993 年要小。如果乌克兰能够解决有关黑海舰队的争端，制止其经济的下降，吸引俄罗斯游客回到克里米亚半岛，那么，克里米亚想获得独立或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愿望很可能落空。

在 1994 年选举期间，乌克兰的地区紧张状况变得明显了。1993 年乌克兰东部的劳工骚动，特别是顿巴斯煤矿工人的长期罢工，迫使政府准备于 1994 年 3 月提前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比宪法所要求的提前了一年。东部地区选举的议员主要是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人士，而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人士则在西部地区的所有竞选中获胜。

有七位候选人参加了 6 月份的总统竟选。克拉夫丘克总统的形势最为有利，但是，观察家对他能否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感到怀疑。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计票结果，克拉夫丘克得到的票数最高，但并没有过半数。他不得不同前总理列昂尼德·库奇马再进行一次角逐，库奇马也得到了超过 30%的选票。竞争十分激烈，克拉夫丘克的支持者指责库奇马想使乌克兰回到俄罗斯，库奇马的支持者则指出克拉夫丘克要为乌克兰的经济困境负责。7 月 11 日，公民们参加了第二轮投票，库奇马居于领先地位。他赢得了〔703〕所有票数的 52%，取代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然而，两人的支持者地域分明：库奇马所获票数的 80%以上来自东部地区，而克拉夫丘克所获票数的 87%来自 3 个西部省份，这 3 个省份中只有 4%的选票投给了库奇马。

尽管在竞选期间出现了政治和地域的两极分化，但是从克拉夫丘克到库奇马的权力交接进行得很顺利。克拉夫丘克及其支持者输得很有风度，证明他们尊重民主程序。就库奇马来说，他很快使全国团结起来，决心加快经济改革，并保证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乌克兰，并且不损害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此，他反对建立任何超国家的独联体协调组织，担心俄罗斯将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应由双边协议来决定。

库奇马还立即着手改善同西方的关系。 1994 年 11 月，他正式访问了美国，强调他所保证的改革，决心实现乌克兰成为无核国家的承诺。回到基辅后，他说服议会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给予他广泛的权力以推行改革计划。他还设法筹集了大笔贷款，并从美国、欧共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了提

供经济援助的保证，不久之前，所有这三方还因为乌克兰的核政策和它缺少一个可靠的改革计划，而对是否提供援助踌躇不决。

在 1995 年初，乌克兰仍因依赖进口能源而负担沉重。它欠俄罗斯 25 亿美元，欠土库曼斯坦天然气款 7 亿多美元，但它仍未找到以出口商品归还欠账的措施。但是，乌克兰实行真正经济改革的前景十分光明，超过了它独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如果乌克兰继续进行改革，外国援助将能有效地减少其困难。

虽然在 1994 年的选举中出现了分裂,但其结果实际上有助于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最不忠诚的地区选举了新的总统，但这反而促使他进行经济改革，而东部的各派势力到当时为止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提醒了住在西部的乌克兰〔704〕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希望保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他们必须避免乌克兰化的政策，并建立一个以各民族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乌克兰国家。因而在 1995 年，一个客观的观察家可以说，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乌克兰挺过了它独立后的最初三年，经受住了第一次民主考验。如果在乌克兰人民中能够确立一种信念，即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民族，而是忠诚于乌克兰国家，那么它肯定能够维持其独立，并最终成为重要的欧洲国家，享有与此相称的地位。

白俄罗斯：难道你想让我们走回头路？

白俄罗斯的独立看来近乎偶然，尽管少数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决心获得独立，认为独立是恢复民族生机的先决条件。白俄罗斯（28）共产党的许多官员，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的领导人，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独立问题，直到 1991 年 8 月的未遂政变失败使他们突然失去了莫斯科的庇护人。那一打击促使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告独立，并屈服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意愿，以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拼写白俄罗斯的国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俄语拼写国名。

然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多数人并不赞成独立。实际上，他们继续像从前一样统治国家，并焦虑地注视着莫斯科的所有变化，期待这种变化能使老大哥认识到应把他们拉回到大家庭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是议会主席和国家首脑（直到 1994 年选举出一位总统），他认为白俄罗斯应该独立——毕竟，他是独联体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但他既不能控制最高苏维埃，也不能控制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总理，克比奇是他的政治对手，他还忠实地代表着旧的官僚阶层的利益。

在 1992 年 9 月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舒什克维奇向我抱怨说，他无法迫使经济官僚采取哪怕是最初步的经济改革步骤。民族主义反对派试图以请愿书的方式——这是宪法所准许的——敦促举行新的选举，但是遭到议会的断然拒绝，议会直接违犯宪法的规定，干脆裁定该请愿书非法。然而，反对派对议会的违宪行〔706〕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对那些按照苏联时期的方式继续管理白俄罗斯经济的人，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挑战。

但尽管如此，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俄罗斯不愿再像苏联政府那样向白俄罗斯的国有工业提供补贴，尽管白俄罗斯人敦促缔结一个使它与俄罗斯结为一体的一揽子协议：建立军事同盟，建立经济协调委员会，订立有关边境地区政权的协议——它看来是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以前，外部补贴曾使白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得以运转自如，缺少外部补贴，使白俄罗斯经受了同俄罗斯一样的损伤，但却没有导致任何改革。1992 年，生产急剧下降，通货膨胀率接近 1000%，而这仅仅是开始。 1993 年，生产继续暴跌。当俄罗斯开

始要求它以世界市场价格支付进口的能源产品时，白俄罗斯像乌克兰一样，经受了债务问题的困扰。1993 年 8 月，它欠俄罗斯的债务达 3.5 亿美元，俄罗斯削减了近 2/3 的天然气供应。

白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反对改革路线，但它小心地不去得罪西方国家，就像它小心翼翼地讨好俄罗斯那样。白俄罗斯很快便同意从其领土上撤走所有核武器，甚至比协议所要求的更迅速。然而，没有进行私有化进程，使白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不那么有吸引力，它同西方的贸易受到了其支付能力的限制。

1992 年和 1993 年形成的政治紧张局势到 1994 年初达到了顶点，当时白俄罗斯议会投票罢免了议会主席舒什克维奇。随之进行了总统选举，因为最高苏维埃已经修改了宪法，设置了总统职位。舒什克维奇和他的竞争对手克比奇总理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泽农·帕赞亚克都是候选人。然而，他们都未获得成功。人民对政治争斗和经济管理不善感到厌烦了，他们投票选举了候选人中的黑马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是 1991 年白俄罗斯议会中唯一投票反对独立的议员。他作为反腐败战士和俄罗斯的朋友参加竞选，虽然他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得到过半数票，但在与克比奇的决定性投票中，他得到了 80%以上的选票。〔707〕尽管卢卡申科善于利用公众的情绪和公众的担忧，但他没有任何真正的计划，一旦这种情况变得明显，他所任命的人遭到批评，他就开始实行新闻管制。曾在竞选中支持他的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成员辞职了，白俄罗斯在 1995 年再次陷入政治混乱之中。

很多白俄罗斯人认为，同俄罗斯更紧密的结合能够拯救他们。在总统选举前不久，克比奇总理与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签署了白俄罗斯加入卢布区的协议；俄罗斯将控制货币政策，并无偿使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但是，白俄罗斯人可以按 1 比 1 的比价用他们的某些地方卢布兑换俄罗斯卢布。鉴于白俄罗斯卢布当时仅值俄罗斯卢布的 1/10，这种兑换显然是非常有利的。然而，由于来自两国的反对，这种谅解很快就瓦解了：多数俄罗斯经济学家和财政官员都认为，这样做代价太高，而且可能控制不住俄罗斯的货币发行量。许多白俄罗斯人也不愿意为了有限的和一时的好处，而让俄罗斯控制其货币政策。该协议在达成一年后也未能得到履行，而且看来决不可能履行了。

难点在于，俄罗斯不愿意承担同白俄罗斯结成经济同盟的代价，因为白俄罗斯仍保持着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白俄罗斯战略地位重要，它位于历史上从西方入侵俄罗斯路线的两侧，即使如此，它也不值得俄罗斯把其资源投入一个没有竞争力的经济中。当然，渴望白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接受从属于俄罗斯的地位，刺激了俄罗斯“爱国者”的自豪感。但是，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到自豪的结果，这种喜悦便消失了。

1990 年和 1991 年，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曾进行了几乎是无望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它没有成功，后来它突然看到其梦想出乎预料地实现了，然而它在政治上继续表现出无能。尽管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并不是人民阵线成员，而是个温和的而非激进的改革者，但他献身于维护白俄罗斯独立的斗争，成为人民阵线中有政治影响的希望之星。然而人民阵线从未与他携手合作，在总统选举中，人民阵线反对他当选，从而分散了改革派的选票。像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一样，人民阵线似乎总是把一个可以得到的好人变成理论上最厉害的敌人。

白俄罗斯无论如何需要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尽管那些现在从〔708〕政治

上控制着国家的人亟盼与俄罗斯结成更紧密同盟，但他们首先必须创造出条件使俄罗斯值得这样做。他们不可能靠莫斯科的补贴来维持苏联式的经济体制，因为莫斯科已经付不起了。但如果白俄罗斯建立一种有价值的伙伴关系，进行经济改革，使之能够吸引投资，它将不再需要俄罗斯——除了作为一个好邻居。

康尔多瓦：第五纵队与老大哥

自从摩尔多瓦独立以来，在它德涅斯特河以东的领土上就发生了起义，起义从它与乌克兰接壤的北部边界不规则地延伸到其东部边疆地区。甚至在独立前，一个由俄罗斯族人所领导的分离主义政权就对摩尔多瓦“左岸”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并宣称它是独立的。（29）无论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承认这个“德涅斯特共和国”，（30）其原因，至少因为它看来只代表了该地区人口中的少数，那里的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在人数上都超过了俄罗斯人。但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第 14 军的领导人支持分离主义政权，并有效地阻止了摩尔多瓦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

俄罗斯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德涅斯特共和国，但与此同时，它不仅没有采取行动，控制随心所欲的第 14 军，甚至还对蒂拉斯波尔政权提供了经济支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就此与莫斯科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到 1995 年初，双方达成协议，俄罗斯军队将在三年内从摩尔多瓦领土上撤走。然而，虽然俄罗斯遵守了这个时间表，但此时那个分离主义政权已经为它所拥有的人数众多的军队获得了武器，这支军队似乎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抵抗西摩尔多瓦军队占领该地区的任何企图。

尽管德涅斯特共和国的领导人声称，他们的行动代表了摩尔多瓦俄罗斯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摩尔多瓦“右岸”俄罗斯人的支持，那里的俄罗斯人更愿意同基希纳乌的摩尔多瓦政府打交道。他们的主要目标看来是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权，他们无情地镇压了控制区域内的摩尔多瓦和乌克〔710〕兰文化。然而，这块飞地的经济状况在 1994 年迅速恶化了。地方货币很快就变得一钱不值，许多工厂关门，德涅斯特政权的困难日趋严重，甚至不能向当地的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

基希纳乌和蒂拉斯波尔都有充分理由达成协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对此给予强有力的推动， 1994 年它倡议召开和平会谈，并建议给德涅斯特河以东地区以特殊地位。斯涅古尔总统经常与德涅斯特政权的领导人伊戈尔·斯米尔诺夫会晤，但直到 1995 年初仍未达成协议。然而，多数观察家认为，如果俄罗斯就此施加压力，斯米尔诺夫将不得不达成协议。

对于摩尔多瓦南部讲土耳其语的加告兹人所发动的较小的分离主义威胁，摩尔多瓦政府处理得更为成功。有一段时间，加告兹领导人曾同河对岸德涅斯特共和国的斯拉夫人政权进行合作，但是在 1994 年，他们与基希纳乌取得了谅解，决定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摩尔多瓦领导人一方面要应付俄罗斯人和加告兹人的反叛，一方面还不得不设法回绝某些摩尔多瓦人提出的同罗马尼亚结盟的要求。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曾在 1990 年控制摩尔多瓦的政治生活,但在独立前它已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少数派想同罗马尼亚重新统一，但是多数摩尔多瓦人，包括较年长的人民阵线领导人更赞成独立。然而，要求与罗马尼亚重新统一的少数派运动为企图从摩尔多瓦分离出去的“德涅斯特共和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借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尔多瓦政府在 1994 年 3 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参加投票

的人有 95%反对同罗马尼亚合并。（31）公民投票使情绪冷却下来，并使斯涅古尔和斯米尔诺夫得以进行后来的谈判。

由于受到少数派分离主义运动和收成不好的困扰，摩尔多瓦政府开始时实行经济改革的步伐很慢，尽管这看来无疑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尽管存在着国家资格问题的压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压力——它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除了中亚各共和国，它是前苏联共和国中领导独立的领导人中仍然在位的少数国〔711〕家之一：米尔恰·斯涅古尔总统的地位似乎特别牢固，但他是靠政治领导，而不是靠镇压来保持这种地位。

摩尔多瓦现任总理安德烈·桑盖利领导着一个多民族的联盟，他从 1992 年年中开始担任总理职务。议会发言人彼得·卢钦斯基在 1989 年和 1990 年是共产党第一书记。他从 1991 年起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工作，苏联共产党解散后，他回到摩尔多瓦。在 1994 年的选举中，他的民主农民党得到的票数最多。尽管他过去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他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但他证明是一位坚定支持市场改革的人， 1994 年选举后，这一改革进程加快了。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摩尔多瓦的改革步骤，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向它提供了大笔贷款。摩尔多瓦货币从 1993 年底开始使用，它出人意料地坚挺，在 1994 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从 1 月份的 45%下降到 12 月的约 5%。

自 1991 年以来，摩尔多瓦政治领导层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面对着敌对军事挑衅和反摩尔多瓦人的暴行，它仍设法在它所控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因而，摩尔多瓦正在多民族的基础上确立它的国家资格。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因为摩尔多瓦政府不希望用军事手段击败德涅斯特河对岸的分离主义者。然而，如果领导人心胸狭隘，手段笨拙，他们的反应很可能是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煽动民族仇恨，赶走少数民族居民，就像跨高加索地区和前南斯拉夫的情况。斯涅古尔总统及其同事们应受到称赞，因为他们坚持和解和不歧视政策。如果摩尔多瓦经济复苏，他们就可能用和平手段控制德涅斯特的分离主义者——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就把分离主义者封锁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

格鲁吉亚：分裂的代价

格鲁吉亚分裂而争吵不休的政治派别，它的难以驾驭的少数民族，它的越来越独裁和乖戾的总统，使它自苏联解体以来陷入到内战之中。

自从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于 1991 年 5 月以压倒多数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他便开始逮捕其政治上的反对派，并继续〔713〕试图以武力压服南奥塞梯人。这就导致了 1991 年 8 月的政治危机，并使他同若干主要支持者关系破裂，其中包括总理西谷阿和国防部长基托瓦尼。到 1991 年 12 月，除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家乡明里利亚之外，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起义。人们聚集到第比利斯，要求他辞职，由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人所控制的武装组织支持他们，反对派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包围了格鲁吉亚议会大厦，那里是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避难所。1992 年 1 月 4 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它已在“反对罪恶政权的民族民主起义中”夺取了政权，两天后，加姆萨胡尔季阿飞离格鲁吉亚，他先飞往亚美尼亚，接着又飞到闹独立的俄罗斯省份车臣，从格鲁吉亚到那里要飞越高加索山脉。（32） 加姆萨胡尔季阿企图返回格鲁吉亚，组成协调委员会以统治国家，直到举行新的选举，军事委员会设法阻

止了这一企图，尽管如此，格鲁吉亚仍然因意见分歧和政权不可靠的合法性而备受折磨。尽管美国和欧共体在苏联解体时曾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但由于那里的政治混乱状况，它们推迟了与它建立外交关系。在进行了几个星期反复而无效的谈判后，反加姆萨胡尔季阿派的领导人邀请住在莫斯科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回来组织新政府。1992 年 3 月初，谢瓦尔德纳泽回到第比利斯，他赞成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各政党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 10 月份如期举行了格鲁吉亚的议会选举，谢瓦尔德纳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获得了总票数的近 96%，当选为议会主席。

谢瓦尔德纳泽尽力团结格鲁吉亚的各个派别，并与各少数民族谈判达成解决办法。然而，他没有控制两个反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主要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缺乏约束的行动逐渐破坏了他使国家实现和平的努力。事实上，国防部长基托瓦尼未经授权，便于 1992 年夏天进攻了苏胡米的阿布哈兹议会，发动了一场格鲁吉亚军队难以支撑的战争。俄罗斯的军队指挥官们对谢瓦尔德纳泽心怀怨恨，因为他在任苏联外交部长期间，支持削减军备，所以他们像〔714〕某些北高加索领导人那样，支持阿布哈兹的叛乱分子，到 1993 年 9 月，格鲁吉亚军队及 20 多万格鲁吉亚族难民被赶出了阿布哈兹。（33）当谢瓦尔德纳泽试图结束冲突、同意从苏胡米撤走格鲁吉亚军队及其重炮以换取停火和谈判时，格鲁吉亚遭到了最终的失败。格鲁吉亚的重炮和大部分军队撤离后，阿布哈兹人违反了停火协议，对尚未撤走的格鲁吉亚军队横加蹂躏。

格鲁吉亚军队逃离阿布哈兹后，加姆萨胡尔季阿再次发动进攻，迫使谢瓦尔德纳泽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要求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允许俄罗斯有权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在此之前，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俄罗斯帮助格鲁吉亚军队打败了加姆萨胡尔季阿，并维持了阿布哈兹边界的原状。

加姆萨胡尔季阿对谢瓦尔德纳泽领导地位的威胁随着 1993 年的结束而终结： 1994 年 1 月，他的遗孀宣布他已自杀。其他报道认为，他是被他的某些随从所杀，或死于其他方式，除了他的某些最狂热的支持者，人们都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死亡。然而，阿布哈兹的挑战仍然存在：阿布哈兹的民族主义者控制着整个地区，继续阻止格鲁吉亚的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战争和自相残杀的政治斗争摧毁了格鲁吉亚的经济。在 90 年代初的混乱状况下，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1992 年的工业生产实际上已经崩溃，几乎不到两年前水平的 1/3。（34）1993 年的经济崩溃继续发展，尽管第二年的下降不那么明显——实际上，格鲁吉亚已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准——但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善。

在加姆萨胡尔季阿死后，格鲁吉亚的政治仍然处于骚动之中。谢瓦尔德纳泽设法击退了逼迫他辞职的多次尝试，并逐步削弱了迄今一直实行自治的军事组织的影响。 1993 年，田吉兹·基托瓦尼和杜扎巴·约瑟利亚尼——他们两人都拥有私人军队——被体面地解除了在国防委员会中的职务，基托瓦尼所担任的国防部长职务也被别人取代。后来，基托瓦尼于 1995 年 1 月被逮捕，当时他未经批准，就试图率众进攻阿布哈兹。武装盗匪——名义上归政府控制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控制住的武装——的活动渐渐减少了。当丽贝卡于 1994 年 8 月访问格鲁吉亚时,她发现人民因战争和经济混乱而感到精疲力竭，但他们对局势的好转仍抱有希望，国〔715〕家能够重新团结起来并维持下去。

事实上，在 1995 年初，局势似乎就显示出了某种光明的前景，比苏联解体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光明，尽管困难问题仍然不少。阿布哈兹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实体，它仍然阻止格鲁吉亚难民返回家乡，但是俄罗斯的和平调解人强制实行了停火，在联合国调停人倡议下举行的对话也对解决问题提供了某种希望。格鲁吉亚货币就像 20 年代初通货急剧膨胀时期的德国马克一样，几乎毫无价值： 1994 年底，1 美元可以购买 100 多万格鲁吉亚“ 息票 ”。犯罪团伙和腐败的政府官员仍在掠夺经济中所剩无几的财富。政治活动继续保持反复无常和高度个人化的特点。然而，战争停止了，并存在着开始重建过程的机会——如果能够避免再次爆发严重的自相残杀的冲突。

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所面临的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比他就苏联军备问题与西方达成协议、以便使戈尔巴乔夫获得改革机会的工作更为艰难。但是，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宽容和他所具有的礼貌的美德引入他的国家，那么，他将名垂青史，不仅是作为结束冷战的政治家，而且是作为近代格鲁吉亚国家之父。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民族仇恨的代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不仅支配着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的关系，而且支配着两国的国内政治。亚美尼亚武装在该飞地的行动日益左右事态的发展。亚美尼亚政府支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但它发现它的政策和经济愈来愈取决于该地区的事件。尤其是，亚美尼亚政府不能迫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的好斗分子同阿塞拜疆人讲和，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府都不能使它们的经济恢复正常。

军事成功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领导人敢于抵制要他们妥协的呼吁。苏联解体时，该飞地的战争加剧了，几个月时间内，那里的亚美尼亚人就击败了被派去对付他们的阿塞拜疆〔716〕军队，并强迫阿塞拜疆族人逃走。他们还经阿塞拜疆领土开辟了一个走廊，以保持同亚美尼亚的陆地联系。这些行动迫使成千上万的阿塞拜疆族人离开了家乡，这还不算以前被从亚美尼亚赶走的那些人。（35） 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失败，导致了不止一届巴库政府的倒台。独立后不久， 1992 年 2 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村庄发生了大屠杀，阿亚兹·穆塔利博夫总统被迫辞职。在 6 月份进行新的总统选举前，出现了几个月的政治混乱。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布尔法兹·叶尔切贝是位大胡子的东方学专家，他获得了 60%的选票，人民阵线在 1991 年 1 月曾被苏联军队赶下台，现在重新控制了阿塞拜疆政府。

然而，叶尔切贝担任总统职务只有一年，就被迫逃离巴库，以免遭到其政治对手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阴谋策划，盖达尔·阿利耶夫——他曾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在 80 年代离开了苏联领导层——在叶尔切贝离开后终于在 1993 年 6 月控制了巴库政府。几个月后，他安排了另一轮总统选举，并宣布他获得了 98%以上的选票。（36）

阿利耶夫靠着镇压和灵活的策略维持其地位。他试图动员多数派别支持他，但却压制政治反对派和新闻媒介。他舍弃了作为共产党人的过去，宣布了市场改革政策——然而，这一改革难以实现。尤其是，他把阿塞拜疆的经济前途押在了某个国际财团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上，这家由外国石油公司组成

的财团打算开采里海下面的石油蕴藏。然而，俄罗斯对阿塞拜疆宣称拥有里海海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还要求任何输出石油的管道都应经过俄罗斯领土。1995 年仍在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和谈判。

正当石油交易为阿塞拜疆的未来展现出某种希望的时候，其经济自独立以来却一直在急剧下降，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复苏的迹象。

〔717〕　亚美尼亚甚至经历了更加灾难性的经济混乱。由于阿塞拜疆的抵制，陆路运输路线大多中断，再加上格鲁吉亚的混乱以及国家还没有从 1988 年毁灭性的地震中恢复过来，所有人都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然而，私有化和其他改革措施在亚美尼亚进展得非常迅速，超过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官方资料显示，亚美尼亚经济在 1994 年开始恢复。据说，工业生产比前一年上升了 1.8%，国家收入上升了 2.6%。但要使人民感受到他们凄惨的生活水平已有所改善还需假以时日。（37）

然而，比起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来，亚美尼亚在独立的头三年在政治上十分稳定。列翁·捷尔-彼得罗相于 1991 年当选为总统，此时他仍是总统，尽管到 1994 年亚美尼亚的反对党派变得更为活跃，并开始要求他辞职。他也开始使用高压手段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例如，在 1994 年 10 月的政治危机期间，他对反对派达什纳克党颁布了临时禁令，借口是它包庇从事政治暗杀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达什纳克的领导人否认这一指责。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之前，人们很难看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能够使它们的经济或政治得到稳定。1995 年初，一项脆弱的停火协议开始生效，但此前的所有的调解努力

都失败了。早些时候，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接受了一项建议，但它却遭到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的亚美尼亚领导人的拒绝。因而对抗仍在继续，对于数百万跨高加索地区的人民来说，对抗不停止，他们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中亚：实行改革的国家

民族问题困扰着所有前苏联共和国，而哈萨克斯坦所存在的问题是其中最严重的。哈萨克人在独立后控制了权力杠杆，但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共和国中却是少数民族。俄罗斯人的数量几乎同哈萨克人一样多，这个国家也是其他许多民族的家园，例如伏尔加日耳曼人、维吾尔人、乌克兰人和朝鲜人。毕竟，这里在斯大林时代是被流放民族的主要收容所之一，赫鲁晓夫曾将数百万居〔718〕民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北部从事农业，在此之前，那里一直是牧场。

其结果是，多种民族最终散布在这个国家，俄罗斯人口在北部占优势，而哈萨克人口则在南部和东部占优势。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敌视确实很可能使国家分裂。

1992 年，我问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什么因素使他领导中亚各国加入了独联体，尽管他强烈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条约。他回答说，一俟三个斯拉夫共和国决定脱离苏联一事变得明显，他就意识到，如果苏联分裂为一方是斯拉夫语民族，一方是突厥语民族，那么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尽管他希望有一个更强大的联盟，但他仍敦促中亚各共和国加入独联体，以防止形成排他性的斯拉夫—基督教集团和突厥—伊斯兰教集团。

他没有说出来、但却狠明显的因素是，这种两极分化将使哈萨克斯坦极

其难于保持它的国家统一。某些俄罗斯人已经煽动并吞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 1990 年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已提议将它作为斯拉夫人联合体的一部分。（38）纳扎尔巴耶夫继续成为赞成加强独联体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并清楚地表示他希望与之有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从未从属于俄罗斯。

在国内，尽管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自己是哈萨克人的领导人，但他一再向非哈萨克人，特别是俄罗斯人保证，他们在哈萨克斯坦也不是外人。然而，一些人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开始离开那里，因为实际上，政府倾向于在关键岗位上更多地任用哈萨克人，而不是其他民族的人。此外，纳扎尔巴耶夫热情地鼓励散居在国外的哈萨克人返回故乡。不仅邻近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居住着很多哈萨克人，而且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在新疆也居住着很多哈萨克人，在集体化所导致的饥馑中，许多人逃离了新疆。1992 年，纳扎尔巴耶夫主办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哈萨克人会议，阿拉木图的名称现在正式采用哈萨克语来拼写，而不是俄语拼写的旧名。鉴于该会议已经为哈萨克人所了解，年轻的哈萨克斯坦显然十分鼓励哈萨克人移居该国。

实际上，在俄罗斯人离开后，哈萨克族的人口继续增长。独〔720〕立时，哈萨克族人口仅略高于俄罗斯族人，但是三年后，官方统计显示，哈萨克人约占 44%，而俄罗斯人只占 40%。

尽管哈萨克斯坦拥有广阔的领土，拥有在前苏联共和国中仅次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但它所经历的经济困难与其他共和国是相同的：高通货膨胀，生产急剧下降以及普遍的混乱。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进展比俄罗斯更缓慢，但是纳扎尔巴耶夫比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更积极地寻求外国的投资。外国投资比他所希望得要迟缓，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但也是因为哈萨克斯坦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合作，便难以建立起出口工业，而俄罗斯并没有始终进行合作。例如，哈萨克斯坦西部油田的开发推迟了，当时俄罗斯就建设输油管道的问题提出了不合情理的要求。

尽管有这些问题，哈萨克斯坦仍然保持了政治稳定，比多数前苏联共和国更稳定。纳扎尔巴耶夫保持着国家权威政治领导人的地位，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尽管他在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方面更开明，超过了中亚各国多数领导人所能允许的程度。然而，哈萨克斯坦的新闻界却不像俄罗斯那么自由，许多报道反映在 1994 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有欺诈、操纵和篡改行为。新议会甚至比其前任更不接受纳扎尔巴耶夫的意见， 1995 年 3 月，宪法法院裁定 1994 年的选举无效，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议会，并宣布举行新的选举。直到 1995 年，纳扎尔巴耶夫似乎更多地是靠着机敏的政治策略和掌握舆论的能力来进行控制，而不是用压制的手段，但他在 1995 年的行动使很多人怀疑他已渐渐趋向于经常使用南方国家所共有的独裁方式。

尽管纳扎尔巴耶夫竭力扩展哈萨克斯坦与前苏联以外国家的联系：他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开辟了与土耳其和德国的直接航线，发展了与美国政界和企业界领导人友好的私人关系，但他认识到，他的国家同俄罗斯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一考虑不仅仅是〔721〕由于其地理位置及该国的俄罗斯人。问题在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能够取代俄罗斯的地位，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39）除了民族问题的考虑之外，这一因素还促使纳扎尔巴耶夫一再试图使独联体更具有国家实体的资

格。显然，哈萨克斯坦宁愿同作为更大组织一员的俄罗斯打交道，而不愿使两国的关系仅仅建立在排他性的双边关系基础上，在后一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纳扎尔巴耶夫使独联体更具有国家实体地位的建议，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拒绝或者忽视。但是到 1995 年，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看来正在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逐步明确其关系。1995 年 1 月，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了 16 个双边协议，其范围从军事关系一直到经济合作。（40）协议规定，俄罗斯可以继续租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试验区。原则上，这种做法近似于将两国军队合并，它在哈萨克斯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纳扎尔巴耶夫为军事协议做了辩护，他指出，哈萨克斯坦不能够单独操作那些试验设备，而且它从租借中得到的收入有助于改善其经济状况。此外，他知道，敌视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新设立的军事机构也没有好处，毕竟它的多数军官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忠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分为二。

协议还规定设立关税同盟（在最初的独联体协议中就包括这一规定，但一直没有实行），但还不清楚何时开始实施，因为它规定“ 如果双方相互提供无条件保证，使‘ 单一关税空间 ’的外部边界得到有效和可靠的保护 ”，将取消对它们共同边界的控制。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一附带条件，为其控制加盟国家的外部边界辩护。

1995 年 1 月，协议朝着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迈出了一步，但纳扎尔巴耶夫无疑是想以此巩固哈萨克斯坦的主权。如果能够实现，它们将消除俄罗斯人占优势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不满。在关键问题上，纳扎尔巴耶夫毫不退让：他拒绝允许双〔722〕重国籍，这是俄罗斯的主要要求之一。反之，他提出了合理的两国公民登记程序以及保护居住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居民如果选择了俄罗斯国籍，就将被作为侨民对待。

在莫斯科签署协议时，纳扎尔巴耶夫说，这些协议证明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建立一个“ 欧亚联盟 ”的想法是可行的。（41）我没有那么自信。在我看来，这些协议（以及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经谈判所达成的其他协议）似乎证明，在前苏联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双边协议，而不是超国家组织。

哈萨克斯坦东面的小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也不再使用俄语拼写国名，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中最出色的改革者，尽管它比多数国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更多。它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穷的国家之一，它的基础设施尚未发展到苏联欧洲部分各共和国的水准。与它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是俄罗斯，而不是其中亚邻国，它的经理和行政官员几乎都不是吉尔吉斯人。但它也是唯一一个不是由前共产党官员担任领导的中亚共和国：阿斯卡尔 · 阿卡耶夫在 1990 年的政治危机期间当选为总统，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曾多年在科学研究院工作。

阿卡耶夫为吉尔吉斯斯坦设计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它可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俄罗斯的方案相媲美，但是他的任务更为困难。该国的立法机构更感兴趣的是维持旧的制度，而不是改变它，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大部分掌握在前共产党官僚的手里，他们对吉尔吉斯人的民族抱负很冷漠。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哈萨克斯坦更受局限：它位于景色优美但是难以进出的山区，夹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

它远离通常的海上贸易路线。古代有从欧洲到中国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曾沿着这条路旅行，它穿过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角落，但是它同现代贸易关系不大。

〔723〕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各共和国中第一个发行自己货币的国家，但是它的货币不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货币那样有实力，甚至比俄罗斯的卢布贬值得更快。它欢迎外国进行投资，认为金矿业和旅游业很有前途——吉尔吉斯斯坦常被称做中亚的瑞士——但它距有希望的市场过于遥远，妨碍了出口的发展。

独立前，吉尔吉斯斯坦就存在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在南部地区发生过流血暴乱，但是自从独立以来，一直保持着民族间的和平。实际上，阿卡耶夫一直坚持给所有居民以公民权，并且平等地对待他们，这使吉尔吉斯斯坦某些主张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然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有些俄罗斯族人开始离开。但多数人没有走，如果得到适当的经济机会，大批人出走的情况似乎不会出现。在 1992 年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以前的伏龙芝）期间，我同一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管理着一家出租车公司。他说，俄罗斯的亲戚劝他离开吉尔吉斯斯坦，但他决定不走。“我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国家。”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情况不是很好——共产党人仍然拥有太多的权力——但是俄罗斯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而且我在这里的事业正在取得进展。”

几个月前，他从德国买了一辆用了五年的梅塞德斯—奔驰轿车，并把它一直开回比什凯克。“你能买到备用零件吗？”我问他，我知道直到 1991 年，即使苏联汽车的零件在莫斯科也很难买到，而外国汽车的零件根本就买不到。

“没问题，”他回答，“如果我需要某种零件，我就打电话给在德国的朋友，他就在下趟飞机把它捎来。”显然，他用德国马克支付货款也不成问题，因为吉尔吉斯货币是可兑换的，尽管它在贬值。

在 1992 年，俄罗斯的企业家可能已表现出过早的乐观，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困难则加剧了，经济困难在 1994 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作为阿卡耶夫追求民主的酬劳，外国同意提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不足以补偿普遍的生产崩溃。阿卡耶夫指责议会阻挠必要的改革，并安排于 1995 年初举行新的选举，但是随着经济继续恶化，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都开始攻击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新闻自由。一项新的国家秘密法律甚至禁止报道有关物价上涨、牲〔724〕畜死亡和道路状况的消息。（42）

1995 年 2 月和 3 月，吉尔吉斯斯坦公民选举了新的议会，但是新议会看来几乎不可能比旧议会做得更好。在一个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国家里，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简直太陡峭了，以至于代议制机构不可能攀登到顶点。

中亚：独裁专制制度

其他三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反对任何试图建立民主政体的努力。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独裁者所控制，他们采取了比苏联后期的统治者更加严厉的高压手段。塔吉克斯坦遭到内战的破坏，结果使那里也出现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

乌兹别克斯坦是三国中最大的国家，它由伊斯兰·卡里莫夫统治，他在担任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开始确立自己的权威。1990 年，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时，他向我保证，他欢迎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个“负责的反对党”，并以意志党作为例证。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他镇压了所有与共产党竞争的党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共产党自 1991 年也改名为人民民主党。意志党和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不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受到折磨和监禁，而且在 1994 年，乌兹别克特工人员还开始在其他国家绑架乌兹别克人权活动分子和反对党领导人，并把他们带回塔什干审问。

尽管在 1994 年进行了新议会的选举——它现在称做最高议会，而不是最高苏维埃——但是唯一允许存在的“反对党”也在卡里莫夫的控制之下。新议会看来根本不可能向他的权威提出挑战。

卡里莫夫的确已宣称乌兹别克斯坦将向市场经济迈进，并于 1994 年开始对小商店实行私有化，但是国家继续实行从前那种管理方式。在外交事务方面，它力求与前苏联以外的国家建立联系，只要这种关系不影响卡里莫夫的独裁统治，它还同哈萨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一起，组成了很多经济联盟，其中多数没有什么影响。

〔725〕 经济统计数字表明，乌兹别克在苏联解体后所遭受的经济衰退没有它的邻国那么严重，但是那些统计数字很值得怀疑。官僚们一贯捏造棉花生产数据，他们在整理汇总统计数字时，决不可能受事实的约束。独立的观察家能够发现，没有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乌兹别克的经济比它邻国的情况更好。

与此同时，对苏联时期的生态破坏，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整治措施。咸海日益干涸，化学工业和棉花生长对它造成了损害。虽然 5 个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在 1994 年 1 月和 1995 年 2 月两次开会研究咸海的未来，但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土库曼斯坦——它们两国抽走了需要留在咸海中的大部分水——都不愿意减少水的消耗量。（43）棉花单一经营——民族主义者对此曾长期加以反对——仍然是经济的支柱。

上库曼斯坦保持着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僵硬的专制独裁制度——甚至在莫斯科已宣布改革时，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仍阻止任何反对派的发展——并且在那里搞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总统的画像随处可见，鼓励人们佩带有他的肖像的毛式徽章。任何萌芽状态的反对活动都被警察行动迅速镇压下去。 1994 年，尼亚佐夫搞了一个“全民投票”，据报道， 99.9%的人投票赞成不需要举行原定于 1997 年的改选，而是让他的总统任期延长到 2002 年。

土库曼斯坦的经济状况比其多数邻国要好，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有更出色的管理。巨大的天然气蕴藏使土库曼斯坦具有现成的出口产品，尼亚佐夫用出售天然气的所得来支撑经济。1994 年，他宣布了在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方案，但它进展缓慢，看来不可能允许发展真正的私营经济，因为那将减弱尼亚佐夫对国家的控制。

出于同样的原因，尼亚佐夫对许多俄罗斯人想在土库曼斯坦得到特殊优惠的企图加以抵制。反之，他建立了与伊朗及西方的联系。例如，土库曼斯坦是第一个成为北约和平伙伴的中亚国家。然而，这种联系不太可能转变为普通民众更大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状况。尽管除了俄罗斯之外，土库曼斯坦比其他前苏联共和国赚取〔726〕外汇更容易，但尼亚佐夫政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但是，它足以避免可导致起义的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的状况。

塔吉克斯坦是苏联最穷的共和国，也是运气最坏的共和国。苏联解体后不久，它就陷入内战，数万人伤亡，数十万人成为难民，屠杀取代了经济发展。

内战开始于 1992 年，交战双方一方是一直统治着国家的共产党官员，一方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的联盟。共产党的军队最终赢得了战争，它得到了应政府要求而来的俄罗斯军队的某些帮助，但是反对派继续在国外进行政治上的反对活动，并从阿富汗——很多支持伊斯兰复兴党的人在那里避难——进行武装袭击。

现在，俄罗斯的边防军继续保卫着它同阿富汗的边界。战斗是零星的和小规模的，但它继续存在。1994 年，联合国倡议塔吉克政府代表与在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举行会谈。尽管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反对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不能在 1994 年 11 月的总统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因而它拒绝承认埃莫玛利·拉赫莫诺夫当选为总统的合法性。因此，当塔吉克斯坦进入 1995 年时，它的停火协议很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打破。

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要完全依靠俄罗斯，才能继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而存在。俄罗斯军队保卫着它与阿富汗的边界，俄罗斯还是它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尽管数量很少。在非俄罗斯的前苏联共和国中，只有塔吉克斯坦继续使用俄罗斯卢布，某些官员还谈到将俄罗斯与塔吉克的经济合为一体。然而，莫斯科对承担维持塔吉克生存的负担持怀疑态度，它鼓励尽力找到一种办法，以解决其内部的政治问题。

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在其近邻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政府以〔727〕及某些中亚国家的政府常常以此为例，说明“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行为对于该地区的稳定造成的威胁。更靠近那里的人们对此半信半疑：塔吉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党派不同于伊朗那种引人注意的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是逊尼派穆斯林，不同于什叶派穆斯林，虽然塔吉克人与伊朗人语言相近，但是他们对伊朗的毛拉统治持怀疑态度。因此，指责他们代表了“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在该地区的进攻，似乎主要是共产党官员的一种借口，以利于他们牢牢掌握权力，并把穆斯林的信徒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即在塔吉克斯坦，穆斯林抵抗组织在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斗争中与倾向西方的民主党派结成了同盟。

就塔吉克斯坦而言，战争看来难以停止，国家也难以得到再生的机会，除非现在的统治者听从劝告，同这个国家的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俄罗斯军队或许能够阻止全面内战再次爆发，但它没有能力完全消除该国的战争。如果俄罗斯能以撤走军队、取消经济支持——除非现政权与其对手达成妥协——相威胁，那么，俄罗斯就能够最有效地维护它自己的利益，维护该地区的利益。

俄罗斯的少数民族

像其他前苏联共和国一样，俄罗斯在推翻了苏联的统治之后，在其少数民族的处理方面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曾鼓励俄罗斯的“ 自治共和国 ”要求更大的自由，以削弱叶利钦的权威，利用这一契机，俄罗斯联邦的很多地区开始要求享有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区领导人更关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征税权以及在俄罗斯议会上院中的地区代表形式，但有些人也企图获得独立。

鞑靼斯坦是前“ 自治 ”共和国，位于伏尔加河流域，是人口最多的自治

共和国，也是最富裕的共和国之一，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和发达的工业基础。它的首都喀山一度曾统治俄罗斯，但自从伊凡雷帝占领喀山后，它就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然而，讲土耳其〔728〕语的穆斯林鞑靼人既想保持他们的语言，又想——直到苏联时期仍然如此——保持他们的宗教，尽管莫斯科定期进行俄罗斯化和反伊斯兰教运动。 1989 年，苏联人口普查显示，鞑靼斯坦的 360 万人口中， 48%是鞑靼人。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鞑靼斯坦都比 1991 年独立的某些联盟共和国更大。

苏联解体时，鞑靼斯坦最初拒绝签署联盟条约，它所选择的地位是“ 与俄罗斯联邦有联系的主权国家及国际法主体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与俄罗斯有特殊联系的独立国家，而不是其组成部分。为了强调其特殊地位，该共和国领导人控制了鞑靼斯坦的国有资产，甚至拒绝将税收交给俄罗斯联邦。

叶利钦政府在同鞑靼斯但打交道时，交替使用威胁和谈判两手。最后，在 1994 年，叶利钦与鞑靼斯坦总统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鞑靼斯坦得到近于完全自治的地位，但是要求它交付若干联邦税，并收回它关于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声明。该条约在俄罗斯和鞑靼斯坦都引起了争议。在俄罗斯，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拒绝接受同俄罗斯的一部分订立条约的想法，而在鞑靼斯坦，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仍然为彻底脱离俄罗斯而斗争。但是条约没有改变，它看来为同那些仍对其地位感到不满的其他俄罗斯地区解决争端提供了一个样板。

不幸的是，莫斯科用来处理与喀山关系的方法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它最引人注目的失败发生在车臣，高加索一个很小的共和国。 1994 年 12 月，莫斯科试图用军队重新控制该地区，致使那里变成了血腥的战场，并动摇了整个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人们仍将目睹其后果，并对它加以评价。车臣冲突是苏联之后俄罗斯历史的决定性转折点，应对它进行更认真的而不是草率的分析。

车臣：政治的巨大失误还是独裁的复活

1991 年事件恰好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开始于一连串的战斗和抵抗，并最终导致了 1994 年 12 月和 1995 年初的大屠杀，当时数千人被杀害，数十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车臣—印古什是俄罗斯联邦内的“ 自治共和国 ”，它的人口在〔729〕1989 年约为 130 万人，它迫切要求在联盟条约的谈判中获得联盟共和国的地位，它是俄联邦中提出这种要求的政治单元之一。它也有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早期阶段，它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很相似。 1990 年，若干“ 非正式的 ”组织建立了车巨人民国民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了德佐卡尔 · 杜达耶夫为主席。杜达耶夫是车臣人，他在苏联军队中晋升为中将，当时他负责驻爱沙尼亚的空军基地。 1991 年，该组织变得更加活跃，杜达耶夫开始组织和武装“ 国民卫队 ”。当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愚蠢地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 8 月未遂政变时，杜达耶夫取代了他们。

俄罗斯政府同意，应取代政变前的车臣—印古什政府，但它坚持应该在选举的基础上从事这项工作。然而，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拒绝承认为进行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用武力接管了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接着，几乎没有预先通知，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竞选，就举行了“ 选举 ”，显然，那只是一个骗局。在控制了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后，杜达耶夫很快就宣告独立。

叶利钦的反应是宣布车臣—印古什处于紧急状态，并派遣数百名内务部

军队前往格罗兹尼，他们很快就被车臣人抓获并驱逐。与此同时，仍然担任着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卷入到这场争端中，他命令负责内部事务的俄罗斯内务部停止在该地区的行动，说服俄罗斯议会取消叶利钦的法令。尽管俄罗斯议会拒绝了杜达耶夫企图脱离联邦的要求，坚持应保持俄罗斯联邦的领土完整，要求严格控制该地区的武器进口，但它规定只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那里的紧张局势。

杜达耶夫则重申了他的独立要求，并且拒绝与俄罗斯当局进行任何谈判，除非它承认该共和国的独立。他继续努力武装车臣人，俄罗斯政府对执行议会通过的武器禁令似乎无能为力。车臣武装包围并封锁了车臣境内的军事基地。基地的士兵纷纷开小差，到〔730〕1992 年春天，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军官还留在驻地，俄罗斯当局撤走了这些军官，并将武器留给了杜达耶夫。

杜达耶夫不仅缴获了部署在车臣的苏联武器，而且开始从其他地方得到武器。到 1992 年夏天，车臣已成为武器和毒品交易的主要中心。莫斯科每次试图禁止与车臣作买卖都证明是无效的，武器、毒品和钱自由地穿过防卫很糟糕的边界。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其他城市的车臣匪帮加强了他们的活动，他们勒索商务企业，汇集违禁交易的收入，敲诈那些表面上合法的挂名老板，并用典型的黑社会方式同其对手和叛徒打交道。俄罗斯警察注意到，在杜达耶夫占领了格罗兹尼后，车臣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狂，而且组织得越来越好，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由于俄罗斯议会的阻挠以及俄罗斯官僚机构和执法机构的干扰，两年多来，叶利钦试图不理睬车臣日趋恶化的局势。俄罗斯政府从未承认车臣所宣称的独立，也从未承认杜达耶夫政府是合法政府，但它的确也做过谈判的尝试。格罗兹尼的答复似乎总是同样的：“只有首先承认我们的独立”，才有可能进行谈判。

然而，杜达耶夫的所作所为，仿佛就是个独立国家的首脑。他的影响扩展到车臣边界以外：他是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加姆萨胡尔季阿被迫离开格鲁吉亚时，杜达耶夫向他提供避难的地方，当加姆萨胡尔季阿企图重新掌权时，杜达耶夫向他提供军事援助。当阿布哈兹人起义反对格鲁吉亚的控制时，他也向他们提供武器，可能还提供了战斗机。他设法在俄罗斯境内寻求盟友和“业务伙伴”，特别是在军事部门寻求，他在收买和操纵俄罗斯的官僚机构方面通常十分有效，超过了叶利钦对它们的控制。

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既丧失了军事选择的自由，也不能施加经济压力，1994 年，俄罗斯政府试图利用车臣内部的分裂，它暗中支持杜达耶夫的对手乌马尔·阿夫土尔汉诺夫，阿夫土尔汉诺夫企图用武力推翻杜达耶夫。虽然他们得到了克格勃的继任者联邦反情报部的支持，但是阿夫土尔汉诺夫的非正规部队在离格罗兹尼很近的地方，被忠于杜达耶夫的军队所阻挡。这一挫折表明，叶〔731〕利钦在控制车臣的反叛者方面并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事实上，他已开始退却，因为他的失败加强了杜达耶夫的地位，并使杜达耶夫确信，不需要与莫斯科进行谈判。

1994 年 12 月 9 日，叶利钦签署了“恢复车臣秩序”的法令，两天后，俄罗斯军队对该分裂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曾预言将迅速而轻易地获得胜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指挥官最初投入战斗的是新征召的士兵，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车巨人似乎不费力就击退了

他们的进攻，面对着几乎是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和炮击，他们保卫格罗兹尼足有两个月，军队伤亡达数千人，平民死亡或负重伤的更多。仅在格罗兹尼一地，就有 10 多万居民逃走，潮水般涌入邻近的共和国，隆冬的寒冷加深和扩大了他们的痛苦。

当战争开始造成重大的伤亡、报刊和电视使俄罗斯和世界看到了凄惨痛苦、令人伤心的画面时，显然，叶利钦决定授权在车臣使用武力一事，使俄罗斯处于危机的边缘。它暴露了俄罗斯军队的虚弱，国内行政管理部门的无能以及国家的分裂。它再次使人们注意到，叶利钦易于感情冲动，缺乏权威的手段。实际上，他的决定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失误，而且为犯罪暴行开了通行证。

随着民主派在 1993 年 12 月的选举中失败，以及叶利钦受公众欢迎的程度逐渐下降，他中断了与很多早期支持者的直接联系，退到了只有少数老朋友的圈子中，其中多数人主张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据说，这个圈子里的人相信，在车臣的胜利能够提高叶利钦正在下降的权威，他们说服他发动了对车臣的战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他的顾问们就犯了大错，这不仅表现在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地征服车臣，而且表现在他们错误地估价了发生在俄罗斯自身的流血杀戮的社会影响。到 1995 年 2 月，民意测验显示，接受调查者中只有 9%的人赞成叶利钦行使其职权的方式,只有 4%的人认为他处理车臣问题是得当的。

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即叶利钦与其计划〔732〕实施者所结成的表面同盟，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至 1991 年的冬天“ 转向正确方向 ”一事。某些人预言，叶利钦即将下台，甚至俄罗斯也将要解体。其他人认为将会出现专制政治，从而毁灭俄罗斯来之不易的而且仍很脆弱的公民自由权利。毕竟，如果车臣人以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城市搞恐怖活动作为回应，那么俄罗斯当局就可以、而且很可能以此为借口，逮捕并驱逐所有可疑分子。他们认为，俄罗斯公民所得到的少数防止任意逮捕的保障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对言论、集会和政治活动的限制。即使这些事情不发生，很多人也担心，叶利钦的同事很可能以车臣灾难之后的政治混乱为借口，推迟或取消原定于 1995 年 12 月举行的国家社马选举和 1996 年的总统选举。

随着 1995 年春天的临近，俄罗斯看来很可能向更糟的方向转化，但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从国家总体来看，车臣的悲剧不仅产生了恶棍，也产生了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俄罗斯人权委员会主席谢尔盖 · 科瓦廖夫，当俄罗斯军队开始入侵格罗兹尼并停留在那里时，他前往车臣，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暴行，并为此作证。从整体来说，俄罗斯的新闻媒介曾长期受到苏联政权的压制和束缚，但它在车臣问题上真正成熟了，它报道有关的事实，驳斥虚伪的政府声明。《消息报》以前是虚夸不实的宣传机器，现在它的头号标题倾向性鲜明，比大多数西方的报纸更大胆，例如“ 军事狂热与蓄谋的牺牲品 ”，“ 在这种战争中，甚至胜利者都将受到审判 ”。

只要俄罗斯还有新闻自由，政治领导人还能够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民主政治就还有机会。但是，车臣战争所激发的情绪，导致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和批评叶利钦者的新的压力，国防部长帕维尔 · 格拉乔夫谴责了新闻媒介和谢尔盖 · 科瓦廖夫一类人权发言人，他的言论就像国家杜马中的某些右翼议员。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打击来自对利斯特耶夫的暗杀，弗拉基

斯拉夫·利斯特耶夫是最受欢迎的电视新闻播音员，他最近受命负责俄罗斯主要的电视网， 1995 年 2 月，当他离家前去工作时，中弹身亡。没有很快找到暗杀者，但是暗杀利斯特耶夫一事，使日益严重的犯罪和暴力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在 1994 年和 1995 年初，国家杜马的两名议员、几个著名的商人以及至少一名新闻工作者被谋杀，没有逮捕任何最终应对此负责的人。

叶利钦对利斯特耶夫被谋杀一事的反应，是罢免了莫斯科的〔733〕警察局长和首席检察官，并打算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犯罪活动和腐败行为。然而，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反对将他们罢免，认为那是不合理的，他指责叶利钦企图用那些诚实正直的专业人员作替罪羊，而同时却放过真正的罪犯。许多民主派人士也对侵犯公民自由的倾向感到焦虑，他们不赞成以同犯罪作斗争的名义，取消公民的自由权利。他们担心，独裁主义势力正在利用公众对日趋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无比义愤建立警察国家。他们甚至隐约暗示，诸如弗拉基斯拉夫·利斯特耶夫一类引人注意的暗杀很可能不是犯罪组织干的，而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以证明镇压是合理的，正像斯大林曾经以谢尔盖·基洛夫（许多人相信是斯大林策划的，尽管没有得到证实）被谋杀为借口，在 30 年代发动了血腥的肃反运动那样。

这些问题到 1995 年春天仍没有得到解答，但是，入侵车臣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对著名人物的暗杀，标志着苏联之后俄罗斯领导者的重要失败。俄罗斯民主派尽管勇敢地挺身而出，反对当局使用武力，但他们已普遍证明没有能力从事必要而枯燥的制度建设工作。当他们在 1991 年底和 1992 年掌权时，他们未能采取有效的步骤改革官僚体制——包括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并开始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更有效的执法机构。他们企图以宏观经济学公式为指导来改革经济，而没有创立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没有考虑民意。在 1993 年 12 月的选举中，他们过分自信，把时间都用于在他们之间争论秘密计划，而没有直接而且切合实际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俄罗斯人民。

〔734〕 叶利钦总统对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习惯于避开日常的管理问题，而且从 1994 年起，他在少数密友的怂恿下作出了缺乏充分依据的决定。到了 1995 年，人民要问，他是否仍然能够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像他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或者他是否将在耻辱中结束总统任期。不幸的是，他对选择继任人问题没有做任何事情；事实上，他倾向于同他的支持者保持距离。

为了说明叶利钦在 1995 年的立场，我回忆起他在 1992 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许多人声称要为他辩护，但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我避免与他们亲近，” 他解释说，并在一张纸的中间画了一个圆圈，接着又从圆圈放射状地画了许多条线，就像车轮的辐条。“ 这样，” 他继续说，“ 我就能在我希望的时候利用他们，但是他们不会控制我或者做我的代言人。 ”

在 1991 年和 1992 年，这种态度使叶利钦那些成分杂乱的追随者中的任何一派人都不能够控制他，但它也逐渐损害了他的同事们建设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党、以开展和支持改革的努力。接着，他同很多最初的伙伴分道扬镳——在 1994 年出版的书中，他公开贬低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叶戈尔·盖达尔等忠诚于他的人——他似乎受到一伙人的影响，他们倾向使用武力，而不是以说服和合法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们的影响不但使俄罗斯的民主主义改革者感到焦虑不安，而且在国外也使叶利钦作为谈判伙伴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特别是车臣战争增加了俄罗斯再次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它将毁灭

1992 年和 1993 年所发展起来的伙伴关系计划。

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

1992 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蜜月之中，它在同美国就削减战略武器的第二个协议进行谈判，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与西方国家协调一致，国际贷款机构许诺向俄罗斯提供巨额财政和经济援助，尽管它是有条件的。但在 1993 年，当俄罗斯议会中〔735〕主张强硬路线者开始指责西方、特别是美国造成了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经济灾难时，这种美好的感情开始破灭。

这些批评者中的某些人，例如联盟的前领导人——联盟是议会中的一个派别，曾试图迫使戈尔巴乔夫宣布实行总统统治——利用克留奇科夫在 1991 年兜售的那些克格勃的虚假情报，来“证明”美国的恶毒意图。某些人甚至相信克格勃的胡言乱语是真实的，但其他人则是故意利用这些假货，并重新使用苏联宣传机器所制造出来的持敌对态度的西方形象，来挖苦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 1992 年，俄罗斯没有任何外国敌人，所以反对改革的人不得不制造出敌人。

俄罗斯议会 1992 年的议长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在 1990 年和 1991 年，他是使俄罗斯联邦脱离苏联的推动者之一。他在 1990 年时曾使我感到震惊，当时他乐观地预言苏联不久就将消失，并被类似联合国那样的松散组织所取代。但是在 1992 年，当他看到反对叶利钦政府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他就开始指责美国伙同戈尔巴乔夫共同策划了肢解苏联的阴谋，他有一次走得如此之远，甚至指责布什总统曾允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 200 亿美元以肢解苏联，但布什又违背了诺言，没有提供这笔钱。

1993 年，反西方的主题受到了“右翼”“爱国主义者”和“左翼”“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强有力的宣扬，两者的方案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论点是，前苏联地区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混乱是西方的阴谋造成的，西方企图收买或者欺骗俄罗斯领导人肢解苏联，然后使残存的俄罗斯处于衰弱状态。他们打算断绝同西方的联系，重申由俄罗斯控制前苏联领土，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为此使用所需要的一切手段。

俄罗斯民主主义改革者一方面拒绝使用武力，拒绝进行领土扩张，但其中一些人也开始打出了一直为“爱国主义者”所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牌。他们关注居住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内的俄罗斯族的地位，要求俄罗斯政府承担保护他们的明确责任，既保护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也避免因俄罗斯人大批返回造成经济和社会负担。他们特别关注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因为多数人承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并没有不公正地对待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族人，尽管那两国也宣布了最终权利。

由于超级爱国主义者的煽动，以及来自自己营垒的意见，叶〔736〕利钦开始对相邻的前苏联共和国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做法常常就像是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 1993 年选举后，民族主义者的突出表现使叶利钦的夸张言辞变得更加刺耳，但甚至在此之前，他已开始鼓励、至少是允许俄罗斯对某些国家进行恐吓。

在就俄罗斯军队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出问题举行谈判期间，叶利钦一再将撤军问题与居住在那两国的俄罗斯族人的地位问题相联系。他要求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允许其公民享有本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国籍，如果他们本人希望这样的话。他没有对驻摩尔多瓦的第 14 军支持分离主义的“德涅斯特共和国”的行动加以阻止，他默认了在阿布哈兹的俄罗斯指挥官对局势的干预，

为了证明干预阿布哈兹是合理的，最初的理由是保护当地的俄罗斯人不受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战争的伤害。他批准了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干预，有效地保护了执政的独裁政权。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国防部还是俄罗斯外交部，都表现出相同的思想，赞成在前苏联领土范围内保持俄罗斯的霸权。在 1994 年秋天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叶利钦看来支持宣布俄罗斯有权在独联体国家进行单方面干预，他当时说，俄罗斯与它们的关系不仅是“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是“血缘关系”，并且宣称“俄罗斯联邦肩负着主要的调解责任”。

尽管俄罗斯的某些行动已处于侵略的边缘，但是叶利钦始终拒绝对俄罗斯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尽管俄罗斯议会敦促他这样做。到 1994 年 8 月底，俄罗斯军队撤离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虽然俄罗斯仍对那里的国籍法感到不满。俄罗斯政府通过谈判，与摩尔多瓦达成了撤出第 14 军的协议。俄罗斯一再重申尊重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完整，不仅在双边会谈中这样表示，而且在有联合国等第三方参加的会议上也这样表示。

然而，进攻车臣一事看来表明叶利钦已改变了政策。虽然车臣在法律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使俄罗斯总统有权采取进攻行动，而如果承认车臣独立，他就无权那样做——但他诉诸武力一事表明，如果争论变得激烈，他很可能乐于在边界之外采取同样的行动。

〔737〕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可能是不必要的。要征服车臣是很困难的，这场战争在整个俄罗斯极为不得人心，这就使今后发动侵略的可能性更小，而不是更大。不经受可怕的损失和破坏，俄罗斯军队甚至无法使一个小小的造反省份屈服，它怎能被用来有效地对付一个决心抵抗的独立国家呢？事实上，它在这样做时不可能不威胁到俄罗斯自身的领土完整。

1995 年，俄罗斯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在俄罗斯的政治机构、经济和整个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倾向，难以有把握地预测它的短期发展。可能的事态发展是：或者当局采取进一步的镇压行动，那将破坏来之不易的自由；或者社会将经历另一次改革的阵痛。由于当局正尽力解决随着俄罗斯帝国、共产党权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产生的错位和混乱，或许以上两者仍旧是兼而有之，然而，有两件事情看来就像是人类的本性一样确定无疑：

1.苏联制度不可能重建。从前允许这一制度存在的环境已经消失了，甚至在其鼎盛时期，它也竞争不过自由经济。试图走回头路——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必将失败，最终它将变为前进的压力。

2.俄罗斯帝国不可能重建，即使俄罗斯人民在感情上依然留恋那个难以理解的过去，并受到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周期性的欺骗。只有健康的俄罗斯经济才能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帝国，但如果俄罗斯又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它的经济创伤就不能治愈。

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对于第二种主张的反对意见，因为我从很多我尊重其判断的朋友那里听到过这种意见。他们通常这样说：“你一定是又瞎又聋。难道你没有听到很多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和——甚至更为不祥的——军事领导人所说的话吗？他们不仅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而且正在为此而策划，并且愿意使用任何所需要的手段。他们不必侵略其他国家。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者已经开始全面干预前苏联地区的事务：在塔吉克斯坦驻扎军队，鼓励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起义，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继续交战，要求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作出它们不可能接受的让步。他们谋求在〔738〕前苏联共和国充当唯一的‘执法者’，甚至厚颜无耻地要求其他共和国为此付钱，事实上，他们当时所想的是在国外获得免费的军事基地。他们的经济政策同样是帝国式的，即要求独占从殖民地征收的贡品。俄罗斯反对阿塞拜疆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尽管俄罗斯的公司也参与了这项交易。它把里海看作俄罗斯的内湖，而不是由若干主权国家所环绕的水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俄罗斯始终想重建帝国。”

这些事情大部分是真实的，但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它忽略了某些基本事实。其中之一是，俄罗斯已经支撑不起一个帝国了，无论这个帝国是怎样建立的。如果 20 世纪教会我们什么事情，那就是使我们明白，帝国是一个昂贵的负担。当英国和法国抛弃了它们帝国的属国时，它们的经济得到了改善。虽然俄罗斯的顽固分子仍在唱着重建帝国的高调，但他们已经不再拥有达到这个目的财力了。正如白俄罗斯政治领导人所了解到的那样，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负担另一个属国，即使这个国家自愿成为它的属国。

此外，俄罗斯欺侮其邻国的大多数举动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行动使独联体成为一个国家实体变得更加困难，并使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放慢。即使俄罗斯的某些邻国被迫同意俄罗斯有权在其国内保留军事基地，享有其他特殊优惠，但它们很可能也不允许俄罗斯直接控制其内政和外交。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人指出，俄罗斯可以成为帝国，也可以成为民主国家，但不可能同时身兼二任。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俄罗斯的长期选择是处于民主和独裁之间，独裁所威胁的不是其邻国，而是俄罗斯自身。试图重建帝国更可能的结果是俄罗斯的分裂，而不是对邻国的征服。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对所有继承了前苏联遗产的国家来说，内部民族问题是主要的挑战。外部因素可能使局势复杂，也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创造它自己未来的手段。它们将保持独立，只要它们真正渴望独立，但只有当它们决定了其身份和方向、建立起得到其人民忠诚的国家、而不是使国家变为单一民族或政治和经济小集团进行压制的工具〔739〕时，它们才可能繁荣兴旺。

当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推动后者的是内部改革的需要——在一条道路上汇合时，冷战结束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社会的开放，为继承了前苏联遗产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扫清了道路：但它只是扫清了道路，而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某些继承者，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正在建设同西欧和北美一样的民主社会。其他国家，例如中亚的几个国家，倒退并且蜕变为僵硬的专制政权。还有一些国家因冲突和内战而分裂。但是两个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它们拒绝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样进行迅速的转变，并且有着很多困难的问题，但它们仍有潜力加入世界经济，建设文明社会和民主制度。如果它们取得成功，它们将对其邻国产生强有力而积极的影响。

至于俄罗斯，从长远来看，它必将进行改革或者走向解体。真正的改革将需要时间——估计很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而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改革无疑会遇到挫折，但是俄罗斯像其他每个国家一样，能够仅仅作为这个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而实现它的潜力。与它所不能控制的世界隔离很可能是俄罗斯历史的重要遗产，但是俄罗斯的历史遗产中并不是只有这些，如果俄

罗斯想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决不能允许继续保持隔离和孤立状态。

那个开始了这一切的人现在的情况如何？从 1991 年 12 月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担任设在莫斯科的社会与政治研究基金会的主席，它通常称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它是叶利钦强迫戈尔巴乔夫辞职时所提供的特别补偿。但即使是苏联的消失和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也没有停止两个人之间的竞争：戈尔巴乔夫偶尔公开提出批评，叶利钦的反应是在几个月内剥夺了基金会的大部分财产，撤消了前总统的汽车和保安人员。

然而，戈尔巴乔夫坚持就社会问题发表他的见解，不过，他在 1992 年断然拒绝了法院要求他为一个案件出庭作证的传票，在该案件中，叶利钦对共产党的禁令受到了挑战。有时候，他甚至暗示，他可能参加预定于 1996 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竞选。〔740〕然而，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不要参加竞选，因为他似乎根本没有机会。 1991 年时，多数公众对他抱有敌意，现在则认为他无足轻重，看来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可能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莫斯科的《独立报》每月对政治观察家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评出 100 名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 1994 年，戈尔巴乔夫并列第 86 名， 1995 年，他根本没有进入排名。

戈尔巴乔夫的大多数朋友发现，他们比戈尔巴乔夫更容易适应一个骚动的新社会。在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的震动下，年轻的外交官戴维·切克瓦伊泽曾仔细考虑自己的前途，现在他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处理维和问题，他的这一职位属于格鲁吉亚在联合国的配额。

大事记

1985 年

3 月 11 日：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3 月 13 日： 美国副总统布什在莫斯科会见戈尔巴乔夫，转交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举行首脑会晤。

3 月 25 日： 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回信送抵华盛顿，其基调是和解的，但并无多少具体内容。

4 月 23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一项改革经济管理制度的决议，推选切勃里科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4 月 26 日： 戈尔巴乔夫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华沙就华沙条约正式延长 20 年达成协议。

5 月 16： 美国宣布与苏联达成协议，两国将就地区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进行磋商。

5 月 1 日： 里根致信戈尔巴乔夫，敦促和谈。

5 月 14 日：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外长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会晤。

7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罗曼诺夫被开除出政治局。谢瓦尔德纳泽由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叶利钦被提名进入书记处。

7 月 2 日： 谢瓦尔德纳泽取代葛罗米柯任外长；葛罗米柯被任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7 月 3 日： 美苏宣布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于 11 月在日内瓦举行会晤。

7 月 29 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

9 月 27 日： 谢瓦尔德纳泽会见里根，就日内瓦会晤进行磋商。在莫斯科，雷日科夫取代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 月 2— 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第一次使用 5 日：了“ 合理足够 ” 一词，宣布与中导协议脱钩，反对把意识形态分歧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11 月 19—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就有关战 21 日 争与和平问题达成共识。

12 月 24 日： 叶利钦取代格里申就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1986 年

1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交换新年贺辞。

1 月 15 日： 戈尔巴乔夫建议到 2000 年前全面销毁核武器。2 月 11 日：苏联最有名望的政治犯之一安纳托利 · 沙兰斯基获释，并被驱逐出境。

2 月 18 日： 叶利钦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2 月 25— 苏共二十七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其方向

3 月 6 日： 与前届大体相似。戈尔巴乔夫在开幕词中称阿富汗战争是一场“ 心病 ”。

4 月 26 日：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死伤多人，放射性物质大面积扩散。随后几天，对直接受害地区的群众进行疏散工作。

4 月 29 日：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中断的美苏商业航空业务开始恢复。

5 月 23 日： 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主持会议，讨论“ 新思维 ”。

7 月 31 日： 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发表演讲，谈‘ 政治体制改革 ”。

8 月 23 日： 美国记者尼古拉 · 丹尼洛夫在莫斯科被捕，这是对美国逮

捕一名苏联间谍作出的反应。

9 月 15— 苏联媒体报道了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举行的 18 日：“ 肖陶夸 ” 会议，会上美国发言人阐述了不承认政策。

9 月 17 日： 美国驱逐 25 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以示对逮捕丹尼洛夫的抗议。

9 月 29 日： 丹尼洛夫离开苏联：被捕的苏联间谍根纳季 · 扎哈罗夫获准离开美国，此前他保证对间谍罪 “ 供认不讳 ”，同时苏联政府同意释放政治犯尤里 · 奥罗夫并允许他出境。

10 月 11—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会 12 日： 晤，就大部分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但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

10 月 19 日： 苏联驱逐五名美国外交官，以报复美国驱逐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外交官。

10 月 21 日： 美国驱逐 55 名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和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外交官，并确定各馆的名额限制。

10 月 22 日： 苏联驱逐另外五名美国外交官，撤出了在美国使馆和总领馆的苏方雇员。

12月16— 当地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被一位俄罗斯人18日： 取代之后，阿拉木图爆发骚乱。

12 月 19 日： 戈尔巴乔夫在高尔基召见萨哈罗夫，通知他及妻子叶琳娜 · 波纳可返回莫斯科。

1987 年

1 月 15 日： 美国解除了向苏联出口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的禁运。

1 月 20 日： 苏联干扰 “ 英国广播公司 ” 转播站。

1 月 27 日： 推迟了三次的苏共中央全会召开，集中讨论了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激进主义出人意料，提出以 “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 取代 “ 发达的社会主义 ”，建议举行真正的选举和秘密投票。

3 月 28—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苏联 她强调人权,并4 月 1 日： 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4 月 14 日：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莫斯科，以推动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谈判。

4 月 16 日： 舒尔茨接受苏联电视台采访。

5 月 6 日： 美苏就在对方首都建立减少风险中心问题达成协议。

5 月 23 日： 苏联干扰 “ 美国之音 ” 广播。

5 月 28 日： 马蒂亚斯 · 鲁斯特驾驶塞斯纳飞机突降红场。

5 月 30 日： 亚佐夫取代索科洛夫成为苏联国防部长。苏联空军总司令和许多将军被解职。

6 月 25—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将民主化和经济改 26 日： 革挂钩；雅科夫列夫进入中央政治局。

7 月 6 日： 克里米亚鞑靼人在红场游行，争取从中亚的流亡地返回克里米亚。

8 月 23 日： 纳粹—苏联协定周年纪念日，波罗的海首府举行游行示威。

9 月 10 日： 切勃里科夫指责西方情报机构挑动少数民族动乱。

9 月 10 日：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在政治局发生冲突。

9 月 12 日： 叶利钦致信戈尔巴乔夫抱怨利加乔夫并提出辞呈

10 月 21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与叶利钦发生冲突。
11 月 1 日： 明斯克举行示威，纪念斯大林时期发生的库罗帕蒂大屠杀。
11 月 11 日： 莫斯科市委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要求解除了叶利钦的职务。
11 月 18 日： 叶利钦被任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1 月 23— 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完成 24 日： 中导协议谈判。
12 月 7—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举行华盛顿首脑会晤，签署了 10 日： 中导条约。
1988 年
2 月 8 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他计划从阿富汗撤军。
2 月 13 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动乱。
2 月 18 日： 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政治局。
2 月 24 日： 塔林举行了 4000 人参加的游行，庆祝爱沙尼亚独立 70 周年。
2 月 28 日： 阿塞拜疆苏姆盖特发生反亚美尼亚人的暴乱，有几人被打死，但谣传夸大了伤亡人数。
3 月 13 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信，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对改革提出了批评。
4 月 14 日：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协议在日内瓦签署。
5 月 21 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解职。
5 月 27 日： 提倡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苏共十九大“ 论纲 ”发表。
5 月 29—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会晤；里根还接
6 月 1 日： 见了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向学生们发表了赞扬自由的演讲。
6 月 5— 在政府的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堂庆祝基督教在 12 日：俄罗斯建教 1000 年。
6 月 9 日： 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的规定得到简化。
6 月 13 日： 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拒绝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立法院关于把其疆域划入亚美尼亚的要求。
6 月 14 日： 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各首府举行游行，纪念大规模迁徙 47 周年。
6 月 15 日：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合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6 月 28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十九大讲话中建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包括公开选举和成立新的立法机构。
7 月 1 日： 叶利钦在党代会上关于“ 政治重建 ”的建议被否定。
7 月 4 日： 苏共代表大会公布支持政治改革的决议。
7 月 7 日： 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发表原则声明，要求恢复乌克兰的国家地位。
7 月 12 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最高苏维埃表决赞成脱离阿塞拜疆，改名为阿尔特萨克。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此举无效。
7 月 18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会议上驳斥了亚美尼亚在卡拉巴赫问题上的立场。
7 月 23 日： 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分别爆发群众游行，抗议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7 月 25 日： 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部会议上，反对将阶级斗争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8 月 5 日： 利加乔夫在高尔基市的一次演讲中捍卫阶级斗争学说。

8 月 12 日： 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一次演讲中宣扬“ 人类的共同利益 ”。

8 月 19 日： 爱沙尼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计划草案。

9 月 8 日： 拉脱维亚报纸发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行动纲领。

9 月 21 日：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动乱后，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9 月 30 日： 利加乔夫和切勃里科夫获得新任命，雅科夫列夫主管苏共中央国际部。

10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取代安德烈·葛罗米柯就任国家名誉主席。

10 月 12 日： “ 萨尤季斯计划 ”在立陶宛发表。

11 月 16 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并控制国家财产。

11 月 22 日： 巴库发生反亚美尼亚骚乱。

11 月 26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爱沙尼亚控制该共和国国有资产的行动无效。

12 月 1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立法，准许公开选举和无记名投票。

12 月 7 日：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宣布单方面裁军，强调“ 人类的共同利益 ”和“ 自由选择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12 月 7 日： 戈尔巴乔夫在总督岛会见里根和当选总统布什。

12 月 7 日： 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戈尔巴乔夫提前结束了对纽约的访问。

1989 年

1 月 12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置于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之下。阿尔卡基·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临时行政长官。

1 月 17— 欧安会观察会议在维也纳闭幕，决定开始裁减欧 19 日： 洲常规武器谈判。

1 月 18 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将爱沙尼亚语定为国语。

2 月 1 日： 拉脱维亚语被定为拉脱维亚国语。

2 月 15 日： 最后一批苏军撤出阿富汗。

2 月 24 日： 独立的爱沙尼亚国旗于战前共和国独立日在塔林升起。

3 月 6 日： 北约和华约关于欧洲常规武器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举行。

3 月 12 日： 里加举行群众游行，支持拉脱维亚人民阵线。

3 月 26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举行选举；叶利钦在莫斯科大获全胜。

4 月 9 日： 苏联军队镇压第比利斯和平示威，至少打死 20 人，伤百人。

4 月 14 日： 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被撤换。

4 月 25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开除了 74 名委员。

4 月 25 日： 苏军开始撤离匈牙利。

5 月 15— 戈尔巴乔夫访华，宣布中苏关系“ 正常化 ”。19 日：

5 月 18 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立陶宛成为独立国家。

5 月 25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

高苏维埃主席和国家主席。

5 月 29 日： 阿列克谢·卡扎尼克退出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以便由叶利钦补缺。

6 月 3— 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冲突中，死伤数十人。15 日：

6 月 4— 波兰大选揭晓，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取得压倒性 18 日： 多数票。

7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对民族冲突发出警告。

7 月 6 日： 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发表演说，宣称苏联不会阻止东欧改革。

7 月 10 日： 煤矿区爆发罢工浪潮，逐渐扩大并持续几个星期。

7 月 28 日：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

7 月 30 日： 叶利钦、萨哈罗夫和其他改革派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里组建“ 跨地区集团 ”。

8 月 22 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宣布 1939 年纳粹—苏联秘密协定自即日起无效。

8 月 23 日： 200 多万人参加了“ 波罗的海之路 ”大游行。

8 月 24 日： 以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非共产党政府在波兰组成。

8 月 26 日： 中央委员会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出警告。

8 月 31 日： 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将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用拉丁字母代替西里尔文字母。

9 月 4 日： 阿塞拜疆爆发大罢工，要求承认人民阵线，恢复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控制。罢工中断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亚美尼亚的主要铁路干线。9 月 8— 鲁克在基辅举行选区代表大会，并竖起了遭禁的 10 日： 独立乌克兰国旗，即蓝黄旗。

9 月 11 日： 匈牙利宣布不再阻止东德公民越过边境进入奥地利。

9 月 22— 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赫尔 23 日： 市举行会晤。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苏联不再将削减战略导弹与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挂钩。

9 月 23 日： 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指定阿塞利为国语，恢复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主权，重申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的权力。

9 月 24 日：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议会分别指定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为国语。

10 月 2 日： 雷普兹格爆发大规模反共示威。

10 月 6 日： 戈尔巴乔夫会见昂纳克，敦促东德加快改革。

10 月 8 日：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确认独立的目标。

10 月 10 日： 匈牙利执政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党被改组。

10 月 11 日：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辞职；随后由埃贡·克伦茨接任。

10 月 23 日： 匈牙利在 1956 年起义 23 周年之际被宣布成为一个共和国。计划于 1990 年举行选举。

10 月 27 日： 华沙外长会议谴责“ 勃列日涅夫主义 ”。

10 月 31 日： 克伦茨访问莫斯科，表示支持改革。

11 月 9 日： 东德解除旅行限制，东德人越过柏林墙涌入西德。

11月10— 保加利亚党首日夫科夫和其他强硬派领导人被解17日： 除

领导职务。

11 月 12 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 1940 年爱沙尼亚议会请求并入苏联的行动无效。

11 月 16 日： 基希讷乌骚乱后，摩尔多瓦党的第一书记西门·哥罗素被彼特·卢钦斯基取而代之。

11 月 19 日： 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宣布主权独立， 1921 年苏联占领格鲁吉亚违反了 1920 年的格俄条约。

11 月 27 日： 政治局发表声明谴责立陶宛共产党企图脱离苏联控制。

11 月 28 日： 西德总理科尔提出两德统一计划。

11 月 28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不顾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代表的反对，投票决定结束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直接统治。

12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在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二世；承诺以立法形式保障信仰自由和乌克兰天主教合法化。

12 月 2—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会晤；戈尔巴乔 3 日： 夫承诺不以武力保持对东欧的统治；布什同意取消对美苏贸易的大部分控制。

12 月 3 日： 埃贡·克伦茨和东德民盟（共）党集体辞职。

12 月 9— 捷克斯洛伐克为期几周的街头示威之后，古斯塔 10 日：夫·胡萨克辞职，非共产党主导的政府上台。

12 月 12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拒绝讨论废除宪法第六条，并将萨哈罗夫逼下讲台。

12 月 14 日： 安德烈·萨哈罗夫逝世。

12 月 20 日： 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

12 月 22—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反共革命中垮台 25 日： 并被处死；苏联拒绝了反齐奥塞斯库势力要求调解的请求。

12 月 24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纳粹—苏联协定无效，但维持根据协定吞并波罗的海和其他领土的现状。

12 月 25— 苏共中央委员会开会，否决了立陶宛共产党获得 26 日： 独立的要求。

12 月 28—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被提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议会 29 日： 主席，瓦茨拉夫·哈维尔宣誓就任捷总统。

1990 年

1 月 11— 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未能说服大多数立陶宛 13 日： 共产党人继续留在苏共里面。

1 月 13 日： 巴库爆发反亚美尼亚人大屠杀。

1 月 19 日： 苏军进攻巴库，解除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武装。

1 月 22 日： 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威胁说，如果苏军不在 48 小时内撤出，将就分离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2 月 4 日： 改革派组织的群众示威吸引了 10 万人参加。

2 月 5— 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纲草案，决定修正宪法第 7 日： 六条，消除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2 月 8 日： 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就德国统一谈判提出 2＋4 方案。

2 月 12 日： 西德、东德和“四大国”（美、英、法、俄）外长在渥太华会议上同意就德国统一问题开始正式会谈。

2 月 24 日： 萨尤季斯赢得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多数议席。

3 月 4 日：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改革派和民族主义者在共和国立法机构选举中初战告捷，但未能赢得多数。

3 月 11 日： 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宣布恢复立陶宛独立，选举维陶塔斯 ·兰茨贝吉斯为最高委员会和国家主席。

3 月 13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正宪法，建立总统制，修订宪法第六条，以消除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3 月 14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总统。

3 月 18 日： 东德保守的 " 基民盟 " 赢得大选。

3 月 30 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决定开始恢复爱沙尼亚独立进程。

4 月 3 日： 苏联正式承认对 1940 年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负责。

4 月 18 日： 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发出最后通牒后，莫斯科急剧削减对立陶宛的石油天然气出口。

5 月 1 日： 红场" 五一节 "游行变成反戈尔巴乔夫示威。5 月 4 日： 立陶宛议会认可独立的目标。

5 月 29 日：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5 月 30— 戈尔巴乔夫与布什举行华盛顿会晤，然后访问了

6 月 4 日：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旧金山。

6 月 8 日：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宣布主权独立，其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

6 月 12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保障新闻自由。

6 月 19— 俄罗斯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改革政 23 日： 策的批评家伊 · 波洛兹科夫为第一书记。

6 月 30 日： 立陶宛议会投票赞成暂时中止实施独立宣言之后，苏联恢复向立陶宛输送石油和天然气。

7 月 2— 苏共" 二十八大 " 在莫斯科召开。戈尔巴乔夫再次 13 日： 当选为总书记，但遭到强烈的抵抗。新的政治局成员大多是平庸之辈。

7 月 12 日： 叶利钦在党代会上以富有戏剧性的演说提出退出苏共。

7 月 15— 戈尔巴乔夫和科尔在斯塔夫罗波尔附近举行会 16 日： 晤，就两德统一的剩余问题达成协议。7 月 16 日： 乌克兰宣布独立。

7 月 23 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列昂尼德 · 克拉夫丘克为主席。

7 月 27 日： 白俄罗斯宣布主权独立。

8 月 1 日：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同意共同制定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并联合组建一个由斯坦尼斯拉夫 · 沙塔林领导的委员会来草拟计划。

8 月 1— 谢瓦尔德纳泽在伊尔库茨克会见贝克国务卿。2 日：

8 月 2 日：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8 月 3 日： 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8 月 4 日：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选举列翁 · 捷尔—彼得罗相为主席，共产党候选人落选。

8 月 9 日： 苏联部长会议宣布私有企业和雇佣工人合法化。

8 月 15 日： 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恢复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和其他著名政治流放犯的公民身份。但索尔仁尼琴拒绝接受。

8 月 22 日： 土库曼斯坦宣布主权独立。

8 月 25 日：　塔吉克斯坦宣布主权独立。

8 月 25 日：　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从格鲁吉亚独立出来，享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位。

8 月 31 日：　戈尔巴乔夫命令将雷日科夫政府计划和沙塔林计划结合起来。

9 月 2 日：　第拉斯波尔俄罗斯民族在德涅斯特河东岸建立一个“德涅斯特苏维埃共和国”，并从摩尔多瓦独立出来。

9 月 9 日：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赫尔辛基举行会晤，同意联合采取行动结束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

9 月 11 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沙塔林 213—1 计划。

9 月 12 日：“2＋4 协定”在莫斯科签署，终止了四大国在德国的权力。

9 月 20 日：　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宣布从格鲁吉亚独立出来。格鲁吉亚议会立即宣布此举无效。

9 月 24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给予戈尔巴乔夫 18 个月的紧急状态权力，以便推行经济改革。

10 月 1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信仰自由法。

10 月 3 日：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开始生效。

10 月 9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立法，确立多党制。

10 月 19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它是否行得通感到怀疑。

10 月 20—　“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21 日：

10 月 23 日：　乌克兰总理维塔利·马索尔在群众抗议的压力下辞职。

10 月 25 日：　哈萨克斯坦宣布主权独立。

10 月 27 日：　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被一致选为土库曼斯坦总统。

10 月 28 日：　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选举反共领导人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为共和国总统。

10 月 28 日：　格鲁吉亚支持独立的政党赢得议会选举。

10 月 28 日：　在基辅召开的代表大会将乌克兰独立定为明确目标。

10 月 30 日：　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

11 月 7 日：　戈尔巴乔夫在红场进行革命日检阅时险遭暗杀。

11 月 13 日：　叶利钦宣布，没有中央政府的合作，俄罗斯联邦不能完成沙塔林计划。

11 月 16 日：　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递交的报告受到冷落。

11 月 17 日：　戈尔巴乔夫建议大规模地改组苏联政府。

11 月 19 日：　“欧洲常规武器条约（CFE）”在巴黎签署。

11 月 24 日：　联盟草案公布。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对它吹毛求疵。

11 月 29 日：　联合国安理会得到苏联的支持性投票，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强行执行联合国有关科威特问题的决议。

12 月 1 日：　鲍里斯·普戈取代瓦季姆·巴卡金任苏联内务部部长。

12 月 20 日：　谢瓦尔德纳泽辞职，警告“独裁正在形成”。

12 月 25 日：　雷日科夫总理因心脏病而离职。

12 月 26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修正案，改组政府，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

12 月 27 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第二轮投票中选举根纳季·亚纳耶

夫为副总统。

1991 年

1 月 10 日： 戈尔巴乔夫命令立陶宛政府恢复“宪法秩序”，否则后果自负。

1 月 11 日： “立陶宛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成立。

1 月 13 日： 克格勃阿尔法小分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视塔，这一事件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

1 月 14 日： 瓦连金·帕夫洛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理。

1 月 15 日： “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在海湾地区实施。

1 月 20 日：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对立陶宛的镇压。

1 月 24 日： 美国大使转交布什致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宣称如果继续在立陶宛实施暴力，将中断经济联系。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采取行动是为了避免内战。

1 月 29 日： 戈尔巴乔夫不顾共和国和地方领导人的反对，发布命令使军队和警察的联合巡逻合法化。

1 月 30 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遭到严厉批评。

2 月 1 日： 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实行经济封锁。

2 月 9 日： 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以上的选民赞成独立。

2 月 19 日： 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2 月 24 日：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

2 月 26 日： 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发表演说攻击民主派。

2 月 28 日： 多国部队停止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3 月 1 日： 顿巴斯地区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并波及其他地区。

3 月 3 日：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78%的爱沙尼亚人投赞成票， 74%的拉脱维亚人支持独立。

3 月 14— 国务卿贝克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波罗的海沿岸和 16 日： 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

3 月 17 日： 大多数参加全苏全民公决的人支持自愿联盟，但并非每一个地方都进行了公决，有些地区并不支持投票结果。

3 月 28 日： 军队开进莫斯科以阻止支持叶利钦的示威游行，但游行照常举行。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军队于第二天撤出。

3 月 31 日： 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4 月 1 日： 苏联零售价格大涨。

4 月 4 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投票授予叶利钦巨大权力。

4 月 4 日： 明斯克开始大罢工。

4 月 9 日： 格鲁吉亚宣布独立。

4 月 22 日： 帕夫洛夫总理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反危机计划”。

4 月 23 日： 9 个共和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9＋1 协定）。

4 月 24 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总统选举法。

4 月 24—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扬言辞职。25 日：

5 月 20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保障国外旅行和移民权。

6 月 12 日： 叶利钦在大选中以 57.3%的多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6 月 17 日： 帕夫洛夫不经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就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

赋予特殊权力，此举得到亚佐夫、克留奇克夫和普戈的秘密支持。

6 月 20 日： 美国大使警告戈尔巴乔夫提防一次夺权阴谋。

6 月 21 日： 最高苏维埃拒绝帕夫洛夫特别授权的请求。

6 月 30 日： 最后一批苏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

7 月 10 日： 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7 月 12 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原则批准“ 联盟条约 ”，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7 月 17 日： 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但得到的经济援助甚少。

7 月 20 日： 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政府机关里的党派活动；共产党官员将此举视为致命的威胁。

7 月 28 日： 戈尔巴乔夫通知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8 月 20 日“ 联盟条约 ”签定以后，他将解除克留奇克夫和帕夫洛夫的职务。

7 月 30— 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和纳扎 31 日： 尔巴耶夫，并单独会见了叶利钦。

8 月 1 日： 布什总统访问基辅，私下会见了克拉夫丘克。

8 月 2 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 联盟条约 ”“ 公开签署 ”。

8 月 4 日： 戈尔巴乔夫赴克里米亚度假。

8 月 17 日： 克留奇克夫、帕夫洛夫和亚佐夫与几名高级党政官员达成协议，要求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暂时让出权力，如遭拒绝，将对他实施隔离控制。

8 月 18 日： 戈尔巴乔夫拒绝一特派代奉团劝他授权采取严厉措施的要求。午夜前夕，副总统亚纳耶夫同意接管政权，签署命令接管总统权力。

8 月 19 日： “ 紧急状态委员会 ”宣布掌权。叶利钦声明此种接管是非法政变。

8 月 21 日： 政变企图失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

8 月 24 日： 戈尔巴乔夫宣布终止共产党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8 月 24 日： 乌克兰宣布独立，定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举行全民公决。

8 月 25 日：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 政治和经济独立 ”。

8 月 27 日： 摩尔多瓦宣布独立。

8 月 30 日： 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8 月 31 日：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

9 月 6 日： 格鲁吉亚宣布与苏联断绝一切联系。

9 月 6 日： 苏联国务委员会正式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支持它们加入联合国和欧安会。

9 月 6 日： 列宁格勒市民投票赞成恢复该市原名圣彼得堡。

9 月 9 日： 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

9 月 21 日： 亚美尼亚宣布独立。

10 月 11 日： 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解散克格勃，并更改其名。

10 月 19 日： 八个共和国签署“ 独立国家经济区协定 ”。

10 月 28 日：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叶利钦实施经济改革的权力，期限为一年。

11 月 4 日： 苏联国务委员会共和国领导人会议废除苏联各部委，只保

留国防、外交、铁路、电力和核能等部。叶利钦通知会议，俄罗斯不打算组建自己的军队。

11 月 6 日： 叶利钦自任俄罗斯总理，提名根纳季 · 布尔布利斯、叶戈尔 · 盖达尔和亚历山大 · 索辛为副总理。

11 月 6 日： 叶利钦命令取消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

11 月 14 日： 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在苏联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同意新的国体应是一个邦联。

11 月 15 日： 叶利钦颁布 10 项命令，实际控制了在俄罗斯境内所有金融和经济活动。

11 月 22 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接管苏联国家银行。

11 月 25 日： 叶利钦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拒绝在已议定好的邦联条约上签字。

12 月 1 日： 乌克兰公民投票，以压倒性多数赞成独立，选举克拉夫丘克为总统。

12 月 5 日： 乌克兰议会正式撤消对创立苏联的条约的认可。

12 月 7— 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布列斯特的 8 日： 一个狩猎场举行会晤，决定结束苏联，创建 “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

12 月 10 日：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批准 “ 独联体 ” 协定。

12 月 11 日： 俄罗斯议会批准 “ 独联体 ” 协定。

12 月 12 日： 中亚国家领导人在阿什哈巴德开会要求承认其在独联体内的创始国地位。

12 月 22 日： 11 个共和国（除格鲁吉亚外的全部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 “ 独联体声明 ”。

12 月 25 日：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辞职演说，俄罗斯国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

人物简介

以下为本书所涉及的来自苏联及其继承国的人物。

（仅列入与本书内容有关的职务和活动）阿艾斯提，哈尔多（生于 1951 年）：1990—1991 年任塔林市市长；

“ 爱沙尼亚人民阵线 ” 领导人。

阿巴尔金，列昂尼德（生于 1930 年）：经济学家，苏联（俄罗斯）

科学院院士。雷日科夫政府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帕拉特（生于 1940 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 1990 年和 1991 年任撒马尔罕州党委第一书记。阿朱别伊，阿列克谢 · 伊万诺维奇（死于 1993 年）：记者。尼基塔 · 赫鲁晓夫的女婿，60 年代主编《消息报》，曾采访过肯尼迪总统。阿法纳西耶夫，维克多 · 格里戈里耶维基（1922—1995）：记者。1976—1989 年任《真理报》主编， 1987 年以后所持态度比戈尔巴乔夫更为谨慎；1976—1990 年，任苏联记者协会主席；他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法纳西耶夫，尤里 · 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34 年）历史学家。改革时期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馆馆长。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现任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校长。

阿甘别吉扬，阿贝尔 · 格则维奇（生于 1932 年）：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1986 年起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所长；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任国家经济学会会长 ;曾协助戈尔巴乔夫起草 1990 年的雷日科夫与沙塔林改革计划妥协方案。

艾特马托夫，欣吉兹（生于 1928 年）：吉尔吉斯作家，其作品因曾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专横和道德败坏提出挑战而著称。他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1990 年被任命为苏联驻卢森堡大使。

阿卡耶夫，阿斯卡尔（生于 1944 年）：物理学家、政治家。1990 年当选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此前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长。

阿赫罗梅耶夫，谢尔盖（1923—1991 年）：苏联将军。1988 年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此前任苏联将领委员会主席。曾参与过 1991 年 8 月的未遂政变，随后自杀。

阿列克谢二世（利基格尔，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29 年）：1990 年起任苏联东正教教父。

亚历山大洛娃，塔玛拉 · 阿列克谢耶芙娜：阿纳托利 · 切尔尼亚耶夫的助手。

阿利耶夫，盖达尔（生于 1923 年）：阿塞拜疆苏共官员。1987 年戈尔巴乔夫将其开除出苏联领导层，后于 1993 年在阿塞拜疆东山再起，继埃尔奇贝自巴库飞回之后，阿利耶夫当选为总统。1976—1987 年为政治局候补和正式委员；1969—1982 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共高级官员之前，他曾是克格勃及其前身安全局的职业官员。

阿尔克斯尼斯，维克多 · 伊曼托维奇（生于 1950 年）：军官。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 1991 年要求实行直接总统制的 “ 联盟 ” 成员。

安德烈耶娃，尼娜：教师。1988 年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撰文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

安德罗波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914—1984 年）：苏共官员。1967 年起任克格勃主席，1982—1984 年间继勃列日涅夫之后任苏共总书记。

安塔纳第斯，维多塔斯·维托（生于 1928 年）：森林学教授，立陶宛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早期领导人之一。

安塔纳维丘斯，卡兹米拉斯·安东诺（生于 1937 年）：经济学家，立陶宛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安东诺维奇，伊万·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和政治学家。1990—1991 年任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92 年移居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阿尔巴托夫，格里戈里·阿尔卡季耶维奇（生于 1923 年）：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现为俄罗斯）“ 美国、加拿大研究所 ” 所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阿斯洛诺夫，卡德林金（生于 1947 年）：1990—1991 年，任塔吉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91 年一度出任塔吉克斯坦总统。

阿夫土尔汉诺夫，乌马尔（生于 1944 年）：车臣武警军官，后来从政。1991 年 12 月，曾在苏军和内务部供职的阿夫土尔汉诺夫作为德佐卡尔·杜达耶夫的政治对手当选为车臣一地区的地方领导人。随后，他立即以所在地区为据点开始向杜达耶夫提出挑战。1994 年，他的军队得到“ 俄罗斯反间局 ”（前身为克格勃）的支持。尽管一开始取得胜利，但最后于 10 月在格罗兹尼郊区被杜达耶夫武装击溃。

巴卡金，瓦季姆·维克多罗维奇（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政治家。1988—1990 年，苏联内务部长；1990 年为苏联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 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1991 年，任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

巴克兰诺夫，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生于 1923 年）：作家。自 1986 年起任文学期刊《旗帜》编辑。

巴克拉诺夫，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32 年）：苏共官员。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领导人之一。曾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主管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别洛诺哥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31 年）：外交官。1990—1991 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别斯梅尔特内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3 年）：外交官。1991 年接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曾任苏联驻美国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比斯考斯卡斯，埃及迪由斯（生于 1955 年）：立宛外交官。1990—1991 年，任立陶宛驻莫斯科代表，随后任立陶宛驻俄罗斯大使。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萨尤季斯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比斯卡夫斯，瓦尔迪斯（生于 1942 年）：拉脱维亚政治家。“ 拉脱维亚之路 ” 党的领袖，1993 年议会选举中该党赢得未过半数的多数票。1993 年 7 月，比尔卡夫斯出任拉脱维亚总理，但一年后辞职改任外交部长。

比舍尔斯，普马斯（生于 1930 年）：拉脱维亚律师，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 年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布洛欣，尤里·维塔利耶维奇（生于 1944 年）：经济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 联盟 ” 领导人之一。

波察罗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41 年）：企业经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济改革计划起草人；

1990 年竞选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未获成功。

波格莫洛夫，奥列格·季莫费耶维奇（生于 1927 年）：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现与尼古拉·特拉夫金合作组建俄罗斯民主党；1994 年起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波古斯拉关斯卡亚，卓娅·鲍里索芙娜：小说家、作家。作品包括杂文、短篇故事、几部小说以及一本关于美国妇女的畅销书。

波尔金，瓦列利·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5 年）：记者、苏共官员。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参与领导了 1991 年 8 月政变。波纳，叶琳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生于 1922 年）：儿科医师，政治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夫人；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鲍文，亚历山大（生于 1930 年）：记者。曾撰写评论对改革派表示同情。 1991 年苏以恢复外交关系后出任苏联驻以色列大使。

勃拉科夫，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7 年）：企业经理。1989 年任吉尔汽车厂厂长，是新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莫斯科国土区”的共产党候选人，由于得票率不足 7%而败于鲍里斯·叶利钦手下。

布拉藻斯卡斯，阿尔吉尔达斯（生于 1932 年）：立陶宛政治家。1990 年 12 月他任立陶宛第一书记时，该党脱离苏共；1991—1992 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主席；1992 年 10 月—1993 年 2 月，任立陶宛“塞马斯”主席；1993 年 2 月起任立陶宛总统。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1906—1982 年）：苏共官员。1964—1982 年，任苏共第一书记，然后是总书记。

布尼奇，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 1929 年）：经济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济改革委员会里的活跃分子。

布尔布利斯，根纳季·艾德瓦尔多维奇（生于 1945 年）：哲学家、政治家。 1989 年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当选苏联人民大会代表；叶利钦的政治亲信， 1991 年被任命为俄罗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协助起草“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

布尔拉茨基，费德罗·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27 年）：记者、编辑。1986—1991 年任《文学公报》编辑；1989—1991 年苏联人大代表。

比科夫，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24 年）：白俄罗斯作家、政治活动家，苏联人大代表，“白俄罗斯人民阵线”领导人。

休帕提斯，维尔吉利尤斯（生于 1937 年）：立陶宛政治家。1989 年任萨尤季斯总书记；1990 年入选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任该委员会“民权与民族关系委员会”主席。

切勃里科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23 年）：苏共官员。1983—1989 年任苏共政治局委员，1982—1988 年，克格勃主席。

切霍耶夫，阿纳托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生于 1950 年）：奥塞梯苏共官员。苏联人大代表，“联盟”成员。

契尔年科，康斯坦丁（1911—1985）：苏共官员。1978—1985 年，苏共政治局委员；1984—1985 年，接替安德罗波夫任苏共第一书记。

切尔诺梅尔金，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生于 1938 年）：企业家、政治家。1992 年 12 月起，任俄罗斯总理；1985—1989 年，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长；1989—1992 年，任国家天然气专营公司“瓦斯普罗姆”总裁。

切尔尼琴科，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29 年）：作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运动成员；1992 年起任“ 农民党 ”主席。

切尔尼亚耶夫，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21 年）：苏共官员。1986—1991 年，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外交事务助理，现掌管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切克瓦伊泽，戴维：外交官。80 年代后期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供职；1991 年调回莫斯科外交部，任苏联总统办公厅礼宾司官员；现为联合国驻纽约秘书处维和组官员。

乔尔诺维尔，维亚切斯拉夫·马克西莫维奇 (生于 1938 年）：记者。1967 年因民族主义活动被捕，获释后，开始发行日报《乌克兰先驱报》，报道持不同政见昔的活动，及当局对异已分子的迫害；1972 年再次被捕；1985 年获释。与人合作组建“ 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团 ”以及“ 鲁克 ”；1989 年当选为利沃夫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90 年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1991 年 12 月竞选乌克兰总统失败。

杰缅捷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7 年）：白俄罗斯共产党官员。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 年 8 月被解职。多勃雷宁，阿纳托利·费奥德罗维奇（生于 1919 年）：外交家。

1962—1986 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 1986—1988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1988—1991 年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

多古泽夫，维塔利·胡塞伊诺维奇（生于 1935 年）：苏共官员。1991 年任苏联第一副总理。

德拉奇，伊万（生于 1936 年）：乌克兰诗人、政治家。80 年代任乌克兰作家联盟主席；鲁克成立后任该组织主席；1990 年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他是乌克兰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杜达耶夫，德佐卡尔（生于 1944 年）：空军军官、车臣政治家。1990 年，当时为苏联空军中将的杜达耶夫当选为非官方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991 年 8 月莫斯科未遂政变后，他割据车臣一印古什首府格罗兹尼，宣布从俄罗斯独立，拒绝官方支持的选举。1992 和 1993 年格罗兹尼成为武器及毒品走私中心，许多俄罗斯官员认为杜达耶夫与犯罪团伙有牵连，是非法贸易的受益者。1994 年 12 月俄罗斯军队开进车臣，杜达耶夫及其支持者奋起抵抗，重创俄军。车臣城市失守后，他们转入山区、农村继续战斗。

杜比宁，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30 年）：外交官。1978—1986 年，苏联驻西班牙大使；1986—1990 年，驻美国大使；1990—1991 年，驻法国大使。

久巴，伊万（生于 1931 年）：乌克兰哲学家。1965 年提交题为《国际化还是俄罗斯化》的报告。该报告在国外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后，他于 1972 年被捕，判处 5 年徒刑，另 5 年流放；1973 年他同意收回以前的作品因而获释。

叶尔切贝，阿布尔法兹（生于 1938 年）：阿塞拜疆东方学者、政治家。1992 年以“ 阿塞拜疆人民阵线 ”领导人的身份当选为阿塞拜疆总统。1993 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变后被迫辞职。

法林，瓦连金·米哈伊洛维奇 (生于 1926 年）：外交官、苏共官员。1990—1991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主任。费尔申，格托尔德·英诺肯基耶维奇（生于 1931 年）：经济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最高苏维埃改革

小组成员。1990 年任俄罗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福金，维托尔德·帕夫洛维奇（生于 1932 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990—1992 年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

费奥德罗夫，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 1958 年）：经济学家。1990 年任俄罗斯财政部长；1991 年及 1992 年初负责“欧洲重建开发银行”苏联方面的工作；1992—1994 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和财政部长；1993 年大选中是“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之一；1994 年起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盖达尔，时戈尔·铁木罗维奇（生于 1956 年）：经济学家。1992 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后任代总理。他被视为倡导俄罗斯经济改革计划的总设计师。1993 年 9 月—1994 年 1 月，再任第一副总理。1993 年 12 月大选中领导“俄罗斯选择”。

盖利斯，马利斯：立陶宛政治家。1994 年起任总理，此前曾任副总理和国家改革部长。

加姆萨胡尔季阿，兹维阿德（1939—1993 年）：格鲁吉亚持不同政见者，1991 年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但 1992 年 1 月被反对派赶下台。1992—1993 年旅居车臣。

盖叶尔，叶夫多季娅·亚历山大罗芙娜（生于 1934 年）：民族学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马里坦州代表，她是民主运动的成员，安·萨哈罗夫的积极支持者。

格德连，特尔曼，霍雷诺维奇（生于 1940 年）：刑警侦查员。1989—1991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前曾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共和国的腐败案提起公诉，1989 年公开起诉几起苏联高级官员渎职罪。他及助手尼古拉·伊万诺夫被指控在他们的调查中使用了非法和逼供的手段，但最高苏维埃拒绝解除使他们免于起诉的议会豁免权。

根泽利利斯，布罗尼斯拉夫斯（生于 1934 年）：立陶宛哲学家、政治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早期支持者。

格拉什琴科，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37 年）：经济学家。1989—1991 年，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92—1994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

基连科，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36 年）：苏共官员。1990 年之前任克里米亚州党委第一书记，后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

戈德曼尼斯，伊瓦尔斯（生于 1951 年）：拉脱维亚物理学家和政治家。1990—1993 年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独立运动期间任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副主席。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31 年）：苏共官员、政治家。1985—1991 年，苏共总书记；1988—1989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1990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 年，苏联总统；1921 年 12 月起，任莫斯科“社会和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

戈尔巴乔娃，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生于 1931 年）：戈尔巴乔夫夫人。自 80 年代中期赞助苏联文化基金，直至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

戈尔布诺夫，阿纳托利（生于 1942 年）：拉脱维亚政治家。1988—1993 年，拉脱维亚议会主席；自 1991 年起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戈里亚乔娃，斯维特拉娜·彼得罗芙娜（生于 1947 年）：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91 年 3 月，提出弹劾叶利钦的议案。

格拉乔夫，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45 年）：将军。1991 年苏

联空降部队指挥；1992 年后，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金，伊戈尔（生于 1951 年）：爱沙尼亚律师、政治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组织者之一。

格列奇科，格奥尔基：宇宙学家。 1989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莫斯科国土选区候选人，后退出提名大会，以便让叶利钦在投票中赢得一个席位。

格里申，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1914—1992）：苏共官员。1971—1986 年，苏共政治局委员；1967—1985 年，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1985 年 12 月被叶利钦取代。

古本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841 年）：演员、戏剧导演。1989—1991 年苏联文化部长；1990 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古本科（胡连科），斯坦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6 年）：苏共官员。1990—1991 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纳迪尔萨，伊翁（生于 1949 年）：摩尔多瓦作家。摩尔多瓦人民阵线早期领导人，1990 年后任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哈雷丘年（阿鲁丘年），苏连（生于 1939 年）：苏共官员。1988—1990 年，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霍尔巴尔（戈尔巴尔），穆科拉（生于 1941 年）：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组成员，70 年代和 80 年代因其反政府活动不断被判刑。

霍林（戈林），米哈伊尔（生于 1930 年）：乌克兰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65 年因民族主义活动被捕，监禁 6 年；1981 年再次被捕；1987 年获释；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组组织者之一；鲁克的创始会员；1990 年被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伊吉济扬，根里赫（生于 1932 年）：亚美尼亚博物馆馆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集团创始会员。

伊格纳坚科，维塔利·尼季奇（生于 1941 年）：记者。1990—1991 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新闻发言人。

伊斯康德尔，法吉尔（生于 1929 年）：阿布哈兹讽刺散文作家。

伊万诺夫，尼古拉·维尼亚明诺维奇（生于 1952 年）：刑事侦查员。80 年代，他作为苏联总检察院的警官，与特尔曼·格德连合办“ 乌兹别克斯坦棉花贿赂案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被指控为在办案过程中滥用职权，但苏联最高苏维埃动用议会豁免权使他免于刑事起诉。

伊万斯，戴尼斯（生于 1956 年）：拉脱维亚政治家。拉脱维亚人民阵线领导人；1990—1992 年，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伊瓦什科，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1932—1994 年）：苏共官员。1989—1990 年，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1 年，苏共副总书记。

卡布尔，努拉利：乌兹别克作家；埃尔克反对党创始人。卡尔宁斯，奥加尔斯（生于 1948 年）：外交官。1985—1991 年，拉脱维亚一美国协会公共事务部主任； 1986 年, 随“ 肖陶夸小组 ”赴拉脱维亚尤尔马拉开会。1992 年后，任拉脱维亚驻美国大使。

卡鲁金，阿列克·达尼洛维奇（生于 1934 年）：克格勃官员，1989 年脱离克格勃；1990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卡里莫夫，伊斯兰（生于 1938 年）：乌兹别克苏联共产党官员。1990 年作为乌兹别克共产党领导人当选总统； 1991 年 12 月起任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卡舒宾，根纳基：苏联将军。苏国防部发言人， 1991 年 1 月 13 日，

发布了有关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塔的误导性消息。

卡斯帕罗夫，加里（生于 1963 年）：国际象棋大师、政治家。1981、1982 年两度获苏联象棋冠军；1985 年，击败安东利·卡尔波夫获世界冠军，民主运动早期领导人，一开始与尼古拉·特拉夫金联袂，后倒向阿尔卡迪·穆拉舍夫。

卡西莫夫，加尼：哈萨克外交官。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助理。

卡乌尔斯，阿尔伯特（生于 1938 年）：拉脱维亚一家农垦企业的主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卡扎尼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生于 1941 年）：律师、法官。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将其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了叶利钦。1993—1994 年任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

克比奇，维亚切斯拉夫·弗朗特塞维奇（生于 1936 年）：苏共官员。独立前后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的政治对手；1994 年两人角逐白俄罗斯总统，都败给了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哈斯布拉托夫，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生于 1942 年）：1990—1991 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3 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基里尔，阿尔比索普：俄罗斯东正教牧师。1990 和 1991 年任俄罗斯东正教对外关系部主任。

基塞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生于 1940 年）：经济学家。来自新库兹涅茨克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基托瓦尼，田吉兹：格鲁吉亚军官。1991 年任格鲁吉亚国民警卫队队长，曾配合推翻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的行动；随后，担任格鲁吉亚国防部长，未经授权就指挥对苏呼米议会大楼进攻，导致格鲁吉亚失败。1995 年由于派散兵游勇进攻阿布哈兹而被捕。

科尔宾，根拉季·瓦西里耶维奇（生于 1927 年）：苏共官员。1986 年 12 月取代库纳耶夫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为日后的暴乱埋下了隐患。1989—1991 年任苏联人民管制委员会主席。

科马尔，德米特里（死于 1991 年）：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中一位被坦克击毙的年轻人。

科姆普列托夫，维克多·格奥尔谢耶维奇（生于 1932 年）:外交官。 1991 年苏联驻美国大使。

科姆普列托娃，阿拉： 80 年代 “ 国际旅行社美国处处长。

科罗季奇，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6 年）：乌克兰诗人、编辑。1986—1991 年任《机关报》编辑。他还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活动家。

科尔扎科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安全官员。鲍里斯·叶利钦的私人保镖，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保安总监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

科瓦廖夫，阿纳托利·加夫里洛维奇（生于 1923 年）：外交官、诗人。1986—1991 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科瓦廖夫，谢尔盖·亚当莫维奇（生于 1949 年）：人权活动家，1975 年因发布反政府文章而被捕入狱。获释后，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俄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他曾是叶利钦的早期支持者，1994 年 12 月俄

军进攻车臣后，成为叶利钦尖锐的批评者。

科济列夫，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51 年）：外交官。1991 年后任俄罗斯外交部长。

克拉夫琴科，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生于 1938 年）：记者。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 年末，负责中央电视台工作。

克拉夫丘克，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生于 1934 年）：苏共官员、乌克兰政治家。1990—1991 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运行主席；1991—1994 年，乌克兰总统。

克里切夫斯基，伊利亚（死于 1991 年）：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中 3 位死难者之一。

库奇马，列昂尼德（生于 1938 年）：乌克兰企业家、政治家。1992 年被任命为乌克兰总理，当时他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家大型导弹厂的厂长，他在那里工作了大半生。1993 年 9 月任总理近一年就宣布辞职。1994 年，他赢得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压倒性多数选票当选为总统，开始强有力的经济改革。

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24 年）：情报官员。1988—1991 年，任克格勃主席；此前负责外国情报收集；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991 年 8 月被捕，1994 年俄议会予以特赦。

库纳耶夫，丁穆哈迈德（1912—1993 年）：哈萨克籍苏共官员。勃列日涅夫时期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1986 年为根拉季·科尔宾取代，次年被开除出政治局。

库拉什维利，鲍里斯（生于 1925 年）：法学家。苏联国家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提倡多党制观念，倡议发起运动来支持改革。库兹米卡斯，勃罗纽斯（生于 1935 年）：立陶宛政治家。1990 年后，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

库兹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37 年）：将军。1989—1991 年，波罗的海军区司令；1991 年 8 月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

克维特辛斯基，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6 年）：外交官。1990 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

拉尔，马尔特（生于 1960 年）：爱沙尼亚历史学家、政治家。1992—1994 年爱沙尼亚总理；此前曾是“爱沙尼亚传统协会”

（1988）和“爱沙尼亚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始人；1992 年起为伊沙马（祖国）党领导人。

兰茨贝吉斯，维陶塔斯（生于 1932 年）：立陶宛音乐家、政治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主席；1990—1992 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席。

拉瞥季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34 年）：记者、政治家。1986—1990 年任《消息报》编辑；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

劳利斯庭，马留（生于 1949 年）：爱沙尼亚哲学家、政治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创始人之一；1990 年起，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列别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陆军将领。1989—1991 年任图拉空降师师长；1992 年后任俄罗斯驻摩尔多瓦第 14 集团军司令。

利加乔夫，叶戈尔·库兹米奇（生于 1920 年）：苏共官员。1965—1983 年任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1983—1990 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85—1990 年为政治局委员。

利哈乔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06 年）：哲学家、历史学家。1987—1990 年任苏维埃文化基金会主席；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洛勃佐娃，柳德米拉：1990 年任基什尼奥夫普希金博物馆馆长。

留本琴科，库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45 年）：法学教授。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委员。

卢钦斯奇（卢钦斯基），彼得（彼奥特）（生于 1940 年）：苏共官员、摩尔多瓦政治家。1989—1990 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1 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1994 年后，任摩尔多瓦议会主席。

卢卡申科，亚历山大·里加尔耶维奇（生于 1954 年）：白俄罗斯政治家。1994 年当选为白俄罗斯总统；1990 年后为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成员。1991 年 12 月他是唯一投票反对白俄罗斯加入“ 独联体 ”的代表。

卢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生于 1937 年）：学者、外交官、政治家。1990 年后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1992—1994 年任俄驻美大使；1994 年后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卢卡年科，列夫科·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 1927 年）：接受过律师培训。1961 年因涉嫌从事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捕，在劳改营中度过 15 年；1976 年获释后，帮助组建“ 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团 ”；1977 年再次被捕，判处 10 年监禁；1988 年获释；恢复后的“ 乌克兰赫尔辛基观察团 ”的创始人之一。1989 年创建乌克兰共和党；1990 年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1991 年 12 月竞选乌克兰总统失败。

卢基扬诺地，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0 年）：律师、苏共官员。1989—1990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90—1991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鲁日科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政治家。1990 年鲁兹科夫为莫斯科市行政官员，当时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支持他竟选市委——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1992 年波波夫辞职，鲁兹科夫继任市长。他是一个有魄力的行政长官，到 1995 年他在俄罗斯已被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马卡晓夫，阿尔伯特·米希洛维奇（生于 1938 年）：军官。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 年竞选俄罗斯总统失败。

马赫卡莫夫，卡哈尔（生于 1932 年）：塔吉克苏共官员。1985—1991 年任塔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1 年任塔吉克斯坦总统。

马尔金娜，塔基亚娜：记者。对 1991 年 8 月 19 日政变领导人提出尖锐问题。

马纽基昂，瓦兹根（生于 1946 年）：亚美尼亚政治家。1990—1991 年任亚美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马奇安，阿曼：乌兹别克作家。反对党“ 埃尔克 ”创始人之一。马季诺夫，弗拉德佐（生于 1929 年）：经济学家。 1989 年后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马斯柳科夫，尤里（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1987—1991 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

梅德维捷夫，尼古拉：俄罗斯族。1990 年 1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时他在维尔纽斯的群众集会上支持立陶宛独立。

梅德维捷夫，罗易·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25 年）：作家、历史学家。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视为异端分子； 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梅德维捷夫，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生于 1929 年）：经济学家、苏共官员。 1988—1990 年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意识形态部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 年为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

梅里，伦纳特（生于 1929 年）:爱沙尼亚制片商、小说家、政治家。 1992 年后任爱沙尼亚总统； 1990—1992 年任爱沙尼亚外交部长。

米哈伊洛夫，阿列克谢：经济学家。 1991 年与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结盟。

莫伊塞耶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9 年）：陆军将领。1989—1991 年任苏维埃军委主席。

莫季耶卡，卡兹米拉斯（生于 1929 年）：立陶宛政治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 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

穆拉谢夫，网尔卡基·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50 年）：物理学家、政治家。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992 年，任莫斯科“武警”司令。

穆塔利博夫，阿亚兹（生于 1938 年）：阿塞拜疆政治家。 1989—1990 年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 1990—1991 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1992 年任阿塞拜疆总统。

纳比耶夫，拉赫曼（生于 1930 年）：塔吉克籍苏共官员。1982—1985 年，塔吉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1991 年秋东山再起，赢得总统大选胜利；但是反对派指控竟选有舞弊行为， 1992 年春内战爆发，几个月后纳比耶夫辞职。

纳扎尔巴耶夫，努尔苏丹（生于 1940 年）:哈萨克政治家。 1984—1989 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 1989—1991 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 1990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

涅纳谢夫，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生于 1925 年）：传媒主管官员。1990 年前任国家电视台主席； 1990—1991 年任苏联国家新闻委员会主席。

尼萨诺夫，拉费克（生于 1926 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 1988—1989 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1989—1991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

尼亚佐夫，萨帕尔穆拉德（生于 1940 年）：土库曼共产党官员。1985—1991 年任土库曼斯坦第一书记； 1990 年后任土库曼斯坦总统。

诺瓦兹洛夫，维克多（生于 1939 年）：将军。 1989—1991 年任苏远东军区司令官。

奥波林斯，亚历山大·米特罗法诺维奇（生于 1943 年）：矿业工程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 年与戈尔巴乔夫角逐主席之职。

奥布霍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7 年）：外交官。1990—1991 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美国事务；此前为战略核武器谈判专家。

奥尔洛夫，尤里·费奥多罗维奇（生于 1924 年）：物理学家、人权活动

家。1976 年因组织“ 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团 ” 而被捕入狱， 1986 年获释，以换回在纽约被捕的克格勃官员。

奥西潘，尤里 · 安德烈耶维奇（生于 1931 年）：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90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戈尔巴乔夫总统委员会委员。奥斯科茨基，瓦连金：民主运动政治活动家。

奥佐拉斯，罗姆阿尔达斯（生于 1939 年）：立陶宛政治家。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萨尤季斯创始人之一；1990—1991 年，立陶宛副总统。

帕尔姆，维克多（生于 1926 年）：化学家、爱沙尼亚政治家。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跨地区代表团 ” 创始人之一。

潘金，鲍里斯 · 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 1931 年）：外交官。1990—1991 年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抵制“ 八月政变 ”，事后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

帕提亚舍维利，朱姆贝尔（生于 1939 年），苏共官员。1989 年 4 月他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发生暴力游行事件。许多人被打死；因调动军队干预而成为替罪羊，几天后被解职。

帕央洛夫，瓦连金 · 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37 年）：经济学家。1989—1991 年任苏联财政部长；1991 年任总理；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后被捕，199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波得拉科夫，尼古拉 · 雅科夫列维奇（生于 1937 年）：经济学家。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1991 年任‘ 市场研究所所长； 1990 年任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顾问； 1991 年 1 月因对戈尔巴乔夫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而辞职。

彼得罗夫，尤里 · 弗拉基米罗维奇： 1991—1992 年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 1993 年后任国家投资公司总裁。

彼得卢申科，尼古拉 · 谢苗诺维奇（生于 1950 年）：军官。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加入“ 联盟派 ”，反对实行总统制。皮亚谢娃，拉里莎 · 伊万诺芙娜：经济学家，积极倡导经济改革；1992 年起在莫斯科市政府主管私有化问题。

普列汉诺夫，尤里 · 谢尔盖耶维奇：克格勃将军。 1989—1991 年任克格勃人事保护局局长； 1991 年 8 月与政变组织者合作，将戈尔巴乔夫软禁于克里米亚。

波洛兹科夫，伊万 · 库兹米奇（生于 1935 年）：苏共官员。1990—1991 年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

波尔托拉宁，米哈伊尔 ·尼基法罗维奇（生 1939 年）：记者、编辑。 1986—1987 年任《莫斯科新闻》编辑；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叶利钦的非正式政治顾问； 1990—1991 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传媒部长。

波波夫，加夫里尔 · 哈里托诺维奇（生于 1936 年）：经济学家。《经济问题》编辑；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91 年当选为莫斯科市长，但于 1993 年辞职；现为莫斯科国际大学校长。

波特尼科夫，维塔利：记者、政治观察家。

曾里马科夫，叶夫根尼 · 马克西莫维奇（生于 1929 年）：政治学家、苏共官员。1985—1989 年任“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所长；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 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90—

1991 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91 年为苏联安全委员会委员；1992 年后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

普列汉诺夫，亚历山大（生于 1938 年）：记者、作家。专写针砭时弊的文章，特别是自 1990 年后，鼓吹以武力维持苏联；1995 年主编右翼报纸《明天》，其前身为《今天》。

普隆斯基涅，卡兹米拉（生于 1943 年）:经济学家、立陶宛政治家。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1991 年任立陶宛总理； 1991 年 1 月 13 日维尔纽斯电视塔被攻占前夕被解职。

普戈，鲍里斯 · 卡尔洛维奇（1937—1991 年）：苏共官员。 19841988 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1988—1990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90—1991 年任苏联内务部长； 1991 年未遂政变后自杀。

拉希多夫，沙拉夫（死于 1983 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 1959—1983 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半记。

拉斯普庭，瓦连金 · 格里戈里耶维奇（生于 1937 年）：作家。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 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

列文科，格里戈里 · 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6 年）：苏共官员。 1989 年后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1 年任戈尔巴乔夫顾问，负责联盟条约谈判。

罗基昂诺夫，伊戈尔 · 尼古拉耶维奇：将军。 1989 年 4 月指挥军队进攻第比利斯和平示威群众，造成严重伤亡。

罗曼诺夫，格里戈里 · 瓦西里耶维奇（生于 1923 年）：苏共官员。1970—1983 年任列宁格勒市党委第一书记； 1983—1985 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73—1985 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正式委员。他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对手，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后不久即被迫退休。

罗斯特罗波维奇，姆斯季斯拉夫 · 列奥波尔多维奇（生于 1927 年）：导演、大提琴家。 1974 年由于支持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被迫出国，此后他成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团长； 1989 年后不断回国在俄罗斯举办音乐会，包括 1991 年 8 月政变期间的一次戏剧性插曲。他赶回莫斯科，为聚集在俄罗斯白宫周围的叶利钦支持者演奏大提琴曲。

卢比克斯，网尔弗莱兹（生于 1935 年）：苏共官员。立陶宛共产党强硬派领导人，反对独立运动。 1991 年 8 月因支持政变而被捕。

鲁茨科伊，亚历山大 · 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47 年）：空军将军。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支持叶利钦为主席； 1991 年 6 月当选为俄罗斯副总统， 1992 年开始反对叶利钦， 1993 年企图在俄罗斯夺权；1993 年 10 月俄罗斯议会大楼遭炮击后被捕； 199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吕特尔，阿诺尔德（生于 1928 年）：爱沙尼亚政治家。 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独立运动期间直到 1992 年任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

雷日科夫，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生于 1929 年）:经理、苏共官员。 1985—1990 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1991 年竞选俄罗斯总统失败。

里诺夫，尤里 · 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 1930 年）：教授。1989 年以莫斯科奥将尼基兹航空研究所所长身份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跨地区代表团 ” 创始成员、叶利钦早期盟友。1992 年后出任俄驻法大使。

萨格捷耶夫，罗阿尔德·吉纽罗维奇（生于 1932 年）：航天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1989 年作为一航天研究所所长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安·萨哈罗夫的亲密盟友、民主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萨哈罗夫，安稳烈·德米特里耶维奇（1922—1989 年）:物理学家、 人权活动家。 1986 年 12 月从高尔基流放地获释后，发挥了日益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于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 年逝世前，他是“跨地区代表团”创始人之一，民主运动中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

桑盖利，安德烈（生于 1944 年）：摩尔多瓦政治家。1990—1992 年，任摩尔多瓦农业食品部长； 1992 年组建“全国共识政府”，此后一直任摩尔多瓦总理。

萨维萨尔，埃德加（生于 1950 年）：爱沙尼亚哲学教授、政治家。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2 年任爱沙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中心党领袖。

沙赫赖，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56 年）：俄罗斯政治家。1990 年当选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叶利钦的早期盟友； 1992 年起任俄罗斯副总理； 1994 年前任国家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 1993 年任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 1993 年 12 月大选中该党赢得了俄国家杜马 19 个席位。

沙波什尼科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生于 1942 年）:空军将军。 1991 年 8 月反对政变企图，事后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长，后成为独联体武装部队司令。

沙塔林，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34 年）：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 1990 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 1991 年 8 月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经济改革计划。由于该委员计划未被采纳，他抛弃戈尔巴乔夫，成为叶利钦的谋士。

谢尔巴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生于 1949 年）：经济学家。1991 年任苏联副总理。 1991 年 6 月随普里马科夫和亚夫林斯基赴华盛顿解释经济改革计划。

谢尔比茨基，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1918—1990 年）：乌克兰共产党官员。1971—1989 年，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1971—1989 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舍宁，奥列克·谢苗诺维奇（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1990—1991 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人事工作。曾支持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

谢瓦尔德纳泽，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生于 1928 年）：格鲁吉亚政治家。 1985—1990 年及 1991 年 11—12 月任苏联外交部长。 1992 年 3 月起任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首脑。

什梅列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于 1936 年）:经济学家、作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推动民主运动，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

索辛，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51 年）：经济学家、政治家。1991 年起任俄罗斯政府负责社会政策的副总理；俄统一和谐党领导人；1994 年起为俄国家杜马议员。索斯塔科夫斯基，维亚切斯拉夫： 1989 年任高级党校校长，民主运动活动分子。

舒什克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弗维奇（生于 1934 年）：白俄罗斯物理学家、政治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1991

年担任白俄罗斯议会副主席；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后，当选为白俄罗斯议会议长，并以这一身份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宣言，随后成为独立的白俄罗斯国家元首。1994 年初被迫辞职，年底竞选白俄罗斯总统失败。

西古阿，田吉兹（生于 1934 年）：格鲁吉亚政治家。 1990 年 11 月起任格鲁吉亚部长会议主席， 1991 年 8 月被加姆萨胡尔季阿解职。此后他加入了反对派联盟，将加姆萨胡尔季阿赶下台，邀请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执政。

西拉耶夫，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生于 1930 年）：工程师、企业家。 1990—1991 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八月政变”后负责苏联经济部门和共和国间经济协调委员会，直到 1991 年 12 月。

画塔里扬，斯捷潘·阿拉马伊索维奇（生于 1930 年）：经济学家。1989—1991 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 年起任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

斯科里夫，拉里莎·帕夫洛芙娜（生于 1939 年）：乌克兰戏剧导演、政治活动家。 1990 年她作为“鲁克”会员从基辅区入选乌克兰议会； 1991 年 12 月支持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取代鲁克领导人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出任总统。斯涅古尔，米尔恰（生于 1940 年）：摩尔多瓦政治家。 1989 年通过语言法案时，他是摩尔多瓦议会议长。 1990 年，当选为摩尔多瓦总统。

索布恰克，阿纳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7 年）：法学教授、政治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跨地区代表团”和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 1991 年当选为圣彼得堡市长；1991 年起任“民主改革运动”（DDR）主席团成员。索科洛夫，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生于 1911 年）：陆军将领。1987 年鲁斯特驾驶“塞斯纳”飞机突降红场之后被解除苏联国防部长职务。

索洛缅采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13 年）：苏共官员。1971—1983 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理； 1983—1988 年任共产党管制委员会主席；1971—1988 年间先任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正式委员。

索洛维约夫，尤里·菲利波维奇（生于 1925 年）：苏共官员。1985—

1989 年任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 1986—1989 年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失败后，以上两职位均被解除。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生于 1918 年）：俄罗斯作家。 1973 年发表《古拉格群岛》，批评由列宁创建、由斯大林将其塞满的劳改营，因此被剥夺苏联公民权，被迫流亡。从 1976 年起直到 1994 年回到俄罗斯之前，他一直住在美国。

1990 年他以《重建俄罗斯》为题发表长文，建议解散苏联，创立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北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斯拉夫国家。

斯坦凯维奇，谢尔盖·鲍里索维奇（生于 1954 年）：历史学家、政治家。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筹组“跨地区代表团”，推动民主运动； 1990—1991 年任莫斯科市委副主席； 1992 年起任俄罗斯政府国务秘书， 1994 年起为俄国家杜马议员。

斯坦凯维休斯，谢斯洛瓦斯（生于 1937 年）：立陶宛政治家。1990—1992 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副主席。

斯塔尔科夫，弗拉基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生于 1940 年）：记者。《论据与事实》编辑； 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支持新闻自

由。

斯塔罗杜勃茨耶夫，瓦西里 · 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1 年）：农业经济学家。图拉州一个集体农庄主席，苏联农民联合会主席。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期间加入“ 紧急状态委员会 ”。当月被捕，随后获释， 199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斯塔罗伏伊托娃，加利娜 · 瓦西里耶芙娜（生于 1946 年）：民族学家、政治家。 1989 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跨地区代表团 ” 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 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2 年任叶利钦民族问题顾问；“ 过渡经济研究所民族政治研究中心 ” 主任，《欧洲》报编辑。

斯捷潘诺夫，特伊姆加兹（生于 1934 年） ： 1985—1990 年在苏联外交部任爱 · 谢瓦尔德纳泽的私人助理；自 1992 年供职于格鲁吉亚总统办公室。

苏霍德雷夫，维克多 · 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932 年）：外交官。80 年代大部分时间为苏联外交部美国司高级官员。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经常担任苏联领导人的英语翻译。

苏来曼诺夫，奥尔扎斯 ·奥马罗维奇（生于 1936 年）:哈萨克诗人， 1989—1991 年任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组织“ 内华达一塞米巴拉金斯克协会 ” 抗议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核试验；被认为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劲敌。

塔拉申科，谢尔盖 · 彼得罗维奇（生于 1937 年）：外交官。 1987—1991 年任外交部总秘书处处长；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秘密联络员。

捷尔-彼得罗相，列翁（生于 194s 年）：亚美尼亚政治家。 1990 年当选为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任亚美尼亚总统。

特雷霍夫，弗拉基斯拉夫：记者。国际电讯社代表， 1991 年 8 月政变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共产党的前途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质问。

特雷尔亚，伊奥西普（生于 1943 年）：宗教活动家。 1962 年因多项罪名被捕入狱。 80 年代初组建“ 先行团 ”，呼吁“ 乌克兰天主教 ” 合法化；后再次被捕，判处有期徒刑。

济霍诺夫，格奥尔基 · 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4 年）：经济学家。1989 年从塔吉克斯坦某区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联盟 ” 派积极分子。

吉洪诺夫，尼古拉（1905—1993 年？）：苏共官员。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85 年被雷日科夫取代。他在政治局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对手。

济贾科夫，亚历山大 · 伊万诺维奇（生于 1926 年）：企业家。1991 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卡里宁机械加工厂总经理，苏联国有企业、工业、建筑、通讯设备协会主席；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期间为“ 紧急状态委员会 ” 成员。当月被捕，随后获释，199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特拉夫金，尼古拉，伊里奇（生于 1946 年）：俄罗斯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989 年 3 月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1991 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供职； 1993 年 12 月当选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

特雷季亚科夫，维塔利：记者。 1990 年起任《独立报》编辑。

则雷特利，朱拉勃 · 康斯坦丁诺维奇（生于 1934 年）：格鲁吉亚艺术家、雕刻家。他是一位多产艺术家，曾把一件雕刻作品捐献给纽约联合国总部大

厦附近一个公园里。许多其他作品屹立于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主要城市。

茨普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生于 1941 年）：作家、哲学家。图列耶夫，阿曼格尔基（生于 1944 年）：哈萨克族。 1990 年任克莫罗沃州苏维埃主席； 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1 年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失败。

乌尔马尼斯，冈基斯（生于 1939 年）：拉脱维亚经济学家、政治家。1993 年 7 月被拉脱维亚议会选为拉脱维亚总统。

巫安努，伊翁·斯皮里顿（生于 1935 年）：摩尔多瓦戏剧导演、舞台设计家。 1990 年任摩尔多瓦文化部长，摩尔多瓦人民阵线领导人。

尤斯曼霍扎耶夫，伊纳姆宗（生于 1930 年）：乌兹别克籍苏共官员。1983 年接替拉希多夫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 1988 年 1 月被解职，随后被指控犯有贿赂罪。

尤素夫，弗拉基米尔（死于 1991 年） ： 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中死难的一位年轻人。

乌斯季诺夫，德米特里（1908—1984 年）：苏共官员。 1976—1984 年任苏联国防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

维亚希，蒂特（生于 1947 年）：爱沙尼亚一工厂经理、政治家。1989—1992 年任爱沙尼亚运输部长； 1992 年任爱沙尼亚总理； 1995 年 4 月他领导的联合阵线赢得了爱沙尼亚议会大选，从而再度出任总理。

瓦西多夫，艾尔金：乌兹别克诗人。乌兹别克艾尔克的创始人之一。瓦利亚利，瓦伊诺（生于 1931 年）：爱沙尼亚籍苏共官员。 1989—1991 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

瓦连尼科夫，瓦连金·伊万诺维奇（生于 1923 年）：陆军将领。 1991 年他作为苏联陆军司令支持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为 1991 年 8 月 18 日在克里米亚围困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小组成员。

维利霍夫，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生于 1935 年）：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戈尔巴乔夫科学政策顾问之一； 1989—1991 年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

维吉罗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利尔·奥格利（生于 1930 年）：阿塞拜疆籍苏共官员。1990 年 1 月“人民阵线”掌权时，他是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随后被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取代。维什涅夫斯基，谢尔盖（死于 1988 年）：记者。 70、80 年代《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家。

弗拉索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32 年）：苏共官员。1990 年 5 月竞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败给了叶利钦。1988 年后，他曾经是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此前为苏联内务部长。

沃尔科高诺夫，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生于 1928 年）：陆军将领、历史学家。 1990 年当选俄罗斯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支持叶利钦的第一位苏联将军。1991 年 8 月未遂政变后，他领导一个委员会审查、公开秘密档案。

沃尔科夫，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生于 1929 年）：政治学家。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1993 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事务及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成员。

沃尔斯基，阿尔卡基（生于 1932 年）：苏共官员、政治家。 1989—1990

年受苏联最高苏维埃之命管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1991 年为“ 民主改革运动 ”组织者之一； 1992 年后任“ 工业企业家联合会 ”主席，是“ 平民联盟 ”政党的领导人。

沃龙佐夫，尼古位 · 尼古拉那维奇（生于 1934 年）：生物学家。1991 年被任命为苏联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主席，当时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中唯一的非共产党成员。1991 年未遂政变中他是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夺权企图的唯一的内阁部长。

沃罗特尼科夫，维利 · 伊万诺维奇（生于 1926 年）：苏共官员。1975—1979 年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1979—1982 年任苏联驻古巴大使； 1983—1988 年任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 1988—1990 年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1983—1990 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

沃兹涅先斯基 · 安德烈（生于 1893 年）：俄罗斯诗人。1962 年尼基塔 ·赫鲁晓夫指责他是“ 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 ”，但他始终拒绝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写诗；在共产党掌管下的文化机构中积极支持改革。

乌尔夫松斯，马夫里克斯（生于 1918 年）：拉脱维亚政治学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 ”成员。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 · 尼古拉那维奇（生于 1923 年）：苏共官员、外交官、哲学家。1973—1983 年任苏联驻古巴大使； 1983—1985 年任“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所长； 1986—1990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87—1990 年为苏共政治局委员；1990 年总统委员会委员； 1991 年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 1991 年为“ 民主改革运动 ”创始人之一； 1993 年后任奥斯坦尼克电视公司经理。

雅科夫列夫，叶戈尔 · 弗拉基米罗维奇（生于 1930 年）：记者、编辑。1986—1992 年任《莫斯科新闻》编辑；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 1992 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

亚库宁，格列勃 · 帕夫洛维奇（生于 1934 年）：俄罗斯东正教牧师、政治犯。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叶利钦的早期盟友。

亚纳耶夫，根纳季 · 伊万诺维奇（生于 1937 年）：苏共官员。 1990 年 12 月当选为苏联副总统，此前担任过共青团和贸易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991 年 8 月参与政变领导层,之后被捕。 1994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予以特赦。

亚林，维尼亚明 · 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40 年）：尼知尼 · 塔吉尔的一位工人，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1991 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活跃分子。

亚罗申科，维克多 · 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46 年）：经济学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支持叶利钦出任主席； 1990—1991 年任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

亚大林斯基，格里戈里（生于 1952 年）：经济学家，政治家。 1989—1990 年供职于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 1990 年任俄罗斯副总理；1991 年 9—12 月任苏联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1992 年后，任莫斯科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席； 1993 年参与创建亚博卢集团； 1994 年后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亚佐夫，德米特里 · 季莫费耶维奇（生于 1923 年）：陆军将领。1987—1991 年任苏联国防部长； 1991 年 8 月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企图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权；政变失败后被捕， 1992 年获释； 1994 年俄罗斯国家

杜马准予特赦。

叶戈罗夫，阿列克谢：克格勃官员， 1991 年 8 月受克留奇科夫之命，负责制定实施军事管制法的紧急计划。

叶利钦，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生于 1931 年）：苏共官员，后为俄罗斯政治家。 1985—1987 年任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1986—1988 年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9 年 3 月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0 年当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 年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1 年 6 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娜，奈娜·约瑟伕芙娜：鲍里斯·叶利钦的夫人。叶大图申科，叶夫根尼·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 1933 年）:诗人、政治活动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叶若夫，尼古拉（1895—1939 年）： 1936—1938 年“大肃反”高峰时任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领导人。

扎多尔诺夫，米哈伊尔：经济学家。1990—1991 年为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的副手， 1991 年 1 月两人合写文章批评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

扎格拉金，瓦季姆（生于 1927 年）：苏共官员。 1967—1988 年任苏共国际部副部长、后升任第一副部长；随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

扎哈罗夫，根纳季：克格勃官员。 1986 年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雇员，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扎利金，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生于 1913 年）：作家、编辑。 1986 年后任《新世界》编辑。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环境问题活动分子。

扎斯拉关斯卡娅，塔基亚娜·伊万诺芙娜（生于 1927 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全苏社会经济问题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主任；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扎斯拉夫斯基，伊利亚·伊奥西伏维奇（生于 1960 年）：纺织工程师、政治家。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 1993 年后为“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 1994 年后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日里诺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生于 1946 年）：俄罗斯政治家。自由民主党创始人； 1991 年竞选俄罗斯总统失败，但 1993 年 12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他的党居第二位。

佐林，瓦连金·谢尔盖那维奇（生于 1925 年）：记者。 1987 年代表苏联电视台采访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莫斯科中央电视台定期播出的“谈话”栏目的主持人。佐尔金，瓦列里·德米特里那维奇（生于 1943 年）：律师、法官。1991—1993 年任俄罗斯宪法法院院长；1993 年 10 月进攻俄罗斯白宫事件发生后辞去了院长的职务，但仍保留法官团成员资格。

注　释

第一章

1.在布朗大学的演讲， 1993年5月4日。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并未说此说法系出自原文，但他也不了解初次引用的是谁。

2.尽管叶利钦已同意其他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的总统对于动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都有发言权，但并不清楚一旦需要做决定时，这三个共和国的意见如何得到体现。无论如何，前苏联大多数核武库是坐落在俄罗斯，并处在俄罗斯人的有效控制之下。

第二章

1.关于这次旅行的报告见艾伦·J·埃伦德 A Report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Operations，1961：U. S.S.R.，Japan，Taiwan，Hong Kong，South Vietnam，LaoS，Cambodia，Thailand.参议院第73号文件，第87届国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62年）。

2.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例外。在赫鲁晓夫为提高苏联小麦生产而发起的‘开发不毛之地”运动期间，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量涌入了北部平原地区。

3.约·维·斯大林：著作选。第五卷（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3年），第269—270页。

4.《苏共的中央全会、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第7版，第一部分（1898—1925）（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文献，1953年），第443页。

5.有关这些事件的细节描述参见波丹·纳海洛和维克多·斯沃伯达所著 Soviet Disunion ：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Problem in the USSR （纽约：自由出版公司， 1990年）。

6.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 Harvest of Sorrow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年）一书中对这一人类悲剧进行了最彻底和精确的研究。

7.其正文由美国政府于1948年发表，见R·J·桑塔格和J·S·贝迪编辑的 Nazi-Soviet Relations l939—1941 ：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 1948年）。参加这一谈判的德国外交官之一在其回忆录 Hans von Herwarth， Against Two Evils（NewYork： Rawson， Wade， 1981）中也描述了这样的内容。

8.这是3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早期曾允许将俄罗斯的扩张看作是一种帝国主义道路。但斯大林上台后，开始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同苏联的爱国主义溶在了一起（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特别明显），早期的提法即成了禁忌。

9. Ivan Dzyuba，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A Study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2d ed.（London：Weidenfeldand Nicolson，1970）。

10.例如,请参见默里 ·费施巴赫和小艾尔弗雷德 ·弗伦德利， Ecocidein the USSR ： Health and Nature Under Siege （NewYork: Basic Books， 1992）。

11.有些西方学者同意这种分析。例如，杜克大学教授杰里·霍夫在1989年写道：“夸大近期苏联种族动乱的潜在性是错误的……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表现的非常善于避免这方面的问题”；Russia and the West ：Gorbachev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New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第 4 页。

12.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New York： Harper &-Row，1987），第 105 和 107 页。

13.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论改革和党的干部》， 1987 年 1 月 27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4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第 331 页。

第三章

1.鲍里斯·叶利钦：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纽约：首脑会议文件， 1990 年），第 139 页。

2.米·谢·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我的立场》（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 年），第 140—141 页。

3.马基雅维里：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阿伦·吉尔伯特译（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6 页。

4.剧作家米哈伊尔 沙特洛夫是首先公开散布这一消息的人之一， 1987 年他在同法新社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此事。后来，其他人也谈到这个事情，其中包括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波兹纳，他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 Eyewitness： A Person-al Memoir of the Unraveling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 RandomHouse， 1992 年）中一再提到它。

5.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的回忆录记载了会议的情况，这是迄今为止与会者所发表的最详尽的有关报道。见尼古拉·雷日科夫：《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 年）和叶戈尔·利加乔夫：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纽约： Pan-theon， 1993 年）。

6.如同仪式的主人在 1985 年华盛顿国旗俱乐部的聚餐会上所评论的那样，副总统的题辞似乎是“你去世，我飞来”。

7.根据回忆录。准确反映了讲话的尖锐和风格，但并非都是原话。

8.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第 140—141 页。

9.叶利钦： Against the Grain，第 140 页。

10.作者 1992 年 3 月 4 日与雷日科夫的谈话。

11.作者 1992 年 9 月 23 日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谈话。

12.雷日科夫：《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第 243 页。对于 1986 年与 1985 年生产的比较，他所引用的实际数字是：伏特加和其他烈酒：从 2.8 亿公升下降到 1.46 亿公升；葡萄酒：从 4.01 亿公升下降到 1.40 亿公升；啤酒：从 7.18 亿公升下降到 4.88 亿公升。

13.引自科罗季奇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镜子》。

14.见戈尔巴乔夫接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 1985 年 11 月 3 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的讲话》，《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2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第 132 页。

15.《真理报》， 1987 年 6 月 26 日。

第四章

1.米·谢·戈尔巴乔夫：《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3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第 245 页。

2.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纽

约：自由出版社， 1991 年），第 81 页。

3.官方通知于 7 月 3 日收到，次日就透露给华盛顿的记者；

The New YorkTimes， 1985 年 7 月 3 日，第 1、6 页。

4.这是指奥列格·卡鲁金，他后来在华盛顿和纽约从事间谍活动。 1990 年，他在晋升为少将后，与克格勃决裂，谴责克格勃，并进入政界，在苏联议会得到一个席位。他出版了一部有关其生涯的著作，The First Directorate ： My 32 Years in Intelligence andEspionage Against the West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1994 年）。

5.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反历史主义》，《文学报》， 1972 年 11 月 15 日；见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Union，第 24 卷，第 7 号，第 1—7 页的摘译。该文还根据“阶级斗争”观点对有关历史的阐述进行了辩护，他后来抛弃了那种观点。

6.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Muki prochteniya bytiya （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1 年），第 60—62 页。

7.同上，第 63 页。

8.A·N·雅科夫列夫： Ot Trumena do Reogana （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4 年），第 394 页。

9.例如舒尔茨所作评论，见他的回忆录 Turmoil and Tri-umph （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兄弟出版社， 1993 年），第 166—167 页。

10. 苏联领导人不仅利用公开的宣传机器中伤里根，还命令克格勃进行伪造文件的秘密战。其中某些情况反映在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基夫斯基的著作中， ComradeKryuchkov’s，Instructions：Top Secret Files on KGB ForeignOperations，1975—1985（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98—103 页。

11.舒尔茨： Turmoil and Triumph。

12.按照国际惯例和苏联自己的法律，对于入侵的飞机，在使用致命武器之前，应对它发出警告，并采取一系列迫降措施。但在 1983 年（和 1978 年）的韩国飞机事件中并未这么做，当时一架韩国飞机误入俄罗斯北部摩尔曼斯克地区。

13.之所以将其放在引文中，是因为我不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国内问题；然而，苏联当局当时的确把它们看作国内问题，反对在谈判中把它们列为正式议题。

14.这一部分牵涉到相互关系，它在讲话公开发表前已经删除，但在后来的声明和美国总统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函中却包括了类似思想。

15. 这部分内容发表在 Week1y Complication of presidentialDocuments， 1984 年 1 月 23 日，第 40—45 页。

16.同上， 1984 年 6 月 28 日，第 944—946 页。

17.对于空间防御计划的这些批评并没有指出，如果美国不存在这种计划，什么因素才能促使苏联同意大规模削减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18.同 15， 1985 年 10 月 18 日，第 1291—1296 页。

19.同 15， 1985 年 11 月 18 日，第 1399—1402 页。

20.同 15， 1985 年 11 月 25 日，第 1422—1424 页。

21.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在讨论军备控制以外的其他问题的工作小组中，苏联代表团接受了有关人权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用语，第一次承认人权是双方

所关注的适当问题。

22.舒尔茨国务卿匆忙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因为他必须在当

晚飞往布鲁塞尔，向盟国作简要介绍。他的表情向聚集的新闻记者透露了他的失望，他没有强调会谈已经解决的许多重要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后来告诉我，苏联人本来准备以肯定的口气向新闻界作简要介绍，但是当舒尔茨以悲观的态度介绍了会谈的结果后，他们也只好照此办理。

23.沃尔克格诺夫于 1990 年选入俄罗斯议会,他是 1991 年之前支持叶利钦的唯一一名苏联将军。

24．1992 年 9 月 21 日，作者会晤了德米特里 · 沃尔克格诺夫。

25.我们现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依靠里根关于达尼洛夫无辜的证词。当时，克格勃已经收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奥尔德里奇 · 艾姆斯，艾姆斯定期向克格勃提供有关美国特工人员的情报。达尼洛夫当然不在其中。

26.在 Turmoil and Triumph 一书中,舒尔茨介绍了对于这些事件的不同观点。从他的叙述中可知，他的下属显然没有向他提供许多有关事实，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官僚机构之间的敌意。

27.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防止奥尔德里奇 · 艾姆斯所造成的损害，艾姆斯是克格勃安插在中央情报局里面的“鼹鼠”，他已经被苏联的、然后是俄罗斯的特工机构所收买，并一直为它们工作，直到于 1994 年 2 月被逮捕。

28.负责组织会议的苏联官员后来告诉我,该会议已经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批准，该部当时由阿纳托利 · 多勃雷宁领导，他在担任了多年苏联驻美大使之后刚刚返回莫斯科。他们说，克格勃同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一样，对是否召开该会议感到犹豫不决，但是多勃雷宁的看法占了上风。

29.其他一些应邀发言的美国人，包括罗伯特 · 麦克法兰、理查德 · 珀尔、杰恩 · 柯克帕特里克和助理国务卿艾伦 · 凯斯，最后都倾向于参加会议。

第五章

1.这是戈尔巴乔夫回应叶利钦 1987 年 10 月份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的一段话；参阅苏共中央的公报， 1989 年 2 月，第 285—286 页。

2.摘自利加乔夫回应叶利钦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的讲话；1988 年 7 月 2 日的《真理报》。

3.参阅叶戈尔 · 利加乔夫的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纽约：先哲祠出版社， 1993 年），第 105 页。

4.根据作者 1987 年 4 月 17 日在大会期间作的笔记。

5.据作者 1992 年 9 月 23 日与米哈伊尔 · 波尔托拉宁的会谈内容。

6.参阅鲍里斯 ·叶利钦的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顶峰出版社， 1990 年），第 178—181 页。

7． 1992 年 9 月 23 日，波尔托拉宁在一次会谈中对我说，他已经相信对叶利钦的攻击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阴谋，即使叶利钦不上台发言，他也在劫难逃。

8.有关阿尔巴托夫对会议的记述可以参阅他的著作 Thesystem （纽约：泰晤士出版社， 1992 年）第 330 页。

9.参阅叶利钦的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第 199—202 页。

10.它最终登载在 1989 年 2 月份发行的中央委员会月报上，据苏共中央的公报，第 209—287 页。

11.事实上,这篇文章早在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就已经见诸报端了，由于那天他正在南斯拉夫逗留，所以推迟了对它的反应。

12.参见 1988 年 3 月 13 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第 3 页。

13.意大利共产党报纸 L’Unita 驻莫斯科记者朱利亚托·切耶萨与苏联共产党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他曾出版了一份报告，详细地论述了这封“信”是如何炮制并登载的。据 1988 年 3 月 23 日的 L’Unita；它的英文件可参阅对外广播信息服务社 1988 年 3 月 31 日出版的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第 55—58 页。

14.参见利加乔夫的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第 301—303 页。

15.根据作者 1992 年 9 月 30 日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内容。

16.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ipfelgesprache： Geheime Protokolle aus meiner Amtszeit（柏林：罗夫霍尔夫， 1993 年），第 223—245 页。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找到戈尔巴乔夫这本书的任何俄文版本或英文版本，只有一本法文的译本，书名为 Avant-memoirs，由奥迪勒·雅各编辑， 1993 年在巴黎出版。

17.作者 1992 年 9 月 30 日与阿尔卡基·沃尔斯基的谈话内容。

18.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1988 年 6 月 6 日，第 703—708 页。

19.民意测验结果登出后，作者在日志中作了记载，但没有标明资料来源。

20.理论上说这里应写作“他或她”，但实际上任党的书记一职的女性少得可怜。

21.电视对各位代表的发言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不过，报道叶利钦的讲话时，却省略了他一半的发言内容，包括他的讲话所引起的掌声，而利加乔夫的讲话却全部予以了转播，包括听众的掌声。

22.参阅叶利钦的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第 222—224 页。

23.以前称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第六章

1.见 1988 年 7 月 26 日的《真理报》。

2.见 1988 年 8 月 6 日的《真理报》。

3.见 1988 年 12 月 8 日的《真理报》。

4. 见 1988 年 8 月 13 日的《红星报》。

5.见 1988 年 8 月 13 日的《真理报》。

6.参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7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88 页。

第七章

1.参阅由查尔斯·F·弗塔多和安德烈亚·钱德勒编辑的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Publics： DOcument on the NationalQuestion（科罗拉多，波特兰：西方观点出版社，1992 年），第 11 页。

2.见 1987 年 1 月 28 日的《真理报》。

3.见 1988 年 7 月 5 日的《真理报》。

4.参阅玛尔塔·布里尔·奥尔科特的文章“The Collectiviza-tion Drive in Kazakhstan”, Russian Review, 1981年4月,第136页;以及罗伯特·康奎斯特的著作 Harvest of Sorrow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192—197页。

5.纳扎尔巴耶夫所写的著作《没有左右派之分》(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91年)以问答的方式记录了许多事实。

6.他45岁时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

7.见1988年7月26日的《真理报》。

8.丁穆哈迈德·库纳耶夫,《有关我的时代》(阿拉木图:RGZhI“Deuir,”Mp“Yntymak,”1992),第265页。

9.比如说,有一名驻莫斯科的英国记者马丁·沃克就曾于12月30在伦敦的一家出版物 The Guardian 上登发了一篇报道。他写道,根据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至少有20人丧失了生命, 200人受伤,多达1000人被捕入狱,然而,事后的调查表明死亡人数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只有三四个人),只是受伤与被捕的人数没有大的出入。

10.可参阅1987年1月9日 The Washington Post 上的一篇文章,“Soviet Leader Criticizes Rioters”,见A—25页。后来,雷日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阿拉木图的骚乱进行了精确的描述,并且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对此次事件予以重视而大加鞭挞;参阅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著《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年),第200—201页。

11.比如,在1987年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参阅1987年2月19日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12.参见塔斯社1988年7月29日所发布的消息,博格丹·纳哈伊洛和维克多·斯沃博达合著的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Problem in the USS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0年),第303页。

13,参见1988年3月29日的《消息报》。

14.以文学的手法描述这场悲剧的作品以弗朗茨·韦费尔写的 The Forty Days Musa Dagh 最为著名。

15.英译本见弗塔多和钱德勒的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第65—66页。

16.博格丹·纳哈伊洛和维克多·斯沃博达合著的 SovietDisuion,第297—298页,第313页。

17. 参考作者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92年3月17日的会谈。

18.参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文章选集》,第7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90年),第142页。

19.博格丹·纳哈伊洛和维克多·斯沃博达合著: SovietDisuion,第221—223页。

20.参考作者与维亚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干1992年9月29日的会谈。

21. 见1988年7月26日的《真理报》。

第八章

1.参见1989年1月22日美国ABC广播电台“This WeekWith David Brinkley”节目里的一段话。

2.卡特的命令通常称之为“粮食禁运”令,不过,用这个词欠妥,因为

卡特还允许每年出口 800 万吨的粮食，根据两国签订的《长期粮食协定》，苏联有权获得这部分美国粮食；但是协定中有关由美国政府批准的应急粮的供应的出口遭到了禁止。然而，美国农民们认为总统禁止出售额外的粮食使粮食价格大为下跌，这对于许多濒临破产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里根总统 1981 年上台后不久，很快就取消了这项禁令。

3.事实上，也有些右翼人士如《保守文摘》的编辑理查德·维古里尔曾经在里根任职最后一段时间里指责过里根总统，不过，没有在政治上产生什么有意义的影响。

4.迈克尔·贝施劳斯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合写了一本书，名为 At the Highest Levels （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 1993 年）。这本书有关布什时期的美苏关系的资料非常详实。根据两名作者在书中的描述，布什 1987 年 12 月份曾提醒戈尔巴乔夫说，他将来会时常因不得已而发表一些反苏言论，不过，戈尔巴乔夫对此不应大惊小怪。两位作者的此番描写似乎是基于布什本人有关这次谈话的回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美国人在场（不包括有可能在场担任秘密任务的保镖）。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帕维尔·帕拉日琴科却对这场（与作者的）谈话有着不同的记述。他回忆说，布什当时对戈尔巴乔夫说，里根不得不时常发表一些反苏联的言论，布什本人则愿意从中进行一些调节。帕拉日琴科不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唇读家，他有可能误读了布什的本来的意图，误认为布什在谈论里根。如果真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对布什的意思的领会与理解就只能是通过帕拉日琴科的俄语翻译了，因为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使他听懂布什的真正的意图。另一方面，布什也不知道他的话是如何被翻译成俄语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在 1989 年整个春天对美国政策是否能延续下去似乎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

5.令人奇怪的是，许多认为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权势的人也常常发表这种言论。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要在随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被剥夺权力，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他会反过来对付我们？

6.在这件事情上，布什推翻了由官僚机构提出的最初的那种谨慎的提议，坚持要求进行富有实质意义的军备削减。

第九章

1.参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文章选集》，第 7 卷（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第 558 页。

2.参阅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著的《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 年），第 284 页。

3.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请求之下，萨哈罗夫于 1988 年 12 月走访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和国，但在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一些争议问题上，他在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调解工作没有取得成功。4 月份的第比利斯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他便赶往出事地区，并为那些受伤的示威群众寻求外界的帮助。

4.参阅尼古拉·雷日科夫所著的《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第 284 页。

5.这是我当时的猜测。 1993 年 2 月 18 日布尔布利斯曾在一次谈话中向我肯定这一点，他说正是本着这个目的，事先早已对这种提名与撤消进行了安排。

第十章

1.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与安德烈·钱德勒合编，《苏联加盟共和国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 Documents onthe National Question》（布尔多，科罗拉多：西方观点出版社，1992 年），第 11 页。

2.同上，第 203 页。

3.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参加者并非波罗的海民族，不过他们支持波罗的海国家独立；“ 国际阵线 ” 并不能代表该地区所有非波罗的海民族说话。

4.《真理报》， 1989 年 8 月 26 日。

5.我个人强调的重点，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和安德烈·钱德勒：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 Documents on theNational Question，第 95 页。

6. USA Today ，1989 年 9 月 16 日。

7. 1992 年 9 月 19 日，作者对鲍里斯·叶利钦的采访记录。

第十一章

1.《我们共同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米·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文件集》， 1990 年 1 月 11—13 日（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2 页。

2.《苏共中央全会文件》， 1989 年 9 月 19—20 日（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第 224 页。

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声明中有一条竟然颇有预见性。

它是这样的：“ 联邦经久不衰的保证，是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在一个单一联盟国体内完全出于自愿的结合。 ” 如果那真是保证的话，就根本不曾有过保证！

4. 1989 年 12 月 21 日，作者与瓦连金·法林的会谈记录。

5.这个问题由叶利扎维塔·斯戴格问及，她代表《论据与事实》来采访，但她是根据斯塔尔科夫的明确指示来提问的。

6. 10 月 14 日，《真理报》报道了会议已经召开这一事实，但没有发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一个更为翔实的报道随后见于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的文章《放慢摆针建交就是停止时间前进》，《莫斯科新闻》，第 43 期（1989 年 10 月 22 日）。

7.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和安德烈·钱德勒合编：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 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布尔多，科罗拉多：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9 年），第 134—135 页。

8.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大量会议记录摘要，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Gipfelsprache ： Geheime Protokolle aus meiner Amtszeit（柏林：罗沃尔特， 1993），有关 “ 西方价值观 ” 的讨论见第 125—129 页。

9.对外广播新闻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89 年 12 月 14 日，第 63 页。

10.对外广播新闻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89 年 12 月 19 日，第 37 页。

11.同上 12.对外广播新闻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1989 年 12 月 29 日，第 38—39 页。

13.《真理报》， 1989 年 12 月 26 日。

14. 1992 年 9 月 23 日，作者对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的采访记录。

15，据叶利钦说，文件原本是在苏联解体后从当时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攫为己有的文件中找到的。

16． 1992年9月28日，作者对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采访记录。

17.《真理报》， 1989年11月26日。

第十二章

1.《真理报》， 1990年1月1日。

2.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1月12日，第49页。

3.出自阿姆斯特丹“Elsever”报记者Rene de Bok和WilliamWansink采访时的讲话，转引自随后出版发行的《新闻报》（都灵）， 1990年1月24日。

4.奥齐罗·马吾罗： La Repubblica， 1990年2月2日，第11页。

5.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k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0年1月12日，第47—49页。

6.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0年1月16日，第117—120页。

7.不久又恢复该城市最初的名称甘杰。

8.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悲惨的中央集权主义》，《俄罗斯文学报》，1990年第1期，第1页。

9.《俄罗斯文学报》， 1989年第52期，第2—3页。

10.贝纳德·格特：“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催促他与保守派决裂”，《世界报》（巴黎）， 1990年1月31日，第1—2页。

11． La Repubblica， 1990年2月2日，国外广播信息服务转译，Daily Reportt Soviet Union， 1990年2月7日，第91—92页。

12.他打算把热气球飘到红场上空，虽然这一要求被否决，但是允许他把热气球飘到靠近国际旅馆的莫斯科河岸。不过，尽管官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莫斯科的气候使他无法将热气球飘起来。

13． The New York Times， 1990年2月5日。

14.《真理报》， 1990年1月15日。

15.《苏共中央全会文件》， 1990年2月5—7日（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l990），第9页。

16.同上，第162—166页。

17.同上，第67—69页。

18.作者对瓦季姆·巳卡金的采访， 1992年10月6日。

19.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第8号公报,1990年2月27日，第137—139页。

20.同上，第143—144页。

21.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2月28日，第30—32页。

第十三章

1.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13日，第57页。

2. 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15日，第44页。

3.《晚邮报》（米兰）， 1990年3月9日，转引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13日，第76页。

4.雷日科夫在两年后，即1992年3月14日接受我的采访时告诉我，他退出竞选只是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后来他觉得自己是一种愚忠，他确信如果他参加竞选的话，他会在选举中获胜。我对他是否能赢得选举表示怀疑，但考虑到他在工业经营者和共产党机关中的声誉，他可能会在秘密投票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5.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19日，第44—45页。

6.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20日，第99页。

7.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22日，第87页。

8.转引自莫斯科美国大使馆收到的呼吁原文。

9.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4月13日，第56页。

10. 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贸易修正案”禁止与苏联签署任何没有经国会批准的贸易协定，所以，没有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政府当局无权签署执行协定的条约。

11. 90名代表投票赞成，3票弃权，国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4月19日，第83页。

12.小查尔斯·F·福尔塔多与安德烈·钱德勒合编：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博尔德彩色出版社， 1989年，第102—103页。

13.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4月20日，第88—89页。

14.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4月13日，第57页。

15.《消息报》， 1990年4月6日，英文版的有关内容见福尔塔多与安德烈·钱德勒编：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第36—40页。

16.《真理报》， 1990年4月11日。

17.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4月19日，第47页。

18.《消息报》， 1990年3月1日。

19.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年3月16日，第60页。

20.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结论，并不是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共同看法，大使馆的人员继续鼓励我通过具有挑战性的观察和信息来论证我的观点。

第十四章

1.《苏维埃俄罗斯报》， 1990年3月25日。

2.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主席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0年3月31日。

3.苏联宪法第76条。

4.《苏维埃俄罗斯报》， 1990 年 3 月 25 日。

5.同上。

6.在交涉中并没有公开地争论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所有投票赞成主权独立声明的代表都完全理解主权声明的言外之意。但是，从逻辑上讲，他们的投票得不出其他的结论。

7.作者 1992 年 9 月 25 日与伊万·安东诺维奇的会见。

8.这次会议正式称之为“协商会”，但是会议召集以后，代表们赞成把这次集会改为议会的成立大会。

9.安东诺维奇还说，他相信如果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不同的候选人，将能够阻挠波洛兹科夫当选；作者 1992 年 9 月 25 日与安东诺维奇的会见。

10.国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0 年 4 月 19 日，第 24 页。

11.同上，第 25—26 页。

12.当然，这种看法是把美国驱逐出欧洲的苏联传统目标的 180 度大转弯。但是，这一目标与“阶级斗争”理论一样都悄悄地抛弃，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此前仍然怀疑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可能对苏联不利的话，那么在 1989 年 12 月雅尔塔美苏首脑会议上，这种怀疑也消失了。

13.选票是 3411 票赞成， 1116 票反对。《真理报》， 1990 年 7 月 11 日。

1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真理报》， 1990 年 7 月 11 日。

15.“Moldavia”（摩尔达维亚）一词是从俄语衍生出来的。它独立后选择了罗马尼亚语名称“Moldova”（摩尔多瓦）。同样，摩尔达维亚首都的名称也从俄语的“Kishinev”（基什尼奥夫）改为“Chisinau”（基希纳乌）。

16.我回到莫斯科后,正式询问了负责地方事务的国家委员会不给发进口许可证的原因，随后进口允许证就发了下来。

17.乌兹别克斯坦宪法随后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的通过,其中的一部分是以美国宪法为蓝本。

18.“自由之声电台”在 1990 年 10 月 31 日出版了这些主权声明的目录。安·希伊编：《主权声明资料集》， RFE/RL 研究所,Report on the USSR, 1990 年 11 月 9 日，第 23—25 页。

第十五章

1.加夫里尔·波波夫，《怎么办？》（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9 页。

2.《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1990 年 8 月 8 日。

3.选自一首针对负责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列昂尼德·阿巴尔金的讽刺诗；《图书评论》， 1990 年 2 月 9 日，第 10 页。

4.苏联学者分为在共产党机构中的官员（例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利加乔夫）以及这一体制下的工厂或农庄经理（如雷日科夫）两种。两个集团都是由共产党员组成，但是他们的心理是不同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主要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官僚，他们不再拥有权力和人手来监视或猜测经理们。而在另一方面，经理们随着共产党的监护的日益下降而获得了权力。

5.见他刚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对报界发表的声明；《苏维埃俄罗斯报》， 1990 年 5 月

25 日。

6.当然，他描绘的是最初载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安排，而不是 1993 年演变后的安排。

7.《消息报》， 1990 年 9 月 4 日。

8.同上。

9.同上。

10.我们的五大湖有好几个面积都很大，但是它们都不太深。

11.《共青团真理报》， 1990 年 11 月 4 日。这封信是由总统委员会中的斯坦尼斯科夫·沙塔林和尼古拉·彼得拉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弗拉德伦·马季诺夫、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中的两名高级成员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等共同签署的。

第十六章

1.《真理报》， 1990 年 11 月 21 日。

2.引自《莫斯科新闻》1990 年第 47 号，第 5 页。

3.发生在 1990 年 9 月 24 日；《消息报》， 1990 年 9 月 25 日。4.苏联法律允许军方人员选入立法机关，在他们服役期间继续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

5.《红星报》， 1990 年 11 月 15 日，第 1—4 页。

6.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0 年 11 月 19 日，第 15 页。

7.作者与瓦季姆·巴卡金的会面， 1992 年 10 月 6 日。

8.尼古拉·雷日科夫，《改革：背叛行为的历史》（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第 20 页。

9.《消息报》， 1990 年 11 月 17 日。

10.《莫斯科新闻》， 1990 年 11 月 16 日。

11.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会议录《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文化和进步出版社， 1993 年）一书中描绘了戈尔巴乔夫的私下反应；德文译本：Anatoli Tschernajew，Die Let-zten Jahre Einer Weltmacht： Der Kreml von Innen （斯图加特：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93），第 333 页。

12；瓦季姆·巴卡金：《丢掉幻想》（克麦罗沃：图书出版社，1990 年），第 90 页。

13.同上，第 91 页。

14.作者与弗拉基米尔·伊万申科的会面， 1990 年 11 月 23 日。

15.在乌克兰的“ 休列科 ”。

16.译自莫斯科电视 1990 年 12 月 20 日播送的他的讲话。

17.莫斯科电视， 1990 年 12 月 20 日。

18.谢瓦尔德纳泽经常向他的个人助手特伊姆加兹·斯捷潘诺夫吐露心事。斯捷潘诺夫 1994 年 3 月 7 日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在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前的某个时间，戈尔巴乔夫曾经问他是否有兴趣担任副总统。斯捷潘诺夫还说谢瓦尔德纳泽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他希望自己继续留在他的阵营里，自己希望还当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斯捷潘诺夫都相信戈尔巴乔夫已经放弃了这个主意，他提起这件事，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减少对谢瓦尔德纳泽的政策的支持这一事实。

19.为了规避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量的方面的限制,乌拉尔山以东的军事装备正在进行悄悄的转移。苏联军队企图把明显受到条约管制的某些部队排除在已达成的限额以外，并且在谢瓦尔德纳泽所进行的战略核武器谈判上倒退。

20.同注 11，德文译本第 336—337 页。

21.亚纳耶夫在第一轮投票中并没有得到确认,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再次递上他的名字坚持要通过他的时候，他才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22.叶利钦稍后向这些数字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他们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税收项目，包括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使用或出口的产品征收的赋税。

23.同注 11，俄文本第 388 页，德文译本第 328—329 页。

24.同上。

25.同上，第 387 页。

26.同上，第 404—405 页，德文译本第 341 页。

27.《莫斯科新闻》， 1990 年 11 月 11 日。

28.阿列克谢·列文索恩，《年度三位风云人物》，《独立报》，1991 年 2 月 28 日，第 2 页。

第十七章

1.引自作者在当时所写的日记。

2.根据彼得拉科夫给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的内容记载在作者的日记中。

3.引自作者在当时所写的日记。

4.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1 月 11 日，第 43 页。

5.这是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控制下的电台节目广播的，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1991 年 1 月 14 日，第 95 页。

6.前一天，联邦委员会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访问立陶宛，并且发回当地局势的报告。

7.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1 月 14 日，第 94 页。

8.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1 月 15 日，第 78 页。

9.《共青团真理报》， 1991 年 1 月 16 日。

10.《政府瘫痪或瘫痪的政府？》《独立报》， 1991 年 1 月 15 日。

11.《真理报》， 1991 年 1 月 23 日。

12.在这个问题上，改革者通常被称做“左派”，而强硬派共产党人则被称做“右派”。鉴于这两个词的含义在西方有所变化——在西方共产党人通常被认为代表站极左——所以我一直尽力避免使用这两个词，只有在直接引述苏联的评论和描述戈尔巴乔夫在 1990 年秋抛弃改革知识分子这两种情况下才用。

13.同注 2。

14.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会议录《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 1993 年，第 416—418 页）中对这段谈话的部分记录作了修改。他删去了我的大部分话，而增加了戈尔巴乔夫评论的概要，并删

去了他当初所作的有关苏联处于内战边缘的评论。

15.《劳动报》， 1991年2月12日。

16.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华盛顿， 1991年2月13日。

17.The New York Times， 1991年2月15日，A—34页。

18.《消息报》， 1990年12月25日。

19.民意测验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关于私人财产的问题、关于对苏联不信任的问题以及关于废除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问题,但是在3月17日民意测验上只包括了选举总统的问题。

20.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2月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该委员包括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帕维尔·布尼奇、格里戈里·阿尔已托夫、塔基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尤里·里若夫和其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Union，1991年2月7日，第66—68页。

21.苏联电视， 1991年2月21日。

22.同注14，第408—412页。

23.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年2月28日，第74页。

24.同上，第76页。

25.《消息报》， 1991年5月26日。

26.当我在1992年10月6日的一次面谈中同瓦季姆·巴卡金谈起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指出：“这样一个报告只可能出自克格勃之手。”

27.《消息报》，1991年3月9日； 1991年3月9日。

28.《真理报》， 1991年3月8日。

29.同注14，第427页。

30. 1991年2月15日，委员会主席谢尔盖·阿列克谢耶夫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这个总统令存在着“实质上的错误和其他缺点”；《消息报》1991年2月16日。

31.在对检察长们的演说中，戈尔巴乔夫指出：“为了大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独裁统治——法律的独裁统治。”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年2月14 日，第20页。

32.《选择报》， 1991年4月6—7日；英文译文见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1年4月10日，第32页。

第十八章

1.《真理报》， 1991年4月10日。

2.《莫斯科新闻》，第16期（1991）。

3. Financial Times， 1991年4月20—21日。

4.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格鲁及亚和摩尔多瓦领导人拒绝参加；叶利钦继续度假，派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代表他参加。

5.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增补版，1991年4月11日，第13—15页。

6.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增补版，1991年4月23日，第23页。

7.《消息报》， 1991年4月24日。

8.《消息报》， 1991年4月9日。

9.我们被告知“联盟”激进派的两名成员——“黑人上校”之一维克多·阿

尔克斯尼斯和爱沙尼亚犹太人后裔的俄罗斯发言人叶夫根尼·科根——将出席午宴，但他们没有来，而我们的客人也未对他们缺席作出任何解释。

10.一些未出席午宴的联盟领导人因指控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一场摧毁苏联的运动而声名狼藉。

11.由会议电视广播的录相带翻译而成。

12.投票中 588 票赞成， 292 票反对， 75 票弃权。

13.《共青团真理报》， 1991 年 4 月 5 日。

14. 80 年代在接受一家外国新闻社采访时，戈尔巴乔夫说他在婴儿时便接受了洗礼，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

15.在 1992 年 9 月的一次采访中，叶利钦告诉我，自从他在 1991 年 8 月的政变企图中幸免于难后，他开始相信上帝和祈祷的价值。

16.（法）《世界报》， 1991 年 4 月 17 日，第 4 页。

17.晚间新闻节目“时代”把报道拖延到为期四天的访问中的最后一天，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1 年 4 月 18 日，第 37—38 页。

18.例如，参看 1991 年 4 月 17 日席尔维那·考夫曼对叶利钦的采访。

19.海外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4 月 18 日，第 36—37 页。

20.《真理报》， 1991 年 4 月 24 日。

21. 1991 年 4 月 4 日，由苏联第一任代总理维塔利·多古泽夫（他曾主管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与曾陪同立陶宛总理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会见国务卿贝克的克斯罗瓦克·斯坦克维克斯率领的代表团开始谈判。

22.罗曼·索尔琴科，“The Draft Union Treaty and the ‘BigFive’”， RFE/RL 研究机构， Report on the USSR， 1991 年 5 月 3 日，第 16—18 页。

23. 1990 年党代会后，由于领导由党代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不再像 1964 年免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那样有权免除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了。

24.《真理报》， 1991 年 4 月 23 日。

25.引自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 1993 年），第 442 页。

26.瓦连金·斯捷潘科夫和叶夫根尼·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莫斯科，星火出版社， 1992 年）第 76—77 页。

27.作者与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会晤， 1991 年 4 月 29 日。

28.这些法律见尤里亚·帕斯帕罗瓦和列夫·西加尔编：“LawonRussianPresidencyBreezeThroughParliament”，Com-mersant， 1991 年 4 月 29 日，第 2 页。

29.雷日科夫心脏病康复后不久，在接受《星期日电讯报》（伦敦）（1991 年 4 月 7 日，第 17 页）的采访中表露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憎恶。

30.他在后来出版的书中透露，他得到的消息是误传， xeno-phobic populist；阿曼·塔利耶夫：《叛乱的长久回声》：《今后该如何生活》（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31.《俄罗斯报》， 1991 年 7 月 11 日。

第十九章

1.出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讲话，其内容后来发表在《日

报》， 1991年12月15—21日；以及《红或白？》《1991年8月的悲剧》：《事实、冲突和见解》（莫斯科，塔拉， 1992年），第42—45页。

2.《真理报》， 1991年6月22日。

3.作者与波波夫的谈话。 1991年7月22日。

4.据别切尔尼亚耶夫说，德国总理曾告诉他，如果1991年戈尔巴乔夫能以客人身份出席伦敦会议，那么1992年他肯定可以完整的成员资格参加。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 1993年）第445页。

5.例如， The Times（伦敦）1991年5月20日头版头条登出《受困的总统转向西方：秘密使节帮助戈尔巴乔夫寻求援助》。

6.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年5月24日，第19—22页。

7.俄语短语“■”的意思是“一致的机会”，但在英语里“机会之窗”更为贴切。

8.《真理报》， 1991年6月18日；《消息报》， 1991年6月18日。

9.《独立报》， 1991年6月19日。

10.由于我没有记录，这些引语以我的记忆为基础。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关键的部分是正确的。

11.实际上，这件事流传得要广泛得多。几周之内，作家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时代》杂志华盛顿分部的总编斯托伯·泰尔伯特便得到了这一消息，泰尔伯特当时正为一本关于布什政府时期美—苏关系的书收集材料，他已经掌握了基本材料，借我在华盛顿之机，向我询问了1991年9月事件的情况。

12.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51页。

13.这次谈话的记录（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书中做了复述）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也许是因为他在我们谈话时，只作了部分记录，后来是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的。例如，他引用我的话说，“美国情报机构获得消息说，明天有人企图罢免你。”实际上，我从未提到它是情报机构的报告，而只是说“报告的主要根据是传闻而非可靠的情报”。并且，我也没有明确说在第二天就会采取行动。虽然波波尔给叶利钦报信说这种企图迫在眉睫，但他也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许多人，尤其是苏联人，在提到“报告”时总是自动地联想成情报，但实际上，如果它是一个政治话题，它可能只是一个外交报告。我已经预见这种可能的误解，因此有意用了一个短语以暗示它不是一个秘密情报。但从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看，我的苦心白费了。

切尔尼亚耶夫还误解了我的另一个声明。不知怎么，他认为我不相信消息的内容，其实，我说的只是我们不能肯定消息是否属实，当然它的确是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它是准确的，但它没有指出牵涉者的姓名，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参看切尔尼亚耶夫的《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50—452页。

14.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452—453页。

15.别斯梅尔特内赫向8月政变的调查者所做的声明，瓦·斯捷潘科夫和叶·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莫斯科：星火出版社， 1992年），第79页。

16.作者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莫斯科， 1992年3月20日。

17.米歇尔 ·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 ·泰尔伯特在 At theHighest Levels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在华盛顿召开的这些会议 (波士顿：利特尔，布朗， 1993 年)，第 384—391 页；切尔尼亚耶夫在《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地位和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第 448—450 页。

18.斯克罗斯和塔尔伯特， At the Highest Levels，第 391 页。

19.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50 页。

20.根据 1994 年 6 月 1 日在莫斯科与亚夫林斯基的讨论；亚夫林斯基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这段经历，见莫斯科的周报《星球回声》第 44 期（1993 年 10—12 月），《一致的机会》，第 18—21 页。

21.当时布尔布利斯是叶利钦最密切的顾问之一,但他已经在敦促俄罗斯宣布独立，而不是去签署联盟协定。

22.亚夫林斯基：《一致的机会》，第 20 页。 1990 年秋，戈尔巴乔夫保证只要与政府计划相协调，“ 500 天计划 ” 中 “ 所有好的部分 ” 都将被保留。

23.尽管“ 七国集团 ” 同意给予苏联联系成员的地位，使苏联能够得到技术性援助，但戈尔巴乔夫不愿意接受在他看来是这些组织中的 “ 二等公民 ” 的地位。因此，它在 1991 年 7 月 23 日提出的申请是要求完整成员资格，虽然西方大国认为苏联经济还不符合成员条件，但还是接受了苏联的请求。

24.这些引语出自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55—457 页。

25.贝斯克罗斯和塔尔伯特， At the Highest Levels，第 407 页。

26.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57 页。

27.切尔尼亚耶夫描述了如何在最后的修改中删去了 “ 社会主义的选择 ” 一词，而这是共产党教义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473—475 页。

28.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 1991 年 7 月 22 日，第 71 页。

29.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第 394—

395 页。

30.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1 日，第 17—19 页。

31.布什夫妇在斯帕索别墅举行的午宴会进行得很顺利。叶利钦夫妇、纳扎尔巴耶夫夫妇和亚美尼亚的捷尔-彼得罗相夫妇都参加了。席间，曾任协调人的纳扎尔巴耶夫来到叶利钦和捷尔-彼得罗相桌前,邀请他们到主桌前集体向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敬酒。

32.立陶宛当局后来的调查表明,袭击是由“ 黑色贝雷 ”的里加支队干的，虽然被莫斯科称为非法的立陶宛边界口岸还遭到了其他的袭击，但都与 7 月 31 日的谋杀无关。调查者认为，这次野蛮行动主要是为了阻止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晤。《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3 页。

33.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是谁批准了最初的消息,但我怀疑它直接出自戈尔巴乔夫，因为我认为一名助手，即使是高级别的，在未与戈尔巴乔夫核实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提出和戈尔巴乔夫一同去斯塔夫罗波尔。

34.除了揶揄布什外,塞法尔还要补偿一下他早些时候对乌克兰民族情绪的冒犯。在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发言撰稿人时，他曾接受苏联大使阿纳托

利·多勃雷宁的建议，让尼克松在到达后称基辅为“俄罗斯的城市之母”。多勃雷宁没有对此作出解释，而塞法尔显然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俄罗斯人用来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上的联盟的。乌克兰痛恨这一称呼，将其视为企图剥夺乌克兰特性的俄罗斯沙文主义。不过，塞法尔不必为此事的后果负责，而我作为当时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则不得不答复来自愤怒的乌克兰的抗议。

35.例如， 1991 年 7 月乌克兰议会采取行动，将财产置于乌克兰政府管辖之下，而不是让莫斯科去将其私有化。

36.参看罗曼·索尔琴科的《乌克兰和联盟协定》， RFE/RL 研究所，Reoort on the Soviet Union， 1991 年 7 月 26 日，第 22—24 页。

37.在莫斯科的电视台的讲话， 1991 年 8 月 2 日。译文可见于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5 日，第 35—36 页。

38.他选用的一词有时译成“联盟”，但不像用于“苏维埃联盟”中的“■”一词，前者表示一般种松散一些的联合。从政治上而言，他的用词意义重大，在 3 月份的全民公决中受欢迎的是■，而不是■。

39.《俄罗斯文学报》， 1991 年 7 月 19 日。

40.《独立报》， 1991 年 8 月 8 日。

41.例如，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在 1992 年 9 月 23 日的一次会见中告诉我，他认为叶利钦不会签字。

42.在背景问题上你可以说“无可奉告”而不会被人引用；但在记录中，拒绝评论则会被视为对所提出的问题予以默认。

43.引自 1991 年 8 月 5 日新闻发布会的录音带；省略号表明不清楚的地方。

第二十章

1.《真理报》， 1991 年 8 月 20 日。

2.Rossiisky nezavisimy institut sotsianykh i natsinalnykh problem， Krasnoe ili Beloe？DramaAvgust-91：Fakty，Gipotezy，Stolknovenie mnenye （莫斯科：塔拉， 1992 年），第 73 页。

3.引自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莫斯科：星火出版社，1992）。

4.鲍里斯·叶利钦，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纽约，朗德门出版社， 1994 年），第 41 页。

5.同上， 38—39 页。

6.同上， 39 页。

7.关于1991年8月政变准备工作的这些细节以及后来披露的细节来自政变失败后公布的调查记录；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

8.同上，84 页。

9.同上，85 页。

10.同上，85—86 页。

11.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The August Coup 一书中的描述（纽约：哈伯克林斯出版社， 1991 年），第 18—19 页。

12.戈尔巴乔夫的话：“我用俄罗斯人在这种环境下通常使用的最有力的

语言，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同上， 19—24 页。

13.对克里姆林宫会议的描述,包括所有的直接引语均以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的《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一书为基础，第 89—91 页。

14.随着时间（格林尼治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宣言可在对外广播信息服务中找到，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19 日，9—13 页。

15.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19 日， 19—20 页。

16.虽然标明的日期是 8 月 16 日，但《消息报》后来报道说，给塔斯社的原始材料日期是 8 月 18 日。后来把日期“更正”为 8 月 16 日，是为了使声明看起来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被命名之前就已签署了的。

17.对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19 日，第 15 页。

18.例如,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紧跟莫斯科的共产党书记阿尔弗莱兹·卢比科斯所做的反应是，宣布当地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由波罗的海军区司令弗雷德·库兹明领导；对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19 日，第 34 页。

19.作者在阿拉木图与纳扎尔巴耶夫的官员助理加尼·卡西莫夫的会见，1991 年 10 月 1 日。

20.在 1992 年 9 月 19 日的一次会晤中,叶利钦亲口告诉我,延期离开‘挽救了他的生命”，因为在下午 5 点离开后不久，就下达了击落他的飞机的命令。据叶利钦说，由于起飞推迟，导弹基地指挥官因不知命令是否还有效；也无法从莫斯科得到时间改到晚上 8 点的确切消息，因而没有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但我没有看到任何要击落叶利钦的飞机的命令，看来它们只是在政变后的调查中才发现的。

21.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 110—111 页。

22.叶利钦， The Struggle for Russia，第 57 页。

23.克格勃阿尔法小组一些官员的证词见《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 117—121 页。

24.同上，第 132 页。

25.米歇尔·贝斯克罗斯和斯托伯·泰尔伯特， At the High-est Levels，（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93 年），第 422—423 页。

26.同上，第 433 页。

27.文章的译文刊登在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20 日，第 2—8 页。但其用词没有抓住电视图像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的形象。我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视广播中制作了录像带，由此作出判断。

28.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 年），第 14—15 页。普里马科夫和巴卡金请别斯梅尔特内赫（也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他们的宣言，但他拒绝了。如果他在宣言上签了字，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他可能就不会被免职了。

29.巴卡金的报告中说，他被从白宫鲁茨科伊的办公室里叫出来，并被要求利用他对亚佐夫的影响阻止伞兵部队的袭击。但是亚佐夫否认有任何袭击白宫的企图，而巴卡金认为这是实话。巴卡金：《摆脱克格勃》，第 15 页。

30.杰姆斯·比林顿， Russia Transformed： Breakthrough toHope（纽约：自由出版社， 1992 年），第 49—59 页。

31.同上，第 54 页。

32.尤里·S·西多连科，《推翻布尔什维主义的三天》（顿河畔的罗斯托夫，顿河期刊出版社，1991 年）。

33.后来有些人对于像阿赫罗梅耶夫这样自豪的官员竟会自缢表示怀疑。军人传统上把手枪作为自杀的工具，但阿赫罗梅耶夫在退休时上交了他的左轮手枪，他别无选择，只有用绢子了。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 236—244 页。

34.英译本见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Union，1991 年 8 月 23 日，第 20—30 页。

35.海外广播信息服务， Daily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23 日，第 28 页。

36.同上，第 29 页。

37.同上，第 30—32 页。

38.讲话的英文译本见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人的讲话：《一次政治力量的重大重组》，TheNewYorkTimes，1991 年 8 月 24 日，第 6 页。

39.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和法令见《戈尔巴乔夫关于共产党的声明》， The New York Times， 1991 年 8 月 25 日，第 14 页。

40.巴卡金：《摆脱克格勃》，第 59 页。

第二十一章

1.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 1991 年 8 月 27 日，第 3 页。

2.《消息报》， 1991 年 9 月 4 日。

3，同上， 1991 年 11 月 15 日。

4.同上， 1991 年 11 月 26 日。

5.以前已接近于宣布立即独立。 1990 年，爱沙尼亚宣布“走向独立的过渡时期”， 1991 年初，它恢复了其战前宪法的某些条款。拉脱维亚宣称，在法律上，拉脱维亚共和国仍然存在，但它准备就取得事实独立的条件与莫斯科进行谈判。

6. 1991 年 7 月 31 日缔结了条约，当时布什总统正在莫斯科；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7 月 31 日，第 70 页。

7.应戈尔巴乔夫的请求，美国的承认推迟了几天。布什总统当时为此受到批评，但是短时间推迟并不是不合理，它也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政府造成损害。

8.赞成独立的票数实际上是 94. 39%，反对票为 0. 46%；伊丽莎白·富勒：《亚美尼亚压倒多数票赞成独立，脱离苏联》，RFE/RL 研究所，Report on the USSR，1991 年 9 月 27 日，第 18—20 页。

9.根据白俄罗斯语言的发音，它也拼作 Dzemyantsei 和 Dziemianciej。

10.根据作者 1992 年 9 月 24 日在明斯克同人民阵线领导人泽诺恩·帕兹尼亚克和白俄罗斯议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的谈话。同沃尔特·斯坦凯维奇详细地讨论了所有事件，“作为白俄罗斯独立宣言背景的事件”，RFE/RL 研究所， Report onthe USSR， 1991 年 9 月 20 日，第 24—26

页。

11.作者与舒什克维奇的谈话。 1992 年 9 月 24 日。

12.某些人指责克拉夫丘克态度暧昧，但即使如此，他也仅仅犹豫了几个小时。在 8 月 19 日晚间，他同意发表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法令在乌克兰境内无效。

1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加姆萨胡尔季阿将外交部长解职的原因，是后者在布什 7 份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没有使他同布什总统会面。实际上，布什拒绝会见加姆萨胡尔季阿，因为他公然侵犯人权，特别是在南奥塞梯。

14. 1991 年 11 月 26 日，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命令建立了俄联邦安全局。对于巴卡金在帮助建立该机构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担任克格勃主席时期与其他共和国的交往，参见瓦季姆·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 年），第 91—128 页。

15.内阁中的高级成员有部长、副部长及各军区司令。

16.亚历山大·拉赫尔对执政的“俄罗斯‘激进派’”的这些派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RFE/RL 研究所， Report on the USSR，1991 年 11 月 22 日，第 20—23 页。

17.同 2， 1991 年 10 月 1 日。

18.戈尔巴乔夫表示，像那样禁止共产党是不合适的。然而，在 1992 年 9 月 30 日同他会晤时，他告诉我，他同意禁止“共产党组织”，即共产党用以统治国家的特殊组织形式。

19.叶利钦的禁令遇到了俄罗斯法院的挑战，一年后，宪法法院只部分批准了该禁令。它判决，总统可以解散共产党组织，但是不能禁止以同样的名称组建新党。

20.切尔尼亚耶夫列举了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时期所会见的约 80 个外国政界人士，某些人会见了不止一次；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跟随戈尔巴乔夫的六年》（莫斯科：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 1993 年），第 496—497 页。

21.尽管采取了技术措施，保护大楼不受窃听器影响，但是国会在几年内仍禁止国务院完成该工程。参议院完全拒绝为使用该建筑拨款，而愿意拨款修建另一所大楼。反之，众议院拒绝授权修建另一所大楼，除非那所尚未完工的大楼能够被使用。结果，美国的外交官不得不在莫斯科拥挤、危险、防火设施很差的地方办公。不幸的是，即使巴卡金的姿态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22.只有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拒绝参加新国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23.M·伯杰对谈判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消息报》， 1991 年 9 月 27 日，第 2 页；《消息报》， 1991 年 9 月 30 日，第 2 页；英译本发表在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第 43 卷，第 39 号（1991 年），第 5—7 页。

24.条约原文发表在《俄罗斯报》， 1991 年 10 月 22 日。英译本发表在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第 43 卷第 42 页（1991 年），第 4—9 页。

25.安德烈·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总统的离职》（莫斯科：进步出版集团，1994 年），第 123 页。

26.有关情况的引文和描述来自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他出席了会议并担任记录员；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23

—124 页。

27.同上，第 145 页。

28.同上，第 145 页。

29.同上，第 148 页。

30.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1991 年 11 月 15 日，第 26 页。

31.同上，第 27 页。

32.自从联合国成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就和苏联一样，被准许单独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罗斯福与丘吉尔同斯大林达成的交易（斯大林曾请求让苏联的这两个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独立成员国），该交易之所以生效，是因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在投票时总是同苏联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一安排是设法向斯大林在该组织中提供两张额外的选票。除了这个仅有的事例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即接受其成员国的组成部分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

33.条约草案的全文发表在《消息报》， 1991 年 11 月 26 日。英译本发表于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 Soviet Union，1991 年 11 月 26 日，第 21—25 页。

34.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64—165 页。

35.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我的立场》（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 年），第 11—15 页；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64 页；巴卡金：《摆脱克格勃》，第 218—219 页。

36． 1992 年 9 月 24 日，作者与斯坦尼斯拉夫 · 舒什克维奇的谈话。

37.格拉乔夫在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交易；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第 16 页。

第二十二章

1.全俄法官代表大会演讲，莫斯科， 1991 年 10 月 18 日：《俄罗斯报》，1991 年 10 月 19 日。

2.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发言， 1991 年 12 月 12 日；《真理报》1991 年 12 月 13 日。

3.《共青团真理报》， 1991 年 12 月 13 日。

4.“ 乌克兰听到了其总统的宣誓，脱离了联盟 ”，《消息报》，1991 年 12 月 6 日。

5.例如，参见《明斯克准备召开三个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会议》，《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5 日，第 1 页。

6.《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7 日，第 1 页；“ 三国同盟 ” 也可以译作 “ 三国联盟 ”。

7.《苏联总统与俄罗斯总统的对话》，《俄罗斯报》， 1991 年 12 月 7 日。

8． 1992 年 9 月，我与他们每个人分别进行了讨论。

9.《白俄罗斯、俄联邦和乌克兰三国首脑的宣言》，《俄罗斯报》， 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1 页。

10． 1992 年 9 月 24 日，作者与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的谈话。

11.该协议及野牛森林会议（所有文件都指出正式的签字地点是明斯克）后所发表的其他宣言的俄文原文，见《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10 日；《俄

罗斯报》， 1991 年 12 月 10 日。英译本见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56—57 页。

12.外国广播信息服务，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12 月 9 日，第 32 页。

13.《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2 页；英译本见外国广播信息服务，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1991 年 12 月 10 日，第 15—16 页。

14.《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10 日。

15.以及已不存在的跨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后来分裂为三个联盟共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

16. 1992 年 3 月 13 日，作者与康斯坦丁·留本琴科在莫斯科的谈话。

17.例如，参见《俄罗斯严重的政府危机；鲁茨科伊不辞职，而将继续进行攻击》，《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5 日。

18.《消息报》， 1991 年 12 月 19 日。

第二十三章

1.亚历山大·赫尔岑：《俄罗斯革命思想的发展》，《作品集（三卷本）》（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64—1965 年，第 7 卷，第 31 页【法文本】，第 160—161 页【俄文本】）。

2.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再次发表的慕尼黑演讲，《1991 年 12 月》：《我的立场》（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2 年），第 195—196 页。

3.鲍里斯·叶利钦：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纽约：RandomHouse， 1994 年），第 35 页。

4.同上。

5.列翁·捷尔-彼得罗相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纽约， 1994 年 9 月 26 日。

6.《独立报》英译本，第 3 卷，第 6—7 号（1992 年）。

7.这是 1992 年 3 月 17 日，弗拉基斯拉夫·斯塔尔科夫在与作者的谈话中所使用的措辞。斯塔尔科夫说，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苏联的制度，而是“在其中游泳”。他是该制度的产物，苏联解体时他处于执政地位，这只是历史的命运，他本人对于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作出任何个人贡献。

8.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保守的和改良主义批评家的判断，尽管这些集团所反对的观点，反而是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诸如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这样的保守派认为，他应该保持 1985 年和 1986 年的政策，不应试图进行根本的政治变革，特别是那些削弱共产党的变革。另一方面，叶利钦和其他改革派指责他在进行政治改革方面过于谨慎，始终低估改革在苏联社会所得到的支持程度。

9.这种看法带有某种个人局限，它是诸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等戈尔巴乔夫亲密助手的见解。

10.戈尔巴乔夫：《1991 年 12 月》，第 195 页。

11.同上，第 195—196 页。

12. 1992 年 9 月 30 日，作者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的谈话。

13.赖莎·戈尔巴乔娃在向人民表达她的意见方面不甘寂寞。1987 年，她对叶利钦的敌意对她丈夫抛弃叶利钦起到了强烈的影响。她在讨论他丈夫的同僚时也并不总是很谨慎。 1990 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她就在

外交招待会上对外国人批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他建议政治局委员应该在 65 岁退休。她显然认为，雅科夫列夫是在暗示，戈尔巴乔夫应该在 65 岁退休——大约六年以后——而当时，雅科夫列夫只是为他没有重新入选政治局一事，提出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解释。

14.这是指正在讨论的时期，直到 1991 年 12 月。后来，在 1993 年他同俄罗斯议会的斗争之后，叶利钦撤消了预定于 1994 年春天的总统选举。

15.有关证据表明，瓦列里·波尔金在担任戈尔巴乔夫部属的领导人期间，也是克留奇科夫的特工人员。早在 1977 年 12 月，在华盛顿首脑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个奇怪事件就与波尔金有关。虽然没有指派波尔金参加会议，但他溜进了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秘密会议，坐在边上，进行记录。美国的与会者不大看重此事；显然，戈尔巴乔夫请他在起草完目录后进来。但后来，苏联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告诉我，波尔金参加会议一事，使他们也感到很惊讶。之所以没有把他赶走，是因为他们不想引起骚动，但是，苏联官员不知道他怎样越过他们自己的安全官员进来的。在 1991 年 8 月的政变失败后，该事件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它不能用波尔金个人的好奇心来解释；他虽然是苏联代表团成员，但并不属于参加会议的人员，他一定是由克留奇科夫派去以报告戈尔巴乔夫说了什么话。这就解释了克格勃的警卫人员为什么让他进入会议室，尽管他的名字并不在与会者的名单之内。

1991 年 1 月，在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期间，克留奇科夫与波尔金在波尔金的办公室聚会，未遂政变后，在波尔金的办公室发现了他们监听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副本。这些事实说明，他们两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16． 1992 年 10 月 6 日，作者与瓦季姆·巴卡金在莫斯科的谈话。

17.一家苏联法院后来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法令无效。卡鲁金本人仅仅靠着赢得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席位，获得了议会的豁免权，从而设法逃脱了刑事诉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在保守派领袖伊万·波洛兹科夫的选区当选，当时后者放弃了议席，接任了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职务。

第二十四章

1.《独立报》，英文版， 1982 年 7 月。

2.这是叶利钦经常进行的评论；它一再出现在其回忆录 TheStruggle for Russia （纽约： Random House， 1994 年），第 145 页。

3.《俄罗斯报》， 1991 年 12 月 10 日 ;译文见 Current Digestof the Soviet Union，第 43 卷，第 49 号（1992 年 1 月 8 日），第 10—11 页。

4.苏联的海军力量由四个舰队组成：北海舰队，基地在摩尔曼斯克；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在喀琅施塔得；太平洋舰队，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黑海舰队，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除了最后一个，其他基地都在俄罗斯领土之内，自动为俄罗斯所控制。

5.叶利钦的法令发表在《红星报》，1992 年 5 月 9 日。有关讨论组建俄罗斯军队的最初动议，见斯蒂芬·福耶：Post—SovietRussh：Politics andtheNewRussianArmy，RFE/RLResearchReport，第 1 卷，第 33 号（1992 年 8 月 21 日），第 5—12 页。

6.本·斯莱：《迅速面对渐进的经济转型》，RFE/RL ResearchReport，第 3 卷，第 31 号（1994 年 8 月 12 日），第 37 页。

7.某些了解政治内幕的人认为，哈斯布拉托夫与叶利钦的疏远并非因为有关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因为哈斯布拉托夫感到很失望，因为他未被任命为

俄罗斯总理。实际上，哈斯布拉托夫以前曾支持他在 1992 年开始加以谴责的政策。

8.例如， 1992 年 11 月，阿卡尔基·沃尔斯基在由 FinancialTimes 在莫斯科所主持的讨论会上说，那一年前 10 个月的资金流出在 160 亿到 180 亿美元之间。

9． 1992 年 9 月 19 日，作者与叶戈尔·盖达尔的谈话。

10.那四个问题和它们的票数是： （1）你信任俄罗斯联邦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吗？〔信任—58.7%，不信任—39.2%〕；（2）你赞成自 1992 年以来由总统和政府所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吗？〔赞成—53%,不赞成—44.6%〕； （3）你认为有必要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吗？〔有必要—49.5%，没必要一 47.1%〕；（4）你认为有必要提前举行人民代表选举吗？〔有必要—62.7%，没必要—30.1 %〕。这些结果显示，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中的支持者几乎是其反对者的两倍。见温迪·斯莱特：《俄罗斯公民投票中没有任何胜利者》， RFE/RLResearch Report，第 2 卷，第 21 号（1993 年 5 月 21 日），第 10—19 页。

11.从全部席位来看，俄罗斯选择占 96 席，自由民主党占 70 席，但共产党位居第三，占 65 席，而由集体农庄经理控制的农民党占 47 席，位居第四。见维拉·托尔兹：《俄罗斯议会选举：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 RFE/RL Research Report，第 3 卷，第 2 号（1994 年 1 月 14 日），第 3 页。

12.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是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 1994 年 1 月告诉我，他很自信能够取得轻易的胜利，以至于不耐烦去投票！

13.根据叶利钦 1995 年 2 月 16 日有关“ 国家状况 ”的讲话，在 1994 年俄罗斯国内总产值中，私有经济成分占 62%；公开资料研究所， Daily Digest，第 35 号， 1995 年 2 月 17 日。

14.例如，资料显示，电子消费产品从 1990 年到 1994 年底下降了 14%，而同一时期的工业生产估计下降了 44%；彼得·拉特兰：《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曲折道路》， Transition， 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12 页。

15.《论据与事实》，第 24 号， 1994 年 6 月。

16.同上，第 31， 1994 年 8 月。

17.Goskomstat announcement， 1995 年 2 月 15 日，引自公开资料研究所， Daily Digest，第 35 号， 1995 年 2 月 17 日。

1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同我就该问题进行了严肃讨论的苏联官员是奥列格·巴克拉诺夫，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国防和重工业的书记，他帮助组织了 1991 年 8 月的未遂政变。那一年 1 月，他向我了解美国立法中有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况。我从华盛顿得到了一部有关的法规，让人送到他的办公室，但我从不知道，是否有人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去明确规定，对于日益增长的私有经济成分，文职人员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能够做什么。

19.交互传真新闻机构引用了一位内务部官员的话，他在 1995 年 2 月 26 日报告，1994 年，从俄罗斯非法流出的资金总数达 500 亿美元，并仍以每月 15 亿到 20 亿美元的速度上升；公开资料研究所， Daily Digest，第 35 号，1995 年 2 月 28 日。

20.布拉藻斯卡斯击败了斯塔赛斯·拉佐雷蒂斯，后者成为移民已经有 50 年了。1993 年 2 月 14 日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是立陶宛举行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以前，塞马斯的主席就是国家首脑。

21.在 1992 年 9 月 20 日的总统选举中，吕特尔赢得了相对多数票，即 42.7%的选票，但是爱沙尼亚宪法授权议会，如果没有任何候选人得到绝对多数票，由议会选举总统。1992 年 10 月 6 日，爱沙尼亚议会选举梅里为总统，他只得到 28.8%的选票。

22.前环境部长安德烈斯·塔兰德被任命为总理。

23.《在以投票为标志的较慢改革中，爱沙尼亚政府被取代》，The New YorkTimes ， 1995 年 3 月 7 日，第 A—10 页。

24.根据协议，乌克兰将从舰队的 833 艘船中只得到 164 艘。见乌斯蒂纳·马库所：《乌克兰：政治变动中的稳定性》， Transi-tion， 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69 页。

25.乌克兰的核导弹仍然有效地控制在俄罗斯的手中,因为只有俄罗斯总统掌握着装载和发射导弹的手段。然而，如果未得到乌克兰的批准，这些导弹不得移出乌克兰。

26.见约翰·W·R·莱平韦尔:《有关核武器的三方协议》,RFE/RL Research Report，第 3 卷，第 4 号（1994 年 1 月 28 日），第 12—20 页。

27.苏珊娜·克劳：《俄罗斯议会坚持控制塞瓦斯托波尔》，RFE/RL Research Report，第 2 卷，第 31 号（1993 年 7 月 30 日），第 37—41 页。

28.在 1991 年 9 月白俄罗斯的名称正式改变之后，我在提到那个国家和它的民族时，使用的是“Belarus”和“Belarussian”，而在提到独立之前的时期时，则仍使用“Belorussia”和“Belorussian”。

29.与德涅斯特西部“摩尔多瓦右岸”不同，这一地区在 1922 年苏联成立时曾经是它的一部分，并且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自治单位。在德苏两国于 1939 年签订了纳粹—苏联秘密议定书后，苏联吞并了比萨拉比亚，比萨拉比亚与另外两个地区组成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活在“摩尔多瓦左岸”农村地区的人口主要是摩尔多瓦人，而城市人口则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其中大部分是在 40 年代以后迁入该地区的。

30.有时译作“跨德涅斯特共和国”。

31.鲁道夫·A·马克：《危机中的进步》， Transition， 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57 页。

32.伊丽莎白·富勒:《跨高加索地区:民族斗争威胁着民主化》， RFE/RL Research Report，第 2 卷，第 1 号（1993 年 1 月 1 日），第 22 页。

33.阿布哈兹族人口不到阿布哈兹总人口的 18%。格鲁吉亚族人和俄罗斯族人远远超过他们。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委员会估计，在 1992 年 8 月到 1993 年 10 月之间，阿布哈兹 54 万人口中，有高达 35 万人逃离了那里；Refugees，第 98 号（1994 年），第 22 页。在其他地区，“民族清洗”通常都是由地方当局或者实际上的多数民族来进行。或许只有在阿布哈兹，是由全部人口中的少数民族迫使其他所有人离开那里。

34.富勒：《跨高加索地区》。

35. 1994 年，联合国难民问题高级委员会估计，“内部逃难的阿塞拜疆人”至少有 63 万人，来自亚美尼亚的——主要是 1988 年——难民达 22.8 万人,两者人数超过了阿塞拜疆全部人口的 10%； Refugees,第 98 号(1994 年），第 25 页。

36.伊丽莎白·富勒：《跨高加索地区：战争骚乱，经济解体》，

RFE/RLResearch Report，第 3 卷，第 1 号（1994 年 1 月
7 日），第 54 页。

37.伊丽莎白 ·富勒 :《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之间》,Transi-tion， 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60—61 页。

38.《我们该如何对俄罗斯进行设备安装？》《力所能及的考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9 月 18 日（第 15 页特别补充）。

39.中国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但是哈萨克更担心中国的霸权，而不是俄罗斯的霸权，而且它与中国的通讯和运输的联系状况很差。

40.《今天》， 1995 年 1 月 21 日,第 2 页 ;英译本见 CurrentDi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第 47 卷，第 3 号（1995 年），第 27 页。

41.《今天》， 1995 年 1 月 21 日，第 2 页。

42.贝斯 · A · 布朗：《中亚：践踏经济》， Transition， 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55 页。

43.它们也没有答应为该地区提供发展基金。在 1995 年会议期间，纳扎尔巴耶夫说，尽管国际组织正在作出它们所允诺的贡献，但是该地区的国家却无动于衷。他说，乌兹别克斯但只支付了它保证提供资金的 2%，而上库曼斯但更是一毛不拔；公开资料研究所， Daily Digest， 1995 年 3 月 6 日。

44.参见《独立报》和《今天》中的文章，英译本见 CurrentDlgest of the Post-Soviet Press，第 46 卷，第 7 号（1994 年 3 月 16 日），第 11—12 页。

45.尽管杜达耶夫声称，符合条件的选民有 77%的人参加了投票，他得到了 85%的选票，但是据观察家报道，多数投票站甚至没有开放，而且对于票数没有进行中立的监督。参见安 · 希伊，《车臣—印古什的权力斗争》，Report onthe USSR，第 3 卷，第 46 号（1991 年 11 月 15 日），第 24 页。

46.戈尔巴乔夫最后的新闻秘书安德烈 · 格拉乔夫认为，叶利钦对发生于 1991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日之间的这次干预很生气，它很可能促使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最后决裂；安德烈 · 格拉乔夫：《今后没有我……》：《总统的离职》（莫斯科：进步出版集团， 1994 年），第 134 页。

47.《消息报》中详细地介绍了杜达耶夫的军队如何接收该地区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1995 年 1 月 10 日，文章题目：《谁武装了德佐卡尔 · 杜达耶夫？》作者尤里 · 贝斯帕洛夫和瓦列里 · 雅科夫，第 1—2 页。

48. 1991 年，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印古什人与车臣人有亲缘关系，与车臣人一样，他们也曾遭到斯大林的放逐——结合在同一个共和国中，即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然而，在杜达耶夫夺取了首府格罗兹尼的权力后，印古什人投票脱离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1992 年，联邦政府批准了这一分离，曾经是一体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成为单独的车臣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车臣共和国有大约 80 万人，印古什共和国有 50 万人。

49.斯蒂芬 ·汉德尔曼发表了对苏联解体后的犯罪行为进行仔细研究的著作，他对杜达耶夫集团在其中的作用总结如下：“ 无论杜达耶夫政府是否从非法的武器交易中直接获利，它都没有作什么努力来制止这种交易。在莫斯科，警方发现，车臣人在苏联之后的黑社会中的权力迅速崛起，这与他们在毒品和武器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有关。在杜达耶夫担任总统的两年间，车巨人

是后共产主义社会中居首位的武器商。他们在首都拥有 500 多套公寓，约 140 家商店、赌窟和烟馆，以及 6 家旅馆。尽管没有人能够就犯罪组织与格罗兹尼政府之间的联系提供确凿凭据，但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车臣帮从一个进行小笔敲诈勒索和以偷汽车为业的小团伙，发展成从事武器交易和毒品买卖的大犯罪帮派，在时间上恰好与车臣作为金融和政治势力的崛起一致。”斯蒂芬·汉德尔曼： Comrade Criminal ： Russia’s NewMaflya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20 页。50.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参见公开资料研究所， DailvDigest， 1995 年 2 月 24 日。51.《消息报》， 1995 年 1 月 5 日和 6 日。